最後的貴族



# 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一纸清诗吊兴废　山色江声共寂寥

李喜所　胡志刚　著

東方出版社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莫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自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沉的民族自尊。

——梁思成

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梁思成

当时的匠师们，每人在那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中工作，犹如大海扁舟，随风飘荡，他们在文化的大海里飘到何经何纬，是他们自己所绝对不知道的。在那时期之中，只有时代的影响，驱使着匠师们去做那时代形成的样式；不似现代的建筑师们，自觉的要把所谓自己的个性，影响到建筑物上去。

——梁思成


ISBN 978-7-5060-3714-3
9 787506 037143 >
定价：48.00元

K826.1
12-4

最後的貴族

# 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李喜所 胡志刚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贵族：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 李喜所 胡志刚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60-3714-3

Ⅰ.最… Ⅱ.①李…②胡… Ⅲ梁思成(1901~1972)-家族-史料

Ⅳ.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7674 号**

**最后的贵族——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ZUIHOU DE GUIZU——LIANGSICHENG DE QIANSHIJINSHENG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姚 恋

**封扉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東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 65289539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9 千字

**I S B N：** 978-7-5060-3714-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 贵族与贵族文化

社会是分阶层的，人也是分穷富尊卑的。没有地位各不相同的族群，就不成其为社会，竞争的活水源头也就枯竭。彻底消灭贫富贵贱，实现人人绝对平等、整齐划一的“世界大同”，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停留在纸上的“理想”。能够达到多数人自食其力、尽心尽性、各得其所、平安快乐，使阶层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和睦相处，就算很了不起的太平“盛世”了。贵族作为富有而尊贵的一族，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阶层，只是人数相对较少，处于社会宝塔的顶上，让社会大众可望而不可即。曾几认为贵族是革命的对象，可憎可恨，这种观念是错误且离谱的。其实，贵族以其特有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文化底蕴、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贵族文化，从而成为一个正常社会无法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失去了贵族，不仅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民族文化的构建也难以圆满丰硕。贵族和贵族文化特有的示范和导引功能是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

贵族基本都拥有令人惊羡的财富。贵族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大量的财富做基础。众所周知，财富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源泉，亦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象征。人们从来都对有能力的强者给予由衷的尊敬。但是，有钱的人并一定会被大众划入贵族行列。李鸿章应该说钱财惊人，但谁也不承认他是贵族；袁世凯也是金钱无数，他也不可能为贵族所接纳。那些贪官污吏、江洋大

盗、流氓政客，也有不少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但绝对和贵族不沾边。原因是这些人富而不贵。所以，财富和贵族不是有甲必有乙的因果式的必然关系，而是成长为贵族的一个起码条件。从有了钱到蜕变为贵族，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和李鸿章有血缘关系的张爱玲，可以说是贵族，但那是李鸿章死后多少年的事了；袁世凯的后代中，袁家骝应该说是典型的贵族，那也是经过两代积累了。宋氏家族中，宋庆龄的父辈基本是积累财富，到宋氏三姐妹这一代变成了贵族。本书的主人公梁思成，也是前辈为他打造了必要的根基。其父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的普通农家，经过不断拼搏，从梁启超维新领袖发展为民国的财政总长、清华教授，政坛学界，赫赫有名。随之，财富也有较大的积累，虽不能说大富，但也非一般丰衣足食的人家可比，从梁启超能够在北戴河买一栋别墅即可知一二。这为梁思成步入贵族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们常说，培养一个贵族要几代人的努力。仅是财富的积累就非一日之工啊！何况，仅有钱还远远不能让人们尊为贵族。

贵族大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的“大款”绝对成不了贵族。尤其在清末、民国，教育逐步向全民转化，接受良好的教育已经变成民众的共同追求，对贵族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而且，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国学、西学兼通才是人们眼中真正的有学问者。那时的贵族多数顺应了这种潮流，不仅以“洋化”为时髦，而且以受过西方教育为荣耀。所谓贵族文化，学贯中西是基础。例如本书要讲述的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启蒙教育是东洋文化，1913 年回国后又在中西合璧的清华学堂苦读 8 年，1924 年往美国留学，5 年后学成回国，任教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是一位典型的“中学、西学皆有根底”的新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其父梁启超苦心安排的结果。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的一位楷模。他的 9 个子女，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 7 个出国留学。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梁启超还想方设法为他们增补国学。梁启超一贯认为，不通中学者，西学也学不好；不懂西学者，中学则难精深。为了给子女补习比较缺乏的古典国学，梁启超除了自己抽时间给他们讲解外，还在家里开设补习班。他的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1924年以后，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渐渐长大了。比他们大的哥哥姐姐们都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年龄小的一组孩子在身边，全家住在天津。但公公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很忙，初期忙于政治活动，后又远行欧洲考察……所以在天津的时间不多，对于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为了提高充实他们几个人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决定让他们几个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补课，特聘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当时（1927年暑假前）五舅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初一，准备升入初二。

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

据五舅回忆，补课的课程为：

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

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

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

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在短短一年多的补课的紧张学习中，五舅的国学、史学方面的知识有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受益匪浅。（《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85页）

梁启超如此重视子女的教育，梁思成不成为有文化的贵族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情况下，有钱人家的子女教育较平民家庭要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贵族生活往往使子女失去奋发向上的刻苦奋斗精神，甚至会堕落为纨绔子弟。所以，富家子女的教育尤显重要。一旦富家子女的教育成功了，往往会出类拔萃，甚至会成长为耀眼的社会明星。和梁家一样，产生《雷雨》

故事的周家，即贵族周学熙一家，更将子女的教育放在治家首位。其儿孙从孩童时起，就雇有英文、日文、法文等专职教员手把手地认真教授。周家后代出了不少知名的文化贵族，和其教育成功密切相联。没有文化积淀的富翁进入不了贵族的行列；不用文化继续武装后代的贵族家庭也难以延续贵族的尊荣。

贵族还必须具备幽雅的气质。谁都明白，高贵气质的养成非一日之功。较之积聚财富和文化修养，贵族的气质修炼最难。人的气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很难给予一个十分清晰的答案。按一般推理，气质应该是性格、生活、文化、职业乃至遗传等多种因素综合运作的产物。一个人的气质如何，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身份和人生态度，可见气质对人的定位何其重要。如果将个人扩充到整个社会，幽雅的气质则是社会文明与和谐稳定的必备条件。假如像人们所期待的男人绅士、女人淑女，社会的高雅自然就不期而遇了。至于说到贵族的气质，当然应该成为社会的典范。这种贵族气质的核心就是对美的追求，包括人们所熟知的仪表美、心灵美、行为举止美等。所有的美中，心灵美最重要，没有心灵的美，其他任何美都谈不上。心灵是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试想心灵不美，哪来的其他美呢！富翁可以过钟鸣鼎食的优越生活，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有文化、有地位，但如果没有一颗美的心灵，就不可能有幽雅的气质，人们也不会将其视为贵族。本书重点评述的梁思成，虽不能说其是美的象征，但他一生始终追求美，尤其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他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从不居功自傲，脚踏实地为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奋斗了一生。从小养尊处优的贵族式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失去在艰苦条件下生活的能力。抗战时期，他在四川李庄的生活极其艰苦，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夫人林徽因还患肺结核卧病在床，梁思成仍然一面工作，一面精心照顾夫人。做饭、蒸馒头、炒菜、做四川泡菜、做新鲜果酱等，梁思成都很拿手。经济困难，他就变卖衣物，一心为夫人增加营养。梁思成经常乐观幽默地对家人讲："这只名表'红烧'了吧！这件大衣'清炖'了吧！"如此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绝非"贵族"一虚架就能办得到的。古语称"仁者寿"，原因是"仁者"有良好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至于说到梁思成的幽默，那是很出众

的。和他在一起，让你轻松自如，妙趣横生。关于这一点，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对其二舅有生动的描述。仅举一例：

> 50 年代初，妈妈接二舅到北京大学我们家休养。一天吃饭时二舅又对妈妈说："唉！我是个'无齿之徒'，有不白之冤啊！"吓了我们一大跳。原来他说自己没牙齿是"无齿之徒"，而他到老还是满头黑发，有不"白"之冤。（《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67 页）

幽默并不是谁都可以装出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其是人的气质的一种外在表现。梁思成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新知识分子高雅的学者气质。而其夫人林徽因则具有一种几乎高不可攀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绝代美女型气质。南开大学一位著名的数学女教授晚年曾在《今晚报》撰写回忆录，讲述其半个世纪以前偶遇林徽因的情况：

> 1930 年春夏之交，我因病休学，在香山脚下亲戚家的别墅休养，有一天同一位朋友上山游览，半山上一顶山轿下来，我看见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士，她容貌之美，是生平没有见过的，想再看一眼，轿子很快下去了。我心中出现"惊艳"两字。身旁的人告诉我，她是林徽因。用什么现成话赞美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什么都套不上。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从容貌和眼神里透出她内心深处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我今生今世，认定了她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美人。没有一个人使我一瞬难忘，一生倾倒。

作为美的化身，在林徽因身上真正达到了外在美和内心美的统一。而文中的所提的"内心深处骨头缝里的文采和书香气息"，在林徽因身上是，在梁思成身上亦是。贵族气质已内化为一种超然于世外的品性。富贵时从容，困顿时亦优雅。





贵族之所以被尊重，还在于有高尚的人格。做一个尊贵的人，绝不是靠权力，更不是靠金钱，靠的是人格。你要被人尊重，首先你要尊重别人；你要被人爱戴，首先你要爱戴别人。人格的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影响力确是长远而持久的。历来的有识之士，从来都把人格的培养、家风的建设，放在首位。修身才能齐家。一个家族的败落，首先是从家风的堕落开始的。败家子儿真正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挥霍钱财，更在于其将家风彻底败坏了。人格是一种操守，一种精神，是做人的灵魂。前面讲到的梁思成夫妇，之所以被后人怀念、尊敬，人格的魅力最为重要。他们真诚无邪，爱国敬业，忘我奋斗，追求新知，从不屈从于权力、权威的压力，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知、真理，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少有的风骨。林徽因一向以敢说敢做著称，人称“刀子嘴，豆腐心”。她每周在家里举办的茶会，将北京的社会名流聚集在一起，品茶消遣，交流学术，议论时政，被人誉为迷人的“太太客厅”。每次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她那发人深省的见解，真诚的态度，毫不客气的辩驳，总是为人倾倒。假如她是一个虚伪做作的人，“太太客厅”是难以长久的。为了他们一生钟爱的建筑学，林徽因不顾体弱多病，陪梁思成坐牛车甚至步行，到各地调查古建筑。梁思成的不朽名著《中国建筑史》，就是以他们实地考察得来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运用现代理念和最新方法，再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美设计和高超技能，被誉为建筑学的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北京城墙，建议将这一世界唯一的古典文化遗产建成环城带状公园，供市民游玩和中外游客参观。但由于毛泽东要拆，他当然失败，只能将珍贵的建筑资料偷偷收藏起来。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仍难幸免，被造反派焚烧。值得敬佩的是，梁思成无论遇到多大压力，在真理面前决不让步。即使在“文革”那样求生难、求死亦难的岁月里，梁思成仍然认定他是正确的，并坚定地预言：“我的真理将要胜利！”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于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所谓贵族文化，并非一般所理解的享乐文化，而是一种精英文化。诚然，贵族也参与创造享乐文化。诸如收藏、游戏、旅游、饮食、养生、服饰、娱乐等休闲文化的崛起过程中，贵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但这些在贵族文化中不占主导。相对于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占据的是带有示范意义的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位置。其彰显的是智慧、能力、品位、道德、慈善、美丽、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贵族一旦失去了这种高雅、尊荣的文化支撑，就将异化、败落，逐步从有地位转化到无地位，从受人尊重转化到被人鄙视，从社会精英变为无耻恶棍，从富翁变成穷人。即使有个别的可能仍然富足，但由于为富不仁，被大众唾骂，与贵族绝缘。所以贵族文化是一种“富”而“仁”的文化，代表的是民族的智慧、道德的楷模和人类的美好追求。名符其实的贵族越多，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应消灭贵族，更应理直气壮地呼唤贵族。

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 第四章　与时间赛跑



## 第五章　1948年的首选院士



## 第六章　新时代，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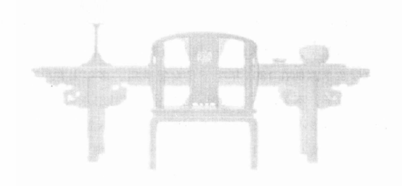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大匠的困惑



## 第八章　尾声——于平凡中传承家风

# 第一章

## 世家温情——从“双涛园”到“饮冰室”



## 一、"思成梁启超"

1901年4月20日，是日本东京樱花绽放的时节，在家人的热切期盼中，一名中国婴儿降生了。毫无疑问，他的到来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愉悦，尤其是他的父亲——戊戌变法的卓越领袖之一——梁启超，更是喜出望外，以至于两年多来把命运突变、亡命东瀛的坎坷经历都暂时抛到脑后，面对道贺的亲友，频频揖首致谢，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无论家人，还是亲朋好友，欢喜之余，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取名思成的孱弱男婴，日后会成为古老中国最早一批系统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留学生，在古建筑研究、保护与现代建筑教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梁启超乃至整个梁家的当然继承人——名誉与人格的继承者，而且，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他的命运颇似窗外盛开的樱花，烂漫与璀璨显得那么的短促，以至于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命运的重压下顽强地拼搏，直至最后一息。

在社会上，人们都称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但在梁家，他的弟妹们却称之为二哥，说起来还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故事。原来，梁思成出生前，他的母亲李蕙仙在1893年生下长女思顺后，多年未有生育，后虽于1900年生下一子，不久即不幸夭折。在梁家对男性继承人的热切盼望中，思成出生了。但很快，大家又开始为刚刚出生的小思成的健康状况所深深忧虑。他不仅非常瘦小，而且两条腿向外撇开，两个脚尖相对，看起来象是一个畸形儿。后来，在一位外科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小思成的腿总算矫正过来了，但脚板依然不像正常孩子的双脚那样平整。年幼的思成体弱多病，全家想尽了种种办法，都不能使他的身体强壮起来。直到有一天夜晚，李蕙

仙梦见一个婴儿，不停地向她啼哭，吓得她从梦中惊醒。和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的做法一样，梁家认为这个梦不寻常，其中必然隐含着某种启示，于是请人来圆梦。圆梦先生告诉他们，梦中啼哭不休的婴儿即是那个死去的长子，他在要求梁家承认他的地位。于是，梁家便将长子的位置空下来，而改称思成为二子，弟妹们则称他为二哥。奇怪的是，从此之后，梁思成的身体就逐渐好起来，在清华上学的时候，还成为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或许是出于对这种奇异现象的敬畏，梁家后来延续了这种做法，对于早亡的孩子，都给他（她）们留下位子，所以，梁家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虽被称作八弟，而实际上他是梁家长大成人的五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

梁家是一个大家庭，先后有 14 个孩子出生，最终长大成人的有 9 个，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贵族家庭：父亲梁启超学识渊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收入颇丰，妻子儿女，衣食无忧；母亲善良贤惠，教子有方，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尊重老者，爱护幼童。传统大家庭的一团和气与其乐融融，在此得以尽情展现。天伦之乐，处处洋溢。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梁任公融汇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的人生实践中。

1927 年底，在梁思成即将完成学业并准备新婚之际，梁启超很严肃地告诉儿子："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人的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际遇——梁启超家书》，77 页）随着梁思成逐渐长大成人，梁启超愈发坚定了自己的这一抉择，在不遗余力地精心培养心爱的长子、并殚思竭虑地为其发展做出种种设计与安排的同时，他开始能够很欣慰地为儿子不断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梁思成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建筑学家，而此时梁启超已告别人世多年。今天，我们慨叹梁思成在那么艰苦的年代里，能够在研究与保护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教育

等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同时，更为其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忠诚、对事业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和对生活乐观向上的豁达态度深深感动，就总的社会影响而言，梁思成很难超越他的父亲，但梁思成却从未停留在父亲巨大声望的荫护下，他一生都在为自己挚爱的建筑事业而不懈努力，甚至不惜以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而且，在终生奋斗过程中，他始终在执著、顽强地实践着梁家的精神遗产——爱国、向上、豁达、永不退缩。这也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大的财富。

梁思成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横滨，再到神户郊外的须磨，都留下了他成长的足迹和美好的记忆。说起这段生活，还得从梁启超逃亡日本说起。

1898 年 9 月 21 日戊戌政变，紫禁城血雨腥风。康有为见势不妙，先是化装出逃天津，然后又逃往上海、香港，再后来逃亡至日本。梁启超的出逃则在惊险愤慨之中多了几分戏剧性。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和谭嗣同高谈阔论，策划待袁世凯杀掉荣禄之后，如何进一步扩展维新事业。不料，突然传来了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的消息。梁、谭二人大惊失色。接着，火车停开，暗探密布，想逃出北京已非易事。无奈之下，梁启超前往日本驻华使馆避难。在与谭嗣同等人作最后努力挽救维新事业未果之后。9 月 24 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梁启超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天津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据说，梁启超一到天津，就被盯梢的暗探发现。只因他们行动迅速，才没有落入官府之手。紧接着，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周围暗探密布，梁启超很难脱身。25 日晚 9 点，梁启超等四人化装成猎人，乘暗探不备，偷偷潜出领事馆，钻进海河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日本船内，急向塘沽驶去，准备上日本商船玄海丸，逃往日本。一小时后，忽听岸上马蹄声响，20 多名清廷巡警气势汹汹赶来，不让该船行进。原来，清廷暗探还是发现了梁启超的行踪，并误认为是康有为。巡警以船上藏有康有为为名，逼迫该船回驶，日人则拒不听命，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巡警惧怕引出中外交涉等麻烦，两小时后，决定派一半人回津向荣禄请示，另一半随船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不料，日本人不理那一套，将巡警轰下船，开航驶往塘沽。26 日凌

晨，日船抵达大沽口。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即与之联络，获同意后，梁启超等人顺利上船，安然无恙。清廷巡警一来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直接冲突，二来也没有接到上司的新命令，干瞪着双眼，让梁从他们眼皮底下顺利离开了。上午9点半，直隶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事吕宗祥等30余人，奉荣禄之命飞奔塘沽车站。当得知逃犯已经躲进日本军舰之后，聂士成暴跳如雷，一定要上舰抓人。王、吕二人苦苦相劝，害怕引发中日冲突。不得已，聂士成方息怒而归。随后，荣禄又派人前往日舰交涉，要求交人，被日方一口拒绝。26日午后，随着日本军舰拔锚启航回国，在激愤、忧虑、奋进的复杂心情中，梁启超踏上了流亡道路。

一直到1912年才正式结束了流亡生涯，其时梁启超前后在日本度过了十余年的光阴。其中的种种辛酸磨砺，恐怕只有梁启超本人才能深刻体会。但流亡的日子并非黯淡无光，生性热爱生活的梁启超在竭尽全力给予家人和子女以幸福温馨生活的同时，也从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先是住在东京的牛込区马场下町，生活比较便利。此时，他的全家及部分族人也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清政府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逃亡生涯。他们先是逃到离家乡不远的澳门，当得知梁启超已在日本的消息后，纷纷到日本投奔梁。无论出于道义，还是出于传统的家族观念，梁启超都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后来，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主编，一度将全家安置在报社二楼。但随着人口的增多，梁家的住房日益显得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又使得梁启超很难改变这一现状。到了1906年，一位倾心于改良事业、又非常敬重梁启超的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慷慨地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名为“怡和山庄”的别墅借给了梁启超及其家人以作安居之所。于是，梁启超带领全家搬到了那里。“怡和山庄”的幽雅环境立即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梁家人。尽管略显偏僻，但这里依山傍海，背后是苍绿的山林，清风徐来，松涛声声，是那么遒劲、悠远；前面则是浩瀚的大海，海风阵阵，波涛拍岸，是那么清脆、悦耳。对于从小生活在海边的梁启超来说，大海并不陌生，但这里的优雅别致、清新爽快深深地感染了他和他的家人。高兴之余，梁启超将自己的

新住所形象地改称为“双涛园”。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等子女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双涛园”的故事也由此开始，清贫而趣味无穷，以至于许多年后，梁思成还常常在梦中重回童年时代。晚年的梁思成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 我自横滨时期开始晓事。父亲当时在编一份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印刷厂的二楼就是我们的家。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很慈祥温柔，像妈妈和姊姊一样。
>
> 日本地震多。每次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母亲是缠过脚的，下楼不太方便。
>
> 差不多在我六岁那年，我们搬到了须磨，住的是一栋华侨拥有的别墅，有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往海滨的松林。父亲称这地方“双涛园”，因为听得见海涛声和松林间的风声回荡。
>
> 堂哥堂姊们和我一块儿从家里步行到通往神户的火车站，搭车到神户同文学校上课。火车查票员待我们很和善，即使一天没去上学，他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2—13页）

“双涛园”的无穷乐趣不仅在于其优美景致，更在于一大帮天真烂漫的孩子。这其中，既有梁启超的子女，也有几个寄居于此的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大的十几岁，小的刚刚蹒跚学步，但年龄的差别并不妨碍玩闹。梁启超在紧张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陶醉于孩子们的欢乐和嬉笑中，流亡生活的困苦，对祖国命运的忧患，壮志未酬的失落……一切一切的不如意都在孩子们的笑语声中烟消云散。他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起了一个足以体现他心情的称呼——“双涛园群童”。

在平常日子里，“双涛园”中大一点的孩子会在思顺的带领下去神户上学。此时的思顺尽管只是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但在弟弟妹妹的心中，她

已经是一位代表父母行使长女职责、并具有足够权威的长者。事实上，梁启超也一直愿意和自己心爱的大女儿商量家里的大事小情。学校离家很远，孩子们要早早地出发，并要步行很长一段路程，然后再乘小火车。但毫无疑问，上学，对于这群贪玩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有了无限的乐趣。在梁思庄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恐怕要数二哥梁思成上学途中的滑稽习惯：年少的思成每天早上赶火车时，一定要在途中拉一泡屎，然后才如释重负，继续前行，每天如此，鲜有或缺。有时眼看小火车就要开走，孩子们急得直跳脚，然而可爱的小思成必须完成此项“功课”，方能同大伙继续前进。

上学之余，“双涛园”之后的山林就成了孩子们真正的“天堂”。樱花烂漫的时节，大人们登山赏花，孩子们则前后奔跑，嬉戏不息，都要玩“疯”了。有时，孩子们会跟着父母，带着小炉子和酱油等佐料，在松林中，踩着厚厚的松叶，四处寻找鲜鲜的松蘑，边烤边吃。风景之美，松蘑之香，气氛之和谐，以至于长大成人后的“双涛园群童”每每想起，都会留恋不已。

暑假的时候，梁家经常去海滨游泳，清澈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立即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梁启超专门聘请了一位退役的日本海军军官担任孩子们的游泳教练。教练在海滨浴场开了一家卖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岁上下，游泳很棒。他要求孩子们在每次下海之前，必须帮他把小店的杂活干完，然后才能在海边沙滩或海水中尽情地嬉戏玩耍。

有一年夏天，梁启超的老师、也同是维新战友的康有为来看望他们。显然，迂腐的言行、裹足不前的思想和日趋强烈的保皇观念使他不仅很难再重温昔日与梁启超师徒之间的默契与共鸣，而且不知不觉中成为“双涛园群童”的共同敌人。因为康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正在进行着的孩子们和父母的水中“狂欢”，而且他们也时常看到父亲和“康老头”正在为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而争论不休。孩子们决定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对“康老头”进行报复。他们刚刚学会的潜泳技术派上了大用场。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一同下海游泳时，孩子们便潜入水中，然后悄悄地游到康的身旁，使劲

揪他的颌下胡须，疼得“康老头”唏嘘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晚年的梁思成还清晰地记得关于康有为这个“老古董”的一些轶事，最有意思的恐怕莫过于康有为剪辫子的故事。

> 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仍留着他那满清帝国的大辫子。所以出出进进招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父亲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好像举行什么盛大典礼一般，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着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祈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宣读了一篇祭文是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也是大体相同的词句念了一遍。每念完一篇就行一次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才坐下来。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已经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要理发。等他刚拿起剪子，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也吓掉了。（《困惑的大匠·梁思成》，6页）

“双涛园”的闲雅生活并未影响梁启超的事业，他依旧终日忙碌，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竭尽所能地四处宣传改良思想。工作之余，和孩子们的相处无疑成了他放松自我的最佳方式。“双涛园群童”的记忆中，一个很难忘，也是很常见的镜头便是晚餐餐桌边全家的团聚，梁启超是这聚会中的当然主角。通常梁启超会倒上一壶酒，边喝边谈，海阔天空，天南地北，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渐渐地，那些原本陌生的英雄们及其事迹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并暗暗立志：要努力成为民族的英雄，让敬爱的父亲为自己而骄傲。

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在风景如画的“双涛园”度过了七年时光。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梁启超爱之又恨之的满清王朝。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个人的理想，梁启超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双涛园”，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开始一段更加辉煌、也更加波澜壮阔的人生征途。一年后，怀着

依依难舍的心情，“双涛园群童”在妈妈李蕙仙的带领下回到了中国。对于他们中的很多孩子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气息，但祖国的观念早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牢牢树立。

## 二、维新英雄

在梁思成的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他的父亲梁启超。从求学，到择业，再到婚姻；从做人，到做事，再到做学问，梁启超都倾注了极大心血，他将其渊博的学识、跌宕的经历和精深的感悟化作亦师亦友般的循循善诱，帮助和引导着自己的子女。民国初年，梁家已经进入上层社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上流士大夫家庭，但梁启超却总是督促子女要养成“寒士家风”，上进、好学、勤俭、坚忍。梁家子女个个成才，人人爱国，既是对这种“寒士家风”的最好继承和发扬，更是对父亲的思想和精神的薪火传承。

下面，我们首先走进梁启超的人生舞台，对他辉煌而变幻莫测的人生作一巡礼。或许，透过任公的人生经历，我们能更深入地体会和把握梁思成的人格和风格。

1873 年 2 月 13 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西汉时称四会县，晋更名为盆允县，南朝刘宋时置新会郡，隋朝废郡改县。从新会县城往南约二三十公里，便是茶坑村。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但天气易变，往往一日之间，风雨凉热骤易，令人难于应付。同时，会有台风侵扰，天灾伴随着人祸，不时袭来。从晚清的多种文献来看，生活在这鱼米之乡的人们，并





不富庶。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天灾和人祸的侵袭，再加上生产水平的低下，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艰苦的乡村环境养成了茶坑村民十分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善于应付各种突发事变，勤劳俭朴，务实，求变，爱乡，敬业，崇尚封建义理，信神鬼而不乏迷信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这种乡风，即使在有了很大变异的梁启超身上，也隐约地有这样那样的反映。

19 世纪 70 年代，尽管地处"中国极南"、远离北京紫禁城的茶坑村民仍然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古朴、有序、守成、封闭而又缺少生机的节奏平静的生活，但大清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事实上，到了 19 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凭着强大的武力和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轴的经济实力，已经将全世界联成了一片，清廷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美梦不可能做下去了。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清政府门户洞开，广州城外的炮声不时使近在咫尺的茶坑村的老百姓震惊；三元里 103 乡村民的英勇反侵略斗争，也给梁启超家乡的父老兄弟以巨大的鼓舞。1857 年英法联军在珠江口外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给新会县一带的村民带来了灾难，珠江三角洲的士农工商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伴随着殖民主义的腥风血雨，距新会县 150 多公里的花县出了一位洪秀全。他高举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大旗，试图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农民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这场农民大起义虽然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悲壮地失败告终，但给中国人民尤其是梁启超故乡的人们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思考。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反抗，使清廷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1861 年后，清廷不得不举办洋务运动，对外开放，"师夷之长技"，企图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的内核。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并没有使清政府强大起来，但在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1872 年，离茶坑村六七十公里的南海县出现了继昌隆缫丝厂，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此后不久，新会县也设立了缫丝厂。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疑给清廷封建主义专制大厦的墙角划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给珠江三角洲带来了新的希望。

古老的中华大地在这种血与火压迫下的新陈代谢，迫使一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去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对策。魏源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写了《海国图志》，呼吁向西方学习；徐继畬在1848年刊印了《瀛环志略》，公然颂扬华盛顿；离茶坑村仅几十华里的香山县的南屏村，贫家子弟容闳已经赴美国留学，并在梁启超出生的前一年率詹天佑等30名幼童赴新大陆学习西学；比梁启超大7岁的小同乡孙中山在香港学习了一段西医后，又奔赴美国的檀香山，构筑着新的救国方案；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在南海县西樵山宁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试图从古色古香的经卷中寻求再创一个新世界。

环境在变，人也在变。这种急剧变化、新旧交替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梁启超不甘居人之下、追求真理又天资聪明的自身条件相结合，就使他不可能在其先辈走过的道路上亦步亦趋。

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言，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和父亲梁宝瑛属于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做事认真，为人公道，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地主文人的标准评论是非得失。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常表现出惊人的学识，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从来不把他以常人来看。祖父梁维清更把梁启超看做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在诸多子孙中，爱梁启超“尤甚”。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倾注在梁启超身上，千方百计诱导、教诲，希望他耀祖光宗。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育下，梁启超学业大进。8岁即可学做八股文，9岁就会写洋洋千字的小文章。“神童”之称在茶坑村一带渐渐传开。有亲朋好友来梁家做客，无不夸奖梁启超的聪明，有的还出题相试。有一次，一位教书先生来拜会梁宝瑛，启超立于旁，这位先生即高吟一句：“东窗客赏陶潜菊”，令启超来对。梁启超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在座者齐声喝彩。梁启超对诗如流的佳话一下子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还有一次，梁宝瑛的一位好友来梁家做客，启超恭恭敬敬地端上茶来。客人想一试他的聪明，顺口出一句“饮茶龙上水”，命梁启超即对。他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客人拍手称赞，并解释其高妙之处，他出的上句是新会县一带的土语，启超所对的也是新会县的土语，且雅俗相配，妙哉！

从此以后，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梁家的好友，常令梁启超对诗，启超的天资聪明也越传越神。

茶坑村有一座古庙，构筑精细，风格典雅，内藏40多幅古画，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挂有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24位大忠臣图像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24位大孝子的漫画。每当元宵佳节，庙内灯火通明，彩带飘舞，锣鼓喧天，游人在赏灯欢乐之余，可以领略这些忠臣孝子的忠孝精神。梁维清则把这种节日观光作为教育子女的有利时机，每年正月十五一定要带梁启超等人进庙赏景观画，进行教育。一会儿指着岳飞的画像讲述其英勇善战，精忠报国；一会儿又指着朱昌寿的画像，述说他如何行孝，怎样弃官寻母。孩童们个个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每到此时，好奇而善学的梁启超总是认真倾听爷爷的教诲，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同时暗暗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反过来又向他人讲解。每遇及此，梁维清总是摸着花白的胡须，得意地微笑。一来赞叹梁启超的聪明，二来对这种形象生动的教子方式，颇多自得。

梁家的祖坟在崖山。这里濒临大海，石厚土薄，又是南宋末年与蒙古铁骑血战的古战场。当时南宋皇帝赵昺被逼得走投无路，大忠臣陆秀夫誓死抗战到底，与元军激战。最后，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无处可逃。万般无奈，陆秀夫先将心爱的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背着赵昺投海自杀，演出了南宋灭亡时极为悲壮的一幕。富有民族意识的梁维清常来此凭吊陆秀夫，寄托对忠臣赤子的哀思。每当清明时节，杨柳依依，鲜花盛开，百鸟争鸣，梁维清就划一小舟，带上梁启超等儿孙前往崖山扫墓，一祭祖先，二怀南宋时像陆秀夫这样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船接近崖山时，有一怪石，高数丈，突伸大海之中，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个大字。舟行至此，必下船观赏，讲陆秀夫君臣之英勇，念南宋灭亡之可悲，还要吟诵各种纪念英雄的诗词歌赋。这种满怀激情的慷慨悲歌，是极为形象生动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弦外之音是发泄对清廷以满洲贵族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不满。这对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坚持改革有一定的影响。

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梁家也极为重视。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其祖父

和父母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梁家决心要把梁启超培养成一位具有“仁义礼智信”道德情操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力的封建社会的强人。有一次启超说了谎话，其母不仅责骂，而且警告他，如果不进行好好的道德修养，将来就没有立身之地，甚至于变成盗贼，沦落为乞丐。这对童年的梁启超触动非常大。多年后，他还写文章回忆这件事。

封建时代，年轻人的理想道路是读书—考科举—升官发财。梁启超也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而且较一般人早得多。

1882 年，刚满 9 岁的梁启超就在家人的催逼下前往广州考秀才。那时还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去广州应试的人通常是合伙买一条木船，由新会沿西江而上。时值 11 月，稻花飘香，金秋送爽，西江清澈见底的绿水，两岸远去的青山倒影，使这些憧憬于美妙前程的读书人顿生无限诗情画意。年龄最小的梁启超，面对这些兄长、叔伯，甚至四五十岁的长辈，不免有几分怯意，但那急盼望出人头地的心情又使他有一点自负，总想寻求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学。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天中午，大伙儿正在舟中共餐，米饭加咸鱼，有人突然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作句。当满船学子还在苦思冥想之际，梁启超已经在那里引吭高歌：“太公钓鱼后，胶鬲举盐初。”诗句风格典雅，故事动人，抒发了成大事业者不畏失败的奋斗精神，既富有诗情，又寓意高远，博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大家无不惊叹这位初出茅庐的“神童”不寻常的才华。这就是时至今日仍在新会一带广为流传的梁启超舟中吟诗的故事。

这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但毕竟从边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科举考试的实践经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1884 年初冬，梁启超第二次往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成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主考的广东学政使叶大焯惊喜交加，特地找梁启超等几个年龄小的秀才，再考他们的“文艺”。惟独梁的对答条理清晰，极少差错。叶叹服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之后，梁启超鼓起中状元的理想风帆，一方面抓紧钻研科举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博览群书，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才学与日俱增。为了有更快的进展，1885 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

东的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旨在给秀才们提供一个继续深造的场所。该校先生称山长，一般有8人，必须人品好，学问深，在学界有一定的地位，督抚到广东赴任时都要前往拜谒。学海堂分专课生和附课生两种，以治经学为主，学生又称“专经生”。每月初一，山长和学生共餐，相互交流感情。学堂还设有“膏火”——即奖学金——奖励学业成绩优异者。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经常得奖。他爱书如命，把所获奖金全用以购书。每当寒暑假回家，总是背着一大捆书，如《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读书面大大扩展了。

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各个书院虽然风格不一，但皆以清代一直比较流行的注重考证、辨伪、求得经书的本源和含义为主，较少涉及义理的发挥。这虽然对梁启超的创造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学问做得很扎实。1888年，15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的院外生。先后教过梁启超的先生有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其中以石星巢对他影响最大。

从1885年到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读了近五年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汉学基础。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的学术研究，得益于在广州五年苦学扎下的深厚根基。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神态潇洒，踌躇满志，大有当今天下舍吾其谁的宏图大志。9月，他往广州参加乡试，主考官是李端棻和王仁堪。梁启超胸有成竹，从容应考。据上海《申报》9月6日所载，考题是：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发榜之后，梁启超成绩斐然，中举人第八名。李端棻欣赏启超的品貌和才学，将妹妹许配给了这位翩翩少年的举人老爷。抑制不住心头喜悦的梁启超更相信了宋代以来就广为流行的格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清制，举人即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考中后就有官做，即使落榜，根据不同情况也会给知县、教谕等职位较低的官，也就是说可以挤进官场了。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的梁启超，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使祖父、父母多年的宏愿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但是，恰此此时，梁启超遇到了康有为，康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特殊的知遇，使梁启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追求发生了新的转折。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意义。他选择跟随康有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触及到了时代的脉搏。这是由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康有为所占有的政治地位促成的。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步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从6岁开始，他就读《论语》《中庸》《大学》《孝经》等书，背诵各种诗词、古文，也学习史学、经学等，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基础。1874年，17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卷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反思，心潮滚滚，思绪万千。1876年，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朱次琦在南海县的九江镇办起了礼山草堂，康有为欣然前往，拜朱次琦为师，学业大有长进。但是，康有为志在改造中国，从朱次琦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并没有使他悟出改造中国的出路。1879年，他茫茫然来到西樵山日夜苦思。他在自编年谱中称：“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1879年底，康有为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30多年，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基本建立，并显露生机。繁华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高楼使康有为赞叹不已；崭新的思想和学术文化更让他应接不暇。尽情地领略了香港的风光之后，康有为购买了一批书籍和地图，又开始了新的钻研和思考。

从香港返回南海后，康有为在读书时开始注重中学和西学的比较，着力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西学知识虽然是有限

的和肤浅的，又多为自然科学，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由自然引申到社会，由科技联想到人生。而且，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弘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重视从古典学术的一般论述中去放言高论，借以表达其思想倾向和各种新的观点。他已经逐步成长为较有造诣的今文经学大师，鸦片战争以来继龚自珍、魏源之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

1888 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面对国家的破败，民族危机的加深，官场的黑暗以及民众生活的困苦，他毅然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从国际背景、中国前途、社会矛盾、官吏民情等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并声色正厉提出，如果不变法，中国国将难保，朝廷将危在旦夕。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一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胆敢对朝廷指手画脚，是有可能遭杀身之祸的。康有为此时的胆识和勇气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幸的是，一帮腐朽官吏怕此书上达给自己惹祸，只是将上书扣压下来，并未追究康有为的责任。

1890 年，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云衢书屋执鞭开讲。梁启超来到这里，成为康有为最早的学生。接着，陈千秋等 20 多位少年也投入康有为的门下，潜心求学。康有为一整套学术和政治理论得以宣泄。1891 年，学堂迁至长兴学舍。到了 1893 年，因为人多，容纳不下，又迁往万木草堂。这里树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好地方。梁鼎芬有诗称：“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康有为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为梁启超这批热血青年所欢迎。梁启超所受到的教育，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不仅生活得特别快乐，而且变成了一位不同于传统的旧知识分子的新人。他基本上接受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论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尤其为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所倾倒。梁启超几乎变成了第二个康有为，在其旗帜下呐喊搏击。人们习惯上称“戊戌变法”为“康梁变法”，亦准确地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

四年的万木草堂学习生活结束之后，梁启超紧跟康有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维新变法运动当中了。

1894 年是维新运动由思想准备走向实际行动的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 3 月，为准备转年的会试，梁启超风尘仆仆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下榻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这时的北京，乍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含苞待放的桃花，丝丝吐绿的垂柳，显示出一种新的生机，给人以精神爽快的好感。然而，青年梁启超面对北京腐败的政治，危机四伏的国难，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惋愤时局”，放言高论，抨击时政，呼吁变法。无奈人微言轻，在官吏、名士云集的北京，谁知梁启超是何许人也！不仅如此，一些守旧派官僚看到其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书之后，极为不满，认为是对正统经典的诬蔑，是“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应当像孔子杀少正卯那样把康有为杀掉。梁启超闻讯，惊恐万分，立即找同情他们的官僚，四处活动，最后得到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帮助，才幸免于难。但广东方面还是严禁《新学伪经考》的流传。通过这场小小的政治风波，梁启超深深感到变法的艰难。但青年人难得的政治热情促使他仍在政治的风浪中奋击。

8 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武器精良，策划周详，气焰嚣张，步步进逼；清军则内部腐败，指挥混乱，士气低落，节节败退。10 月，日军攻旅顺、大连，占辽东半岛，清廷的所谓“龙兴之地”即将失守。北京城里舆论大哗，可是慈禧太后仍在鼓乐声里进行她的万寿庆典。悲愤已极的梁启超感到时局维艰，11 月返回广东，寻求对策。不过，他也无能为力。

1895 年 3 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梁启超和康有为前往北京会试。及至天津的大沽口外，已闻清军大败，又遇日人搜船，颇被污辱，令康梁极其愤怒。到达北京，到处传言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李鸿章往日本议和，要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此情此景，使得正准备参加考试的梁启超已无法静心，整日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考试的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4 月中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议论纷纷，决心抗争。康有为觉得“士气可用”，立即令梁启超四处活动。梁先联合广东的举

人联名上书，反对议和，湖南的举人立即响应。台湾的举人更是痛哭流涕，要求清政府不要割让台湾。连日来，往都察院递请愿书者络绎不绝，还有将官僚的轿子拦阻，请求他们反对议和，反对割地赔款。随后，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全国18省的两千多名举人在松筠庵开会，讨论上书事宜。会上群情激昂，义愤填膺，甚至有痛哭失声者。最后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长达18000言的请愿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当场签名的有1300多人，遍及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吉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18个行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由于守旧官僚的阻挠没有成功，但意义深远。

对康有为、梁启超来说，“公车上书”是他们所坚持的维新变法由思想变为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同时，通过这次上书，宣传了康梁的变法主张，争取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康梁的改革方案也具体和明确了。这就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康梁在“公车上书”中起的正是振臂一呼的作用。这使青年梁启超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决心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

通过“公车上书”，梁启超深深认识到了组织政治团体的重要性。经过认真而艰苦的努力，1895年11月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然后以“强学会”为阵地，集会、演讲、购书、办报，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他和康有为基本采取三种途径促进维新变法：第一，利用“强学会”，组织变法队伍；第二，通过办报、译书，宣传变法主张；第三，创建新式学堂，培养维新人才。在和康有为通盘策划之后，1896年夏，梁启超来到了上海，以《时务报》为阵地，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创办《时务报》是梁启超的辉煌时期。他利用这一宣传阵地，较全面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思想和改革方略。《时务报》共出69期，没有梁启超文章的仅17期，而且梁启超每期发两三篇妙文，他是名符其实的《时务报》主笔。梁的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大致分为五

类：一是强调报刊的“喉舌”作用，认为报刊可以医治各种社会病，起到“通神”、解除社会病痛、增强活力、提高民智的重要作用；二是呼吁变法，认为变是天下之公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三是抨击现实，揭露封建官吏，哀叹平民疾苦，鞭笞社会丑恶现象；四是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张中西并重，相互融合；五是对一些具体人物、事件、图书、学校、团体、商务、财政、文献等的叙论，在扣人心弦的记述和画龙点睛的评说中阐发他的政治、文化观点。

这时的梁启超精力过人，才华初露，新思想一个连着一个，漂亮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10日一册，每册3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6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创开时务报原季记》，《知新报》第66册）

随着《时务报》的广泛发行，梁启超也声名卓著，上自通都大邑，下到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借着《时务报》这块宝地，梁启超的才华自然一鸣惊人。

随着梁启超社会影响的扩大，清廷的一些大官僚也对其另眼相看。1897年初，梁往武昌拜见张之洞。张听到梁启超来拜访，极为振奋，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梁，甚至还准备鸣炮，等其属下告诉他梁启超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时才能鸣炮，张才作罢，但还是以特殊的礼节迎梁启超入城。之后，张之洞和梁启超长谈，“至二更乃散”。

1897年夏，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湖南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人要办时务学堂，黄遵宪等即致信梁启超，邀他出任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由沪奔湘。执教时务学堂伊始，梁启超便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这十条学则虽然充满了儒家的治学立身精神，但其总目标是学以致用，全面发展，服务于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随后，时务学堂又公

布了学生功课详细章程，要求学生在读书中重思考，多实验，自由讨论，学用结合。所读书目有数十种，其中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日本国志》《化学鉴原》《格致汇编》《万国史记》等较为新颖的图书十多部，同时强调学生多读报，关心国内外时事。学习程序分为两个阶段：前半年学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初步；此后两年半攻专门学，即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梁启超实际是以公羊学派为轴心，参以古典儒学、西洋科技、史地等，再发挥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宗旨，把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搬过来，使时务学堂成为服务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速成学堂。

教学之余，梁启超还和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等维新志士漫谈志向，议论时政，诗歌互答，有数知己，于心甚慰。

时务学堂先后招考三次，收学生二百多名。在梁启超等人的谆谆教导下，这些学生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而且接受了新思想，特别是成为了变法维新的积极支持者。后来的实践证明，像蔡锷、林圭、唐才质等时务学堂的高才生都成了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人物。可以肯定地讲，在培养人才方面，时务学堂是十分成功的。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生动描述的那样：

>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戊戌政变记》，143页）

1898年2月13日，梁启超刚刚庆祝了他的25岁生日，就迎来了变法运动的高潮。他和康有为一起成了众人崇拜的变法英雄。

戊戌变法高潮到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

方面，但光绪皇帝的支持具有决定意义。光绪帝继位于1875年，当时还是个年仅4岁的娃娃，一切朝政皆由慈禧太后左右。1889年，光绪"大婚"，慈禧不得不宣布"归政"，由光绪料理朝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光绪十分惧怕做亡国之君，认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思想。一些官僚，如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也十分赞同并积极支持光绪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有所作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窘况。于是形成了以光绪帝为核心的所谓"帝党"。

光绪想变法，自然会去争慈禧的权力；慈禧为了夺权，逐步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和守旧派联在了一起，出现了所谓的"后党"。诚然，光绪的变法和康梁的变法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变"这一点上不乏共同语言。于是，光绪积极支持康梁，才演出了"百日维新"悲壮的一幕。

康有为、梁启超在积极向光绪上书的同时，还借北京会试知识分子云集北京的大好时机，筹划成立全国性的变法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898年4月17日，迎着明媚的春光，"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成立了。参加成立大会的有近300人，康有为在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极其动人。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保国会章程。

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面对情绪激昂的爱国志士，梁启超一跃登台，发表了动人心弦的演说。他首先陈述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三年以前很多人还对中国的被瓜分不以为然，"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在这种"国将不国"的危急时刻，必须唤起国民，救亡图存，再无别的选择。但是，有不少士大夫面对危亡，空发议论，没有行动，甚至认为中国不可救药，而坐以待毙，是极其危险的。"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为改变这种书生空议论、于事无补的局面，梁启超引经据典，深刻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梁启超的演讲动于情，拨之理，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在国破家亡临近之时，民族感情共鸣效应是空前的。4月25日，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第三次集会，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声浪越来越高。康有为居住的南

海会馆更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康梁师徒激情满怀，高谈阔论，宣传他们的变法主张。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这是最痛快的时期之一。

1898年5月，梁启超利用他在变法运动中的影响，又联合在北京应试的1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而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近万名举人，听说梁启超等一帮人要废除八股考试，这等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一时愤怒异常，有些人甚至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可见改革是何等的艰难！

但是，变法毕竟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光绪一心想通过变法振兴清廷，就使康有为、梁启超多年的变法努力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正式开始了。紧接着，光绪召见康有为，商谈变法事宜，并任命康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从此，康有为思考多年的变法主张，通过一道道奏折，飞进了皇宫，成为光绪变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梁被召见的当天，即被清廷赏给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至此，梁启超的变法总算取得了合法地位。7月间，梁启超草就了《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由孙家鼐代奏，具体规定了开办译书局的规模、经费和条例等等，并呼吁广购图书，多译西书。接着，他又要求清廷开设编译学堂，广招学生，培植翻译人才，还请求对这些学生毕业后同样给予出身，和科举生员待遇相同。这些举动虽然对“百日维新”的全局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也是变科举、兴学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也先后被光绪接见，变法的声浪与日俱增。9月5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任命为军机四卿，直接参与光绪的变法事宜。许多维新的诏旨，都出自谭嗣同等人之手。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不少政治主张这时通过光绪的名义，得以伸张。无怪乎梁曾自豪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尽出我辈。”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发布的新政命令达一百多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概括来看，主要是：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士；准许平民上书言事；改革财政制度；开办邮局；鼓励开矿和修铁路；

振兴工商业；训练近代化军队；取消旗人特权等。这些改革条款，虽然是初步的，和梁启超的设想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使改革变成了现实，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向西方学习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梁启超每读到一道上谕，都喜形于色。随着变法的深入，梁启超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成了妇孺皆知的政治明星。

正当梁启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9月21日发生了血腥的政变，梁随之变成了政治通缉犯。

光绪宣布实施新政之后，守旧官僚就四处活动，或造谣言，或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推翻新政，制裁康梁维新派。光绪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给予一定的反击；慈禧太后则一方面坐观事态的发展，一方面也不时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太后的如意算盘是：让你闹，但也要给你找些小麻烦，等闹到一定火候，一网打尽，夺回权力。9月中旬，慈禧等守旧分子认为废掉光绪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胁迫光绪发布上谕，秋季往天津阅兵，以借机行动。光绪也闻到了火药味，知道阅兵就权位难保，但深感力量单薄，不好对付。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天真的光绪和康梁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拥有军事实力、且貌似支持变法的袁世凯身上。9月18日深夜，他们派谭嗣同去北京西郊法华寺拜访袁世凯，做最后一次努力。而袁世凯根本就不是维新派，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出卖光绪和康梁维新派。9月20日，他返回天津，立即把谭嗣同求见的情况告诉了荣禄。荣禄当夜进京，报告了慈禧太后。

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光绪被关进了瀛台。25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同时被捕，刘光第闻讯，亦自投入狱。加上先前被捕的康光仁和杨深秀，人称“戊戌六君子”。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清廷残酷地杀害了。临刑前，谭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此时，梁启超已经踏上了岛国日本。

## 三、文化宗师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官离京，又回到了天津的饮冰室。回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他感到一事无成。早年跟随康有为变法，被通缉流亡海外；在日本支持国内的立宪运动，也没有取得成功；希望通过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强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反而被他们所愚弄，丝毫没有政绩可言。真是节节败退，走投无路，惨透了！当然，这并非梁启超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或许，也正是经历了太多的政治“折磨”，才使得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出仕的热情逐渐减弱，开始以冷静的头脑剖析从政以来的功过是非。1918年春节前后，面对饮冰室内那琳琅满目的藏书以及带给他无限激情和快乐的书桌时，梁启超蓦然意识到：这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天地。此后十余年，也是梁启超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终成一代文化宗师。

就做学问而言，梁启超一生纵论古今中外，探测人生社会，广博丰硕，新论迭出，自成风格，为人称道。他的学术著作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领域，可谓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支撑梁启超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也主要是他的论述深刻、见解独到的论著。

生活在20世纪头三十年的中国公民，有相当一批人受到过梁氏文章的影响。梁启超的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文章以情感人，情理交融，被形象地誉为“笔尖常带感情”。著名诗人和文学家黄遵宪在评论梁启超所办的《清议报》《时务报》

和《新民丛报》时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274 页）黄遵宪是晚清地位很高的文学大家，他所崇拜的文学巨子应该说是不多的，这里对梁启超的文章评价如此之高，而且十分形象地将他比作"东游"的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的奇特功效，实在是褒奖有嘉了。和黄遵宪同期的文坛巨子严复，恃才自傲，对梁启超宣传的一些主张不以为然，常和梁相互辩驳，但对梁的文章评价却甚高，尤其对梁文出色的煽动力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梁启超如果写文章鼓吹暗杀，则国人会"佩然去暗杀"；梁启超如果宣传去破坏，那么国人又会群起而"争为破坏"。胡适在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时还是一翩翩少年，他后来回忆梁启超的文章魅力时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四十自述》，50 页）《新民丛报》第 16 期发表过一篇读者感想，用自由诗的形式道出了梁启超文章对读者的巨大影响力，其中写道：

> 喜我脑筋之中日日涌新知，开辟心球理想古无之，生平读书枉千卷，何如一篇饷我神魂飞。乃想古来学界之士如烟海，纷纷孔见不足供胡芦，陆王黄颜亦杰出，凤毛麟角无乃稀，其余汉学宋学清学书充栋，盘旋奴界守步不能逾。世界思潮至此忽大变，冲决网罗决藩篱，犁庭扫穴争倡大革命，打破学界奴性独立而不羁。

由此不难断定，梁启超的文章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具有反传统、求革新的难以想像的威力，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在其冲击下黯然失色，它也就自然成了批判旧文化的"洪水猛兽"，渴望追求新知的青年学子"智慧的源泉"。

一般来说，如果要使自己的文章有广泛的影响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敏锐的思维和洞察一切的观察力，把准时代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跳动的脉搏，出一言而为千百万人热情高呼，发一论而使全国人赞不绝口；二是具备较深的文化根底和压倒一切的表达能力，能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吸引读者，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教父”。这两条，梁启超都是具备的，尤其是他在二十世纪初逐步形成的“新民体”，以半文半白、通俗流畅、热情奔放又富有哲理的语言，在阐述问题时夹杂着煽情，读后往往让人拍案而起。例如《说希望》中的精彩阐述：

> 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希望者，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之所以异于野蛮，而亦豪杰之所以异于凡民者也。亚历山大之远征波斯也，尽斥其所有之珍宝以遍赐群臣。群臣曰：“然则王更何有乎?”亚历山大曰：“吾有一焉，曰希望。”夫亚历山大之丰功盛烈，赫然照烁于今古，然其功烈之成立，实希望为之涌泉。宁独亚历山大而已，摩西之出埃及也，数十年徘徊于沙漠之中，然卒能脱犹太人之羁轭，导之于葡萄繁熟蜜乳馥郁之境。摩西之能有成功，迦南乐土之希望为之也。……自古之伟人杰士，类皆不肯苟安于现在之地位，其心中目中，别有第二之世界，足以饷人类向上求进之心。既悬此第二之世界以为程，则萃精神以谋之，竭全力以赴之，日夜奔赴于莽莽无极之前途，务达其鹄以为归宿，而功业成就之多寡，群治进化之深浅，悉视其希望之大小为比列差。盖希望之力，其影响于世间者，固若是其伟且大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18—20页）

这种政论文章，拨之历史，掺入典故，以古论今，文白相间，深入浅出，绝无板起面孔训人之意，也无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使读者在轻松自如中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给人以美的享受。吴其昌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文章：“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

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如果说出众而独特的文笔使得梁启超独步天下，而他在开创新史学，鼓吹“小说和诗界革命”，学术思想史、佛学及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则最终铸就其大师地位。

其一，开创新史学。

梁启超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以史学为根基。他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馆学，都融合了深厚的历史素养，所以了解梁的史学观是探讨其学术成果的一把钥匙。梁治史善于创新，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善于通古而讽今，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中国史、世界史、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学术史等方面都成果卓著，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将来的“史学革命”勾画了诱人的蓝图。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近代新史观。1923年，他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史学理论已经独成一体，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梁启超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也就是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尽心力，不会有好的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9，第5页）在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性的同时，梁启超特别重视史家的自我修养。在他看来，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德、学、识、才四种品质，就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这点上，他将刘知幾、章学诚的基本思想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史德”，就是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梁认为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对于历史不能公正、客观、准确地去记述，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真实地去评论，则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贻害社会。作

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实的态度是起码要求。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所需要的广博的知识。梁认为研究历史所需的知识非常广，类凡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科技、法学等都要有一定的修养。而且历史研究不可急于求成，要有超人的刻苦精神，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最好先从专门史做起，一步一步扩展。所谓“史识”，就是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历史无法实验，只能靠观察思考，特别是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由局部到全局，再从全局到局部，举一反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要有怀疑精神，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提出新的见解，敢于自我否定，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所谓“史才”，就是治史的技巧，梁偏重于写作方法。他认为方法不当，同样搞不出好的著作。所以合理的剪裁、科学的编排、得心应手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高人一筹的研究角度都是不可少的。而且，再好的天赋，也必须多读书，勤用脑，多抄录，才会取得成果。从自己治史的经验出发，梁启超还格外强调少作而求精的原则。总之，梁启超把德、学、识、才融为一体，全面而准确地进行历史研究。

梁启超不仅讲理论，而且积极践行。他一生写了一大批史学专著，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人物传记等许多方面。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梁启超一直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他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一有空就撰写“五千年史事鸟瞰”。现存的《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就是当时的作品。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可谓成果更丰。无论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他都有极中肯的评论。其中尤以《戊戌政变记》和《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为代表。

梁启超的世界史论著更多的是从宣传救亡角度讲述一些国家的灭亡史、反侵略史和英雄人物传记，例如《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日本吞并朝鲜记》《斯巴达小志》《匈牙利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等。这些作品充满了政治色彩和现实感，时代性明显多于学术性。

20世纪初流亡日本之际，梁启超曾撰写了一批中国史人物传，影响较

大的有《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王荆公》等，其主旨仍在藉历史上的改革家和重要人物，宣传革新，推动社会进步。在写法上，梁启超不求全，突出重点，叙议结合，知人论事，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读起来扣人心弦，栩栩如生，思想性、哲理性与趣味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其二，鼓吹“小说和诗界革命”。

梁启超在文学方面最受后人关注的是大力鼓吹“小说和诗界革命”。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诗文是治国平天下的上乘之作，小说则是下流的东西，“诲淫诲盗”，不足挂齿。在中国古代，直至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小说毫无政治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向传统的文学观发起了挑战，他从造就新国民、革新旧政府、创建新道德等方面，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功能，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说到小说的神奇功效，梁启超用“熏”“浸”“刺”“提”四个字来概括。所谓“熏”，就是小说如烟如雾一样，无孔不入，使人处于其包围当中，无法逃脱其感染；所谓“浸”，就是读小说时被其浸润，与小说的主人公同欢乐，共悲哭，完全融为一体；所谓“刺”，就是受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社会境况所刺激，当头棒喝，意味无穷；所谓“提”，就是通过读小说来提神，提高思想认识，领略人生哲理，顿悟经国治世之道。梁启超夸张地指出：教主如果能够运用这“四道”，必可以立新教派；文学家如果可以通其“一道”，即能成大文豪，“四道”全通，则有可能成为文圣。把此“四道”用于善事，“可以福亿兆人”；用于恶事，“可以毒万千载”。“可爱哉，小说！可恶哉，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中国要想新国民，创造新宗教，建设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首先必须创造新小说。他的结论是，“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以上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0卷）

梁启超这种以小说改良社会的观点，在晚清有较大的影响。夏曾佑、严复等许多知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

呼吁大力创作新小说。从近代中国小说发展的历程来看，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清楚地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并推进小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也正是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批激进的新型知识分子。1905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职业的小说家，涌现了十多种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如果再加上其他杂志和报纸开辟的小说栏目，则小说的创作已经相当可观。与此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梁启超还身体力行，亲自投入小说的创作与翻译，比较有影响的如《佳人奇遇》《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中之人鬼》《十五小豪杰》等。这些小说虽然充满了赤裸裸的政治说教，艺术水平不高，但却有力地推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在诗歌领域，梁启超也是一位激进的改革者。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和好友黄遵宪、谭嗣同等就发起了一场颇有影响的诗界改革运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诗歌要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反映新事物、新思想、新生活，要抨击旧事物、坏传统，成为引导人们奋发向上的号角，那些泥古守旧、无病呻吟、咏花歌月的诗歌，要坚决反对；第二，形式要自由活泼，不拘一格，不专一体，“吾手写吾口”，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应服从内容；第三，诗歌创作要敢于吸收新传来的外国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大胆引进。在这种诗歌创作理论的指导下，戊戌维新时期的诗坛上涌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危亡、歌颂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诗篇，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矛盾、民间疾苦、批评当道、呼吁改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诗歌，还发表了一批反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的诗篇，其中有不少新思想、新意境和新名词，使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演进轨迹去历史地看问题，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这场诗界改革运动，其成果是主要的，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篇章。梁启超晚年著《饮冰室诗话》，对“诗界革命”的重大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同时对当时有影响的诗人如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严复、吴德潇、蒋观云、林旭、刘光第、汪笑侬、丁叔雅、康同璧等作了详细评说，还收入了每个人的代表性诗篇，逐一介绍。梁清

楚地认识到，戊戌时期诗歌改革最成功的地方是反映现实，呼吁变革，推动了维新变法。但他也认识到在形式上的改革很不成功，于是提出写诗应该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就是“旧瓶装新酒”，“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显然，梁启超的反思，有合理的一面，这就是戊戌时期在诗歌改革上没有解决形式上的更新问题，仅引用一些新名词，解决不了问题；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就是只讲内容改革，不注意形式的改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诗界革命”。

其三，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丰硕成果。

梁启超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习惯于抓先秦和明清两头，其成就也自然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对于思想史，梁启超侧重研究政治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其原因，一是他认为“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好的国民政治心理会造成好的社会，好的国家；坏的国民政治心理则有害社会，贻误国家。既然政治心理决定着社会和民族的走向，研究社会变迁首先需要考察政治思想。二是他觉得春秋战国时期是体现中国思想面貌的关键阶段，这期间“百花齐放，万濬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若研究过去的政治思想，仅拿先秦做研究范围，也就够了。”

梁启超将先秦政治思想总体概述为四家、四大潮流和四个特色。四家，即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四大潮流，即无治主义、礼治主义、法治主义、人治主义。四个特色，第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最圆满、最理想的政治思想。自然法则的代名词又是“天”，老子讲“道法自然”，孔子讲“天垂象，圣人则之”，墨子讲“立天命以为仪式”，都是呼吁顺天行事。第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无论道家、墨家，还是儒家、法家，在叙述国君的权限和职责上虽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认定帝王的绝对权威，并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第三，中国人对理想中的国家和社会都有非常美好的描写，从“小康”到“大同”，无不令人神往，但如何达到这一境地，并无具体的方法、步骤，所谓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案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第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国家只是受其制约下到某个朝

代，“天下”又是何物，抽象而不可即，最后还是落到为现政权效劳。儒家讲的“以天下观天下”，法家声称的“以天下治天下”，墨家所说的“兼天下而爱之”，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上四个特点，决定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

梁启超还具体分析了道家的无治主义、儒家和墨家的人治主义、儒家独创的礼治主义和法家的法治主义，指明了各自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方面。他的结论是，无论是“无治”“人治”，还是“礼治”“法治”，都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都是先秦思想家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特定的方案。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这些方案既重视又不太重视，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绝对不取其中的某一种，而是什么有利就取什么，或者交替用之，合而采之。因此，先秦以后的政治思想，既非“法治”，也不能讲是“礼治”。统治者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究其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就政治思想理论而言，在于先秦的政治学家只讲明了“政在民政”，“政以爱民”，没有涉及如何才能实现“民政”，如何才能达到“爱民”。梁启超指出：“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0，4页）这种看法，触及到了先秦政治思想的要害，也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致命弱点。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反复论述这种观点，正是为了找出一种补救的方法，试图找出一条达到“of the people（政为民政），by the people（政由民出），for the people（政以为民）”的合理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显然，梁启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是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古人思想，所以新意迭出，入木三分。在研究先秦思想的同时，梁启超十分注意对明清特别是清代思想的研究。他把中国思想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一是先秦的奠基时期；二是两汉的儒学大一统时期；三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思想大裂变时期；四是隋唐的中外思想融合和复兴时期；五是宋元明时期的理学兴盛时期；六是明末和清初的思想转化启动时期。

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梁启超也是抓两头带中间，用力最多的是先秦和清代学术。他把先秦学术当作一个时代，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涉及的学术

流派也相当多。目前留存的《先秦学术年表》和《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两部论著，在学术界影响甚广。

比起先秦学术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研究就丰厚多了。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是拓荒之作，又是学界公认的不朽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仅半月成书。梁的好友蒋方震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恭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有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按启蒙期、全盛期、蜕变期大加发挥，广泛评说，思如泉涌，无法止笔，一下子写出五万多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作序。

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一部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提出来了，但未加展开，可补充的东西当然不少。但他毕竟是有关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而且高屋建瓴，挥洒自如，描绘了清代学术的基本走向和特点，后来的研究者，基本是按照这部书的框架去图解清代学术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始于明代的最后20年，到1920年为止，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继续《清代学术概论》中分启蒙、全盛、蜕化三个时期的做法，来详细探索清代各阶段学术相互转变的原因；二是用大部分篇幅评述有清一代有一定影响的学派及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通观全书，有三方面尤为突出：一是书中明确提出了清代学术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理性思考而注重客观的实际考察，也就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二是书中对明末清初启蒙时期向汉学大兴的全盛期转变的原因分析得深入透彻，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三是结合梁启超自身的思想特点和多数知识群体的心态，将光绪年间新学术思潮的起因和基本格局描绘得惟妙惟肖。总之，后来的有关清代前后三百年的学术史著作都没有超出这部书的水平。

其四，佛学大家。

梁启超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1922

年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定期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他在致儿女的书信中，不仅把佛学吹捧为“宇宙间惟一真理”，而且要他们也经常念佛。如有闲空，他还和夫人一起念经求佛，以解脱心中苦闷，寄托无限情思。不过，梁的醉心于佛学还和他的佛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信佛的过程就是他钻研佛典的过程。梁在中国佛学史、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理论的研究上都独辟蹊径，成绩显著，为世人称道。

关于中国佛学史，梁启超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两晋和隋唐时期。在他看来，前者是佛教在中国的确立期，后者是进一步建设期。特定的思想文化变迁和社会动乱是佛教能够在中国确立的两大原因。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隋唐时，尤其是经过高僧玄奘的终生努力，使佛学理论异彩纷呈。如果说两晋时的道安是佛学在中国传播的园艺师，那么，玄奘则是佛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家。唐朝之后，佛教理论没有太大建树，佛教也渐渐衰落下去了。梁启超考其原因有三：一是禅宗获得了统治地位，其他诸宗难有立足之地，一花独放，自然失去了进取的生机；二是儒佛逐渐合流，一些儒生窃取佛学的只言片语自立门户，互相排斥，佛学被纳入了儒学的固定框架当中，死气沉沉；三是佛界乏才，难得水平极高的高僧，佛学理论无法发展，反而倒退，想使佛教重现辉煌，只能是梦想。因此，宋元以后，直至明清，佛教一直在走下坡路。梁启超对中国佛学历程的这种概述，极其深刻而合乎历史实际，他的这些观点基本被后人所接受。关于佛经的翻译和传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他在不少论著当中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七百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在叙述一部佛经翻译史。梁启超认为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关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梁启超用力最深。梁的信佛和一般平民百姓的拜佛不同，他不是用迷信来解脱自己，而是用新的理念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观，解决心灵深处的疾苦，构筑新的思想理论体系。1922 年，梁启超

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对佛学理论又作了新的解释和概括，提出了佛学就是心理学的新观点。在梁看来，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它是通过各种人生的哲理并杂以不少玄学，再结合现实生活来规劝人如何做人，如何解除烦恼，从而达到一种“无我”的生活境界。

其五，文化研究出新知。

梁启超对研究文化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有浓厚的兴趣，为了写一部既有理论深度又内容丰富详实的中国文化史，他一方面对有关分支做过大量的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他撰著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宏愿并没有实现，仅写就了社会组织篇，但其大体思路清晰可见，仍然为今天治文化史者所参阅。

1922 年，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和第一中学作了“什么是文化”的演讲，比较简明而又概括地说明了文化的定义、内涵和许多具体问题。何为文化？梁的回答是：“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共业”是佛教语言，与“别业”相对，意为相互传播、相互渗透。具体来讲，就是人类在心灵推动下的文化活动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像电子一样迅速波及他人。人的本能及其表现，有相当大一部分“遗传到他的今生、他生或他的子孙，永不磨灭”，这就是“别业”。还有一部分，“像细雾一般，霏洒在他所属的社会乃至全宇宙，也是永不磨灭，是之谓‘共业’，又叫业力周边的公例。文化是共业范围内的东西，因为通不到旁人的别业，便与组织文化的网无关了”。梁启超将人类的活动分为自然系和文化系两部分，自然系由因果法制来支配，文化系由自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是从人的心理的要求出发，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模仿及创造而形成的，这个模仿和创造的过程，使“自然的人”转变成了文化人。

梁启超所作的文化的规范，从其本身讲是自成一体和有较大的说服力的。如果从本质上去理解，梁所谓的文化就是自由心灵的积极而能动的客观反映。由此出发，梁启超又阐述了文化的主要内容，即：“文化是包括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他认为，人类活动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网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成品，开辟的土地，修治的道路，制造的工具和机械等；精神文化网则包括：社交的要求心及活动力——言语习惯伦

理等，组织的要求心及活动力——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的法律等，知识的要求心及活动力——学术上的著作发明等，爱的要求心及活动力——文艺、美术等，超越的要求心及活动力——宗教等。这些众多的文化网络，交织发展，构成了美妙而极其复杂的人类文化。

显然，梁启超所归纳的文化定义和文化内容是极其广泛而全面的，涉及了人类主观能动性所创造的一切，是人类文明的综合反映。这种文化理念，不仅在当时影响甚广，而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 四、天伦之乐

家和万事兴。在尽情领略梁启超渊博学识和颇具传奇色彩的丰富人生阅历之后，我们不禁为他背后那个和睦、祥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所感动。那里，有他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爱人，有他终生牵挂、魂牵梦萦的儿女；那里，是他尽现才华、实现救国抱负的大本营；那里，更是他潜心学问、著书立说、名扬四海的温馨“小屋”。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月兮，月兮，为谁圆？中秋之月兮，照人弃捐！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年年此夜，碧海青天。”（《梁启超年谱长编》，1022页）这是梁启超1925年所写的《祭梁夫人》中的片断。话虽不多，但夫唱妇随、生死不渝的夫妻深情和言辞中抑制不住的悲伤、怀念之情凝成一曲久久令人难以平静的千古绝唱，不由得不为之感动。

梁启超一生有两位夫人，李蕙仙是他的第一位夫人，也是传统意义上

的正房夫人，她陪伴梁启超共同走过了从平常百姓到政治明星，从维新栋梁到流亡逃犯，从高官显贵到书斋名士等人生经历，共计33年。然而，正是在这生与死的考验中，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成为他们夫妻间情感最准确的写照。和出身普通农家的梁启超相比，李蕙仙的出身颇为显赫，她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家庭生活比较优裕，深得父母的宠爱。虽未受过系统教育，但自幼熟读诗书，知书达理。

1891年，梁启超与李蕙仙在北京完婚。婚后不久，李蕙仙就和梁启超一起回到梁的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活。梁家不算富裕，靠几亩薄田勉强维生，加上茶坑村地处偏僻，气候炎热潮湿，对于久居北方的李蕙仙来说，这既是一个崭新生活的起点，又是一个艰苦考验的开始。困难还远不止这些，初到广东，李蕙仙根本听不懂当地语言，梁启超又长年在外奔波，真难以想象娇小的李蕙仙是怎么适应这一切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蕙仙硬是挺下来了。她不仅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而且尊长爱幼，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成为梁家真正意义上的重要一员，并且赢得了全家老幼的尊重和喜爱，尤其是深得婆母的喜爱，"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梁启超年谱长编》，1020页）这使得远在北京等地为前途而奔波的梁启超感到无比欣慰和感激。千山万水和长久分离不仅没有削弱他们之间的感情，反而使夫妻之情日益深厚，其原因恐怕亦在于此。几十年后，梁启超对此仍念念不忘，"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梁启超年谱长编》，1020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清政府也将魔爪伸向了其家人。李蕙仙虽系一普通妇人，但镇定自若，"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梁启超年谱长编》，166页）她先带全家老少逃到澳门，等梁启超在日本生活稳定之后，又不远万里，赴日寻夫，终于全家团聚。这对于一个足不出户的封建女子来讲，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梁启超在给妻子的多封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妻

子的感激之情。“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167—168 页）在传统忠孝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对于因自己之故而给家人带来的种种磨难深感内疚，而这种内疚感又转化为对妻子更加真挚的爱。虽然他们的婚姻中没有自由恋爱的浪漫与激情，虽然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因梁的复杂经历而动荡不定，但他们在患难与共中形成的信任和爱恋却与日俱增，因此，梁启超称之为“患难交”。

梁家素有家教之传统，李蕙仙亦十分重视儿女的成长。她教子严格，同时又勤奋好学，带头做儿女们成才的榜样。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她年近半百还要孩子们教她英文，她每天在自己的屋里吃早点……吃完饭后就稍休息一会，然后开始念英文，她非常认真地高声朗读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据妈妈回忆，婆（指李蕙仙）的发音虽带些贵州调，但还是能听得出是英文，也听得懂是什么内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 页）不仅如此，她对于一些新鲜事物还兴趣极浓，在日本生活期间，不顾自己是缠足，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乐此不疲，给全家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养猫是李蕙仙的一大爱好，尤其是从日本归国后，梁家生活日趋稳定，在她的带动下，养猫成了梁家老老少少的一大兴趣，而且这一嗜好从她身上传给了几乎所有的儿女，又传给了第三代，以至于梁家被誉为“爱猫家庭”。吴荔明教授讲过一件趣事：1981 年，梁家子女决定回新会老家探望，当他们在机场候机时，吴荔明的五姨梁思宁给她买了一盒糖，吴荔明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不好意思。”梁思宁却说：“我不是送你糖，是送你这个糖盒子。”原来，糖盒子上面印有三只可爱的小花猫。“爱猫家庭”由此可见一斑。

1915 年，李蕙仙患乳腺癌，手术之后，在家休养。1924 年春，病复发，癌细胞扩散，难以治疗。此时，正值梁思成与梁思永赴美留学前夕，他们兄弟俩挂念母亲病情，想等母亲病愈之后再出国。弥留之际的李蕙仙

又何尝不希望和儿子们多一些时间待在一起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病魔随时都有可能将她和家人永远分开。但她却没有那样做，而是微笑地宽慰孩子们，让他们放心远行，不要因挂念自己而耽误学业。在含泪送别爱子之后不久，李蕙仙病情恶化，于 1924 年 9 月 13 日病逝。一年后，梁启超满怀着无限的眷恋与悲痛之情，将这位与自己生活了 30 多年的“闺中良友”的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一处风景秀丽、幽深宁静的小山上。

1929 年，梁启超不幸去世，领导全家的重担一下压在王夫人身上。王夫人名叫王桂荃，于 1903 年和梁启超结婚，成为梁的第二位夫人。她的童年非常悲惨，尚未尽情享受童年的幸福与欢乐，悲剧就不断向她袭来。先是母亲早逝，继母借口她命硬，是父母的克星，经常虐待她，动不动就不给饭吃，还拳打脚踢。四岁时，父亲又不幸抱病而亡，继母进城办丧事，账房先生乘机把家产席卷一空，还将她卖给了人贩子。从此以后，年幼的她先后被转卖了四次，其间所受的折磨与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后来，她被卖到了李蕙仙的娘家，转机发生了。1894 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年龄虽小，但聪明伶俐又勤快，便把她带到梁家作贴身丫鬟，并取名桂荃。从此年幼的王桂荃走进了梁家，这一进就是 70 年，直至 1968 年病逝于北京。

在梁家，王桂荃是一个既特殊又极重要的人物。说她特殊，单从梁启超及孩子们对她的称谓中就可见一二。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一般称她为“王姑娘”“王姨”，孩子们则称李夫人为“妈”，而称呼她为“娘”，孙辈则称呼她为“婆”。说她重要，不仅在于她悉心照料梁启超，使他能安心工作和学问；而且在于她以忍耐、刻苦、上进的性格和无限的爱心精心哺育、培养梁家的每一个子女，成为大家庭中一个难得的协调者。

梁启超是幸运而幸福的，他和王桂荃的结合并未影响全家人的感情，特别令他欣慰的是没有损害他和李夫人的恩爱之情。同时，王桂荃又给梁家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她的聪明能干，她的豁达善良，她的真诚爱心，使她赢得了全家上下的尊重与喜爱。梁启超更是对她爱恋有加，以至于一刻也离不开她的照料。几许小事便可见一斑。1915 年 12 月，梁启超前往


王夫人


梁思成、林徽因、林母与梁再冰

上海策划反袁称帝、拯救共和的护国运动。王桂荃得到消息后，很快便冒着危险来到上海。有了王的照料，梁启超再无后虑，便足不出户，放手开展工作。1916年3月，梁启超到香港，又致信家中："当遣王姨来港"，"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梁启超家书》，236页）退出政坛后，时局动荡，加上李夫人过逝，对梁启超打击很大，但他很少为家事担忧，依旧潜心学问，成绩斐然，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王夫人的辛苦操劳。

王夫人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好学，接受新事物很快，尤其是和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大大开拓了眼界，成为全家第一个学会日语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不识字，后来干脆等孩子长大一些时，和他们一起学习认字，很快，"她学会了读书，而且读得朗朗有声，表情丰富。她不仅擅长护理和料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溜冰、滚铁环、编织、钩毛线、打桥牌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1—12页）

对于众多子女，无论李夫人所生，还是自己所生，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她都一视同仁，将子女们的健康成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梁思庄十多岁那年，染上了白喉，住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王夫人日夜守护在旁，悉心照料，终于使思庄转危为安，病情好转。而此时的王夫人已经面目憔悴，几不能行。然而，更大的打击随即发生了。在思庄患病的同时，王夫人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由于忙于护理思庄而对她护理不周，年仅9岁的女儿不幸夭折了。失去爱女的王夫人强忍悲痛，依旧辛勤地劳作着，对子女们愈加疼爱。这样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能不尊重和爱戴她吗？

李蕙仙、梁启超先后去世后，尽管时局动荡，全家经济拮据，思宁、思礼等几个孩子尚年幼，但她丝毫没有畏缩，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梁家的责任，在带领梁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维系着梁家的声誉与稳定的同时，想尽一切方法，将儿女们全部培养成学有所长的有用之才。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王夫人是勤劳善良和意志坚定的化身。梁思成虽为李夫人所生，但却对"娘"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他多次谈起幼时的一件往事："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

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下子收不住，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困惑的大匠·梁思成》，9—10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北京曾于1928年6月至1949年9月改称北平，本书为方便读者阅读，统一称为北京，特此说明）、天津旋即沦陷，梁家全家被拆散。思成、思永全家和思达都去了大后方，思顺、思庄仍住在北京，思懿在燕大读书，王夫人带着思宁和思礼住在天津，只靠过去的一点积蓄和房租度日，还要缴纳孩子们的学费。1941年，思礼和姐姐思懿一起赴美国留学，思宁则去了解放区，而不久思庄也要带着女儿去大后方。昔日笑声盈堂、儿女满院的梁家，如今只剩下年近六旬的老人和空荡荡的饮冰室。当在火车站含泪送走身边的最后一个孩子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笼罩着这位瘦小的老人。我们很难想像四十年代初日本统治下的天津时局是何等动荡，生活是何等艰难，但这一切都没有吓倒这位坚强的老人。在无数个孤寂的日子里，她总在默默地为远在四方的孩子们祝福，祝愿他们平安幸福，祝愿早日全家团聚。有一张很有代表性的照片：瘦小的王夫人手抚着伏在窗台上的小猫，眼睛出神地凝视着前方，凄苦之情溢于言表。而透过这份孤独与凄凉，我们又清晰地体会到其中的坚韧毅力和无限憧憬。有梁启超，有那么多可爱的孩子在她的生命中，她永远都不会孤独。

抗战终于胜利了，梁家也重新团聚，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是王桂荃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再后来，她把天津老房卖掉，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买了一座小四合院，每逢节假日在京的儿孙们欢聚在此，尽享天伦之乐。她依旧过着勤俭的生活，终日劳碌，将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在孙辈身上。吴荔明讲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王夫人“也很幽默，这是和公公（梁启超）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当年二舅梁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

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8页）

对于王桂荃在梁家的重要作用，数十年后，梁家的子孙们在“母亲树”前的纪念碑上深情地写道：“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

1912年梁启超回国伊始，便将家安在天津。之后，虽然梁启超四处奔波，且有很长时间在北京，或为官，或教学，他也一度将全家接到北京居住，但梁家绝大部分时间仍然居住在天津的租界里。

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位于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即现在的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包括新旧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在新楼的后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很不起眼，这是40年代初，王夫人为维持生计而建的，之后的近十年时间，她基本上住在那里。今天，我们将这两座漂亮的洋楼统称为“饮冰室”。

像众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梁启超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一个颇有讲究的名字——“饮冰室”。据说，这一名号出于《庄子·人世间》中的一句极具哲理意味的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在这里，最终脱离政界的梁启超实现了由“政治明星”到“学术大家”的转变与飞跃，而标志则莫过于梁启超晚年所撰写的大量震撼学界的著作，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梁在“饮冰室”——这所安静而又温馨的书斋里完成的。后来，梁启超的作品结集出版，书名即以“饮冰室”来命名。“饮冰室”也因此而名扬海内外，成为众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学术圣地。

饮冰室的两座洋楼分东西而立，各有特色。靠西边的是一座漂亮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建于1925年，是梁启超特意请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设计的。整座楼房呈浅灰色，分上下两层，造型典雅，即便是在以建筑别致而著称的意大利租界，也有着浓重的超众脱俗之感。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后，亦为官，亦做学问，收入颇丰，因此室内摆设很讲究。当然，作为学者之

家，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首推书房和图书资料室。在这里，梁启超经常才思喷涌，行笔如飞，著书立说，通宵达旦。靠东边的那座洋楼稍显陈旧。这座二层洋楼建于1915年初，外观稍显呆板。屋顶用红色洋瓦，外墙体也呈浅灰色。梁启超晚年主要在此居住生活，直至1925年新楼建成。而梁家的众多子女及亲戚在1930年之前，则主要生活在这座旧楼。

作为有着浓厚爱国情结的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为什么将自己的家安置在京城之外、海河之津的天津意租界？这种做法似乎与梁启超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不相符合；同样，这种做法似乎也与梁启超终生倡导并不懈实践的爱国主义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难以理解，包括梁启超年轻的儿子。在一次家庭晚餐过程中，面对父亲的侃侃而谈，正在上中学、且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四儿子梁思忠鼓足勇气向梁启超问及其中原由，尽管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他们敬重的父亲感到尴尬。梁思忠问道："为什么一个爱国的政治家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显然，梁启超没有想到儿子会提出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对待儿子的疑问，他非常平和地对儿子解释道："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年轻的思忠是否理解父亲这番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及由此而产生的安全需要是导致梁启超长期住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只有认真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以及梁启超本人的复杂人生经历，才能找出比较全面的答案。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坛漆黑一片，混乱不堪，政府更迭频率之多、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后，曾对共和政治抱有空前的兴趣，志在一搏。然而，身陷其中，方知仕途险恶。坦率地讲，尽管梁启超学富五车，在政治斗争中却始终比较幼稚，激情有余，智谋不足，何况又是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背景中，虽然风光一时，但几经沉浮，

依旧两手空空，直至生命终结，梁启超也没有弄清楚从政之路的“真谛”。值得庆幸的是，严峻的现实，加上绝顶的聪明还是使他看清了当时的处事之道。一方面，梁对政治仍有着浓厚的热情和参与意识，在北京，政局变幻莫测，一旦卷入，很难抽身，弄不好，还会搭上身家性命。而在天津则大有好处，这里虽不是京城，但相距不远，且交通便利，如果形势有利，则可乘火车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北京；如果形势不利，则可迅速脱身，离开是非之地。翻开天津近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座距离北京不远的租界城市成为众多军阀、政客的首选居住地，而且他们的住所基本上都选择了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外国租界中，其中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则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决不是单纯的空喊口号和自我标榜，爱国的行动可以而且应该包括各个方面，既有政治救国、军事救国，也应该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等等。不能为了标榜自己爱国而与一切洋事物都划清界限；也不能为了表明爱国，大家都去当兵或参与政治斗争。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基于此种认识，尽管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梁启超的爱国热情始终未减，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学术救国的信念。

在世人的心目中，“饮冰室”无疑成为梁启超渊博学识的代名词，以至于很多人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瞻仰它。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梁家儿女来讲，这里不仅是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着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这里也总能听到孩子们天真欢快的笑声。这里，是梁家子女离开“双涛园”之后又一个快乐天地。许多年以后，他们总还常常记起在这里度过的难忘岁月。

住在“饮冰室”的梁家人丁兴旺，一团和睦。流亡日本期间出生的孩子们，除了思成、思永一直在北京求学外，年幼的思庄、思忠和思达（1912年12月出生于日本神户的“双涛园”，他是梁启超在日本出生的最后一个孩子）长期住在这里。随着思懿、思宁和最小的思礼相继出生，梁家越来越热闹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纵情嬉戏成了梁启超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自我的最佳途径，而小孩子们在玩闹时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及“失败者”的大哭声不但没有令他感到烦躁，在他听来反而变成奇妙无比的

交响乐，听起来是如此得心旷神怡，既而灵感源源而来，对生活的万千兴趣转化为生花妙笔和创造性工作的无穷动力。

孩子们尽情享受童年的乐趣。思成、思永平时在北京上学，难得和弟弟、妹妹们相聚，假期一到，家里便成为他们大展“调皮捣蛋”才能的天地。思庄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妹妹，也是他们恶作剧的“最大受害者”。通常他们俩人先商量好捉弄妹妹的方法，然后分头实施。一般思成主演，有时全身披挂各种怪装饰，有时倒立着怪声怪调唱歌，然后，由思永出面骗思庄来。小哥俩深知妹妹特别喜欢和他们玩，因此，不用什么花言巧语，小思庄就会上当。既爱玩又胆小的思庄妹妹每次都被吓得尖声大叫，甚至放声大哭。有一次，两个哥哥一本正经地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纸盒，口口声声要送给小妹一个重要礼物，思庄高兴坏了，不假思索地接过纸盒，迫不及待地打开，随即而来的不是欢笑，而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声。原来，那漂亮的盒子里装满了小哥俩从槐树上捉住的毛绒绒的绿色肉虫。恶作剧的目的达到了，但接下来，小哥俩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哄妹妹，直至她破涕为笑。否则，娘是不答应的。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走，而欢乐则长久地驻留于此。30年代，思庄的女儿也曾在“饮冰室”生活了很长时间。调皮的小八舅思礼不仅是她最好的朋友，更常常逗得她放声大哭，之后，又像当年的俩哥哥一样，千方百计逗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外甥女开心，而身旁的娘则仍然是一位严格的主持公道者。对于“饮冰室”来说，快乐的一幕即使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为多啊！

思成、思永等渐渐长大成人，连最爱哭鼻子的小妹妹思庄也于1925年去国外读书。对子女满怀深情的梁启超一度感到寂寞和失落。他在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们的信中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他这样写道：

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

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但我十五日早晨吩咐你那几段话，你要常常记在心里，等到再见我时，把实行这话的成绩交还我，我便欢喜无量了。（《际遇——梁启超家书》，144 页）

之后不久，他亲自裱好一个小型的手卷寄给思庄，并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的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23 页）

梁思礼的出生令梁启超高兴万分，他将这个小儿子称作“老白鼻”。思礼也成为梁启超晚年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和乐趣，他将“老白鼻”一点一滴的成长过程都给记录下来，并告诉远在海外、日夜牵挂的儿女们，和他们一同分享家的温暖。在 1925 年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老 Baby 好顽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老郭每天总要着他几口。他虽然还不会叫亲家，却是会填词送给亲家，我问他‘是不是要亲家和你一首?’他说‘得、得、得，对、对、对。’”（《际遇——梁启超家书》，22 页）梁启超还曾经写过一首描述思礼儿时神态的滑稽作品。

**其一**

昨日好稀奇，
进出门牙四个，
刚把来函撕吃，（事实）
却正襟危坐。

一双小眼碧澄澄，
望着阿图和，
肚里打何主意，
问亲家知么。

**其二**

谢你好衣裳，
穿著合身真巧。
那肯赤条条地，
教瞻儿取笑。

爹爹替我掉斯文，
我莫名其妙。
我的话儿多着，
两亲家心照。

等“老白鼻”长大一些，乐趣就更多了。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 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注：思礼的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际遇——梁启超家书》，126页）

这些信里通常都会提到的“亲家”竟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这是梁启超乐观天性的又一真实再现。对于思礼这个“老来子”，梁启超疼爱有加，并经常开玩笑说，思礼和大姐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而实际上，思顺比这个最小的弟弟要大31岁。

付出终会有回报。“饮冰室”不仅是梁启超全家的快乐天堂，而且成为孩子们接受“家训”、学有所长的崭新起跑线，欢声笑语，朗朗书声，始终回荡在它的上空。

## 五、教子有方

梁启超极富生活情趣。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见解独特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一位热血激昂、叱咤风云、命运多舛的维新志士和共和勇士，而且是一位极有人情味的性情中人。家庭、子女，天伦之乐，永远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之奔波操劳，乐而不疲；他为之喜怒哀乐，竭尽所能。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给予淋漓尽致的诠释和实践。也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无论是在“双涛园”，还是在“饮冰室”，都能够听到梁家传来的欢声笑语，感受到那抑制不住的幸福与温馨。

梁启超子女众多，年龄相差也悬殊。梁思顺是长女，她出生于1893年，也就是梁启超新婚之后的第三年。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24年，五年之后，梁启超就去世了。就年龄而言，梁的孩子们大概可分为三个群体，长女思顺与弟妹们年龄差距较大；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所生的几个孩子年龄接近，分别是思成、思永、思忠和思庄，他们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1911年梁启超回国，生活趋于稳定，几个孩子陆续出生，

他们是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除思礼年龄稍小一些，可算同一个年龄段，他们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天津的饮冰室中度过的。子女们虽然年龄相差悬殊，成长的环境也不尽相同，但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梁思成、梁思永等六个子女还先后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所学专业涉及建筑学、考古学、现代军事学、图书馆学、历史学和自动控制等，梁思成、梁思永获得硕士学位，梁思礼获得了博士学位。除去梁思忠因病早亡外，其他子女归国之后，或从事专业研究，或投身社会活动，均凭着自己的知识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晚年梁启超不仅为子女们取得的成就兴奋不已，对自己一贯坚持的教育子女的理念和实践颇为自得，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孩子们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概括来讲，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有三点突出的特色。

其一，提供条件。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父母企图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判断去改造子女，像制造产品一样重新创造自我，也就是说，是改造子女而不是引导子女。其实，子女是独立的自我，个性、才情自有其特色，不可能是父母的再现，包办代替是南辕北辙，不可能行得通。最重要的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发挥自我、展示才华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尤其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当然，教育可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具有根本意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只能是辅助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提供条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这种十分简单的道理，梁启超当然明白。所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校教育上。他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

总起来看，梁启超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

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梁启超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子女们的聪明上进，再加上他的精心安排，使其子女都具有了现代知识。但当梁启超发现他们的国学根底不够时，一方面指导他们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家中开设了国学训练班。像梁启超这样举办高水平、有实效的家庭培训班，在一般家庭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学习条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 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的建筑艺术。在培养儿女的问题上，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用心良苦。

其二，给予理念。

比起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条件来，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也很重要。如果说，充足的条件是物质的，那么，人生理念则属精神的，二者缺一不可。虽然不能强迫子女接受甚至必须按照父母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去生活，但毕竟父母有多年的生活积累，不乏经验乃至教训，将这些人生的感悟去告诉子女，影响子女，自然是子女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儿女们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他断言：一旦兴趣没有了，生活就索然无味了。梁启超多次宣称自己是个“趣味主义者”。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面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在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上物质上消耗而有余。”梁启超就是用这种趣味的人生观约束自己、指导自己，同时也影响和教育子女。当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之后，他时刻担心其学业太专而会感到单调，由单调又会导致乏味，乏味则会不思进取，生活苦恼。他多次去信和梁思成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封写道：

>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会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际遇——梁启超家书》，32页）

在这里，梁启超是要梁思成等儿女们吸取他兴趣广泛的长处，并非强迫他们像他那样兴趣太多，以致不能成为某一点上最精深、最权威的专家。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就是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所以，生活当中，对周围的事物有兴趣是第一位的，兴趣的多寡则是因人而异的。梁启超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梁启超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而悲观的产生往往是源于过高估计自己，目标过高而达不到，于是常常悲观失望。故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又说："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着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切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多少有点贡献。"（《梁启超年谱长编》，1116页）梁启超在这里讲得非常真切、客观。人的能力各异，只要尽情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快活和满足。如果能具有梁启超这样的生活体认、浓厚的生活兴趣和持久地去释放自己的能力，快乐和幸福就不可能不伴随着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人的性格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梁启超的"尽兴"，本质上是"尽性"。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梁启超的情感极其丰富，连写文章都"笔尖常带感情"。他认为生活固然需要理性，但太理性了，生活就枯燥无味了。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但是，情感的展示必须"适度"，否则社会就失去了规范，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所谓的"爱"和"美"，也不复存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也会一团糟。所以，在梁启超的家书中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情感，也同时渗透着理智。他教育其子女任何时候都

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即使是感情的事，也还是要有理性。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讲："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际遇——梁启超家书》，63 页）梁启超在这里讲的是他对自己的学生徐志摩的批评。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个唯美主义者，只要他认定美的东西，包括爱情，就不顾约束地去追求。当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得到陆小曼，并选定吉日良宵在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的时候，却没有料到被身为证婚人的老师梁启超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梁启超还将讲话稿寄给他的孩子们引以为戒。可见，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梁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梁启超越是到晚年，对儿女们理智的教导和关怀越多。大概是人老了，历练多了，越来越认识到理智才能少走弯路，有智慧才有美好的生活。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人生总是要经历不可回避的挫折和失败，能从容面对，那才是最重要的。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梁启超深知这方面的重要性，他一再用自己的感受和体认去谆谆教导儿女们。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好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克服困难中更上一层楼。当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致信解劝说：

>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儿

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际遇——梁启超家书》，99页）

这样苦口婆心、情理相融的劝慰，活现出梁启超慈祥而负责任的家长的可人风貌。同样，当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不幸身亡之后，梁启超又情意深长地致信儿子梁思成解劝道：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际遇——梁启超家书》，191页）

对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利害得失，唯一的办法是泰然处之，积极应对。即使是个人的利益，也不要患得患失。因此，梁启超给子女们开出的信条是：“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

梁启超归纳的这些人生理念，确实是非常实际而精深的至理名言。但是，对于思想家来说，常常是知易行难。客观地讲，就是梁启超本人，都未必能做得到，至于其子女能接受多少、践行多少，就看其悟性和能力了。不过，梁启超是尽到为父的责任了。

其三，耐心关怀。

家长关心子女，似乎天经地义，很难找到对子女漠不关心的父母，除非是有某种疾病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但关心子女能够耐心和关心到点儿上，则大有学问。梁启超在这方面却能做得很圆满。他在给儿女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同时，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可谓大处引导，小处关心。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二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留学时想家，他也会认真开导。他还费尽心思，亲手裱糊了一个古典高雅的艺术品，里面装上他写的条幅，取名“千里一

笑"，赠给思庄。思庄由于刚到加拿大，英语还未过关，考试排到了十几名，心情沮丧，梁启超立即致信好言劝慰。后来梁思庄为尽快人大学着急，梁启超立即致信开导说：

> 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际遇——梁启超家书》，20页）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他在给儿女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 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际遇——梁启超家书》，33页）

至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梁启超对此颇感自豪。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其致信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说：

> 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回来……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

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际遇——梁启超家书》，162 页）

如此精细而周密的安排，作为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梁启超的儿女情深于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吴荔明记称：

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这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更是一位优秀的父亲。时至今日，当我们在赞叹其子女取得的成绩时，这位父亲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

走进梁家，在众多子女身上，我们不仅能强烈地感受到梁启超的风格和品格，更为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所深深折服。

浓厚的爱国情结，终生不渝。这无疑是梁家众多子女最突出的特点，更是梁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梁家子女来说，爱国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体现在他们全部的人生历程中。梁家有六

个孩子先后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没有一人留在国外，全部回到祖国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论在战乱不休的二三十年代，还是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抑或黑白颠倒、残酷迫害的十年文革，他们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报国之志始终未减。抗战时期，贫困交加的梁思成宁可死在国内，也不愿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到国外生活。其实凭着梁家的声望和自身出众的才华，哪一个子女不可以在国外寻求到安逸的生活呢？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也没有。无论贫困，还是挫折，都没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为了祖国，他们终生都在努力的工作。

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献身学术，矢志不移。这是梁家子女们又一突出特点，在思成、思永、思庄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受到过系统、正规的西方现代科学教育，而且有着广泛的爱好和扎实的国学根底，这无疑对他们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没有像某些思想陈旧的知识分子那样观念狭隘，固步自封；也没有像某些喝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甚至妄自菲薄，而是将自己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开拓性的工作中充分体现出来，用近代化的眼光重新发扬和改造传统中国的文化。对于梁思成等人来讲，所从事的专业就是他们终生的挚爱，他们沉浸其中，乐不知返。工作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为了工作，他们可以义无返顾地抛弃任何个人的享受。梁思永于 1930 年回国后，常年累月在野外从事考古工作，艰苦的条件加上过度的劳累终于击垮了健康的身体，但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不停地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操劳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在 50 年代初期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尽管病得卧床不起，但依旧没有停止工作，病房变成了工作间，他们是在拿生命作代价来完成他们对“爱国”一词的完美诠释。

各有所长，成就斐然。这是梁家子女的又一特点。就学术成就而言，梁家的九个子女有三个是院士，其中梁思成和梁思永于 1948 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最小的老 Baby 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 199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九个子女，所学专业各不相同，所选择的工作也相差较大，既有学术

大师，又有社会活动家；既有学社会科学的，又有专攻理工的；既有学文的，又有学武的。人虽不多，但涉及到多个领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就像一组璀璨的明星共同铸起了梁家的辉煌。通过他们的实践，完成了梁家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到现代知识家庭的转变。



# 第二章

## 快乐的求学时光



## 一、思成初长成

梁思成在日本东京和神户郊外的"双涛园"度过了略显清贫、但趣味无穷的童年时光。他的启蒙教育是从位于神户市区的梁启超为华侨子弟开办的同文学校开始的，当然最好的启蒙老师当数他那位学识渊博而又对子女关爱有加的父亲。前面已经讲述了"双涛园"群童上学途中的种种趣事，事实上，每天走那么远的路赶小火车上学还是很辛苦的。孩子们一大早就得起床，匆匆吃完早点后，便带着饭团子上路，往往天黑透了才能赶回家。据林洙回忆，这种紧张而有趣的生活给梁思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常梦见童年时赶火车上学的情景，睡梦中还能说出流利的日语，但醒来后却全忘了。（《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6页）

辛亥革命后，激变中的中国政局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梁思成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12年11月14日，梁启超乘船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和梁家开玩笑。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梁启超一贯持反对态度。尤其是1903年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劲头更高。他惧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大乱，中国从此会国将不国；他认为中国民众民智未开，不可能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治。总之，革命不可以救中国，改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梁启超的看法不能讲百分之百错误，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但是，在清廷已经腐败透顶，又拒绝深层次的社会改革的情况下，惟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他坚持的改良，无法解决那时的社会问题，甚至连他自己的流亡命运都不能解救，倒是他曾经极力反对的革命运动，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使他得以重新回到了祖

国，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由于梁启超在戊戌维新中的卓越声望，以及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11月16日，梁一抵达天津就受到了北洋系军政大员张锡銮、唐绍仪等人的夹道欢迎。接着是袁世凯的贺礼。三天之中，登门拜谒者达200多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料不及也”，“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民欢呼，真令人感动也”。尽管这隆重背后充满政治的险恶和阴谋，但梁启超还是为之激动不已，决心在民国政坛大干一场。

随着梁启超在国内政治地位的稳定，在李蕙仙的带领下，暂时留滞在日本的梁思成和其他家人也于第二年启程回国。梁家先在天津安顿下来，之后，梁思成便和年龄相近的三弟梁思永一同到北京上学。他先后在汇文学校和崇德高小读书。这一时期，随着梁启超经济收入的显著提高，梁家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梁家好学、上进的家风，尤其是梁启超对子女们的殷切期望和言传身教，使得梁家众多子女没有一人成为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而是在紧张充实的求学生活、乐趣融融的家庭氛围之中，渐渐长大成人。1915年，年仅14岁的梁思成进入著名的清华学校读书，正式成为一名清华人。在清华的8年时光，不仅成为他一生前途与命运的新起点，而且成为他与清华之间半个多世纪爱恨交加的人生因缘的开端。对于后者，年轻时代的梁思成显然没有意识到。

清华学校是利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开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典型的美式教育使它颇具近代色彩。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给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里明确阐述了创办清华学校的目的，他这样说：“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影响中获取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巧妙的方法，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从认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发展。”为此，他建议在总计3293.9万两白银（折合美元2444万元）的庚子赔款中拨出1100万美元，“退给”中国，用于兴办教育，培养符合美国利益的年轻学子。罗斯福总统接受了此项建议。退





款事宜从1909年1月1日开始办理，同时设立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9月，清政府将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园作为校址，开始兴建校舍。1910年12月将游美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1912年10月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分高等科和中等科，学制均为四年，高等科三四年级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一二年级，毕业生可直接插班到美国大学读三年级。学校聘请了许多外国教师，英语是常用的语言，除国学外，其他课程多用英语授课。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梁思成对此感触颇深，他说：“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7—28页）

在清华，年轻的梁思成度过了丰富多彩、乐趣无穷的8年时光。尽管对于天资聪颖而且勤奋上进的思成来说，8年的学制可能稍显冗长一些，但毫无疑问，清华的教育不仅使他在英语语言、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学习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而且在艺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不断展示和提高。这一切，又都成了梁思成成为一名著名建筑学家和古建筑保护与研究大师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此外，还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旨在培养亲美学生的清华学校丝毫没有办成一个洋奴与买办的训练基地。相反，她却成为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和人才成长摇篮。一代代清华学子在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同时，以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来为祖国的民主、独立、文明、富强而奋斗，以实践诠释爱国主义精神。

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加上严谨向上的学习态度和个人的天分，使得梁思成在清华学习期间，学业之优秀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但显然，年少的梁思成远远不满足于做个“书呆子”，他在音乐、美术、体育等众多方面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且一旦学起来，便立即以满腔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投入其中，乐而不倦。这一点，和他那位“兴趣”甚多的父亲是多么的相似啊！梁思成在清华的同窗好友、著名建筑师陈植在多年以后还对他在

清华的优异表现记忆犹新，他这样回忆道："(梁思成）性格爽直，精力充沛，风趣幽默，与我意气相投，成为知己。""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或劲炼或潇洒，曾在1922—1923清华年报任美术编辑；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何林一夫人）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Veloso）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则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Hymens）任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当时北京学校中设乐队的，清华是首屈一指。"（陈植《缅怀思成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页）当时的乐队成员还有梁思成的两个弟弟：梁思永和梁思忠。每逢假期，兄弟们就把乐器带回家里练习吹奏。于是，梁家除了欢声笑语以外，又传来阵阵优雅、悦耳的乐曲声和热烈的掌声，间或还能听到高低不一、断断续续的"杂音"，这是好奇的弟妹们在哥哥们演奏的间隙，争相抢过乐器一"吹"为快，而这往往又引起全家的哄堂大笑。在哥哥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梁家的子女们都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终生乐此不疲。即使是最晚出生的老Baby梁思礼，尽管和梁思成、梁思永等几位年长的哥哥相处时间很少，也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浓厚的兴趣。梁思礼酷爱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交响乐。他有一个绝活，就是能把贝多芬的交响乐，从头到尾哼出调子来，而且基本无错误，即使到了晚年，这一"功夫"也丝毫未减。

在清华期间，梁思成还曾和同学黄自等人组织合唱团，自己亲自担任男低音和男中音两个声部的演唱。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一位有高度音乐修养的人。

凡是熟悉梁思成的人，还为他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所折服。早在清华读书期间，梁思成的美术才能得以充分展示，而且，对于美术的浓厚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日后选择了"建筑学"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也是在清华，他曾被美术老师指定，和杨廷宝、闻一多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旨在"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关系"的艺术社团——"缪斯"。在担任清华年报及其它一些校内刊物美术编辑期间，更是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包括

封面图、栏头画、插图、写生画、速写等，甚至还有一些漫画。这些作品不仅绘制精美，而且不乏立意新颖之作。由于梁思成在美术方面的卓越才能，他被列为清华最有才华的小美术家之一。

在运动场上，年轻的梁思成同样十分活跃。他是如此的瘦小，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很难将全校跳高冠军等荣誉和他联系起来。学生时代的梁思成精力旺盛，朝气蓬勃，洋溢着令人艳羡的健康精神，这股精神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包括他的爱情以及他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中的生活与事业。梁思成当年的体育老师、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教授在其晚年还记得自己的这位得意弟子，他说“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体育方面也不能落后。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梁思成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病，身体才坏下来的”。（黄延复《有政治头脑的青年艺术家》，《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08 页）对于清华时期自己在体育场上的矫健身姿，梁思成即使在晚年回忆起来，也颇有几分得意，“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清华大学体育教授）。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7 页）

对于一名年轻的学子而言，梁思成显然是幸运的。8 年的清华学习，使他接受了系统的近代西方文明教育，而父亲的言传身教，则帮助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梁启超在将梁思成及其他子女送进西式学堂、继而出国留学的同时，也想尽一切办法，着力夯实孩子们的国学基础。

梁启超本人学贯中西，对于西方近代发展成就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精深的理解，主张“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要把欧美思想，尽量的全部输入，要了解，要消化”，“构成一种新东西”。（《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9，150 页）他甚至勾勒出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前景：“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

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1—38页）体现在教育思想上，他尤其强调要中西方教育并重，既要知西学，掌握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也要懂中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1914年，梁启超参加清华学校举办的座谈会上指出：“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转引自黄延复：《梁启超》，载《清华人物志》（二），155页）1920年底，梁启超开始在清华讲授国学小史，1922年正式成为清华学校的讲师。在讲国学的同时，梁启超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社会影响，积极推动清华的人文学科建设，主张融合中西，避免全盘美国化。他指出：“美国物质发达，她是时代的娇儿，她的经济毛病最重……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转引自耿云志、崔学海：《梁启超》，355页）也正是在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清华学校开始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1924年秋，筹建旨在培养国学研究人才的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受聘为四大导师之一。一时间，清华的国学人才济济。梁启超本人也成为真正的学术、文化宗师。

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后，特意将一套影印宋本《四书》寄给尚在日本学习的梁思成，让他好好阅读。在清华毕业前夕，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治疗，梁启超要求儿子边养病，边藉此巩固自己的国学基础，“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梁启超年谱长编》，995页）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梁启超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听课的有思成、思永、部分亲戚家的孩子和梁的一些年轻门生。梁启超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讲课，下午孩子们温习所学内容。梁启超先后讲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和《前清一代学术》等。这种家

庭学校的教育显然是卓有成效的。孩子们不仅深受父亲思想的熏陶，就连他激情洋溢的讲课风格都极力加以模仿。为进一步检验和巩固思成的国学学习成果，1922 年，梁启超责成梁思成和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人合作，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而梁启超本人则拨冗执笔，字斟句酌，修改润色。他说，“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亦所谓私授厥子，借以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别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这部译著最终经梁启超联系中华书局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梁思成后来指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自己和思永影响深远。他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8 页）而自美国留学归来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中国建筑史和考古学方面取得的震惊世界的开拓性成就，无疑是对梁启超的最好回报。虽然，这已经是梁启超去世多年以后的事情。

## 二、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梁思成对时局极为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和他的同学们已经在自觉地以未来中国主人翁的态度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并以年轻人所共有的激进方式实践着自己的爱国热情和理想，甚至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学生时代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 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进城宣传时，曾同一百三十余人一起被反动军警拘禁于北大法

科大院内。拘禁期间，他们坚持斗争，并声明‘政府不派人谢罪，誓不出法科一步’。终于迫使军阀政府派参议曾彝进前来当众道了歉，然后在义勇军和军东队的护送下凯旋回校，沿途特意从总统府门前过，‘大呼中华万岁，声动天地，观者如堵’，军警再也不敢干涉。到校时，‘校中教职员及同学百余人，排立大门两旁迎接，掌声雷鸣……’”（黄延复《有政治头脑的青年艺术家》，《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08 页）“五四”运动过程中，清华的学生自发组成了“学生代表团”临时指挥行动。运动之后，同学们深感有必要将这一组织变成代表学生的常设机构，于是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1919 年 12 月 23 日，“学生自治会”召开成立大会。迫于北洋政府压力，清华校方竟然公开进行阻挠，并联合军警粗暴干涉，甚至采取停电等拙劣手段妄图阻止同学们的爱国之举。面对着激情似燃烧的烈火一般的进步学生，当局的卑鄙之举必将导致更猛烈的反抗。正在群情激愤之时，梁思成的政治领袖能力又一次得以体现，只见他站起身来，大喊一声：“我们罢课！”杂乱的秩序和四处涌动的愤怒情绪立即被一场坚定有序的驱赶校长运动所取代，全校学生罢课。学生们的愤怒显然收到了成效，偌大的清华竟然在一年之内被迫三次更换校长。这种状况持续到了 1922 年春，清华甚至到了没有一名称职的校长来接任的地步。

青年时代的梁思成是如此地关注爱国的政治运动，并乐此不疲，以至于几乎改变他一生命运、实际上也给他的大半生造成无限痛苦的一场交通事故也是在他急于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发生的。

1923 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毕业，并准备去美国留学。5 月 7 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国耻日”大游行。8 年前，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等列强的支持，实现自己的皇帝梦，竟然利令智昏，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将高徐、顺济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消息传出，举国愤怒，人们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的国耻。悲愤不已的留日学生先是在日本举行抗议集会，之后又回国请愿。而 3 年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竟然不顾中方坚决反对，而同意日本提出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荒谬要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的中国无疑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对于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的纪念“国耻日”的大游行，“小政治家”梁思成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他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前去追赶游行的队伍。当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汽车突然横撞过来，梁思成来不及躲闪，摩托车被重重地撞倒在地。思永被甩到很远的地方，思成则被重重地压在摩托车下面。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思成伤势较重，左腿骨折，脊椎受伤，而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肇事者居然不以为然，高傲地向前来处理的警察丢了一张名片，便钻进小车，扬长而去。原来，此人是金永炎，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

当听到车祸的消息时，梁家全家老少都吓坏了，以至于转天梁启超给他的长女梁思顺写信讲述事件经过时，还心有余悸。梁启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宝贝思顺：你看到今日《晨报》，定要吓坏了。我现在极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借祖宗功德庇荫，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出事后约摸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那里，我怎样能见他？我那时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强说，不要紧，不许着急。但我看见他脸上回转过来，实在亦已经放心许多。我心里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残废也甘心。”（《际遇——梁启超家书》，139—140页）思永的伤势较轻，一周后就出院了。而思成的伤势则比当时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加上医院最初的误诊，耽误了治疗，之后的一个月内不得不连做了三次手术，整个夏天都在病房中躺着。但腿骨还是未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公分，受了伤的脊柱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由于肇事者和受害者均为当时的知名人士，这场交通事故轰动了整个北京城。鉴于梁家的威望和政府高官的逃逸行为，在梁家的一再责问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最后，北洋政府的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道歉，方才使事件平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尤其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差点耽误了他的前途，而且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伤，并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近年来，随着社会上对梁思成，特别是对梁思成的妻子


车祸受伤的梁思成

林徽因关注度的不断升温，关于这次车祸的缘由又人为地制造了种种莫名其妙的解释，以至于以讹传讹，混淆是非。其中有一篇文章颇具代表，该文描述说当时在西山养病的才女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一个赌局：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车祸发生了。行文至此，杜撰之风跃然纸上，想必读者自能辨清真伪。

坦率地讲，清华时代的梁思成不仅有着政治家的敏锐头脑，更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敢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和一定的领袖才能，以及良好的个人修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他完全继承了父亲梁启超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参与意识。就当时中国混乱不堪、危机不断加深的政局而言，也确实需要一大批富有牺牲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但自清华毕业之后，梁思成就逐渐远离了政治，而专心学术研究，他的显赫声名也主要源于后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梁思成为什么后来没有专心从政，或者退一步讲，为什么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一边做学问，一边从政？这个问题似乎很能引起后人的兴趣。如今，梁思成已去世多年，他本人生前没有告诉世人答案，因此我们的解释和其他众多关注梁思成的人作出的解释一样，都只是主观的推断而已。

其一，显然受到了父亲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年因为从政而出名，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明星，后来流亡日本期间，虽处境艰难，仍钟情于改良运动。辛亥革命后，立即回国，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民主共和政治活动中。民国初年，梁启超曾多次参与组织内阁，先是于 1913 年 9 月 11 日出任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勉强支撑 5 个月，内阁垮台。之后，梁启超又担任币制局总裁，仅 10 个月零 8 天，便自觉上当，愤而辞职。虽然 1915 年春梁启超已经提笔发表了脱离政界的宣言，但颇有社会责任心和远大政治理想的梁启超实在不可能坐下来一门心思地去作文论道。于是，后来中国政坛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出现了梁启超的身影，从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鼓吹民主共和，揭露袁世凯帝制野心，到策动自己得意门生蔡锷云南起兵，武装反袁，掀起护国运动大潮，并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再到联手

段祺瑞，草拟《反对复辟电》，马厂兴兵，进军北京，赶走辫帅张勋，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可以说，梁启超在民初政坛叱咤风云，屡建奇功。

1917年7月17日，时年45岁的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为了酬谢和拉拢梁启超，段祺瑞请梁出任财政总长，同时安排了6位研究系的人入阁。梁启超一度为之兴奋不已。一来，他一直钟情于财政总长一职，对理财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宏大的抱负，当年参加熊希龄内阁时，他便明确要求出任财政总长。但袁世凯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陆军、内务、外交、财政等内阁关键部门人选早已圈定，仅剩下农林、司法、教育等几个无关紧要的部门让熊希龄去自由发挥。虽然梁启超等人大为不满，但强权政治下的民主缝隙又能留给他们多少空间呢？最终只能委曲求全出任司法总长。二来，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并导致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闹剧的发生。在这一系列的政局变化中，梁启超基本上是站在段祺瑞一边的。因为在梁看来，段祺瑞是颇有力量的一个人，而且在对德宣战等问题上观点基本相同。不难看出，梁启超在护国战争后，又在寻求依靠"强人"、通过"开明专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老路。这次，段祺瑞就是他心目中的"强人"。同时，段也看重了梁的巨大社会影响，希望梁加入他的阵营。特别是梁在护国战争后搞起来的宪法研究会，很有势力，人们习惯上把这一帮人称为研究系。段祺瑞很想利用这股力量。

应该说，以书生从政并打拼官场多年的梁启超还是积累了一些为官经验的。他特意邀请与各军阀头目关系甚好的王克敏担任财政次长，同时，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作为施政的八字方针。但这也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在军阀混战时期，哪一个军阀不是在拼命捞钱？财政部其实早已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烂摊子，想有作为难比登天。梁启超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入不敷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疲于应付。1917年9月，他算了一笔到1918年6月的收支账：收入仅有7000余万元，支出却达到9300余万元，其中，陆海两部所属军政费即高达4900余万元，而到期要还的2400万元内外债还根本没有着落。梁启超为之日夜紧张，常常愁得做噩梦。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梁启超为巨额亏空而一筹莫展之际，段祺瑞的讨伐张勋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份报销账单，让梁启超签字。账单明细如下：1、

讨逆军总司令部经费70万元；2、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经费15万元；3、讨逆军总司令士兵犒费10万元；4、陆军部临时增加军队经费70万元；5、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20万元。讨伐张勋，段祺瑞实际出兵不过两个师加一个混成旅，共两万多人，战事也不过四五天，居然一开口就索要军费185万元。这分明就是狮子大开口般的公开打劫！更可笑的是，所谓的讨逆军总司令部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办事也不超过十来天，竟然报账85万元。但梁启超又能奈何呢？明知也不敢问，只能照单签字。段祺瑞如此，其他大小军阀的贪心与霸道也毫不逊色，各种军费开销的单子如雪片般飞到财政部。什么陆军部特别经费、外交军事用款、四川湖南军事费用、江西督军临时费用、海军特别犒赏等等，五花八门。纵使梁启超生出三头六臂，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元供大小军阀们挥霍啊！这些钱基本上落入了大小军阀头目的腰包。不仅如此，更令梁启超心寒的是，他连支配本部的用人权都没有。上任以后，梁启超试图将各省盐运使、税关监督、烟酒公卖局长等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便于政令畅通。不料，各省军阀自恃武力在手，肆意干涉人事任免。结果，梁启超一个也动不得。堂堂财政总长不过是军阀们的提款机而已。梁启超反复思量，觉得这财政总长实在无法当下去了。不得已，上书临时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职。冯千方百计挽留，梁只得继续留任。此后，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矛盾激化，梁夹在当中，左右为难，11月15日又提出辞职，但冯仍然挽留。18日，梁第三次请辞。恰遇冯、段矛盾白热化，22日，冯国璋居然下令解散段祺瑞内阁，梁启超也就自然下台了。

对于从政，梁启超可谓满腔热情而来，却两手空空而归。说到底，梁启超虽曾位居高官，但他不是政客，而是思想家、学者，才情洋溢却权谋不足。胡适后来有一个评价很中肯，他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政坛的黑暗与混乱，使得天真的梁启超屡遭挫折，空有报国之志，只能对天长叹。失望苦闷之余，梁启超逐渐悟到一些“真谛”——尽管这样的感悟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消极悲观和无可奈何的成分：在军阀专制、黑暗混乱的中国，从政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尤其是青年，绝不可涉足于此。“而求阅历于官吏社会，则与个性发育主义最相妨者也。今试

问国中大多数之青年，其性质实宜于为官吏者果有几许？其所学与官吏事业绝无关系者亦且泰半。今乃悉投诸官吏之大制造厂中，而作其机器之一轮一齿，其自暴殄毋乃太甚乎！……又以官吏之量供过于求，故其得之也，必须至剧烈之竞争。而此种竞争，非若陈贷于肆，惟良斯售。而其间恒杂以卑屈之钻营，阴险之倾轧。其既得而患失也，则亦若是。故虽以志节之士，一入乎其中，则不得不丧其本来，而人格既日趋卑微，则此后自树立之途乃愈隘。”（《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3，49—51页）也正是有了这么一个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晚年的梁启超在退出政界之后，虽仍关注时局，时常有参政之冲动，但始终未付诸实践，而仅仅将自己“政论家”的角色限制在“议政”层面，并专心学问，终成一代宗师。

出于对子女的关爱和责任，梁启超也在潜移默化中向他的子女们灌输着这种思想。他认为国富民强要人尽其才，发挥个性和特长，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并非从政一途。更何况，当时的政坛是如此的黑暗，从政者除了谋取私利外，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梁启超不希望儿女们进入政界，而是教导他们要专心学业，不要看着国内的形势着急。正如他一再告诫大女儿思顺夫妇的话，“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事实上，在20年代这个革命与反革命针锋相对的时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梁思成和他的弟妹们也按捺不住满腔的热情，急于投身“国民革命”的洪流。他们的父亲颇具民主色彩的作风和坚定的个人信念，加上孩子们从小就已形成的对父亲的无比信赖和尊重，最终使他们接受了父亲的观点。

当梁思成兄弟因赴美求学而远离了时代有所顾虑的时候，梁启超给予他们这样的解释：“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际

遇——梁启超家书》，129 页）

北伐时期，梁思忠受国内时局影响，热血沸腾，想中止在美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梁启超得知儿子的想法后十分焦虑，立即回信劝阻。在给思顺的信中，他依然对思忠表现出的政治冲动不无忧心。他告诉女儿：“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虽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实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际遇——梁启超家书》72 页）

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并持之以恒，全无政治活动的轰轰烈烈。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明确地鼓励孩子们：“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

其二，梁思成的“远离”政治，不是完全脱离政治的隐士之举，更不是对政局漠不关心的消极“避世”。相反，他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并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不惜以自己和妻子的健康与生命作为代价。

仅举抗战时期发生在梁思成夫妇身上的两件事便足以说明问题。

第一件事：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暂时解散，梁思成、刘敦桢等主要成员决定内迁。为免学社成立以来工作的重要成果——全部的测绘图纸、测绘图稿、摄影底片和调查报告落到日本人手中，经紧急打包之后，全部存入位于天津租界的英资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中。正当他们忙于收拾物品之际，梁思成忽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注意上他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马上离开北京。梁思成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抛弃家产，和林

徽因一起，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岳母，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流亡之旅。事实上，此时的梁思成夫妇除了要扶老携幼颠沛流离外，还要面对自身疾病的严峻考验。林徽因的肺部检查出空洞，病情有恶化趋势，亟需静养；思成本人年轻遭遇的那场车祸的后遗症突然加剧，经检查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疼痛难忍，行动不便。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能阻拦他们。

事实上，1935年末，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态势迹象尽显，梁思成、林徽因便开始了内迁的准备。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的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56页）

日军对北京发动进攻之后，林徽因在给女儿再冰的信中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和丈夫的态度。她用大而整齐的字告诉再冰：“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50页）

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梁思成夫妇的爱国情操。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带领全家（包括外婆在内共五口）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这是一所灰砖楼房，房东就住在楼下，后面有一个狭窄阴暗的天井。这同我们在北平住的那个院子中有丁香花的四合院（虽然也是租来的）相比，差别自然很大。父亲和母亲

立即开始学习烧饭、洗衣等家务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带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变化的。

使我更难忘记的是父亲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三叔是考古学家，曾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象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35—236 页）

第二件事：1940 年冬天，梁思成带着全家老小随同中央研究院迁往偏僻贫瘠的四川李庄。之后的生活之艰难，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在极端的困境中，妻子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李庄的闭塞落后以及梁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改变现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鉴于梁思成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和大学写信邀请梁去美国访问讲学，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费正清夫妇和其他的一些美国朋友，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更令常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梁思成复信告诉那些热切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美国朋友："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152 页）梁思成在用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抉择的沉重代价。正如梁思成本人所言，"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

如果说，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徽因除此之外，比我更多地从拜伦、卢梭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学习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梁思成、林徽因与我》，152页）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位著名的美国医生就告诉梁思成，他心爱的妻子林徽因因疾病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将会不久于人世。爱国，关心政治，这些时髦的话语，在梁思成的身上显得如此的朴实无华，又是如此的坚韧不拔，这无疑是对梁思成政治观的最深刻的阐述。从这一点上看，梁思成真正实现了父亲对他的希望。而这恐怕也是梁思成没有从政的深层次原因。

其三，对从政的理解和对建筑学专业的无比热爱。这一点，既和梁启超有一定联系，又有着鲜明的思成特色。

梁启超认为从政也应当算是一种职业，政治救国和军事救国、学术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从事旨在拯救民族命运的活动，不必也不应该将从政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的人生理想选择。从梁思成的个人经历看，似乎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着这一思想。他一生钟情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热情之高是其他兴趣难以比拟的。这门融会工程、艺术、人文等多领域知识的学科使他如痴如醉，沉浸其中，终生不悔。梁思成在给他的学生讲课时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难能可贵的是，梁思成不仅有着出类拔萃的艺术天赋，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而且性格沉稳、作风严谨，做人、做学问均一丝不苟，所有这些特长集合在一起，加上其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才铸就了一代建筑宗师。

20世纪30年代，是梁思成从事古建筑调查和研究的黄金时期，通过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的不懈努力，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等一个个璀璨无比的中国古建筑陆续被世人知晓，并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全世界，彰显出中国古老建筑艺术

的独特魅力和中国建筑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而此时的中国，已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之下。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丧，到1935年华北事变平津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着日寇全面入侵、甚至于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锲而不舍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亡高潮。这一时期的梁思成则全力以赴展开了与时间的竞赛，争分夺秒地开展古建筑调查，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保护方案，力争赶在战争爆发之前，找到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力争赶在日本学者之前，写出中国的建筑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抗战呢！

1937年6月，梁思成多年来的梦想和努力终于成真。他和妻子林徽因终于找到了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位于山西五台山南台豆村镇东北约5公里的佛光寺，也将自己的事业推向辉煌的巅峰。虽然这来之不易的辉煌就如同夜空突然绽放的礼花，绚烂而短暂，但在属于他们的抗战战场，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漂亮的胜仗。

## 三、初入建筑殿堂

1924年6月，清华毕业的梁思成携手林徽因赴美留学。至于要学习的专业，二人早已达成一致，那就是建筑学。尽管对于他们、甚至于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讲，这都是一门还没有、甚至闻所未闻的学科，一个陌生的研究领域。他们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系统接受西方近代建筑学教育的留学生。

年轻的梁思成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自己原本毫不熟悉的建筑学专业，并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兴趣和职业乐而不疲？这通常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梁思成必问的一个问题。的确，作为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的专业选择应

该是值得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借鉴的。事实上，诸多的传记文学作品也都谈到了这个话题。大家普遍认为，主要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略显简单，仅关注到了林徽因的作用，而忽略了梁思成自身的优势、兴趣，以及父亲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深究这一问题，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原因之一：林徽因将建筑学专业介绍给了梁思成，并引起思成的极大兴趣。

梁思成后来也常常向朋友们谈起他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建筑学专业。他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梁思成、林徽因与我》，36 页）

和梁思成夫妇交往至深的费慰梅肯定了梁思成的说法，她说：林徽因"轻易地引导思成走上同一条路。思成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可以当个艺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起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理想。"对于林徽因接触并喜欢上建筑学专业的时间，费慰梅则根据梁思成的回忆，指出是在 1920 年至 1921 年林随同父亲在英国生活、学习期间。"徽因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着迷了。她的朋友在她追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下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事业，一种把艺术创造和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27—28 页）

原因之二：梁思成自身的兴趣爱好，使他能够在建筑学领域尽情展示才华。

建筑学融艺术创造和应用工程于一体的专业特点，恰恰是有过人的艺术天分的梁思成所渴望为之的工作。别忘了，清华读书时期的梁思成就已经是个出色的小美术家了。何况，梁思成不仅有着出类拔萃的艺术天赋，而且有着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初，梁思成结合自己的专业体会，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自己对建筑学的理解，他说"建筑虽然是一门技术科学，但它又不仅仅

是单纯的技术科学，而往往又是带有或多或少（有时极高度的）艺术性的综合体”。建筑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艺术”，“建筑⊂（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美术）”。（《梁思成全集》（第五卷）361页，372页）

原因之三：父亲的支持和教导，坚定了梁思成的专业学习信心。

无论求学，还是做学问，有两点很可怕：一怕没兴趣，食之无味，弃之不舍，如嚼干蜡，即使勉强取得一点成绩，也不会长久维持，这在当前紧随高考指挥棒、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教育背景下是屡见不鲜的；二怕没方向，要么随波逐流、胡打乱撞，要么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都难有大的提高和发展。

在求学过程中，这两类问题梁思成都曾经遇到，更为之苦恼不已。幸运的是，父亲的及时点拨与鼓励，以及长期以来父亲的学术修养对他们的影响，帮助年轻的思成闯过了这些关隘。

梁启超一生充满了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心”，又对生活和事业饱含浓郁的“兴味”，是两者调和、统一的生动体现。1921年，梁启梁在北京哲学社演讲时说：“诸君读我的近20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7，60页）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梁启超对家庭、对生活，充满热情，于是才有了“双涛园群童”的幸福童年，有了饮冰室的欢声笑语；对从政、做学问，同样始终充满热情和激情，即使后来忍痛告别官场，也毫不气馁，关注时局的同时，全力在学问上大展宏图。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是极其勤奋、相当用功的，全身心投入，已到忘我的程度。他著述《中国通史》时，因劳累过度曾患呕血病甚久，但仍然苦读。有一段时间，因病“医者力戒静摄”，但却“发愤自撰”《陶渊明年谱》，“虽号称养病，亦颇以镂刻愁肝肾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88页）有时候，他“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差不多夜夜都做到天亮。”（《梁启超年谱长编》，1014页）对于梁启超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手下无笔、眼中

无书。他认为，这无异于叫他过“老太爷的生活”，让他“成了废人”，而这于他“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梁启超年谱长编》，1163 页）1928 年，他在医院养病期间，“仍托人觅关于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于是不等病体痊愈，立即“携书出院”，“驰回天津”，一面服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梁启超年谱长编》，1119 页）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梁家的子女。从梁思成，到梁思永，再到梁思庄、梁思礼，甚至于再下一代子女，哪一个不是倾注满腔热情和无限兴趣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并取得显著成就。

梁启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厚的造诣，他“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占有绝大价值”。中国建筑是古代美术、科技，乃至整个文化的结晶。所以，当梁思成决定赴美学习建筑学专业时，他不仅给予全力支持，而且对思成的专业定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例如，在他的建议下，梁思成后来学习的重心逐渐从“美术”转向“工程”。再例如，对梁思成、林徽因影响巨大、甚至决定了他们两人毕生学术方向的一部著作——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就是梁启超寄给他们的。

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8 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学校创建于 1740 年，是美国第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独立宣言的 9 位签字者和美国宪法的 11 位签字者和该校有关。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学校的创建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由卡普和斯特沃森设计，两位建筑师融合了英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建筑风格，在保留一些哥特式建筑古老元素的同时，创新并发展出了全新的哥特式校园建筑风格。学校中心校区面积 269 英亩（约 1 平方公里），并向费城西部延伸，东北面与爵硕大学相邻，形成了拥有众多院系和研究所的校园。学校拥有知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其藏品中有着大量古埃及与中东的文物，同时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文物，包括一个出自古代中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球。此外，校园中的当代艺术研究所每年举办多场不同风格的艺术展览。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的美术学院创建于 1890 年，是培养能美化自然和社会环境、

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人才——建筑师、规划师、历史文物维护专家、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等的基地之一，其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中不乏美国一流的艺术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要来报考美术学院的建筑系。但是很不巧，他们到达时已经过了学校春季招生时间，没办法，只能等待秋季的招生机会了。

对于满怀热情、不远万里来求学的思成和徽因来说，在异国他乡无所事事地干等上一个夏天，简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苦闷之余，他们从周围的中国留学生那里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宾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每门课程只要学分修满便可毕业，不限定学制年限，且具备了一定学分的学生，可以申请直接进入大学二年级或更高年级。而位于纽约市附近绮色佳小镇的康奈尔大学就开设了暑期班。7月6日，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到康奈尔大学，同行的还有梁思成的清华同学陈植。尽管绮色佳景色优美，但对于他们而言，求学的欲望远远超出游山玩水的闲情雅致。来这里的第三天，他们就开始上课了。梁思成选修的是“水彩静物画”“户外写生”和“三角”等三门课程，林徽因则选修了“户外写生”和“高等数学”两门课程。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假期在紧张学习中，悄悄地过去了。

秋天来了，顺利拿到康奈尔大学课程学分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次来到费城。然而，命运又给他们开了个玩笑。只是这次的玩笑可真的有些过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居然不收女生！理由在现在看来更是显得有些荒唐——建筑系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而无人陪伴的女生不太方便。学习建筑学专业的想法始于徽因，而如今她却被莫名其妙的理由拒之门外，这样的结果简直令她无法接受。可是，规定早已存在了，不接受又能如何呢？没办法，林徽因只得到同在一个学院的美术系注册。而梁思成则顺利进入了建筑系。鉴于他们已经获得的学分，校方同意他们从三年级课程读起。

出于对建筑学的极端喜爱，聪明的徽因后来还是想办法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思成呢？良好的学习环境，出色的个人天赋，加上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孜孜不倦的勤奋努力，使他很快成为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曾在学院组织的设计竞赛中获得两项金奖。据他的好朋友陈植回忆：“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

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但亦曾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雅淡，明净脱俗。”（陈植：《缅怀思成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 页）

在宾大学习期间，梁思成有幸遇到了两位优秀的建筑学教授，学业上有了长足进展。一位是他和陈植的设计导师斯腾菲尔德（H.Sterbfeld）教授。在他的指导下，梁思成不仅得以接受巴黎美术学院传统的古典艺术基础教育，而且就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作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钻研。据梁思成回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对他后来在中国的事业很有帮助。在当年的学生作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是以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未完成的教堂设计；或以原历史背景重新设计凯旋门，但又不能背离当时的环境，或修复毁损的建筑物。梁思成娴熟的制图技术，加上扎实的绘画基础，使他顺利地完成了一份份颇具难度的作业。对于这一点，林洙感触极深，而她的感触来自无意中翻看到的梁思成在留学期间的学习笔记。“一天，我在资料室的书堆中发现两个厚厚的英文活页笔记本，这是某人在学习西洋建筑史时做的笔记，一页页整洁的打字，隔两三页就有一张插图，有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和剖面图。全部都是钢笔徒手画的，线条活泼又严谨。我被这些精美的作品吸引住了，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我慢慢地看出了一点眉目。这是一个极用功的学生学西方建筑史的笔记，笔记中除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外，还就每一座建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抄下重要的评论，然后又根据照片或书中插图画成了这些小钢笔画。好家伙！这是个什么人哪？西洋建筑史我学过，而且听的是梁先生的课，虽然同学们都很爱听这门课，但也没有见到谁下这么大的工夫。我继续看下去，发现有的画上有一个①字，同时还有一个印章，中心写着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外圈是 SCHOOL OF ARCHITECTURE（建筑学院）。我恍然大悟，对！这是梁先生当年的笔记本。想起他讲西方建筑史时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并以他渊博的学识古

今论证、中西对比，那正是他几十年来严谨治学的硕果。……我又问他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图上有印章，但大部分都没有。他告诉我说，①是1分，美国学校也是实行5分制，但最高分是1，最低分是5，正好和我们现在的5分制相反。有印章的是教师要求完成的作业，没有印章的是他自己画的。我说了声谢谢，不知怎么搞的又傻头傻脑地冒出一句：'您真了不起。'他笑了笑说：'没什么，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30—231页）

另一位对梁思成影响深远的是克雷（Paul. P. Crade）教授，一位著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教授不仅在美术和建筑教学方面才华非凡，而且具有丰富的建筑设计经验，华盛顿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底特律美术学校等美国建筑中的经典作品，均出自他的手笔。在克雷教授一丝不苟、甚至于有些"苛刻"的要求下，梁思成受到了很好的美术和建筑设计专业训练。1927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因成绩优异，梁思成得以进入克雷教授的建筑事务所实习，并担任他的副设计师。作为刚刚毕业的建筑系学生，能有机会到大师手下工作，不仅仅是莫大的荣誉，更是一次难得的专业实践与深造的机会。对此，梁思成显然是非常自豪的，以至于回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出具个人简历的时候，其中一个头衔就是"克雷博士副设计师"。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建筑界，深受法国建筑思想影响，由法国兴起的布杂艺术（Beaux-Arts）在美国盛极一时。布杂的中心思想是基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法则，认为社会文化之所以能达到稳固的程度，是由于它的古典基础。其建筑思想与特征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遵守古典的建筑法则及语言（元素），以此工作和教育下一代；第二，调整及发展可用的古典公式，来适应新的建筑型态；第三，以轴线的理论为基础，关切建筑物及都市的发展；第四，尊重历史，以包容的态度来处理建筑物；第五，坚持以砖石为建筑材料，表现量体及围出次序井然的空间；第六，整齐及对称的构图是布杂的平面标准。简单地讲，布杂艺术是西方建筑教育的一种传统风格。以克雷教授为代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所极力倡导并贯穿学生培养过程的主流建筑思想即是布杂艺术。而这种教育

理念对于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使他对建筑历史和建筑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选择了建筑史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方向。关于这一点，下文我们再作专门阐述。

不可否认，布杂艺术过于强调在建筑外形上模仿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注重纯形式美，而忽视其内部实际功能的建筑设计理念。对此，年轻的思成一度感到困惑，甚至担心长此以往，自己也许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头脑的机械画图的匠人，而不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建筑师。在给父亲的信中，梁思成流露出这种忧虑。远在大洋彼岸的梁启超对于儿子遇到的问题显然非常担心，立即回了一封长信，不仅对这一问题作了解答，而且结合自己做学问的心得，帮助思成理清了发展方向。他在回信中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与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摅自己性灵的余地。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区区波士顿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次，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际遇——梁启超家书》，129—130 页）

在求学方面，梁思成的另一个遗憾则是在后来感受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的建筑设计理念开始了一次重要的变革，以大量新型建筑材料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布杂艺术所刻意追求的现代古典主义开始被现代主义潮流所取代，后者很快成为建筑界的主流。而此时的梁思成已经从宾大毕业了。后来，梁思成曾多次表示他的遗憾，说自己刚好错过了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关口。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应邀赴美讲学并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期间，广泛地接触了欧美一流的现代派建筑大师，这种合作与交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遗憾，也使他在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过程中，独具匠心地实现了古典学院派建筑教育与包豪斯的现代派教育的过渡与融合。

在宾大学习期间，梁思成在建筑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他在艺术领域的天分又使得这一兴趣充分展现出来。“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宾校的博物馆与建筑系大楼近在咫尺，规模不大，但名闻遐迩，藏有我国古代铜、陶、瓷等文物。其中最令人感叹的是唐太宗陵墓的‘六骏’之一，竟被盗卖而存于异邦的博物馆。思成兄、徽因与我每往必对这一浑厚雄壮的浮雕凝视默赏。思成兄本人又常徘徊于佛像与汉唐冥器之间。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他对我国雕塑的鉴赏力是以后对石窟的壁画、造像、寺院的佛像等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鉴别而不断加强成为专家的。1947年他从耶鲁大学讲学返国时，曾言在考虑撰写中国雕塑史，惜终未如愿以偿。由于钦佩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深邃，在他50岁时我曾以隋代造像为赠。”（陈植：《缅怀思成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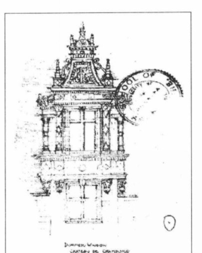
梁思成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追溯其建筑发展道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身在美国，受西方审美观念的熏染，接受的是典型的西式学院教育，但梁思成始终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建筑学，而是尝试将中西建筑文化熔为一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身上越来越表现出一名优秀建筑史学家应具有的良好素质，即对现代和传统的融会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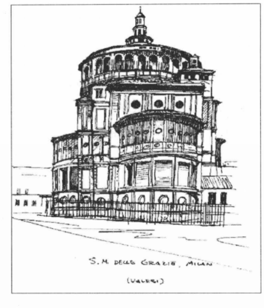
和浓厚兴趣。有一件趣事令梁思成记忆犹深，以至于多年后每每提及，还颇为得意。那还是在宾大上学时，梁思成在宾大美术学院的工作室精心为林徽因制作了一面仿古铜镜，并作为1928年的新年礼物送给了徽因。铜镜是用一个现代的圆玻璃镜面镶嵌在仿古的铜镜框里合成的。铜镜正中刻着两个飞天浮雕，组成圆形图案。飞天外面是一圈卷草花纹，花纹外圈是两条线脚，两线中间均匀地铸着一圈字——"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喻其晶莹不玷也。"铜镜设计构思巧妙，制作精良，再经过仿古处理，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调皮的梁思成竟将这件假古董拿给一位专门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教授看了又看，实在难以作出鉴别，不得不坦率地告诉思成："从图案看像是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看着教授认真的态度，梁思成实在忍俊不禁，担心再待下去就要露馅了，于是找个借口溜跑了。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梁思成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国学教育，国学造诣深厚。就这一点而言，梁思成继承了梁家的家学。同时，在清华读书的8年和在美国的4年留学生涯里，梁思成又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学习了大量的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真正做到了中西并重，中西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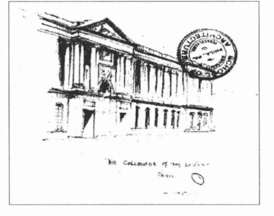
在对西方建筑史学习的过程中，梁思成深感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浅薄与匮乏。梁思成晚年这样回忆当年的想法：

> 在宾大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
> 同时，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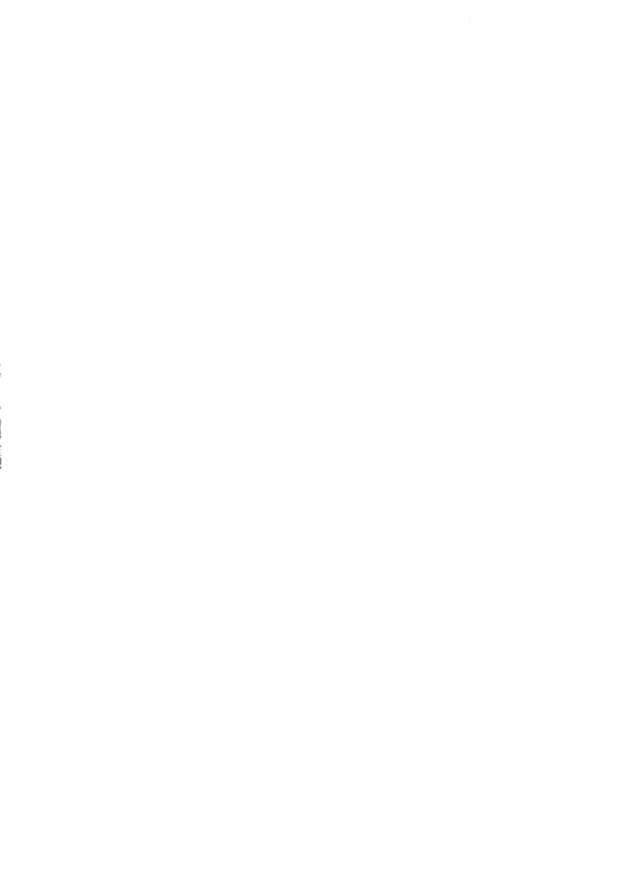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建筑画

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梁思成、林徽因与我》，36 页）

而真正促使梁思成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建筑史，并终生矢志不渝，则是父亲梁启超于 1925 年 11 月 13 日寄给他的一部书。甚至可以说，这部书改变了梁思成一生的命运，也最终造就了一位伟大的中国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后来回忆说："1925 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是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我想既然在北宋（公元 960—1127 年）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著，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著的决心。"（《梁思成、林徽因与我》，36—37 页）



# 第三章

## 牵手林妹妹



## 一、任公的得意安排

在清华读书时的梁思成就像一只快乐而自由的小鸟，在不断汲取知识的同时，尽情地展现着出众的才华。毫无疑问，和同时代的众多年轻学子相比，他当然属于出类拔萃的。对于这一点，他那位慈祥的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梁启超渐渐发现，昔日那个满脸稚气、调皮捣蛋、常惹妹妹大哭的小个子思成已长成一个举止得体、颇有学识的大小伙子了，尽管幽默乐观的天性丝毫未减。传统的思维方式立即使梁启超夫妇意识到：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事实上，自梁思成出生之后，梁家就在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毕竟，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是梁启超的希望之所在。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男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由父母作主，选一位门当户对人家的贤淑女子，经媒妁之言，定下终身，然后择良辰吉日，迎娶过来，人生中的婚姻大事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小就生活在传统的伦理观念氛围之中的梁启超很自然地因循了前人的做法，开始处心积虑地为思成寻找合适的女孩子作为梁家未来的儿媳妇。很快，他发现了一位再理想不过的人选，这个令任公满意的女孩子就是梁启超在政界的好友——林长民的千金——林徽因。

林徽因祖籍福建闽县（今福州），1904年6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陆官巷的祖父家。林徽因从小生活在祖父家，5岁时跟随大姑母林泽民识字读书，一年后便开始学写家信寄给远在外地的父亲。稍长一些，开始承担起杭州家庭与父亲的通信事务。9岁时进入上海的爱国小学读书，10岁时随祖父赴北京与林长民同住。1916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英国教会学校培华女中读书。天资聪慧、清新秀丽的徽因从小就深得父亲的疼爱，虽

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但频频往来的父女书信，不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且对小徽因的成长，乃至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徐志摩曾对林长民、林徽因父女的感情作了一个真切的描述："她，你曾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对我说，是她唯一的知己。你们这父女不是寻常的父女。'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徽，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只你，她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她自己的老父？"（《伤双栝老人》）

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同时代人，也同为这个时代的知名人物和佼佼者。林家不仅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而且思想开明，注重新式教育，且同情和支持革命，对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贡献很大。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字伯颖，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外放浙江海宁、孝丰、仁和、石门等地为官多年。1876年生于杭州的林长民，幼名则泽，字宗孟，号苣冬子、桂林一枝室主，晚年又号双栝庐主人。小时候曾分别师从林琴南、林白水学习国学和西学。21岁中秀才，之后放弃科举仕途，进入杭州一近代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在20世纪初期的留学大潮中，年轻的林长民虽在父母的包办下早早成亲，并已有了孩子，但他不甘心继续父辈平淡禁锢、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毅然于1906年走出国门，东渡扶桑，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近代以来培养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知名人士，还有一些职业的革命家。林长民无疑也属于这么多著名人物中的一员。在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学位后，于1909年回国，先后担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处长、福建咨议局书记长等职。尽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学贯中西，诗文、书法皆享誉一时，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但就个性而言，林长民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心书斋的学问家，对政治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别的兴趣。辛亥革命爆发后，林长民以书生从政，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民国元年，林长民代表福建省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后任参议院秘书长等职。段祺瑞马厂起兵，赶走辫帅张勋之后，林长民一度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等要职，可谓显赫一时。虽然担任司法总长只有3个月，却因拒纳涉案人军阀张镇芳十万元贿款而广受舆论好评。他





本人也颇以此自许，还专门刻了一枚“三月司寇”的印章。曹锟贿选总统，一张选票开价五千大洋，林长民丝毫不为之所动，坚决拒绝。曹锟上台之后，林长民不得不暂时避祸于天津，卖字为生。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徐世昌任总统后，林长民又当上了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1919年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林长民得知内幕后，悲愤不已，于5月2日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警告国民》一文，将山东问题和盘托出，并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一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震撼，两天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林长民和梁启超的结识及个人友谊的形成始于民国初年二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曾于1913年9月在熊希龄内阁担任了半年的司法总长，对民主法制问题颇有研究。在合作中，林长民和梁启超很快找到了共同点，这其中，不仅有政治观点的相似，而且在做人的风格与兴趣方面也多有共鸣和默契。于是，两个在学术和从政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的知名人士成为了好朋友。传统思维模式又一次在这两位近代化意识很浓的名人身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彼此的意气相投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传统中国人惯用的做法——进行儿女联姻，结为秦晋之好，亲上加亲。而联姻的对象便是林长民心爱的长女——林徽因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梁启超和林长民显然对他们的这一安排非常满意，不仅仅由于他们二人的深厚友谊和门第相当的家庭，更主要的是两个孩子是那么的出众。在这么一种传统的观念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识了。而最初他们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竟成为民国社会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相识是在1919年的夏天。当时梁思成18岁，林徽因14岁。在两位家长的刻意安排下，正在清华读书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见到了年轻的徽因。当时的情景我们无法再现，但毫无疑问，初次会面，两位正处于感情朦胧期的心照不宣的年轻人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曾听到父母谈起过这段幸福的往事，据她回忆：“爹爹后

林徽因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林长民与林徽因父女



来说，他当时对于这次‘相亲’颇为忐忑，有点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民国初年女子的打扮）的旧式大小姐。但当亭亭玉立却稚气未脱的林徽因走进来时，爹爹见到的却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肩发辫、上身穿着浅色中式短衫、深色裙仅及膝下的小姑娘。她的灵秀之气和神采立刻吸引了他。特别令他心动的是，这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建筑师林徽因》，42 页）的确，林徽因那出众的容貌、良好的教养、大方的举止，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梁思成，这种感觉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年轻的思成尽管看上去略显拘谨，但却如此富有朝气，广博扎实的学识，幽默不俗的言谈，毫无富家子弟的轻浮与做作，这一切，都令年轻的徽因心动不已。爱情的火花就这样悄悄地迸发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的话，接下来，便应该是双方订婚，然后选择良辰吉日，为他们举行婚礼，两家皆大欢喜。梁思成和林徽因真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们，尤其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长期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但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民主、自由、平等等近代意识同样在他的头脑中深深扎根，并自觉地付诸实践。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传统的思维和现代观念得到有机结合，形成独特而颇见成效的梁家模式与特色。他的做法是，先为长大成人的儿女精心选择才学兼优者，让他们相识，并逐渐相互了解，培养感情，最后由儿女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对于这种古今兼容、土洋结合的做法，梁启超显然颇为得意，而他的长女的美满婚姻就是他依据这一原则而创造出的杰作。

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1893 年正月出生于广东新会老家。梁启超很宠爱思顺，单从对思顺的称呼中就足可以感受到他对女儿的真挚情感。“大宝贝”是梁启超对思顺的爱称，早年写给思顺的信均以“示娴儿”或“娴儿读”结尾，后来的许多信件则干脆称呼“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一直到晚年仍丝毫未变，而那时，思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对于年龄和自己仅相差二十岁的长女，梁启超不仅对思顺的成长竭尽所能，寄予厚望，在思顺稍稍长大之后，更将她当作了自己最信任的朋

友和助手，着意培养。从少年开始，思顺就为父亲阅报、收集资料、做翻译，成为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不可替代的得力助手。1913年，梁启超全家结束了十余年流亡生涯回到久别的祖国。此时的梁思顺已经是个落落大方的大姑娘了，她的婚姻问题也成为梁家的重要事情。梁启超不想干涉女儿的婚姻，他理解并尊重女儿的选择；但强烈的责任感又促使他不愿意置之不理，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他要为女儿一生的幸福负全部责任。左右为难的梁启超在苦思冥想之际，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出身贫苦的青年华侨周希哲是梁启超的学生，并曾担任梁的助手，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梁启超非常了解他，更非常看重他，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女婿。但梁没有擅作主张，而是先将周希哲介绍给思顺，让他们互相了解，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自然产生感情，最后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后来，思顺自己决定和周希哲结婚。由于感情相投，两人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梁启超对此十分欣慰，他曾经颇为得意地对女儿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际遇——梁启超家书》，116页）

有了长女幸福婚姻的经验，梁启超当然要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继续这一做法。于是，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建立了初步感情基础之后，梁启超郑重地告诉两个孩子：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婚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而最终作出这个决定时，时间已过去了4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年轻的徽因和思成都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的感情更真挚了，心更近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最初相识，并未影响他们的生活。之后，梁思成重新回到远在京郊的清华园，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林徽因则因为他的父亲林长民的工作变动而开始了一段令她终生难忘的异国生活。当离开中国时，年轻的她心中只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憧憬。无论她抑或梁思成恐怕都没有想到，对他们之间刚刚建立的尚无太深根基的爱情而言，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尽管从始至终他们都是被动的参与者。这个考验发生在林长民和林徽因父女远行的目的地——英国伦敦，而麻烦的制造者是一位后

来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青年诗人——徐志摩。

"一战"结束后，出于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重新划分世界利益等多种需要，战胜国成立了第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作为"一战"名义上的战胜国，北洋政府亦参与了相关的工作。而林长民，这个活跃的政治家尤其热衷于此。作为发起人之一，林长民于1919年3月筹备成立了"国际联盟中国协会"，并当协会干事。五四运动的爆发，导致北洋政府对林长民大为不满，使他在国内政坛难以立足。大总统徐世昌为息事宁人，指派他作为国际联盟中国协会代表，常驻伦敦，以躲避风头。1920年2月，他动身前往英国，开始了近两年的驻外生涯。出于带有外交官性质的职业需要，也是出于个人情感的需要，林长民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林徽因带去作伴。事实上，林徽因14岁那年，林长民赴日本访问，就很想携爱女同行，但顾虑徽因年龄尚幼，不便公务而未果。1920年初春，当林长民决定赴欧的时候，写信给徽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徽因："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当时的林徽因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出众的才华、早熟的性格以及她在学校里学会的英语，足以成为视之为掌上明珠的父亲驻外期间工作和生活上最好的助手。林长民的几位妻子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她们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的家庭主妇。

林徽因的聪明、热情和好学使她很快适应了在伦敦的生活，并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她的英语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很快就能够用一口流利的、略带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进行交流。林长民的职业和身份，使徽因有机会进入英伦社交界，结识了H.C.威尔斯、T.哈代等众多文化界名流。她的清纯美丽、聪明机智以及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使她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而且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此期间，徽因曾陪伴父亲到欧洲大陆游览，还曾于1921年8月，随同柏列特医生全家到英国南部海滨小城布莱顿避暑。

愉悦轻松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逝，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她们父女俩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很快就出现阵阵涟漪，甚至差点酝酿

出惊涛骇浪。这个年轻人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于 1897 年 1 月出生于浙江一个十分富有的实业家家庭。这是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子，热情好动，放荡不羁，性格中充满了叛逆精神。1915 年 10 月 29 日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婚后，几经周折，于 1917 年 9 月成为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在北大的一年时间里，徐志摩过得悠闲轻松。他并未正式上课读书，而是随意选修了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对于他而言，赴美留学才是真正的目标。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途，先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1919 年冬季毕业取得一等荣誉学位。之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并于当年的八九月间，取得硕士学位。这位日后中国新诗和“新月派”的文学健将来美之后，尽管学位上收获不少，但于学问，却无更多精深研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徐志摩有些近乎疯狂地崇拜上英国哲学家罗素，并自作主张，立即结束在美国的学业，于 1920 年 9 月，横跨大西洋奔赴英伦，万里寻师。后来，徐志摩曾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 20 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全集》第 4 册散文，上海书店版 135 页）

乘兴而来的徐志摩却未能在剑桥大学拜师罗素，甚至都未能谋面。原因很简单，早在 1916 年“一战”期间，罗素因为主张和平，惹怒了英国当局，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徐志摩到达伦敦时，罗素已经离开英国，踏上了去中国的讲学旅程。在华期间，罗素发表演说十多次，汉语言大师赵元任亲自担任翻译。罗素的每个讲题自成一个系列，依次是“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恐怕连罗素老先生自己都没想到，在万里之遥的古老中国，他不仅受到隆重欢迎，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场面不亚于当红名星，而且观众反响强烈，造就了诸多的中国信徒和崇拜者。此次来华讲学一直持续到 1921 年 7 月。

寻师不遇，徐志摩颇感无奈，不久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学习政治学。英伦之行，虽然投师未果，但徐志摩在伦敦生

活期间，结识了很多英国文化界名人，例如著名小说家、史学家威尔斯，著名汉学家魏雷。和他们的交往对徐志摩后来改习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志摩本人也颇为自得，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浓，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徐志摩全集》第9册书信集，9—10页）也正是在伦敦，徐志摩见到了林长民和林徽因。

还是在北京读书期间，徐志摩就结识了梁启超。对于他的才华，梁启超十分赏识，加上徐志摩妻兄张君劢的竭力推荐，遂将其认作挂名弟子，着力栽培。后来，徐志摩留学归来，他们依然保持着师生加朋友般的情谊。在梁启超的引荐下，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徐志摩便去拜访了林长民。在这次礼节性的拜访中，二人惊喜地发现，他们之间竟有着如此惊人的共鸣：奔放的热情，风流倜傥的性格，以及对文学的执着与偏爱，等等。一句话，两人属于同一类人。很快，他们便成为意气相投的知心朋友，尽管在年龄上有不小的差距，但显然这已不足以成为障碍了。在之后的日子里，徐志摩成为林家的常客，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无拘无束地交谈。通过林长民的介绍，徐志摩结识了一位对他今后的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一位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英国文学家——狄更生。狄更生不仅给徐志摩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文坛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于1921年推荐徐志摩进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成为一名专攻英国文学的特别学生。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徐志摩的非凡才华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林长民的家里，徐志摩认识了他美丽的女儿林徽因。对于英美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戏剧的挚爱使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徐志摩那极具感染力和个人魅力的讲述，一扇通往欧美文学大师殿堂的大门向年轻的徽因缓缓地打开了，雪莱，济慈，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等等。大师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精神让徽因激动不已，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当她谈起徐志摩，总是

情不自禁地谈起这些文学大师们和他们的不朽之作。

如果说，最初的相处，徐志摩对于比自己年少十来岁的林徽因最深刻的印象只是容颜的美丽和个性的开朗的话，随着接触的增多和交谈的日益投机，徐志摩渐渐被徽因那带有浓郁艺术天分的迷人气质所倾倒了。等他有所发觉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林徽因，而难以自拔。事实上，他根本不想掩藏自己的情感。于是，一段曾经在中国近代文坛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感情纠葛发生了。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此事，以至于让无辜的读者和观众看到了大量不遗余力地夸大渲染、甚至是歪曲这段情感事实的作品。而可爱的徽因，在当时就已经是这段“绯闻”中的被动参与者，时隔多年以后，仍难得片刻清静，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啊！

无须否认，林徽因的美丽与才华曾经倾倒过很多人，但生活中的林徽因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女孩子，对人生，对事业，对爱情，她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毋庸置疑，徐志摩的才华很出众，林徽因也清楚地意识到，徐志摩确实是真心真意地爱着她，以至于年轻的徽因一度为此困惑和苦恼。但理智很快驱赶了迷惘，林徽因坚定地拒绝了徐志摩，尽管善良的她丝毫不愿意伤害这位在文学方面给予自己很大帮助的老师和朋友。究其原因，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多年之后的一篇回忆录中的解释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这样写道：“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林徽因文集·文学卷》，420 页）和梁思成、林徽因同在美国留过学的冰心也曾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的徐、林“恋情”，她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

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离婚的。”（文洁若《林徽因印象》，《随笔》1992年第一期）

为进一步澄清徐、林之间的情感传闻，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一，林徽因对待感情，尤其是家庭的态度，使她无法接受移情别恋的徐志摩。

徽因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者和政客，但在私人生活上，却具有浓重的封建守旧色彩，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先后娶了三个女子为妻，而这种一夫多妻是被现代社会所彻底否定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林长民的大家庭从来也没有过一天的祥和气氛，女人们在相互的嫉妒和仇恨中消磨着青春，流逝着光阴。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瑗是林长民的第二房太太，所生的三个孩子只有徽因长大成人。1912年，林长民又从福建娶了第三房太太程桂林。由于三太太年轻漂亮，且接连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所以很得丈夫的宠爱。全家搬到北京之后，林长民一直和三太太住在前院，而极少顾及住在后院的二太太，使她实际上过着分居的孤苦生活。当时的林家经常是前院欢声笑语，后院冷清凄凉，家庭矛盾自然不断升级。这种压抑的氛围给年幼的徽因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尽管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的父亲不希望她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

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父亲在感情上的不专一给母亲乃至整个家庭造成巨大伤害，林徽因才更加渴望真诚、而且负责任的爱情，而多情多才的徐志摩恰恰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说徐是反面典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多情的他不仅对自己的结发妻子没有丝毫的责任感，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也缺乏最基本的关爱。当1920年底妻子张幼仪不远万里从中国来英国寻亲之际，他没有表现出起码的热情，而是将她匆匆安排住下之后，又开始冥思苦想如何获得林徽因的芳心。他那可怜的妻子还沉浸在与丈夫异国他乡团聚的幸福中呢。在近乎疯狂地追求林徽因的过程中，他愈发感到身边的妻子是一个极大的累赘。于是，他决定离婚，并把这一想法首先告诉了朝思暮想的徽因。出乎意料的是，文静的徽因以无法掩饰的愤怒作为对他的答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无意中发觉了自己一向很信赖的丈夫已经变心了。可以想象这个远离亲人的孤单女子是如何的伤心和失望。在泪水中，她告诉丈夫一件本想令他惊喜的事情：她又怀孕了。徐志摩的不负责任在这时表现到了极点。他只是淡淡地要求妻子流产，连一丝一毫的关心都没有流露出来。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出乎常理。之后的一天，徐志摩突然向妻子提出离婚要求，一周之后竟撇下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幼仪后来才知道，去了伦敦后的徐志摩托朋友捎话给妻子，再次表示要离婚。夫妻感情到了这个程度，已无任何维持的必要了。最可怜的是妻子张幼仪，初到国外，就遇到丈夫背叛，怀有身孕，而无家人关心，茫茫英伦，连一位亲人都没有，悲痛之情又有谁能体会呢！倔强的妻子最终还是答应了徐志摩的要求，在二哥张君劢和七弟张景秋的帮助下，得以从英国去了巴黎，又辗转到了德国，在那里生下了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但很不幸，这个从未得到一点父爱的孩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坦率地讲，徐志摩对这一悲剧应负完全责任，他也因此受到了全家的谴责。

其二，林徽因已经结识了梁思成，并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梁、林两家更是在极力促成他们的结合。

抛开颇为一致的家庭背景不说，单就梁思成本人而言，优秀的学业、敏锐的思维、男子汉的风度以及如此的多才多艺，都足以证明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且，梁家的幸福温馨这一现实似乎也在告诉徽因，思成应该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男人，而这正是年轻的徽因多年以来一直渴望的。事实上，梁、林两家有意结为秦晋之好的消息也早已为亲戚朋友所知晓。林长民父女回国伊始，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以示欢迎，“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劲瘦。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事实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她不仅得到了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一个爱她的、待她极好的丈夫，而且拥有了她足以信赖的幸福无限的家，尽管在婚后的大部分岁月里，她和丈夫、子女是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生活，并顽强地继续着自己心爱的事业，但又有什么比这

更可贵呢？

关于这段感情纠葛，后来由于徐志摩意外身亡之后出现的“八宝箱”（注：徐志摩的文字因缘箱，内有徐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徐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日记等）而增加了几分悬念，以至于几十年来，人们对“八宝箱”的兴趣甚浓，希望能窥得全貌，既而了解徐志摩在英国追求林徽因的真实过程。对于有些事情来说，秘密永远比真相更有吸引力。斯人已远去，就让“八宝箱”随着徐志摩优美的诗歌而淡淡地远去吧！挥一挥手，作别昔日，留下对故人的真挚记忆。

对于自己的好友和女儿之间的感情纠葛，林长民感到十分苦恼，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该怎么办？他几乎没了主意。一面是自己意气相投的知己，他不想失去这份友谊；另一面是自己心爱的女儿，他对徽因的爱超越了一切，决不允许有丝毫对她的伤害，更希望她能得到终生的幸福。徐志摩虽然才华横溢，但却难以给女儿带来令人满意的幸福。对于这一点，林长民很清楚。唉，一切全乱套了，平静的生活再也难以寻觅，风景如画的伦敦成了林长民父女俩的头疼之地。可事情必须得有一个了断。在徽因当面拒绝了徐志摩的追求之后，林长民于1920年底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虽措辞委婉，但态度不能说不坚决。信函全文如下：“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中文：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优异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后。”

尽管林长民父女对徐志摩的态度很明确，甚至于在1921年的暑假，为回避徐志摩，林徽因还随同柏列特医生全家去英国南部海滨小城布莱顿度假，但随着徐志摩家庭危机，以及以后的离婚大战愈演愈烈，在认真思考之后，林长民决定结束这段生活，让距离和时间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10月14日他和林徽因乘上回国的邮船，漫长的旅途很快过去，他们在1921年11月回到了中国。

随着林长民父女的回国，徐志摩，这位多情的才子也只能面对浩瀚的大海空发感叹了。一段难以理清的感情纠葛也就无声无息地平息了下去。

一年后，徐志摩返回国内，尽管还对美丽的徽因念念不忘，尽管他已不顾一切地于当年的3月同自己的妻子离婚，但眼前的现实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徽因不可能接受他了，因为她已经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感情归宿。

1922年初，梁思成拜会林徽因，两位年轻人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梁、林两家自然非常欢喜，尤其是他们的父亲，更是异常高兴。同时，两位长者总算能够放心了，因为，他们确信，那个曾经试图将他们精心设计的美满姻缘给搅乱的多情才子恐怕很难有机会改变这一切了。作为师长，梁启超和林长民都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不想伤害他。但对于他的放荡不羁，梁启超也很难容许。为了彻底消除徐志摩今后可能对自己长子家庭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就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一事写了一封批评信，而其实际用意则是再明白不过了。他在信中写到：

其一，人类恃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重闹之悲诧，微君劢言吾亦可以推想得之，君劢家之老人，当亦同兹感。夫人或与弟同怀抱所痛灭杀（?），然最堪者两儿，弟既已育之，胡能置之，兹事恐弟将终身受良心上之重罚无以自宁也。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最乐道，吾于兹义固不反对，然吾以为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以兹事为唯一之神圣，非吾之所敢闻，且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非可谓吾欲云云即云云也。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

愧耶！可无惧耶？

我们不能不为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显然，在思成已经成为情战胜利者、可怜的徐志摩两手空空之际写这封信是不合时宜的。一无所有的徐志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但在精神上，他不想同样一败涂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给梁启超的回信中，他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其几亦微矣！"

显然，此时的徐志摩仍未完全死心。回国后不久便到了北京，试图对林徽因展开新一轮的爱情攻势。但多情的志摩忽视了徽因和思成的感情，之后的一件事情便足以让自负的他倍感尴尬。蔡锷将军英年早逝，为纪念这位再造共和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四处奔走筹建了松坡图书馆，并亲任馆长。松坡图书馆设在北京，有两处馆所，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快雪堂环境幽静古雅，周日不对外开放。但梁思成因为父亲的关系，自配了一把钥匙，方便出入。周末回城，他常常和徽因在此约会读书。后来，徐志摩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在这个地方可以见到林徽因，于是便不请自来。他是梁启超的挂名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尽管思成和徽因不愿受其打扰，但出于礼貌也不能赶他走啊！可鉴于徐志摩经常不请自来，总不能任其下去吧，何况他来找徽因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梁思成索性在门上贴上一张纸条，上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中文：情人不愿受到干扰）徐志摩见了，也只得怏怏而去。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作了一个极坦率的剖析，他说："林徽因被她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平。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陈宇：《暮年金岳霖

忆林徽因》，《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46页）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婚时间，梁、林两家存在一些分歧。林家主张立即订婚，然后举行婚礼；梁启超则出于对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考虑，认为思成和徽因应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显然，梁启超的主张是颇有远见的。于是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思成和徽因先到美国留学，等毕业后，再正式结婚。

生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似乎就等着欢欢喜喜大团圆的最后结局了。然而，或许是乐极生悲，或许是爱情之神还要再一次考验这对恋人，一场意外事件发生了。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在准备参加“国耻日”游行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由于伤势严重，整个夏天都在病房中躺着。而按照先前的计划，此时，梁思成应该和林徽因开始前往美国留学的旅程。如今，一切都要推迟了，年轻好动的梁思成曾一度为此十分苦恼。

林徽因的出现使笼罩在思成心中的阴影很快就一扫而光。当得知梁思成受伤的消息，她也吓坏了，并很快赶到医院，和梁家人一同守候在思成的床前，不吃不喝，直到确认思成已无生命危险。在以后的日子里，林徽因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坐在梁思成的床前，陪他聊天，甚至为思成拧手巾擦汗，一切都是那么大方自然。然而，两位年轻人没有想到，徽因的举动引起了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的极度反感。有着浓厚封建意识的她认为林徽因的举动大大违背了传统的伦理要求，因为她还没有嫁给思成。对于这位即将成为儿媳的“现代新女性”，她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刚刚摆脱了来自外部的感情磨难，内部又起波澜，实在令这对年轻的恋人和他们的父亲哭笑不得。好在梁启超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使这场危机未能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一年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动身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留学生活。

我们无须刻意渲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的无比愉悦。他们到达美国后，双双进入著名的宾西法尼亚大学。美丽活泼的林徽因很快适应了美国校园的生活，并成为校园中的明星。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思成的优势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出国之前的种种考验，已再难以将他和徽因分开。即便如此，梁思成也丝毫不敢大意。由于忙于学业，他和徽因

并不常见面，每次约会，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耐心地等上二三十分钟，林徽因才梳妆完毕，像一位骄傲的公主一样走下楼来。当年，同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为此专门作对联一副：“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192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宾大的学习。梁思成获得硕士学位，林徽因获得学士学位。两人在克雷教授建筑事务所实习3个月后，梁思成进入哈佛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全力研究中国宫室史。林徽因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学生。

在哈佛大学，通过几个月艰苦细致而又系统有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研究工作，梁思成不仅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现状和有关成果了如指掌，而且明显感觉到已有的成果是那么的匮乏、肤浅和不系统，即使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两位学者——塞伦和波胥曼，也“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其中塞伦较好一点，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关于这一问题，梁启超的看法也颇有见地，他在给思成的信中提到：“思成的中国宫室史当然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到各处实地游历不可。”事实确实如此，离开对中国建筑的实地考察，闭门造车写一部中国宫室的历史，无疑是纸上谈兵。明确了这一认识，并征得导师同意，梁思成下决心暂时中止学业，回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氛围中完成《中国宫室史》的写作。此时，徽因也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的学习。

随着学业的顺利完成，加上梁启超的肾病越来越严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家人希望他们能尽快成婚，思成和徽因的婚姻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在梁启超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下，1927年12月18日，梁家在北京和天津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3个月后，这对相爱多年的恋人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由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和姐夫周希哲主持，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时间是1928年3月21日。3月21日是思成和徽因精心挑选的一个日子，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中国

宋代工部侍郎李诫，这是在朝廷为他立的墓碑上唯一出现的日期。这位杰出的古代建筑工程专家于公元1103年出版了卓越的建筑标准著作——《营造法式》，正是这部中国建筑史上的不朽作品使后人得以重温中国古代辉煌的建筑成就，而这一切，又不能不归功于梁思成夫妇以及他们的亲密助手们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

## 二、欢喜冤家

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伴着婚礼进行曲的优美旋律响起，梁思成终于和林徽因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让所有参加婚礼的来宾们都羡慕不已的幸福伴侣。尤其是徽因，她是那么的美丽，又那么有才学。对于思成和徽因的婚姻，万里之外的梁启超虽然已病痛缠身，但仍像一个快乐的孩子一样，兴奋不已。他将长子的美满婚姻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成功之作，是自己所独创的融会古今婚姻观的现代家庭婚姻理论的又一成功实践。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异国他乡举行婚礼并度蜜月，但这丝毫不影响老父亲对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大事小情，他都一一想到，并反复叮嘱思成和帮助思成操持婚礼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书信成了他表达满腔爱意的最佳方式。对于大女儿，他这样叮嘱道："在美婚礼，我远隔不能遥断，但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可由希哲、思顺帮同斟酌，拟定告我。惟日期最盼早定，预先来信告知，是日仍当在家里行谒祖礼，又当用电报往贺也。"（《际遇——梁启超家书》，80页）对于思成，他也同样叮嘱道："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

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顽了半天。……

我主张你们在坎京（旧译，指加拿大）行礼，你们意思如何？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婚礼还是在教堂内好），才庄严像个体统。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节省点钱作旅行费。”（《际遇——梁启超家书》，161页）

甚至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蜜月旅行，梁启超都提前作出了周密的计划。我们很难用语言描述已显老迈的梁启超对子女的关爱，至少有一件小事可以将这种真情诠释得淋漓尽致：为了思成和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方便，梁启超特意随信寄给思成12张自己的名片，并告诉他们，如果需要帮助，可持名片到中国派驻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因为当时很多领事都和梁启超有着私人交往。希望能多收到子女的来信，是梁启超的一贯风格，对于他来说，子女的来信就是最令自己愉悦的美文。这次更不例外，梁启超在信中按捺不住自己的舐犊之情，再三嘱咐思成“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境况。”

毫无疑问，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属于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熟悉他们的人又都知道，他们在性格上差异颇大。林徽因聪明漂亮，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为人热情，很容易与人交流，但个性太强，脾气稍显急躁；而梁思成比较刻板沉稳，做事一丝不苟，认真有余，而活泼不足，虽然生活中不乏幽默感，但总得来讲，感情比较含蓄。在性格上有这么大的反差，以至于在人们为他们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的同时，也不禁为他们的将来略有担心。知子莫若父，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就看在眼里。当思成和徽因举行完婚礼后，他在信中表示祝贺的同时，很坦率地提醒两个孩子：“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

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4页）

在美国读书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性格上的差异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并因此导致二人之间不断出现摩擦，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可否认，冲突的发生使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痛苦，毕竟他们都深爱着对方，不愿意伤害对方，而这种冲突也往往因爱而起，准确地讲，是由于性格的差异而导致对爱的表达方式的理解不同。刻板的思成显然头脑中中国传统化的意识更浓重一些，和许多典型的富有责任心的中国男士一样，他认为自己既然和徽因相爱，何况又是在这远离父母、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关心、帮助徽因，对她的行为负责任，尤其是对一些他认为不合宜的行为予以纠正和规范。传统中国男人的责任心使年轻的思成在努力履行自己作为男友和事实上的保护人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也许他认为不能称之为问题、而林徽因异常在意的问题，即林徽因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何况是这种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的帮助。事实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并很快就融入到美国大学生活的林徽因头脑中对于爱的理解更重要的成分应是平等自立和相互尊重，Lady First 固然需要，但个性自由似乎更重要。她强烈地反对任何自己不需要的帮助，反对任何试图干涉自己思考和行动自由的言行，而很少顾及这种帮助是否出于深切地关爱，这种“干涉”是否出于善意的“初衷”。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没必要去推测冲突时的情景，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冲突伊始，他们都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必胜的理由和莫名的委屈，而这种感觉简直就是一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到美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冲突频繁发生，以至于几乎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有一件未经考证的二人冲突颇有代表性。据说在宾大时，梁思成学习非常刻苦，尤其是确定《营造法式》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之后，更是经常沉浸在建筑史的海洋中，废寝忘食。有一天，林徽因应邀参加同学的野餐会，很想让思成陪自己一起去。同学们和思成也很熟悉，知道思成是个办事很有规律且特别注重学业的人，恐怕不会改变自己的学习计划来参加野餐。

调皮的美国同学于是半开玩笑式地和徽因打赌：如果思成接受邀请，野餐会上徽因只管享受美味，而不用做任何事情。对此，徽因满怀信心，因为她知道自己在思成心中的地位。精心打扮之后，徽因去图书馆找到了思成，请他和自己一起参加野餐会。思成这个傻小子呢？脑子里大概还在古希腊罗马的建筑群中游荡，非但没有注意到徽因殷切的眼神和刻意的装扮，反而一本正经地告知对方学习的重要性，略表歉意便予以拒绝。对于心高气傲的林徽因来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尤其无法令自己容忍的是思成那一套一本正经的大道理和一副严肃认真的模样，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疑句句是利刃，刀刀伤感情啊！唉，真是难为他们俩了。

其实，在生活中，又何尝不如此呢？越是亲近的关系，往往越容易使人忘掉换位思考，不经意间就想当然办事了，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还一心为对方着想，以至于忽略了，或者干脆没有顾及对方的想法、态度和感情，日积月累，就真的会使对方很受伤害，原本亲密无间的感情甚至有可能失去维系的空间。朋友如此，家人如此，恋人、夫妻更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也许在相互之间非理性的争吵中，两人逐渐体味到对方的真实用意；也许固有的感情基础稍稍冲淡了彼此的误会和不愉快，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个性的冲突虽然依旧出现，但数量上已颇为有限，二人开始学会了宽容，并试图主动地去理解对方，尽管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真应该感谢此时的冲突，它不仅有意或无意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而且，削弱了二人鲜明个性中特别背离的部分。如果没有这段冲突，很难想象婚后思成和徽因之间的和谐生活怎么实现。而事实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爱了一生，也吵了一生。尽管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足30年，尽管他们是那么的相爱，并携手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和考验，甚至有很多生与死的考验，但他们还是经常争吵。即使到了晚年，每当对一些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时，争吵会随时随地发生，但又很快雨过天晴。以至于熟悉他们的亲友们形象地将他们称为“欢喜冤家”，恩恩爱爱一辈子，拌嘴吵架几十年。

对于思成和徽因因性格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梁启超的一段话颇有意思，“其实我们在一生中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即如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王殿里画出来还可怕，因为

一时造错了一点业，便受如此惨报，非受完了不会转头……因为不是故意的，而且忏悔后又造善业，所以地狱的报受够之后，天堂又到了。”（《际遇——梁启超家书》，21页）

“地狱”之后果然是幸福的“天堂”。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终成眷属，而且相亲相爱、生死与共，携手走过了漫漫的人生路。这期间，因为战争、疾病、贫困、政治运动等造成的考验恐怕远远超出了生活中因性格差异而形成的矛盾。但他们始终微笑着直面任何困难和考验，并一同勇敢地去接受任何挑战。尤为可贵、可敬的是，这对忠诚的伴侣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卓越开创者。

从“地狱”到“天堂”，单纯的相互宽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他们在固执己见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多年的好朋友美国人费慰梅的一段描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大学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从工作态度上便可看出。满脑子都是创意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然后一边做，一边修正或改进，而一旦有了更好的点子，前面的便一股脑儿丢开。等到交图的最后限期将届，即使在画图板前不眠不休赶工也来不及了，这时候思成就插进来，以他那准确和熟练的绘图工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简洁、漂亮、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俩合作无间，各为建筑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特殊天赋，在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始终坚持着。”（《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38—39页）费慰梅是了解思成和徽因的，关心他们的人们往往只注意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差异，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和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不同性格的互补性所带来的优势互补，以及梁思成、林徽因对他们所从事的建筑学研究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在婚后的岁月里，共同的追求和事业上的优势互补使他们的感情不断升华。对于他们来讲，爱已不仅仅是口头的表达，更深深地融入到他们彼此的生命中，成为一种内在的流露。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在一起形成的组合的完美性，下面一段描述也许更具说服力。

我们的朋友显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对温克尔（Rip Van Winkles，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 tou Irving）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角，喻指和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他们回到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祖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把他们的新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有时他们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大半时间却只有怀疑。

菲莉丝（指林徽因）感情丰沛，爱开玩笑，对任何事都很坚持，走到哪儿都惹人注目。思成则是温文尔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对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店铺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他们两人是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早年，似乎也看出两人合为一体，比各自分散所得成果要大得多——一种罕有的奇迹的配合。（《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53—54页）

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伊始即投身到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创办工作中，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们将理想付诸实践的艰苦历程。他们在建筑学研究领域的完美组合，最终创造出了令世人望之兴叹的累累硕果。

从1931年起，梁思成开展了广泛且有成效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林徽因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便成为野外考察队的重要一员。他们对一些古建筑的调查所带来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很难用简短的话语来形容的。他们的思想及实践，不仅将现代建筑学的理念引入到封闭的中国，而且将中国古代曾经创造的辉煌的建筑成就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并将它们重新展现给世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京、天津很快沦陷，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南下的流亡之旅。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之后又随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位于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偏僻、闭塞、落后的地方，全家住进了一处篾条抹灰的简陋农舍。艰苦的生活，旅途的劳累和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天气，使他们的生活及健康都经受了空前的考验。患难之中，也让我们再次深切感受到这对夫妻的真情挚爱。

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这样回忆李庄的艰苦条件，“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10—241 页）面对重病中的妻子，梁思成心如刀绞。但环境的恶劣、条件的简陋，丝毫没有令他畏缩。这位从未接受过医学训练的建筑学家开始学习打针，为了心爱的徽因，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爱能战胜一切，梁思成不仅学会了肌肉注射，而且学会了难度很大的静脉注射，成为林徽因最好的“护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好朋友费正清也曾接受过梁思成这名高级业余“护士”的护理。1942 年 8 月，费正清出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并很快在重庆见到了前来申请经费的梁思成。老友相见，自然激动不已。在梁思成夫妇的盛情邀请下，11 月 14 日，费正清在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陪同下来到李庄，看望梁思成夫妇和一大批落难于此的学术大家。没想到的是，旅途中费正清感染了一种呼吸道病菌，到李庄就发高烧，一病不起。梁思成把费正清安排到了自己的家里，“和徽因的病房只有一厅之隔。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食物、药品、体温表等，跑来跑去奔忙着”，一直到费正清病愈。

林徽因一生中的多半时间是在病中度过的。梁思成则始终将照顾好林徽因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并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一切。还是在李庄，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微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桔皮做果酱等等”。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已经上小学了，但“除了冬天外婆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外，平时都只能穿草鞋。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亲难得的高级营养品了。父亲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

外没有别的。父亲就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戏称之为‘甘蔗酱’”。（《林徽因文集·文学卷》，429—430 页）

即便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乐观、豁达的梁思成夫妇仍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弥漫着浓重的药品气味的小屋里，不时可以听到大人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朗朗的读书声。多少年过去了，梁再冰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苦中找乐的幽默话语，“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由于背的毛病，头已‘重’得抬不起来了，画图时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他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到全国各地再去考察。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母亲不发烧时也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作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她睡的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41—242 页）

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坎坷多磨的命运。在患难中，在不断的生与死的考验中，他们这对曾经被称为“欢喜冤家”的夫妻的感情也得以升华，并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中。林洙的一段记述将这种真挚的情感再一次生动地表现出来。1948 年的一天，林洙在梁家聊天，在谈论古建筑这个话题时，不经意间谈到了太庙，立即引起了病中的林徽因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她（指林徽因）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她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思成，他正挑

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了。梁思成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徽因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06—107页）

## 三、“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这是晚年梁思成对爱妻林徽因的评价。此时，林徽因已离开这个世界7个年头了。在深深地怀念着徽因的同时，梁思成仍念念不忘她那出众的才华，并感慨道：“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38页）

梁思成晚年的一段肺腑之言，不仅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夫妻真情，更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林徽因的一扇窗户，使我们得以走进林徽因——这位足以令近代女性引以为豪的一代才女，去了解、去品味她给我们留下的不朽的作品，以及在她身上折射出的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格和品格。若干年过去了，我们再次打开当年的历史，仍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徽因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力。对于后人来讲，她的作品

不仅是她作为一名建筑学家和诗人、文学家的撼世之作，更有那令人深省的人格魅力。

林徽因所生活的家庭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关系非常密切，不仅由于她的父亲在民国初年的政坛曾显赫一时，而且由于这个家庭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中出现了三位烈士，她的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英勇牺牲；她的三弟林恒，“一二·九”运动之后，毅然放弃在清华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成为一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场激烈的对日空战中阵亡。尤其是她的堂叔林觉民，一篇与爱妻诀别的《与妻书》，字字饱含深情，句句彰显情操，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而她的父亲林长民虽然在民国初年黑暗混乱的政坛很难有所作为，但政治热情始终不减，以至于1925年12月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郭松龄的倒戈反奉行动。很快，郭部兵败，林长民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年仅49岁。

由于父亲职位的不断变动，少年时代的林徽因曾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和英国伦敦等地上学。作为一个生长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大家庭的女子，林徽因记忆中的童年似乎并不很愉快。但她又很幸运，能有机会接受完全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式教育，而且还在英国学习了一年。这一切，为她以后展现其出色的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岁那年的冬天，林徽因以“尺棰”为笔名，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童话译作《夜莺与玫瑰》和刊物的封面设计。编者在编后语《感谢》里对这位年轻作者的文学才华和独具匠心的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尺棰’女士是闺秀笃学家，美术、文学的造诣很深，封面图案和《夜莺与玫瑰》一篇译作，虽不能代表女士的全部的学识，也可以看出女士的天才几分。我们对于女士援助的厚意，不能不特别表示感谢。”（《林徽因寻真》，169页）

林徽因真正开始声名鹊起是在1924年春天。那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邀来华访问，梁启超、林长民及当时已成为中国新诗领袖人物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是此次活动的发起者。尤其是徐志摩，竭力推动此事得以实现，并亲自担任泰戈尔访华期间的全程英文翻译，同时，他邀请林徽因担任副翻译。出于对这位印度诗哲的无比敬仰和对新诗的喜爱，林徽因

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夫妇曾不无感慨地对林徽因的儿子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林徽因文集·文学卷》，447 页）

一幕足以让很多人过目难忘的场景出现了：在欢迎泰戈尔的盛大集会上，林徽因和徐志摩左右相伴着老人。泰戈尔身着长袍，精神矍铄，白发银髯，飘洒俊逸，仙风道骨，尽现其中；林徽因清秀袭人，端庄大方，素洁淡雅，卓而不群；徐志摩依旧传统装束，面目清瘦，激情似火，才华横溢。尽管欢迎集会云集了北京学术界、政界名流，观众更是数以千计，但他们三者携手亮相立即引起全场的轰动。当天，北京的各大报刊，均以醒目版面报道了这次欢迎集会的盛况，赞誉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林徽因的清新可人，徐志摩的翩翩风度，和泰戈尔老人的睿智慈祥交相辉映，一时成为京城美谈。

5 月 8 日，新月社邀请在京名流，举行盛宴为泰戈尔祝贺 64 岁寿辰。他们精心排演的泰翁诗剧《齐德拉》则将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

这个剧本的故事，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衍变而成。齐德拉是马尼浦国王的女儿，马尼浦王系中，代代都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齐德拉的父亲齐德拉瓦哈那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父亲想把她当成儿子来传宗接代，并立为储君。公主齐德拉生来不美，从小受到王子应受的训练。邻国的王子阿顺那在还苦行誓愿的路上，来到了马尼浦。一天，王子在山林中坐禅睡着了，被入山行猎的齐德拉唤醒，并一见钟情。齐德拉生平第一次感到，她没有女性美是最大的缺憾。失望的齐德拉便向爱神祈祷，赐予她青春的美貌，哪怕只有一天也好。爱神被齐德拉的诚心感动了，答应给她一年的美貌。丑陋的齐德拉一变而成为如花似玉的美人，赢得了王子的爱，并结为夫妇。可是这位女中豪杰不甘心始终冒充美人，王子也表示敬慕那个平定了盗贼的女英雄齐德拉，他不知他的妻子就是这位公主。于是，齐德拉祈祷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在丈夫面前显露了她本来的面目。



1924年4月泰戈尔（右三）与林长民（左三）、林徽因（右二）、梁思成（左一）、徐志摩（右一）等合影。



梁思成、林徽因与泰戈尔

剧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长民扮演春神伐森塔，张歆海扮演王子阿顺那。梁思成则发挥专长，负责舞台美术。林徽因真挚、动情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泰戈尔和在场的观众，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之际，泰戈尔激动地对美丽的徽因说："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5月10日的《晨报副刊》对此次演出作了详细报道，"林宗孟君头发半白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徐的滑稽神态，又独到之处。林女士徽音，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年轻的徽因是那么的光彩熠熠，她的活泼，她的聪明，使得泰戈尔短暂的中国之旅大为增色。临别时，泰戈尔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这样：

> 蔚蓝的天空
> 俯瞰苍翠的森林，
> 他们中间
> 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哎！"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留学。尽管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将林徽因阻挡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门外，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林徽因学习建筑学的热情和实践。她一面在美术系注册上学，另一方面开始选建筑系的课程。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年9月开始她还被建筑系聘请为"建筑设计事务助理"及"设计指导导师"。这种事情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美国的大学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对于林徽因在宾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下两段文字似乎最有代表性。费慰梅在为梁思成夫妇写的传记中这样描述大学时的林徽因和她周围的朋友们："在美国同学看来，中国来的'学生'多半刻板、死硬，唯独'菲莉丝'（这里的人都这么叫徽因）和班哲明·陈（他们的好朋友和同学，宾大建筑系的中国留学生陈植）例外。她有着异乎寻常的美貌、活泼和机灵，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又善于交际。……她正在充分享受美国的

自由，而她在男女同学里受到的欢迎真是令人陶醉。她已摆脱了家庭和文化的压抑，在新大陆快乐扬帆。”（《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37页）

另一段文字则是被很多传记作品广为转引的一篇访问记，被访问者就是林徽因。这篇文章出自林徽因的一位美国同学之手，在她的眼中，来自古老中国的林徽因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开朗，那么的富有才华，又那么的平易近人，以至于同学们都希望成为她的好朋友。于是这位同学（想必也是徽因的好朋友）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将活泼、可爱的林徽因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文章这样写道：

她在绘图室临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身子倚着绘图桌，窗外望去是校园的一条小径，她那娇小的身影弯下腰画那巨大的建筑图。每次三十到四十张图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墙上时，她总是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分数，偶或拿第二。她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旅途中，我第一次有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我有想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数百年不朽的好建筑理论。”

“然后我在英国上中学。英国女孩子不像美国女孩子一下子就很友好。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做作矜持。”

“你对于美国女孩有什么看法？——小野鸭子。”

她总是轻轻一笑，脸颊上出现一对柔美的、浅浅的梨窝。细细的眉毛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大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扬起。

“一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怕我受她们的影响，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愚蠢，但是熟悉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中国建

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41—42 页）

1927 年 6 月，林徽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对于艺术的一往情深使得林徽因决定前往著名的耶鲁大学继续求学，这次她选择了一个更具有现代气息的专业——舞台美术，她也因此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第一位留学生。在这里，她的秉性和才华使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深得同学们尊重和喜爱的位置。她又一次自由自在地沉浸在艺术的殿堂里。

人们称林徽因是一代才女，丝毫不过分。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建筑学、美术学领域，在文学，特别是新诗创作等方面，她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更愿意将林徽因看作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1929 年 8 月生下大女儿梁再冰之后不久，林徽因就病倒了，后来诊断是肺结核病。在当时，这种病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出于治疗需要，当年冬天，林徽因辞离远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北京养病。她先是暂居在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家，转年的 3 月初，和母亲、孩子一起移居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病痛的折磨无疑是痛苦的，但对于富于激情和灵性的林徽因来讲，远离繁忙尘嚣的氛围，幽静自然安谧的环境，再加上一位故友、导师的热情鼓励和全身心支持，却成为打开她的创作天赋，灵感喷薄而出、一发不可阻挡的“创作天堂”。从当年的 4 月在《诗刊》第二期发表第一篇诗作《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开始，林徽因先后创作了《仍然》《那一晚》《激昂》《一首桃花》《笑》《深夜里听到乐声》《情愿》等诗歌，此外，还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窘》、舞台美术评论《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等作品，以及为好友沈从文的小说《神巫之爱》绘制了一幅风格别致的插图——《祈福》。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诗刊》《新月诗选》《北斗》等刊物上。那清新自然的语言、优美轻快的节奏、率真朴实的感情，构成了林徽因作品的鲜明风格。她的诗无不和大自然、和生命息息相关，处处浸透着美的芳馨。在《笑》中，“美”就这样被毫无痕迹地展现出来：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旋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这是林徽因文学创作的高峰期的开端。从 1931 年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的 7 年间，在倾心于古建筑研究之余，林徽因共发表新诗 40 余首，散文、小说 10 多篇，剧本 3 幕。主要诗作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秋天，这秋天》《年关》《微光》《忆》《吊玮德》《灵感》《城楼上》《深笑》《风筝》《雨后天》《记忆》《静院》《无题》《题剔空菩提叶》《黄昏过泰山》《昼梦》《八月的忧愁》《过杨柳》《冥思》《空想》《你来了》《"九·一八"闲走》《藤花前》《旅途中》《红叶里的信念》《静坐》《十月独行》《时间》《古城春景》《前后》《去春》等；散文有：《悼志摩》《山西通信》《窗子以外》《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等；小说则有《窘》《九十九度中》《吉公》等。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四幕剧《梅真同他们》未能最终完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乏深受读者喜爱、并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

人们在研究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这个人或其作品划

入某一派别、某一类别，对林徽因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林徽因和新月社交往密切，风格相似，应该属于这个派别。其实林徽因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自己似乎从来也没把自己看作“新月派”的一员，也不喜欢人们称她为“新月派诗人”。坦率地说，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花很大气力去探讨林徽因的作品是否应划入“新月派”的范畴。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说到“新月派”，不能不谈到一个人，那就是“新月派”的灵魂——徐志摩。事实上，我们前文所说的激发出林徽因的文学创作热情和天赋，并给予她热情鼓励和全身心支持的那个故友、导师，就是徐志摩。

尽管在英国留学期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近乎疯狂的追求无果而终，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友谊，确切地讲是没有对徐志摩和梁思成全家的友谊产生太大的影响。何况，当林徽因从美国回来时，情况已有了重大变化：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多情的徐志摩则在一场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婚变之后，也终于找到了感情的归宿，他于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对于这段惊世骇俗的婚姻，担当证婚人的梁启超的一段同样惊世骇俗的话表明了人们的态度：“徐志摩，你这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忆梁启超先生》刘海粟，见《追忆梁启超》，夏晓虹主编，301页）

事过境迁，深藏起了当年的感情，徐志摩又一次走进了林徽因的生活。和上次不同，这次，他带给林徽因的更多的是朋友的深切关怀，是激发林徽因创作灵感的热情鼓励。当时，徐志摩正参与主编《诗刊》、《新月》等杂志，他主动向林徽因约稿，并鼓励她写新诗。如果说，当年在英伦，徐志摩在对林徽因的一片深情中，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将她领进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世界的话，如今的徐志摩，则更似一位知音，一位对林徽因文学天赋有着巨大信心和热情的知音，他迫切希望世人能早日看到徽因身上蕴涵的无限潜能。

文如其人，林徽因的作品在尽情展现清新风格的同时，更加细腻、纯

净，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浓浓的韵律美、建筑美和音乐美。在《深笑》中，简单的语句，摇曳的意境，蕴含着无限的美感。

是谁笑得那样甜，那样深，
那样圆转？一串一串明珠
大小闪着光亮，迸出天真！
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
灿烂，
分散！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惊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
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
挂着
留恋。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的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而送给刚出生的儿子的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则在轻舞飞扬的词句间，将诗人清新淡雅的内心世界和满怀希望的脉脉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这一时期林徽因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和内容日趋丰富，尤其是社会现实题材作品的发表，更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九十九度中》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篇小说发表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创刊号（1934年创刊），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小说巧妙地选取了30年代市民阶层的一个生活横断面作为背景，围绕一个“热”字，将有钱人与穷苦人因贫富悬殊而形成的强烈的命运反差鲜明地展现给读者。在作者的笔下，有钱人为祝寿、过生日、娶媳妇等盛事而热热闹闹地忙碌着；那些社会最下层的挑夫、洋车夫们却在片刻不停地为生活而奔波，即便如此，仍然食不果腹、命比纸贱，直至悄无声息地死去。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无序，仿佛世界就是一只热气腾腾、扑朔迷

离的开水锅；一切又都是那么的不公平，难道穷人生来就只能选择凄惨的命运？

这篇小说因其强烈的现实性及表现手法上充满着寓意和象征，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李健吾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及其富有现代性。""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行行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有那么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一个女性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场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289—290页）

林徽因的散文内容丰富生动，形式多样，情感质朴，语言简洁明快，全无做作之感。"有的是用写诗的笔法来写散文，如《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有的是融入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如《窗子以外》；有的就像她平素与朋友们谈天那样谈笑风生地写着论辩式的散文，如《蛛丝与梅花》；有的是近乎杂感式的笔法，如《彼此》。"（《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323页）其散文代表作当数发表在1934年9月5日第99期《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窗子以外》。这年夏天，林徽因、梁思成和费正清夫妇一同去了山西汾阳、洪洞等地考察古建筑。《窗子以外》忠实地记录了她到山西调查古建筑的感受。陈学勇对这篇传诵一时的佳作作了很好的介绍和剖析。他指出：《窗子以外》"从窗外四个乡下人的背影谈起，浮想联翩，连珠炮似的激发出一个个似断又连的话题，谈到自己家里的雇工，谈到街上卖白菜的，推粪车的，谈到行旅中认不得路错过站头的老太太，由这些最终谈到上层阶级身份的自己与窗外下层人的隔膜。时叙时议，叙事生动，惟妙惟肖；议论精辟，语惊四座"。作为一名接受了

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新女性，尽管和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大城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贫瘠落后的农村及小城镇充满疑虑和恐惧，但对古建筑的无限热爱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软弱，开始勇敢地面对整个社会，不愿困守在貌似繁华的大城市和沉闷的书斋，到“窗子以外”了解社会。但作者“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好强的徽因一度为此而深深苦闷。这是多么可爱的“苦闷”啊！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它代表了这一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走进民众、扩大生活视野、要用知识改变中国命运的美好愿望，这本身就是一篇挑战落后中国的行动檄文。这篇散文后来曾被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的国文教材，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林徽因的文学才华不仅体现在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创作上，还深深体现在她那独特的文学观上。1936年，林徽因受萧乾之邀主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她不负重望，精心选出30篇作品。这些小说既有名家手笔，也不乏后起之秀和名不见经传者的优秀作品。该书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以至于多次再版。在书的题序中，林徽因坦率地谈及她的文学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很具代表性：

> 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迫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即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

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9—40页）

林徽因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诗歌、小说等方面的多篇佳作问世，使她获得了一代才女的赞誉，大量融建筑审美及文物保护知识于其中的散文作品或带有散文风格及意境的古建筑调查报告的发表更如同锦上添花，处处浸透着作者独特的艺术天赋。事实上，除去健康原因影响了一部分外出考察工作外，林徽因和她的丈夫及同事们在野外古建筑调查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即使是在条件艰苦到极点的抗战时期，他们的工作仍在顽强地进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他们在将一个个美轮美奂的古建筑展示给全世界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文字优美、内容严谨的建筑考察报告。其中林徽因执笔或参与完成的作品主要包括《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又名《平郊建筑杂录·续〈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等。事实上，林徽因在古建筑研究领域的成就远不是这些文章所能体现的。从回国伊始和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到配合梁思成解读《营造法式》并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写作，再到远赴山西、河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及平津等地进行古建筑调查和修缮，并最终和梁思成一起抢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用智慧、毅力和勇气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古建筑研究事业和建筑教育事业，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建筑宗师。关于这一时期林徽因在古建筑研究领域的成就，下文我们再作专题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那些专业性很强、在常人印象中应该是颇为枯燥的古建筑研究论文，在林徽因那富有灵性的笔下，也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感、艺术感和韵律感，娓娓道来，如行云

流水，轻松地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时光隧道，真切地去感受昔日中国建筑的璀璨与辉煌。

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林徽因这样描述自己的考察对象："龙天庙在西岩上，庙南向，其东边立面，厢庑后背，钟楼及围墙，成一长线剪影，隔溪居高临下，隐约白杨间。在斜阳掩映之中，最能引起沿溪行人的兴趣。山西庙宇的远景，无论大小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立体的组织，权衡俊美，各部参差高下，大小相依附，从任何视点望去均恰到好处；一是在山西，砖筑或石砌物，斑彩淳和，多带红黄色，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浓艳夺人，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在这两点上，龙天庙亦非例外。谷中外人三十年来不识其名，但据这种印象，称这庙做'落日庙'并非无因的。"进入庙中之后的文字叙述更有着无穷的雅致和乐趣："庙中空无一人，蔓草晚照，伴着殿庑石级，静穆神秘，如在画中。两厢为'窑'，上平顶，有砖级可登，天晴日美时，周围风景全可入览。此带山势和缓，平趋连接汾河东西区域；远望绵山峰峦，竟似天外烟霞，但傍晚时，默立高处，实不禁古原夕阳之感。近山各处全是赤土山级，层层平削，像是出自人工；农民多辟洞'穴居'耕种其上。麦黍赤土，红绿相间成横层，每级土崖上所辟各穴，远望似平列桥洞，景物自成一种特殊风趣。沿溪白杨丛中，点缀土筑平屋小院及磨坊，更错落可爱。"（《梁思成全集》第二卷，297—298页）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林徽因早期发表的作品中，除去一部分使用笔名外，大多数作品的署名是"林徽音"。这也是她的原名。这里，还有一个改名趣闻。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活跃着两个姓名相近的作家，一位是林徽音，另一位则是林微音。两人虽然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地域、性别、文风则相去甚远。前者不必说了，后者主要生活在上海，男性，作品数量多，体裁广泛，且多取材于江南都市，颇具海派文学风格。由于名字太接近了，不仅现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经常把他们两人混淆，即使当时的很多人，把他们的作品张冠李戴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都会弄错。例如，上海的林微音曾经翻译出

版了房龙的《上古人》，很多人仰慕林徽音的名气，想也不想便把此书划在林徽音名下。当然，林徽音的很多作品也曾被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纳入林微音作品。林徽因对此曾颇感无奈地说：不怕自己的文章变成别人的，就怕人家的文章挂在自己的名下。为有别于上海的林微音，林徽音决定改名字。据她的堂弟林宣后来回忆，是他给堂姐提的建议，将“音”改为“因”，林徽音欣然接受，并从1934年5月在《学文》创刊号发表小说《九十九度中》和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开始，署名林徽因。（《林徽因寻真》，47—48页）

卢沟桥事变之后，林徽因全家开始了南下的流亡生活。生活的艰辛情况我们在前文已有描述，更可怕的是，林徽因的病情不断加剧，几乎时刻都在忍受难以想象的病痛的折磨。即便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她手中的笔仍未停止，创作的源泉仍未枯竭，她仍在继续着文学写作，她的所见所闻，她的欢乐，她的忧愁，都用文字表达出来。但很遗憾，尽管时有佳作，但从数量和体裁上，都很难再和抗战之前相比。就如同她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历程一样，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和古建筑调查的黄金时期，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戛然而止。如能生逢盛世，也许，天才的林徽因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林徽因的主要作品有诗歌《昆明即景：一、茶铺；二、小楼》《除夕看花》《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哭三弟恒》等，还有一些散文。当然，她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中国营造学社资料整理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在物资严重匮乏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她和梁思成一起，写出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在油印本《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高度评价了林徽因的贡献，他说：“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她校阅补充。”无论当时，抑或今天，人们都很难相信，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如此严重的病痛中，林徽因居然还能写出优美的诗歌，尽管，有些作品满含悲怆之情，如《哭三弟恒》中的真情流露：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抗战胜利了，林徽因和全家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她生命的最后10年也由此开始。尽管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但她的创作欲望依然不减当年，艺术水准也丝毫没有降低。她的感情依旧是那么的丰富，字里行间无不真挚。一方面，她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诗歌陆续发表；另一方面，她又写了《对残枝》《给秋天》《人生》《展缓》《病中杂诗·小诗（一）、小诗（二）》《我们的雄鸡》等诗歌及《一片阳光》等散文。坦率地说，这个时期林徽因的心情就像是国家的形势一样是复杂的，但没关系，只要有一丝的美，就会被率真的她捕捉到、感悟到，就像《一片阳光》里表现出来的那摇曳的光影。

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琤琮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幻，那种动，柔谐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儿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林徽因去世前3年，她还应《新观察》杂志

之约，为其新开辟的专栏“我们的首都”撰写了一系列介绍北京古建筑的文章，包括《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故宫》等，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大家风范，尽现其中。

说起林徽因的艺术天赋，人们总能首先想起这么两个事实：一是，林徽因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向西方学习舞台艺术设计专业的留学生，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二是，林徽因曾和徐志摩等人一同主演了泰戈尔的著名诗剧《齐德拉》。其实，综观林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样的例子又何止一两件。这里，我们仅从林徽因的亲人和朋友的回忆中撷取几则故事。

在自己的婚礼上，由于不喜欢西式结婚礼服，林徽因索性自己设计了一套具有浓厚东方情调的婚礼礼服，美丽的新娘和她同样美丽并个性洋溢的婚礼礼服令前来祝贺的来宾和记者们啧啧称赞，轰动一时。几年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在北京协和礼堂举行婚礼。从婚礼礼堂的布置，到新娘的打扮，林徽因都一手操办。她还为梁思庄精心设计了一套白色结婚礼服，使新娘穿上显得美丽端庄。当婚礼举行时，到场的来宾们开玩笑地说，思庄站在那里就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林洙在《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一书中讲述了看文工团演出的故事。1948年冬天，清华大学获得解放后，常有解放军的文工团在清华大学礼堂演出。演出表现了解放区热火朝天的生活，内容新颖，富有朝气和革命精神。尽管演出的艺术水平并不高，但仍然吸引了大批师生前去观看，年轻的林洙也是其中一个热情极高的观众。当她把观看演出的感受告诉重病中的林徽因时，她惊讶地发现，林徽因对这些演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执意冒着严寒前去观看大型秧歌剧《血泪仇》。虽然最终因为病重而未能如愿，但她对艺术的热爱和民族文艺的孜孜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对于革命文学，林徽因的评价可谓客观公允。她说：“一个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实，要忠实地反映生活。内容是占首位的，艺术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对于一个文艺作品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革命文学并非天生就排斥艺术。不能因为它的革命性就用大喊大叫的政治

口号来代替，历史上各个革命时期都有优秀杰出的文学作品。”（《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09—110 页）对于解放区的一些优秀作家，如赵树理等，她都给以较高评价。

抗战时期，林徽因在病情略有稳定时，曾醉心于汉代文化史研究。梁思成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你在汉墓和其拓片方面的研究，徽因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私下曾很认真地弄熟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一提起汉代人，简直像在谈论隔壁家最要好的朋友！这还不打紧，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甚至性情都牵连成一线。若按现在的速度做下去，她迟早会成为汉朝研究的专家。即使现在病成这样子，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讲那些西汉的人物典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57 页）

战争结束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林徽因曾在昆明居住了一段时间。静逸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景使她的艺术灵感不断涌现，她这样记述当时的感觉：“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是我在这所新房子里的第十天。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户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创作出合适的台词，我敢说这真能成为一出精彩戏剧的布景。”（《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85 页）

很遗憾，林徽因在艺术方面的特长始终没能得以完全展示。但纵观她短促的一生，在其建筑学研究实践与文学创作中，又何尝不处处浸透着对艺术的独特感悟和尽情诠释啊！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句话里含有多少唯心主义的成分，我们暂且不去考证，但就林徽因而言，却不幸被言中了。她曾和冰心、庐隐被誉为福建三大才女。生活中的她又是那么的美丽，甚至于被很多人视为圣洁女神的化身。但她却终生与健康的体魄无缘。可以说，林徽因所取得的每一份成就，都是与病痛折磨相抗衡的结果。在她的家人和朋友们的记忆中，

林徽因常常是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还手不释卷，片刻不停地工作着。林徽因没有说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类的豪言壮语，但她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心爱的事业而努力的拼搏，从未停息，她在用生命诠释着自己的人生追求。

尽管始终与疾病为伴，但生活中的林徽因却是那么的乐观，她的欢声笑语，她的热情洋溢，她的豁达善良，都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和她交往的人。早在美国留学期间，林徽因出众的社交能力就已为美国同学所折服，若干年以后，她的美国同学们还念念不忘这位被称为“菲丽丝”的活泼可爱、美丽大方的中国女孩。费正清夫妇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留学归来相识并终生保持深厚友谊的一对美国夫妇，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更是深切地感受林徽因独特而魅力无穷的个性。

和梁思成一样，林徽因终生远离政界。这一点，和她的父亲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不从政，绝不意味着对政治漠不关心。实际上，林徽因一生都在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她深深地爱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和生活于斯的同胞们。

30年代的天津《大公报》是林徽因非常欣赏的报刊，它的文艺副刊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广大爱国志士高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林徽因为民族的命运深深忧虑。1935年11月的一天，林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并被按日本人的意图组建的《联合亚洲先驱报》取而代之。惊讶之余，林徽因感到异常愤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徽因接到该报文艺副刊的约稿信，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她清醒地知道，这一举动可能会给她带来的危险。在给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她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她说：“昨晚我们这里忽收到两份怪报，名叫‘亚洲民报’，篇幅大极，似乎内中还有文艺副刊，是大规模的组织，且有计划的，看情形似乎要大公报永远关门。气糊涂了我！我只希望是我神经过敏。社论看了叫人毛发能倒竖。这日子如何‘打发’？我们这国民连骨头都腐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1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抗战时的表现。在流离失所、生命垂危的日子里，林徽因仍和她的家人和朋友在真诚地期盼着胜利的时刻。他们的好朋友、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曾这样评述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中的林徽因，“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有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中国唯一的古建筑学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职业）艺人，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智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李健吾《林徽因》）

尽管一生命运坎坷，但林徽因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她是那么的渴望新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林徽因晚年写给梁思成的一封信将她宽广、圣洁的内心世界再一次展现给今天的我们：

> ……我连着看了四本书都是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一）是《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的人们》，短篇的，几篇都好；（二）是《普通一兵》记马特洛索夫的事迹；（三）是《斯特汉诺夫工人的笔记》；（四）是《安格林娜自传》（第一个女拖拉机手）。这些人和事都深深地深深地教育了我，提高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和感性认识，不只是一种理论在我脑子里，而是形象化了的事实。这些精神养料太丰富了，现在只是它们如何结合到我生活中来的问题了。这样的熏陶下去，新意识和新意志必会在我血液里产生出来的。我也会蜕变成为新时代里的可靠的人，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不断做好工作。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也许就因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会成为有价值的人。一反过去那样想做有价值的事，反而是无价值的、无成绩的人。（《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39 页）

## 四、从“太太客厅”到“梁家茶会”

从20世纪30年代的“太太客厅”到40年代的梁家茶会，梁思成家经常是高朋满座，轻松、愉悦的朋友聚会，成了他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因为他们的原因，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气息和文化氛围。

30年代初，林徽因和梁思成先后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京，全家搬进东城区米粮胡同二号。之后不久，又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以至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年逾古稀的老朋友费慰梅还清晰地记得院子里的景致。“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樱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铺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边。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西南的方向，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62页）

由于梁思成夫妇独特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加上他们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国际色彩浓厚的教育背景，回北京伊始，他们就结交了众多学术界和文化

界的朋友。和许许多多那个时期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一样，他们非常喜欢和朋友们无拘无束的交流，一杯清茗，或是一杯咖啡，既可以轻松身心，交流思想，又能够开拓视野，激发灵感。随着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交往圈子的不断扩大，梁家的聚会也逐渐成为30年代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沙龙之一。久而久之，甚至得到了一个雅号——“太太的客厅”。尽管这个名字的缘起并不是十分的友好，甚至在当时还引起过一场小小的风波。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事人都能一笑待之，何况我们这些晚生后辈？走进梁家的聚会，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应该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风采和魅力。

梁家的聚会既有两三个人的小聚会，又有一大群人的大聚会。前者有朋友间的拜访，也有朋友间的畅谈与倾述；后者则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规定的钟点，没有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就是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聊天。随着朋友们的陆续到来，幽静安谧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便热闹起来。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国际政治学家钱端升，哲学家邓叔存，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甚至还有他们刚刚结识的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等等，这些当时或是以后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都是这里的常客。聚会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主客之分，新老之分，大家完全是平等的。从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心得，到文学艺术的最新动向；从褒贬时政的冷静剖析，到名人雅士的逸闻趣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人生的体味和市井的百态，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

毫无疑问，林徽因是聚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最富活力、最受欢迎的一员。不仅是因为她是这个院落的女主人，更主要的是她出众的才华和率真的性格。费慰梅对此感受颇深，一则在于梁思成夫妇的热情和真诚，她和费正清新婚燕尔，初到北京，居然在无意间很幸运地结识了梁思成夫妇，继而成为好朋友，并经常应邀参加梁家的聚会；二则在于梁家聚会上林徽因所表现出的突出的个性与风格。她回忆说：“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中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

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85 页）林徽因尽管天赋极高，但生前留下的文章数量并不算多，以致于参加过梁家聚会的很多人后来都感慨：如果把林徽因当年在聚会上的谈话整理成文，不仅数量巨多，而且观点新颖，充满奇思妙想。

梁家的聚会不仅有鸿儒，还有很多当时鲜为人知的年轻人也得以在此与大师们面对面沟通，并得到指导和帮助，受益匪浅。例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萧乾。正在北京读书的梁、林两家的晚辈们，每逢假日，也经常带着自己的同学，参加这自由的聚会。30 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对于文艺界的动态她非常关注，尤其是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潜质高的年轻人，甚至会主动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梁家来作客，千方百计予以提携和帮助。年轻的萧乾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当年的他还只是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当听说作者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时，便主动写信请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出面，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她告诉沈从文：“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0 页）不难想象也不难理解接到邀请后萧乾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其实，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今天，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居然得到一位大家的褒奖，并应邀家中作客，同样会感到无比荣幸和拘谨。但显然，这次茶会让年轻的萧乾信心和勇气倍增，成为自己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在萧乾晚年发表的一篇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 1966 年 8 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　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

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读书》1984年第10期）

梁家的热情和豁达是属于他们的每一个朋友的，这里的聚会不仅有天马行空般的说古论今，还有朋友加亲人般的温情和体贴。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梁思成夫妇的好朋友，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林徽因的书信中，有不少是写给他的，林徽因称他沈二哥。有一次，沈从文和他心爱的妻子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年轻的从文焦急万分，可又束手无策。绝望之中，想起了善解人意的梁家兄嫂，性格脆弱的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寻求慰藉和帮助。而对徽因来说，帮助朋友解决这样的生活或情感问题，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她耐心地倾听沈从文的述说，一点一点地帮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林徽因告诉了他们这件事的经过：“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位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林徽因文

集·文学卷》，354 页）

谈到聚会的忠实参加者，不能不提及两个人。一位，是多情才子徐志摩；另一位，则是被称作“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和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将新家安在上海。他自己则在上海、北京等地同时兼有工作，于是，只得京沪等地来回奔波。梁思成家成为他在北京的主要落脚点。而此时的徐志摩呢？追求陆小曼时的激情已经逐渐退却，上海的十里洋场和奢靡生活丝毫不能使他产生创作的灵感，天才的诗人为此感到非常郁闷。而在北京，在那帮和他一样优秀且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或文学天赋的朋友中间，他却能如鱼得水，迸发出过人的机智和热情。这也正是徐志摩所渴望的。或许，还夹杂着一些对林徽因的难以割舍的情感。总之，徐志摩一度成为梁家的常客，梁家聚会最忠实、也是最活跃的参加者。甚至，有人担心，多情的志摩会不会再生情变，抛弃日渐萎靡的陆小曼，重新追求林徽因。担心也好，猜测也罢，终归不是事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天才诗人徐志摩，在 1931 年 11 月 19 日，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遇难，终年 35 岁。噩耗传来，北京好友悲痛不已，甚至恸哭失声，林徽因更为失去这么一位好友、一位文学导师和永远的支持者而昏倒在地。受北京学界同仁委托，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前往济南料理了志摩的后事。梁思成夫妇的善良、宽容与大度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而徐志摩生前在北京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梁家的茶会，主题是欢迎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此人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茶会结束后，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老金是梁家聚会的另一位忠实的参加者。和别人不一样，他一生都没有离开梁家的聚会，没有离开梁家。其实，老金结缘梁家，还得益于徐志摩。因为徐志摩不仅自己是梁家的座上客，还经常把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梁家，老金就是其中的一位。对此，费慰梅作了一个极可爱又极实在的评价——“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老金和他们一见如故，不仅很快成为聚会上最佳的聆听者，而且成为铁杆参与者，甚至干脆将自己的家也迁至梁家所在的北



诗人徐志摩

# 第三章　牵手林妹妹

总布胡同三号院的后院。为方便来往，在梁家客厅开了一扇小门，参加聚会，推门即到，如入自家。再以后的岁月，从北京到昆明，再从李庄回到北京，老金始终紧随梁家，不离不舍。老金不仅痴迷于梁家的聚会，而且自己也很有号召力，参加梁家聚会之余，也会邀上一帮子学术界的好朋友，神侃之后，还经常捎带聚餐。老金是湖南人，在家里办茶会次数多了，颇有一些名气，还博得一个雅号——"湖南饭店"。不用说，梁思成和林徽因自然也是"湖南饭店"的常客。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状态中。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期，也因此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雄心勃勃潜心思进，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日寇之手，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但国民政府却在攘外必先安内旗帜下，大打内战。加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混乱秩序，加剧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正是受这么一种纷繁复杂形势的影响，任何一种现象，尤其是上层精英的言行，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同的反响。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代，一大帮生活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远离劳苦大众，品茶论道，自然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非议。梁家的聚会也难以摆脱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尽管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忘却自己的国家，忘却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给梁家的聚会带来非议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的女主人——林徽因。也曾是聚会成员的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和梁家私交很好，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林徽因》一文中，对林的性格作了非常简练、准确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急，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赤热、口快、性急、好强，就为人处世而言，这种性格也许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在为自己赢得喝彩的同时，也常常会在不知不觉间伤害了周围的人和自己。尤其是在和同性相处

的时候，更容易遭到误解、嫉妒和非议。有两件小事颇有代表性。一件事来自萧乾的回忆。他说：20 世纪 30 年代时，林徽因经常会参加在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家里举行的“读诗会”，对文学作品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另一件事则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扩建，拆城墙、拆牌楼，林徽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向上呼吁，得不到支持，她忍无可忍，把气撒向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丈夫——梁思成，怒责道：“一个堂堂男子汉，保不住一堵墙。”后来参加文化部活动，正好碰上学者出身、当时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她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吴晗的鼻子，谴责他保护城墙不力。

也许就是基于上述分析的这两方面原因，尤其是前一种情况，导致了同为那个时代知名才女的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一段恩怨纠葛的发生。事情起源于冰心于 1933 年 10 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的一篇小说，名字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用略显调侃的风格勾勒和讽刺了上流社会“沙龙”上各色人等光怪陆离的言行，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虚伪、无知、颓废，甚至有些“商女不知亡国恨”。小说发表后，很快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但随即就有人指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其实是在讽刺林徽因和参加梁家聚会的朋友们。纠葛由此而产生，尽管无论当时，还是多年以后，林徽因和冰心两人均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但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的一个举动无疑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但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小说发表后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林徽因刚好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北京，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看到这篇小说后，立即叫人把那坛山西老陈醋送给了冰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观望，便离开了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家，扶老携幼，踏上了南下流亡的道路。太太客厅由此成为人们的记忆。但梁家的茶会并没有完全停止。无论在长沙，在昆明，还是蛰居在偏僻的李庄，尽管经济状况日渐窘迫，甚至生计都难以维持，

但一有机会，他们和那些逃亡至此的新老朋友们还是喜欢以茶会的方式相聚。尽管环境是如此的恶劣，但他们依旧保持了乐观的心态，流亡长沙期间，林徽因曾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讲述了他们的聚会，“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地说来我们的情绪还不错。”（《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65 页）而在昆明期间，梁思成夫妇几乎耗尽了全部家资，在市郊的龙头村旁边，自行设计并建造了他们一生中唯一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宅。之后不久，一批从北京逃亡而来的教授也纷纷迁居于此，包括老金、李济、钱端升等，都是当年梁家茶会上的老朋友。以至于可爱的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惊叹道：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以想象，在混乱的战争年代，能有一个栖身之处，并和几位老友相邻而居，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当然，朋友聚会也是少不了的。只是，对祖国命运的忧虑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以至于再难听到他们开心的笑声。林徽因尤其如此，“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状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44 页）然而，在这个昆明的“北总布胡同”，他们仅仅住了半年。出于工作和生计的考虑，1940 年 11 月，梁思成夫妇便不得不告别诸多老友，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长江南岸的李庄镇。梁思成全家和中国营造学社一起搬进了离李庄镇约两华里的上坝村月亮田。

李庄生活之艰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恶劣的天气、窘迫的经济条件和物资的极度匮乏，使得林徽因很快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能恢复健康。梁思成的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但即使是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古建筑研究，也依然能保持乐观的心态，梁家茶会的重新“开张”无疑成为他们永不颓废、努力进取的一个典型表现。到了下午四点钟，梁思成和学社的同仁们便会放下手中的工作，沏上一大壶

茶，摆起龙门阵。院里不上学的孩子们也会从家里跑出来，打闹戏耍，月亮田的小院立时便热闹起来了。林徽因身体稍好些的时候，也会请人把她的行军床搬出来，加入到茶会中。小院的茶会虽然简陋，但却不乏乐观、坚韧。在这里，他们甚至举办过国际茶会，先后接待了他们的好朋友费正清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全家从四川李庄回到了久别的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他们的老朋友们也大多回到北京。大家久别重聚，自然无限欢欣。位于清华大学教师住宅区新林院八号的梁家再次成为学者们聚会的“天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时期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新林院在当时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居住条件最好的住宅区，单层独立、红砖四坡顶的洋式小住宅，一座座散落在绿草如茵、花木似锦的庭院中，环境十分幽静。

聚会还是以茶会的方式进行，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茶客中既有老朋友，包括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金岳霖、陈岱孙等学术大家；也增加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很多清华建筑系的年轻教师和学生。梁家茶会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终于又得以延续。林徽因则再次成为茶会的中心，她的热情活泼与博学多才也再次得以体现，思维敏捷，语言风趣，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林洙在她的回忆中，这么描述茶会中的林徽因：“她（指林徽因）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知唱中（朱畅中）’，引得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林洙）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罗（原来她是云南人罗）。’逗得我们都笑了。”（《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05 页）

有一次，林徽因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在对其艺术渊源娓娓道来之后，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思成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原来，沙发上那几块挑花土布是林徽因当年高价从一位苗族姑娘那买来的，而那个姑娘原本拿这几块布做嫁衣上的袖头和裤脚的。

还有一次，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抗战初期开展的川康古建筑考察。梁思成说，老百姓的语言真是丰富多彩啊，考察途中雇的抬滑竿的轿夫们很少用普通的语言对话，几乎出口成章，而且全与他们的工作和见闻有关。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提醒后面的人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心领神会，马上接道"地上牛粪堆"，于是小心地避开。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青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松动了，不小心就会滑倒，或是把石缝下的泥浆溅到身上。遇到这种情况，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在加上小心的同时会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如果要过一个很窄的小桥，前面的就喊"单桥一根线"，后者则脱口而出"好马射得箭"。这样的对话简直多得不得了。对于轿夫们在劳动中的乐观情绪，梁思成也感触颇深，他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到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困惑的大匠·梁思成》，73 页）

对于这种茶会方式的学者沙龙，梁思成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坦言获益良多。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等是我家的座上客。茶余饭后，他、林徽音和我三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李道增《一代宗师的光和热》，《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6 页）

## 五、世纪挚友

人的一生会结识很多人，人和人之间也会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成为朋友，但真正能够相互欣赏、相互信任、相互敬重、同风雨共坎坷的挚友能有多少呢？很难说，也许终其一生，能遇到一、两个这样的知己，就算是幸运中的幸运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主人公梁思成夫妇真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尽管历经磨难，但却以自身的人格和学术魅力，结交了诸多好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那个时代知识界的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么多的朋友中，有三个人堪称他们一生的挚交。品味他们与梁家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为他们的真挚情谊所叹服。这三位挚友就是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和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下面，我们就来撷取他们交往的点滴往事，共同品味和感受他们的友情。

梁思成夫妇和费正清夫妇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城。说起来，这两对年轻夫妇相识还颇有点偶然。出于对中国历史和艺术的极度喜爱，1932年，费正清和费慰梅来到中国，并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几乎游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和风景名胜，对于他们而言，这个古老的国度、古老的城市，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历史值得他们去探究、去发现。一次逛游北京的时候，费正清夫妇遇到了同样年轻而富有朝气的梁思成夫妇。费慰梅这样记述他们的相识："约莫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Whei）——她特为外国密友取的昵名——人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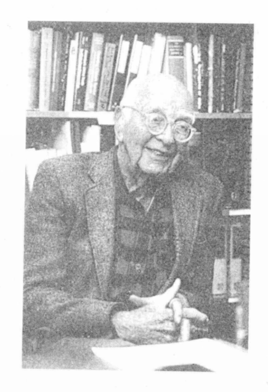
美，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些。他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所时来到北京。这又让她讲起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6—7 页）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让这两对年轻夫妇成为知己吧。当一见如故的他们挥手道别之际，竟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住处离得非常近。费正清夫妇很快便成为太太客厅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中国知识界精英。更多的时候，费慰梅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那种感觉太美妙了，以至于多年以后，费慰梅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这样回忆道：“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一个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直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84 页）

1934 年的山西之行，十余天的艰苦跋涉和朝夕相处，使费正清夫妇和梁思成夫妇更加了解对方、欣赏对方，并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特别是华北地区古建筑调查与研究的梁思成来说，山西始终是他重点调查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省份之一。1933 年 9 月的第一次山西之行，他先后调查了山西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木塔和浑源县悬空寺等古建筑。转年的 8 月，本打算去北戴河避暑的梁思成夫妇收到了费正清夫妇的邀请，请他们去山西汾阳城外峪道河去消夏。梁思成本来也有计划再次到山西，对汾阳附近的赵城进行古建筑调查。接到邀请后，很快便和林徽因一起启程赶赴汾阳。

峪道河位于白彪山麓，其源头是“马跑神泉”。相传当年宋太宗统兵作战，三军断水，饥渴难耐，危急之下，太宗的坐骑踢出甘泉，潺潺流水不

费正清



1934年与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赴山西调查古建筑



仅救了干渴的三军，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干枯。沿河有数十家磨坊，以河水为动力，生意兴隆，远近闻名。近代以来，随着电磨机的出现，平遥成为山西面粉业中心，这些原始的水力磨坊便失去了往日的兴盛，逐渐沉寂下来了。但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幽美，很多传教士看中了这些磨坊，纷纷出资购买，加以改造之后，便成为一幢幢风格别致的磨坊别墅，消暑度假，倒也颇有一番田园情调。正如费慰梅所描述的："一道从附近山上奔泻而下的溪流，穿过长满了白杨的山谷、斑驳的树荫，汩汩流过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季，磨坊内自有一股清凉。"（《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02 页）

毫无疑问，无论对于费正清夫妇，还是对于梁思成夫妇而言，汾阳之行无疑都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一方面，他们可以真正暂时忘却一切世俗的烦恼，谈天说地，畅所欲言，尽情享受大自然和好朋友带给自己的愉悦。连以往感觉性格比较内向的梁思成也仿佛换了一个人，尤其是在四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简直就成了他尽情展示自我的舞台。正如费慰梅所评述的："这个沉静的男子在饭桌上可是妙语如珠，一顿饭吃下来总是欢闹声喧。"费慰梅和林徽因则更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尤其是林徽因，来之前还在为没完没了的家务事而烦心，但在这里，除了幽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一起享受这美妙的假期，真的让她欣喜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可不仅仅是单纯来度假的，汾阳附近的古建筑还在等着他们去考察呢！当然，同样喜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夫妇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助手和同伴。他们以汾河峪道河为根据地，向临近的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 8 个县市做了多次的旅行考察，所发现的古建筑，不下三四十处，可以说，收获颇丰。当然，和在别的地方考察一样，旅途的艰辛也是一言难尽的。例如，介休和赵城相距三百余里，原本也不算太远，他们甚至从一位传教士那里租了一辆汽车，还有一名快乐的美国司机，计划一天到达目的地。然而阎锡山修筑同蒲小铁路的"壮举"不仅使他们的计划完全泡汤，举步维艰，历尽周折，甚至于有三个晚上连住宿的地方都差点找不到，几乎要露宿了。最终，他们用了 5 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

愉快的假期和丰硕的考察成果大大激发了梁思成、林徽因的创作热情，回到北京以后，他们将调查成果加以整理，很快便写出了一份高质量的考察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文风清逸洒脱，生动形象，读其文如随其行，所见所思，尽在文中。

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颠沛流离，历尽坎坷，物质上的困乏和无休止的疾病，几乎使他们难以支撑下去。人们恐怕无法想象，作为一代建筑学宗师的他们，一生中给自己设计并建造的唯一一所住房，竟然是流亡昆明期间在郊区农村建造的一所极其普通的三间房子的土坯民居。但即便是这么简陋的平房，也耗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迅速上涨的物价更是雪上加霜，使他们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绞尽脑汁。费正清夫妇得知他们的窘迫状况后，不仅常常通过书信给予他们关心和慰藉，而且给予了他们及时的经济援助。在此之前，经费慰梅介绍，国际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发表了梁思成所写的关于河北赵县大石桥的研究论文《Open Spandrel Bridges of Ancient China，1.The An-chi Chiao at Chao-chou，Hopei 2.The Yung-t' ung Chiao at Chao-chou，Hopei》。这篇论文的发表在让国际建筑学界了解梁思成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有助于他和国际同行们保持学术上的联系和交流。

当再次踏上流亡旅途，远赴四川李庄之际，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她和思成的诚挚谢意。她这样写道：

> 亲爱的慰梅和费正清：读着你们8月份最后一封信使我热泪盈眶地再次认识到你们对我们所有这些人的不变的深情，这深情带有你们的人格特点，而我们，经过这么长久的沉默，又如此天各一方，真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情意。……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你们得先明白两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你和费正清首先绝对是少有的最亲近和最亲爱的那种人，第二，你们的礼物来得正是我们最最需要它的时候，这使我们更加心情激动并特别特别感激。你们怎么会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72—373页）

这里，需要再谈谈费正清夫妇曾给予处于困境中的梁思成夫妇以经济资助的事情，从中或许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来自异国的友情。应该说，梁思成夫妇不仅出身名门，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回国之后，无论在东北大学执教，还是在中国营造学社任职，经济上都收入颇丰。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曾回忆起30年代家里的生活水平说：“抗战前我父母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是优裕的。50年代初，父亲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比抗战时期和解放前生活好了许多。我曾问他，以当时和抗战前比，哪时生活更好？父亲根据购买力换算了一下，结果是，战前我家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不低的。”至于家里的实际消费水平，显然是解放后无法比拟的，“那时我家有两位保姆，分别照顾我们姐弟、外婆和父母，还有专管父亲书房的‘听差’、两个厨师，和专送我和姐姐上幼稚园和小学的‘洋车夫’小王。父亲则自己开一辆1928型的雪佛兰汽车上班。”（《不重合的圈》，400—401页）以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丝毫不会逊色于费正清夫妇，更不可能接受别人的经济资助。但抗战的爆发，使过去的一切优越生活都化作幻影。尤其是梁思成夫妇抛弃家产踏上流亡道路后，经济上每况愈下，而狂涨的物价又很快榨干了他们剩余的积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绝对不会低下头来去接受别人的恩惠，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作为多年的好友，费正清夫妇是很了解和理解他们的。为了能够在经济上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又避免让好朋友产生误会或是其他不必要的想法，费正清夫妇可谓煞费苦心。最后，他们决定将钱寄给他们共同的好朋友老金，然后由老金找个合适的理由，将这笔钱交给梁家使用。老金虽然是著名的哲学家，可处理这种事情却显得逻辑性严重不足，在梁思成夫妇的一再追问下，很快就把事情说漏了。梁思成夫妇也在戳穿了老金的善意的谎言的同时，深刻地感受到了费正清夫妇的良苦用心和真挚情意。正如林徽因在信中所言：“种种痛苦、欢乐和回忆泉涌而来，哽在我的眼底、鼻间和喉头。那是一种欣慰的震撼，却把我撕裂，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72页）对于来自这样的好友的帮助，任何客套或是自命清高的拒绝显然都是不适宜的。之后的岁月里，梁家的生活水平一降再降，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而费正清夫妇也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尽全力予以帮助。这种真正的

朋友关心，不仅没有使他们产生距离感，反而拉近了他们的情感，加深了他们的友谊。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经济处于崩溃状态，通货膨胀惊人。虽然此时的梁思成夫妇收入很高，可相对于飞涨的物价，生活还是很紧张。1948 年新年就要到了，按照以往的习惯，两家会互相送上小礼品以祝贺新年。在新年之前寄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干脆提出请老朋友寄上一盒五百张的轻打字纸作为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原因很简单，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一张要一万元，一盒就是半个月的薪水。费正清夫妇接到信后，很快将指定的新年礼物给好朋友寄去了，当然，还有他们无限的新年祝福。

见证梁思成夫妇和费慰梅夫妇友谊的还有一部书——出版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部书不仅再次向全世界彰显了梁思成的古建筑研究大师地位，而且成为延续两家友谊的纽带。抗战后期，受国立编译馆委托，梁思成在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开始编写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该书是一部以图版和照片为主，加以简要文字说明的中国建筑史，所有图注都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准备在抗战胜利后把书稿送到国外出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则全力协助梁思成夫妇，为他们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 80 余幅图稿制作了一套缩影胶片。尽管工作费了好几个月才完成，但缩影胶片的效果很好。费正清这样写道："思成昨晚第一次来，看到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稿的缩影胶卷，当场很兴奋。小伙子们特别喜欢拍它，因为效果极佳。"（《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74 页）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应邀赴美讲学，并将书稿带到美国。他将此书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希望在美逗留期间完稿并出版。但后来由于林徽因病重，梁思成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行程，书稿未能最终完成。考虑到出版的便利，梁思成将全套的图片和照片交给费慰梅保管，自己则带着书稿匆匆回国。之后，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两家一度失去联系多年。1957 年 3 月，费慰梅接到梁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请她把《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全套图片和照片寄给一位在英国纽卡索求学的刘小姐。据说，这位刘小姐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梁思成。在与刘小姐取得联系并再三叮嘱之

后，细心的费慰梅才将精心打包之后的图片资料寄了过去。尽管还是有点不放心，但毕竟好朋友所托的事情都已照办了，费慰梅也就没再去多想这件事。没想到，事隔21年之后，从一位访问清华大学的欧洲朋友那里，费慰梅得知了一件几乎令她彻夜难眠的事情：当年寄给纽卡索的刘小姐的那套图片资料竟然石沉大海，再无音讯，梁思成一直到去世，也未收到。作为这部书稿形成的见证人，费慰梅太清楚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了。事实上，她不也一直在尽全力帮助梁思成完成这部书稿吗？正如费慰梅所说的，“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愤怒和委屈之余，费慰梅立即行动起来，“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位退休的大使兰博特博士的帮助下，费慰梅竟然找到了已在新加坡工作的那位刘小姐。之后的交涉却颇费一番周折，在费慰梅、梁思成家人和清华大学的一再要求下，那套消失了20余年的珍贵图片，终于在1980年7月17日回到了中国。

后来发生的则是一个人们期望已久的大团圆的故事了。费慰梅在为梁思成夫妇所写的传记中很欣慰地讲述了这段往事，并再次回忆了两家历经半个世纪的真挚友谊。她说：

> 1980年的10月，我专程到中国，与林洙（梁思成的遗孀）一起编写清单目录，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找到了，这部散佚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
> 四年后，思成的大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应吴良镛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编辑这部书，为它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博得中外人士的欢迎以及赞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因本书在一九八四年获得美国出版家专业暨学术书籍出版金奖。
>
> 看到这批珍贵的图片重见天日，以及《图像中国建筑史》问

世，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的欢欣。为了表示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省游览，由林洙当向导，走过思成往昔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追寻一九三四年和正清随同梁思成夫妇走过的足迹。……

完成这趟中国建筑之旅后，我邀请林洙到美国，她在我们剑桥的家住了两个月。我们旅行了许多地方，从新英格兰到南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一路上参观了许多美国的特殊建筑。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费城，去看看当年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邦交的二十五年间，梁家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儿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伦敦及其他各地。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学者。在那段苦难的时期，他忠诚地守着父亲和林洙。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而今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感动了他，他决定为中国读者翻译出版中英对照版。由于他没有学过建筑，为了挚爱的父亲，他暂时搁下自己的工作几个月，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完成翻译。……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中来作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一九九一年，正清临终前不久。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挚爱的人而伤悲，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一生成就的骄傲。但愿我们两家的友谊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永远。（《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241—243 页）

纵观梁思成、林徽因的一生，最形影不离的朋友恐怕莫过于老金——金岳霖。老金从 30 年代初经徐志摩介绍结识梁思成夫妇起便成为梁家的常客，之后的人生岁月，无论贫穷、战争，抑或无休止的政治斗争，都没能把他们分开。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历程，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朋友





情谊，而且还有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风格。

金岳霖，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留学和游历，1925年底回国。说起金岳霖的求学经历，和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一样，颇有些传奇色彩。他先是学商业，因为“引不起兴趣”而改学政治，后又由政治学转到哲学和逻辑学，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之所在。回国后，金岳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他的代表作之一——《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被学术界公认具有世界水平的扛鼎之作，不仅为金岳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对于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爆发以后，金岳霖和诸多清华同仁一起开始了流亡生涯。从北京到长沙，最后辗转来到昆明。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寇的满腔仇恨，激励着金岳霖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全力以赴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先后完成了《论道》和《知识论》两部书稿。对于他在抗战期间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冯友兰的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他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冯友兰《怀念金岳霖先生》，《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29页）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岳霖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并曾任民盟中央常委。

说起老金和梁家的友谊，有两个方面最为突出。

一是钟爱徽因，一生不变。

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惹人关注的当数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有很多人断言：老金之所以终生未娶，完全是由于他始终深爱着林徽因。甚至还有人据一些模棱两可的记载随意编造出一些所谓的感情纠葛故

事。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老金和林徽因，乃至和梁思成之间的友情呢？

首先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老金是深爱林徽因的。应该说，老金从1931年结识林徽因开始，便被林的出众才华和高贵品格所倾倒，进而萌发出浓浓的爱慕。之后，他不仅成为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加者，用一生去欣赏、去呵护、去帮助林徽因，而且情不自禁地向林徽因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这个性格如大男孩般的逻辑学家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是如此地欣赏自己的才华，和自己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面对他的痴爱，敏感的林徽因一度有些不知所措。梁思成的真爱与豁达、老金的真心与率直，最终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看似十分棘手的感情难题。晚年的梁思成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 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

> 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38—239页）

正如梁思成所说的，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人生岁月中，他始终理智地掌控着自己的感情，将无限的痴情与爱慕深深地藏在心底，把梁思成夫妇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坦然面对和相处。

抗战期间，避难于四川李庄的梁思成夫妇生活极其窘迫。尤其是林徽因，更是因重病而长期卧床，而物质的匮乏又大大阻碍着她身体的康复。此时的老金虽然仍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但心早已飞到了蛰居李庄的梁家。1941年的暑假，他千里迢迢从昆明来到了李庄。梁家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而解决这些困难对于他来说又是不可能的。毕竟他自己也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加上抗战期间薪水微薄，纵然有心也无力啊。但老金有老金的办法，他做事的“痴”也体现于此。早在30年代在北京和梁家毗邻而居的时候，老金就养了几只斗鸡，时间久了，竟然以科学之精神总结出了许多养鸡的理论和心得。当然，书呆子气颇重的老金养鸡，经常会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老金的好友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曾讲述过这么一件趣事：老金回国后，曾一度和一位中文名字叫丽琳的美国女友住在一起，虽然从未张扬此事，但学界的朋友们大多知晓，也见过其人。有一天，老金忽然给赵元任家打电话，说家里出了事，请妇产科专业出身的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忙。杨步伟以为是老金和他那位美国女友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情，急忙赶去，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学妇产科的赵太太前来助产。流亡到昆明之后，鉴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补充些营养，并为空袭不断、疲于奔命的生活增加些许乐趣，老金又养了一大群鸡，且水平不断提高。梁从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啊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不重合的圈》，422—423页）到了李庄，为给病重的徽因滋补身体，老

金再次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从薪水中挤出一些钱，到附近的镇上买了十几只鸡，认认真真地当上了饲养员。也许是心诚则灵吧，老金的苦心终于获得回报，那些鸡不但长得很快，没有生病，而且很快就开始下蛋了。当老金亲手将煮好的鸡蛋送到林徽因床前的时候，其欣喜的心情恐怕用任何言辞都难以形容。

不仅养鸡，老金还一直尽自己所能安慰病中的林徽因，陪她聊天，帮她修改稿件，甚至给她读诗歌，读散文。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以后。重回清华园的梁家再次高朋满座，包括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在内的诸多好友以及建筑系的师生们总是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到梁家聚会。而老金呢？每天风雨无阻，下午三点半准时到达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徽因阅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等，甚至还包括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读书完毕，其他参加茶会的朋友和师生也陆续到了，老金又会陪同林徽因来到客人们中间，茶会于是开始了。

1955 年 4 月 1 日，一代才女林徽因与世长辞。惊闻噩耗，老金悲痛欲绝。脑海中，那个美丽端庄、充满灵气、让自己一生为之倾慕的林徽因似乎就在身旁侃侃而谈，依旧是那么有激情，那么有朝气，可清醒之时，却已是生死两重天。悲痛之余，老金和好友邓以蛰联名撰献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挽联借用了林徽因 30 年代的一首诗歌的内容，不仅表达了对林徽因的无限思念和哀悼，更体现出老金对林徽因的艺术天分始终不渝的仰慕和领悟。看到此挽联者，无不为之动容。多年以后的一个 6 月 10 日，老金突然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大家接到邀请后都有点不知所以然，搞不清楚老金为何请客。等朋友们到齐后，老金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在场诸友闻听此言无不惊诧，并为老金的一片痴情所感动。

老金晚年的一段表白，让我们再一次强烈的感受到他的痴心与真情。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林徽因作品的编撰者前往拜访已是垂暮之年的老金。当拜访者请求老金为即将出版的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时，老金忽然沉默了，过了很久，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稍停片刻，又更加神圣与庄重地说：“我没有机会同她

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42—349页）

二是择“林”而居，魂系梁家。

老金自结识梁思成夫妇后，很快便成为梁家的好友和太太客厅的最忠实的参加者。再过了一段时间，索性卷起铺盖，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后院择“林”而居。老金晚年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11—12页）据说，老金还曾经坦率地讲过一句心里话：“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事实确实如此。从30年代迁居北总布胡同开始，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有梁家的地方，往往会出现老金的身影。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曾耗尽家资在昆明郊区的龙头村建造了一所三间房的简陋民居，之后不久，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金便如影随形般地在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和在北总布胡同居住时的风格一样，为方便来往，老金的耳房与主房的起居室开门相连，进出梁家，足不出户，推门即可。尽管生活状况大不如从前，但只要和梁家毗邻而居，老金就过得悠哉悠哉。平日里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这个新家，著述，养鸡，聊天，还有，就是像一位老大哥一样去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梁家。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她说：“我们亲爱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一片温暖的笑。”（《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74页）

其实，老金自己在昆明的生活也是辛苦之极。因为日本人的飞机频繁地对这座城市进行轰炸，老金的生活经常都是在逃亡中进行。正像林徽因

所说的，“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老金的眼睛有毛病，怕阳光，常年戴着一顶呢帽，加上个子高，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躲避空袭时往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这还不算，也许是这种逃亡的生活太紧张了，在一次躲避空袭时，老金一时疏忽，竟然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原来，抗战爆发后，老金一心想学术救国，在完成了《论道》一书后，开始专心致志地创作巨作《知识论》。1939年老金到达昆明之后，洋洋六七十万字的初稿已基本杀青。每逢日寇空袭，老金便携带一小箱子躲避于乡野。和寻常人不同的是，老金的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法币美钞，而是两样老金心目中的无价之宝——一样是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另一样则是正在修改中的《知识论》书稿。对于前者，当时还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的汪曾祺感触颇深，他说：“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 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跑警报》）在一次空袭中，老金像往常一样拎着箱子，逃往郊外。当赶到城北蛇山后，稍事休憩，便拿出书稿，埋头修改。这次空袭时间出奇得长，等了大半天，警报还是没有解除。老金又累又饿，索性放下书稿，顺势枕在上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渐黑，空袭的敌机也撤离了。腹中空空的老金如释重负，急忙爬起身，拿起身旁的小箱子，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山回家了。等到了宿舍，老金忽然意识到，书稿忘带了。这下，老金有些傻眼了，不顾一切地冲向郊外的蛇山，可找遍了整个山包，再也没有见到宝贝书稿的影子。痛失书稿的老金几乎要失声痛哭了，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了。懊恼之余，老金

的犟劲又起，下定决心重头再来。时隔7年，终于在1948年完成了这部哲学巨著。

新中国成立之后，老金的命运不断地发生着起伏，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自我批判中蹒跚行进。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先后离世，使他倍感孤独，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精神依托，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在这个老人最需要关心的时候，梁家的后人来到了他的身边，也使他和梁家近半个世纪的情谊延续到了他们的后代。这人就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那个老金从小看着长大的、被林徽因称为“小弟”的孩子。感念老金和父母的真挚友情，同样是历经磨难的梁从诫，毅然决定携家搬至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居所，悉心照顾已年逾古稀的老金，并以尊父之礼相待，称他为“金爸”。重回梁家的老金显然再次找回了自己的依托，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他将从诫视为己出，信任、关怀备至。这次，老金再也没和梁家分开。十年之后的1984年的10月19日，带着对徽因和思成的无限思念以及对往日时光的诸多回忆，也带着对梁家、对梁家子女的无限眷恋，89岁的老金在家里安详地故去。

沈性元是老金当年的好友、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的小妹，老金晚年时，她经常前去看望。对于老金晚年的生活，沈性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做了非常温馨而形象的描述：“有时碰上梁从诫伉俪和他俩的爱女全在家，望着安卧在金老床上的大黄猫（猫享有一长方白布垫褥）那眯细双眼、懒洋洋地好不舒坦的样子，更令人觉得：这屋里不是一姓的三代人的一家，‘和平共处’的气氛，是那么自然、融洽。梁氏夫妇对金老的尽心负责，倪阿姨对金老无微不至的照应，使老人感到舒适，作为朋友们不由为之感动、放心。”（《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212页）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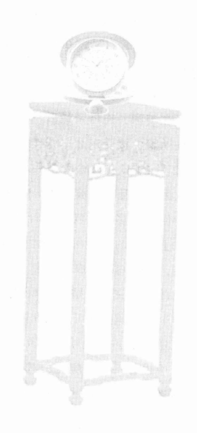
1939年林徽因与金岳霖在昆明





# 第四章

## 与时间赛跑



##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28 年 8 月，满怀着对即将开始的事业的无限期望与憧憬，风华正茂的梁思成和新婚妻子林徽因在穿越了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从 1924 年 6 月离开祖国赴美留学，转眼 4 年过去了。这 4 年对于年轻的思成和徽因来说，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可以说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一方面，留美的 4 年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美好的 4 年。他们尽情地汲取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在学业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步入婚姻的殿堂，并终生相伴。另一方面，这 4 年期间对他们俩人来说，又饱受失去亲人的折磨和煎熬。先是思成的母亲李惠仙于 1924 年 9 月去世，思成远在美国，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未见到；一年后，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不顾朋友劝阻，接受东北军张作霖的部将郭松龄的邀请，突然出关加入其部队，12 月 24 日，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旋即兵败被杀，而担任其幕僚的林长民也在乱军中被流弹击中身亡。林徽因闻此噩耗，痛不欲生，几欲中断学业回国。多亏梁启超出面帮助林家妥善处理了后事，并对徽因百般安慰，加上思成的细心呵护，才使徽因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也许正是这些磨难，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

随着学业的基本完成和婚礼的顺利举行，梁思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回国之后的工作问题。这可是他和徽因走向社会、独立养家的第一步啊。何况，林家家道中落，徽因母亲孀居福建，无依无靠，需要他们赡养。父亲梁启超在信中也曾一再提醒这一对刚成家的小夫妻，他说：“以徽音现在的境遇，该迎养她的娘娘才是正办，若你们未得职业上独立，这一点很

感困难。”（《际遇——梁启超家书》，55 页）

对于他们而言，找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颇有名气和实力的基泰建筑公司就通过种种关系试图邀请梁思成加盟，条件当然是非常优厚的。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们的专业兴趣与理想。前文已经谈到这个话题，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接触到《营造法式》这部看似“天书”的经典著作后，更是下定决心，要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拓荒者。正因为如此，在确定就业方向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

事实上，选择大学教书这一具有浓厚知识分子倾向的举动，既是梁思成的兴趣，更是时刻关注着他成长的梁启超的良苦用心之真实体现。梁启超对于自己爱子的前途可谓殚思竭虑，尽管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他还是亲自为即将学成归来的梁思成夫妇的工作再三筹划。最初，考虑国内时局的混乱、学术机构的困难和孩子们成长的需要，梁启超曾一度希望暂时包办子女的就业，让他们先做自己的助手，再慢慢谋求生计独立。他在 1926 年 2 月给孩子们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想法：“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际遇——梁启超家书》，25 页）但考虑到思成夫妇的实际情况和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梁启超改变了想法，积极着手帮助思成联系工作。他先是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和清华大学的深厚渊源，游说清华大学聘请思成担任建筑图案讲座教授。尽管清华校方答应将此事提交评议会研究，后来也获得通过，但实话实说，无论梁启超还是梁思成，都对这个外人看来优越至极的职位不是很满意。一来，清华本无建筑系，决定聘任梁思成，或多或少有些梁启超的面子和人情在其中，这让生性耿直的梁启超父子有些难以接受；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清华的条件实在是太舒适了，反而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一向注重寒士家风的梁启超对此尤为顾虑，正如他在给思成的信中所言：“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际遇——梁启超家书》，86 页）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梁启超意外地得到一个信息：关外的东北大学欲聘请梁思成前往执教，并

创办建筑系。

东北大学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文科专科学校。1922年，奉天省长王永江倡议筹设东北大学，并自任校长，在北陵前辟地500余亩，依照德国柏林大学图纸建造。1923年春季，正式成立东北大学，分为文、法、理、工四科。1926年秋天，少帅张学良就任该校校长。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年少气盛的张少帅一心想在东北干出些名堂。任职不久，即着手大学的改革与扩充，把原有的四个学科，改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同时，扩建校舍，广聘贤才。一时间，沈阳大有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重镇的架势。在学科设置上，当时的东北大学还是很有远见的。他们看到社会发展对于现代建筑学人才的需求，于是在1928年设立建筑系并招收了第一届学生。而此时，偌大中国，仅有国立中央大学刚刚设立了建筑学专业，其他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均无此专业。但当时的中国，真正接受现代建筑学教育的人很少很少，能有资格和水平创办大学建筑系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清华出身的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想到了留学美国、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清华校友杨廷宝，希望杨能够担当此重任。但杨廷宝自1927年回国后即加盟天津基泰工程司，负责图房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总建筑师），实在无法分身。面对东北大学的盛情邀请，杨廷宝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比自己晚毕业两年的梁思成。鉴于东北大学开学在即，未及与正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商量，杨廷宝便直接来到梁家，向梁启超谈及此事。正在为思成工作谋虑的梁启超闻听此事，颇感兴趣。在给思成的信中，梁启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廷宝谓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以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发展不可限量。"（《际遇——梁启超家书》，86页）一个月后，梁启超再次谈及此事，"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际遇——梁启超家书》，87页）

显然，无论学术地位，还是生活环境，远在关外的东北大学都无法与清华抗衡。但梁启超却最终为儿子和儿媳选择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东北大

学。对于这一决定，很多人难以理解。其实，这恰恰体现了梁启超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提及自己的理由，“清华及东北大学皆请他，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到彼后便可组织公司，从小规模式办起，徐图扩充，所以我不等他回信，径替他作主辞了清华（清华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就东北聘约了。”（《际遇——梁启超家书》，59 页）

其实，在谋划这些事情的时候，梁启超的病情已日趋严重，尤其是1926 年 3 月被协和医院误割去好肾之后，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到了1928 年的秋天，病情开始急剧恶化。但为了思成夫妇的前途，梁启超没有把他们留在身边，而是强打精神，要求他们立即去沈阳报到，因为东北大学就要开学了。分别 4 年，刚刚见到心爱的儿子，又要分离，这对于一向注重家庭温情的梁启超来说无疑又是痛苦的决定。懂得怎样的爱才会对子女终身有益，梁启超给我们做出了真正的表率。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年轻父母们应该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此外，直到病逝之前，梁启超始终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兴趣盎然地做学问、教学生，与家人同享天伦之乐。在他生命中的最后 3 年，梁启超除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及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务外，著述方面成绩依然不减当年，先后编著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928 年 9、10 月还在抱病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10 月 12 日，病重绝笔。为了不让子女们牵挂自己以至于影响工作和学业，梁启超在给他们的信中总是充满了乐观。仅以他病逝前一年的几封家书为例，1928 年 2 月 13 日，刚刚出院就让梁思永代笔给在海外的孩子们写信，告诉他们：治疗的效果很好，“自从灌了两回血之后，很有功效”。（《际遇——梁启超家书》，37 页）过了两个月，身体稍稍恢复，便立即将消息告诉梁思成和林徽因，他说：“今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我的体子静养极有进步，半月前入协和灌血并检查，灌血后红血球竟增至四百二十万，和平常健康人一样了。你们远游中得此消息，一定高兴百倍。”（《际遇——梁启超家书》，54 页）其实，到 1928 年的时候，梁启超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甚至不得不定期输血方能维持。大女儿思顺虽远在加

拿大，但最挂念父亲的病情，在给父亲的信中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心和忧虑。梁启超接到她的信后，连忙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告诉自己的宝贝女儿："看你们来信，像是觉得我体子异常衰弱的样子，其实大不然。你们只要在家里看见我的样子，便放下一千万个心了……此次灌血之后，进步甚显著，出院时医生说可以半年不消再灌了。现在实行'老太爷生活'，大概半年后可以完全复原（现在小便以清为常态，偶然隔数天小小有点红，已成例外了），你们放一万个心吧。"信中，梁启超又再次表明了自己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心境，好让女儿放心，他说："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际遇——梁启超家书》，59—60页）即便是到了当年的10月份，梁启超因病情日益严重而停止著述，还念念不忘那些不在身边的子女，在10月12日写给思顺的最后一封信中，不但丝毫不提自己的病情，反而对思顺夫妇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关心备至，慈父之情跃然纸上。

对于父亲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和林徽因显然是心领神会的，甚至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比较自由，省去不少的应酬，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古建筑和《营造法式》，继而理清楚整个古代中国的建筑发展脉络。此外，学成归来的他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非常渴望能有一片独立的天地一展身手，而筹建中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恰恰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除了十几位对现代建筑学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等待他们前去开创。

1928年9月，年仅27岁的梁思成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他的职称是副教授，两年后升为教授，林徽因则是他最得力的合作者和当之无愧的骨干教师。事实上，最初的一个学年，整个建筑系只有他们两位专业教师。他们既要忙于整个系的建构，从学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到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的选购，又要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的教学和学生的课

外研讨。他们经常忙碌到深夜，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工作。

梁思成夫妇的全身心投入显然是卓有成效的。

一是他们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课程设置为蓝本拟订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体系，并付诸实践。这样做也许自身特色不是很鲜明，或多或少有些全盘照搬的痕迹。但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建筑教育而言，这何尝不是在高起点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自觉接轨呢！更重要的是，梁思成不仅在建筑学专业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在他的身上，作为教育家的素质和潜力也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来，其建筑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便是在这一时期萌发并逐渐形成的。这一点，无论对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建设，还是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上书梅贻琦校长，重回清华创办建筑系，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梁思成在 1932 年 7 月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信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早期的建筑教育思想和理念。他告诉自己的首届学生：

现在你们毕业了，毕业二字的意义，很是深长，美国大学不叫毕业，而叫“始业”（Commencement）。这句话你们也许已听了多遍，不必我再来解释，但是事实还是你们“始业”了，所以不得不郑重的提出一下。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为求得到合用和坚固的建筑，所以要有专门人材，这种专门人材，就是建筑师，就是你们！……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说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这又是我从前对你们屡次说厌了的话，又提起来，你们又要笑我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话，但是我还是要你们记着，尤其是我在建筑史研究者的立场上，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百年后，你我或如转了几次轮回，你我的作

品，也许还供后人对民国廿一年中国情形研究的资料，如同我们现在研究希腊罗马汉魏隋唐遗物一样。但是我并不能因此而告诉你们如何制造历史，因而有所拘束顾忌，不过古代建筑家不知道他们自己地位的重要，而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却有这样一种自觉，也是很重要的。（《梁思成全集》第一卷，312—313页）

二是承担了大量的专业课教学任务，从“建筑概论”“中外建筑史”“建筑设计”到“美术史”“素描”“水彩”等课程，他们俩几乎都讲过。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林徽因还自告奋勇开设了“专业英语”课。良好的教育背景、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他们在课堂上很快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那生动风趣、富有激情的讲授，以及对于学生的循循诱导和悉心呵护，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信任和尊重，而且使初创时期的建筑系一开始就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强大的凝聚力。

还是在给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信中，梁思成再次深情地回忆起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还记得你们头一张 Wash Plate，头一题图案，那是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多么有趣，多么辛苦，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

后来林先生来了，我们一同看护小弟弟，过了他们的襁褓时期，那是我们的第一年。

以后陈先生、童先生和蔡先生相继都来了，小弟弟一天一天长大了，我们的建筑系才算发育到青年时期，你们已由二年级而三年级，而在这几年内，建筑系已无型中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一种Tradition，在东北大学成为最健全，最用功，最和谐的一系。（《梁思成全集》第一卷，311页）

在讲课的时候，梁思成喜欢用准确的比例在黑板上勾画出建筑的轮廓

与特点，几乎把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例都在黑板上画出来，这种讲画结合、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不知不觉中就体会和把握住了中外建筑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演变过程。多年之后，东北大学建筑系早期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并主持过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十大献礼工程”中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的设计任务的张镈对此还感受颇深。他回忆说：“梁公当时只有27岁，却已经学问渊博。梁公讲课的一个大特点是高度的‘视觉化’，每讲到一个实例都要在黑板上准确地把建筑的平、立、断面画出来。”后来，梁思成执教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学生们对梁先生的这一做法同样感触极深，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是全力以赴引进高水平师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深受梁思成尊重的清华老校友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的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则在自己首次创业中就自觉地实践着这一思想。在梁思成的盛情邀请下，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先后来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这些最早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留学生的加盟，使东北大学建筑系迅速成为传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师摇篮之一，其实力和水平甚至足以和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相抗衡。后来，他们全部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学者和专家。例如童寯，曾先后担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的建筑系教授，还在上海与赵深、陈植共同主持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培养了一大批建筑人才，参加设计的工程约一百多项，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2—1933年）、南京首都饭店（1932—1933年）、上海大上海大戏院（1933年）、南京地质矿物博物馆（1937年）等等。“九·一八”事变后，接替梁思成主持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的童寯和家人一起流亡到关内。尽管时局混乱，生活艰辛，但童寯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满腔的热情继续为建筑系师生服务。这期间，有两件事足以彰显其人格以及对东北大学的卓越贡献。一是离开沈阳之后，无论旅途多么艰险，童寯始终随身携带着一箱东北大学建筑系教学用的幻灯片，而且抗战期间辗转带到大后方，从未损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如数交还给已改名为东北工学院的东北大学。二是随着大批东北大学的师生流亡到关内，复课呼

声一度很高，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但建筑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在童寯的召集和奔走呼吁下，陆续到达上海，并得以进入大夏大学借读。童寯、陈植、赵深等人及部分建筑界同仁亲自担任课程的教学工作。此项工作前后历时两年，1932年，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首届学生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在上海通过毕业答辩。

正是由于梁思成、童寯、陈植等人的出色工作，因“九·一八”事变而夭折的东大建筑系，在其存在的短短5年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建筑师，如刘致平、张镈、刘鸿典、赵正之、张翔等人，为近代中国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东北大学工作的3年可以说是梁思成朝着建筑大师目标奋力前进的起步阶段，在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古建筑调查与研究等领域，他都开始涉及，并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建筑学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学科特点就要求从事建筑学教育的人在潜心学术研究的同时，必须具备丰富的建筑设计工作经验。此外，单纯从经济上考虑，从事建筑设计的收入通常要远远高于从事建筑教育和研究。事实上，梁启超生前给梁思成的信中也多次表达了这个想法：希望儿子在教学、研究之余，成立设计事务所，做一些实践工作。到达沈阳之初，梁思成夫妇一度为建筑系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拿不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设计工作。陈植、童寯等人加盟后，教学工作任务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于是，几个年轻人便在教学之余，开始联手承接建筑设计任务，为此，他们在沈阳合作成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出众的专业素养帮助他们很快打出了知名度，他们先后承接了一些大学校舍的建筑设计工程。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合作设计了一些小型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吉林大学校舍是梁思成的第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当时的“吉林大学”并不是现在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据《吉林风物志》记载：“1929年，吉林省督军张作相要办吉林大学，请了梁思成（当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等人设计，在当时吉林市西郊八百垅开工建校，1931年7月校舍竣工，共建完三座石楼：一座学生宿舍楼，一栋实验楼，十九栋教工宿舍和两座门房。”“九·一八”事变后

吉林大学关闭。目前三座石楼保存较为完好，为东北电力学院所在地。三座石楼呈“品”字形布置，主楼二层，建筑面积3184平方米，主楼门前有一大石台阶直接进到一层半，主楼外墙面以粗糙的花岗岩饰面，凸凹明显，十分庄重。在入口上方女儿墙的两侧有石雕的正吻造型，中间部分屋顶台阶式的回收同两侧坡屋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建筑外墙面局部用较平滑的花岗岩装饰。这三座石楼利用同种材料的不同质感进行表现，加强了建筑群体的完整性，体现了简捷、质朴的建筑风格。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在1929年东北大学举行的校徽设计竞赛中，林徽因设计的颇具东北地方色彩的“白山黑水”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并获得学校校徽图案征集奖金400元。

这一时期的另一项突出成就是1930年梁思成撰写的《中国雕塑史》一书初稿的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雕塑史”。全书未排出章节目次，而是按历史朝代编排，共有“上古”“三代——夏”“三代——商”“三代——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朝”“南北朝——北朝”“隋”“唐”“宋”和“元、明、清”等13个部分，30000余字，并配有近200幅插图。篇幅虽然不长，但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如新风扑面，趣味盎然，充分体现了作者重视“魏风唐味”的倾向。例如，在论及初唐雕塑时，梁思成的评论幽默、诙谐而不失分寸，他这样写道：“自北齐起，神通寺窟像已开始刻造。唐代像皆太宗、高宗时代造。形制大略相同，并无何等特别美术价值，其姿态颇平板，背肩方整，四肢如木。其头部笨蠢，手指如木棍一束。当时此地工匠，殆毫无美术思想，其唯一任务即按照古制，刻成佛形，至于其于美术上能否有所发挥不顾也。此诸像者，与其称作印度佛陀，莫如谓为中国吃饱的和尚，毫无宗教纯净沉重之气，然对人世罪恶，尚似微笑以示仁慈。中国对于虚无玄妙之宗教，恒能使人世俗化，其在印度与人间疏远者，至中国乃渐与尘世接触。神通寺诸像，甚足伸引此义也。”（《梁思成全集》第一卷，112—115页）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在1946年写给儿子的家书中特别提到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予以极高评价。他说：文章高妙应该是行文时做到不加引号，而引文与己文分别显然，乃足贵也，梁先生的雕塑史，正是这样一个范例。

在教学工作之余，对古建筑研究的浓厚兴趣促使他开始了古建筑调查实践的探索。沈阳曾经作为满清入主关内之前的都城，有着大量的皇家建筑物，这无疑为梁思成夫妇的实践提供了理想的对象。于是他们从丈量沈阳郊区清“北陵”——也就是埋葬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昭陵开始，尝试用现代建筑学手段调查古建筑。在利用留学美国时所学的现代测绘技术对昭陵进行测量时，梁思成发现丈量结果与绘制图纸的比例要求无法取得一致，经过反复试验，他决定不再使用英尺等尺度分划，而代之以公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应该说，这期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以后梁思成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必要基础。作为一名成就斐然的古建筑保护专家，梁思成力图保护中国古建筑的实践也始于这一时期。当时，沈阳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试图将这一文化瑰宝保存下来。他告诉那些当权者：毁坏容易保护难，古建筑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要选择毁灭它们呢？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当权者拒绝了他的建议。这一结果似乎是一个悲剧的预示：作为一名古建筑专家，他的一生中多次遇到这一无奈而痛心的情景，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很少能凭借一名学者的力量实现他本应实现的愿望，精美的中国古建筑在他的视野中一个个消失了。

对于满腔热情在东北大学创业的梁思成夫妇而言，1929 年可以说是最难以忘却的。在这一年中，他们经历了死生与悲喜的双重磨砺。1928 年的初冬，东北已是寒风呼啸、白雪皑皑，当忙碌了将近一个学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梁思成夫妇准备回北京与家人团圆欢度春节的时候，忽然得到了父亲病重、11 月 28 日再度入院治疗的消息。这次的状况显然不容乐观。因为一向乐观开朗、最喜欢在信中向子女“炫耀”自己身体健康或病情恢复得很好的梁启超曾在 10 月 17 日写给梁思成的信中，坦白地告诉他们自己“精神委顿”，人也瘦得不像样子。梁思成夫妇接到消息后，焦急万分，匆匆处理好手边的工作，便赶回北京。此时的梁启超病情已经急剧恶化，看到自己最钟爱的儿子和儿媳，百感交集。在他们身上，这位文化巨匠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和期望。如今，思成不仅已经成家，而且在东北大学的创

业颇见成效，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呢！和儿子，他有太多的话想说，治学之道，人生感悟，可是病重的他已口不能言。见到面容枯槁的父亲，梁思成夫妇更是心痛万分，从留学美国到执教东北大学，多年来，他们更多的是忙于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对父亲的关心和照顾实在是太少了，书信都写得不多，以至于父亲多次提出抗议，甚至是请求他们多来信报告一下学习、生活情况。在他们的印象中，父亲是那么的健康，永远朝气蓬勃，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不会气馁，更不会悲观。半年前给他们的信中，梁启超还再次告诉他们“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终身不许它侵入”。如今，父亲躺在病床上，是那么的孱弱，甚至连话都讲不出来了。其实，天底下的父母哪一个不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常陪自己聊聊，可子女们呢？年轻时一心想着学业、奔着事业，心中虽有天下，却很少想起父母，等自己成家立业、为人父母，真正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1929年1月19日，一代文化宗师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梁启超的逝世惊动了社会各界。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举行了公祭或追悼大会，沉重悼念这位维新英雄和文化宗师。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学会有哭任公诗两首，哀情如丝，牵动肺腑，读后令人痛断肝肠。其云：

忽见沧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尘吹日落，园树助群悲。
忧国死未已，新民志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泪丝垂。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
此身终报国，何意计勋名。
正气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历史人物真正不朽的价值在于他的事业和精神能转化为后人的知识和

力量，能为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从新的需求中去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对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梁启超作为近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学术、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和久远的。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甚至称："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处，但客观地讲，戊戌、辛亥时期以及五四前后的两代青年普遍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其中，不乏毛泽东、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政治伟人和文化大家。

梁启超逝世后，满怀着对父亲的思念，梁思成夫妇联袂设计并监修了他们俩的第一件作品坐落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侧的梁启超墓墓碑。

送别父亲半年之后，梁思成夫妇于8月21日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女儿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这是梁家的长孙女。初为父母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之兴奋不已。为纪念逝世不久的父亲，那位对子女关爱有加、尤其偏爱女孩的"饮冰室老人"，也出于对女儿的期望，希望她能够继承梁启超的学识和人品，再造梁家"饮冰室"时期的辉煌，他们给这个可爱的女孩取名再冰。

东北大学的繁重工作使得林徽因原本就比较羸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孩子满月回到沈阳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处。东北的冬天又是那么的寒冷，病中的徽因显然无法适应，她的病情日益加剧。在家人和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下，1930年冬天，带病坚持工作了近一年的林徽因决定暂时辞去东北大学的工作，回北京养病。两个月后，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医院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病，而这种病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几乎无法治愈的绝症之一。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讲述了林徽因的病情，"思成和徽音我以为他们早已回东北，因为那边学校已开课。我来时车上见郝更生夫妇，他们也说听说他们已早回，不想他们不但尚在北平而且出了大岔子，惨得很，等我说给你听：我昨天下午见了他们夫妇俩，瘦得竟像一对猴儿，看了真难过。你说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和周太太（梁大小姐）、思永夫妇同住东直门的吗？一天徽音陪人到协和去，被她自己的大夫看见了，他一见就拉他进去检查，诊断的结果是病已深到危险地步，目前只有停止一切劳动，到山上静养。孩子、丈夫、朋友、书，一切都须隔离，过了6个月再说话，那真

是一个晴天里霹雳。”

在北京安顿好妻子和女儿之后，梁思成又回到东北大学，继续领导着建筑系的工作。命运似乎总在给人们开玩笑，雄心勃勃的少帅张学良全力扶持东北大学快速发展，希望将其办成东北的人才培养基地。但他没有料到，创办不久的东北大学却将中国官场上的朋党之争全面继承过来，朝气蓬勃逐渐被拉帮结派所挤掉，民主风气则被专制霸道所取代。这一局面令梁思成大为失望，而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又使得梁思成的“失望”变成了“无望”。日本人早就对富饶的东三省垂涎三尺，30年代初更是加紧了侵略步伐，东北危在旦夕，东北大学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刚刚起步的古建筑调查和研究工作很难再继续开展下去了。梁思成等人在为东大的前途深深忧虑之时，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求新的出路。1931年，东北的局势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迫于时局压力，这年2月，陈植离开东北大学，加入到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其他一些同事也相继离职。梁思成坚持工作到学期末，遂将系里的事务交给了童寯，回到了北京，进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随即沦陷，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关内。

## 二、不寻常的选择

东北大学的工作虽然短暂，但对梁思成后来的人生与事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愿望更迫切了，决心也更坚定了。在即将离开东大之际，梁思成接受了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并很快成为其中一员。

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于1930年3月。其创始人朱启钤是清末民初一

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曾先后出任熊希龄、孙宝琦、徐世昌内阁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并督办京师市政。改建北京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绿化市区，疏浚护城河，开放皇家艺苑京畿名胜等在近代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工程均由其主持完成。朱启钤还热衷于公众文化事业。在其内务总长任内，多方筹资将社稷坛改造成近代北京市的第一个市民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同时，将清王室承德避暑山庄所藏的二十余万件珍宝运到北京故宫，在紫禁城外廷开设古物陈列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退出政坛后，朱启钤致力于经营中兴煤矿。和许许多多旧式官僚不同，朱启钤对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古建筑研究情有独钟。他曾参加领导过一些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工作，和诸多长年维修皇家建筑的工匠建立了密切而愉快的关系。从他们那里，他了解了很多中国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朱启钤受徐世昌总统委派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手抄本。多年的古建筑修缮、研究经验和浓厚的兴趣，使朱启钤敏锐地认识到这部书的重要价值。通过江苏省省长严震，他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就是“丁本”《营造法式》。但由于“丁本”《营造法式》屡经转抄，错漏较多，如不认真修订，难免以讹传讹，以至于抹杀了这部巨著的价值。于是，朱启钤再次筹集资金，委托版本专家陶湘、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等人，以四库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阁藏本及蒋氏密韵楼本和“丁本”互相勘校，“时阅七载，稿经十易”，于1925年刊印发行了“陶本”《营造法式》。“陶本”《营造法式》装帧考究，校勘精良，印制精美，书的行款字体均仿宋刊本，并在书后加以附录，集录诸家记载及题跋，陶湘还在“法式识语”中对《营造法式》的版本流传做了详细的考订，并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此书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海内外学子始渐知中国古代营造之学。

自“陶本”《营造法式》刊行，朱启钤即“悉心校读，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然其大体已可句读且触类旁通，可与它

书相印证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书，而……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多"。（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讲词》，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14 页。）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扩大，朱启钤愈加感到中国建筑历史的博大精深，非有专门机构难以担此重任。"须先为中国营造史，辟一较可循寻之途径，使漫无归束之零星材料，得一整比之方，否则终无下手处也。"（《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124 页）经多方努力，特别是在以前政界故交周贻春的帮助和支持下，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他于 1930 年 3 月 16 日正式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旨在系统地整理中国建筑史资料，追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沿革。中国营造学社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在此之前，建筑史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概念。朱启钤曾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谈及自己创办学社的初衷："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途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斐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晚近以来，兵戈不戢，遗物摧毁，匠师笃老，薪火不传。吾人析疑问奇，已感竭蹶。若再濡滞，不逮数年，阙失弥甚。曩因会典及工部做法，有法无图，鸠集师匠，效梓人传之画睹，积成卷轴。正拟增辑图史，广征文献。又与二三同志，闭门冥索，致力虽勉，成功尚少。劫运无常，吾为此惧。亟欲唤起并世贤哲，共同讨究。或以智识，相为灌输；或以财物，资其发展。就此巍然独存之文物，作精确之标本。又不难推陈出新，衍继成书，以贡献于世界。"（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 年 7 月第一卷第 1 期）

成立之初的营造学社并未有大的作为。其早期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国学专家，如阚铎、瞿兑之、刘南策等，对建筑学所知甚少，更未接受过近代建筑学教育。他们试图从浩瀚的古籍中去发掘中国建筑历史的脉络。"第

一年工作：整理故籍，拟定表式；第二年工作：审定已有图释之名词；第三年工作：制图撰说；第四年工作：分科编撰；第五年工作：编成正式全篇。”（《社事纪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 年 7 月第一卷第 1 期）这显然体现了传统思维中人们对于建筑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不难想象，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去，即便朱启钤的热情再高，中国营造学社也很难有所作为。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曾称其为“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68 页）

梁思成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对于中国营造学社来讲，梁思成的加盟不仅增加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他带来了现代建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与理念，学社的古建筑研究很快便大步向前。

说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其中还颇有一番周折。对于梁思成的学识，朱启钤早有耳闻，成立营造学社伊始，便委托曾做过自己的幕僚、私交很深的周贻春专程前往沈阳游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学社。周贻春曾于 1913 年—1918 年担任清华学校的校长，而当时梁思成还在清华读书。在朱启钤看来，周贻春以老校长的身份亲自去请梁思成应该是很有分量的。但梁思成夫妇当时并未明确接受老师的邀请，仍然留在了东北大学。为什么呢？其一，选择到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是梁思成和父亲梁启超一致认可并决定的，梁思成非常希望能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做一些事情。虽然初建时期困难很多，但在自己和其他同事的不懈努力下，建筑系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工作需要上，梁思成夫妇都不愿意离开这里。其二，朱启钤毕竟是位经历非常复杂的老官僚，虽然做过很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过许多政治斗争，做过一些糊涂事。特别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曾不遗余力地为袁复辟帝制摇旗呐喊，以至于袁世凯死后，一度和赵秉钧、陈宧、梁士诒等人被北洋政府列为“四凶”予以通缉，后来，虽蒙政府特赦而重返政坛，但还是留下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为国人所诟病。专心学问、远离政治的梁思成自然不愿意与朱启钤交往过密，不接受营造学社的工作实属正常。

然而，时局的变化却促使梁思成改变了当初的想法，决定放弃在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北京工作。客观上有三个原因：一是日本人在关外早已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发动全面进攻，将东三省占为己有，并以此为大本营，占领华北，乃至全中国。进入30年代之后，虽然张学良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但日本人的刺刀已经指向中国人的鼻尖，东北形势急剧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做逃亡关内的准备。二是东北大学的发展陷入党同伐异的怪圈，人事斗争不断升级，以至于人心涣散，生机顿失。目睹着东北的危亡和学校的困局，踌躇满志的梁思成不禁仰天长叹，虽有心建设好学校，教育好学生，但又能奈何呢？三是林徽因的病情时刻牵挂着梁思成的心。1930年冬天，病情日益严重的林徽因不得不辞别丈夫，和母亲、女儿一起回北京养病，经协和医院诊断，竟患上了肺结核病。这不能不令远在沈阳的梁思成焦急万分。

1931年6月，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9月，正式加入中国营造学社。选择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是梁思成的一个不寻常的抉择。如果用世俗的观点衡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单位似乎和梁思成的地位和学识极不般配，但梁思成却最终选择了它，究其原因，关键还在于梁思成的学术兴趣和朱启钤求贤若渴的诚意。虽然梁思成一度拒绝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但朱启钤并未因此放弃努力，之后，他一直和梁思成保持联系，并一再向梁思成发出邀请。事实上，从事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也是梁思成终生的志趣所在，而营造学社恰恰是以研究中国古建筑为宗旨的，可以为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搭建一个平台，尽管条件很简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加入营造学社之后，梁思成先在研究部任主任。一年后，随着建筑学家刘敦桢的加入，学社在组织机构上作了一些调整，社长下设法式、文献二部，梁思成改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前者的工作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和分析鉴定；后者侧重于对古籍文献上关于建筑学的记载进行研究。刘敦桢早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曾先后在苏州工业学校建筑科和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任教，在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和建筑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出于对古建筑研究的极度热爱，

1932年秋，已在建筑学界颇有影响的刘敦桢毅然辞去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建筑师事务所收入较丰的兼职，举家迁居北京，加入营造学社，专心矢志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共同的志趣使梁思成和刘敦桢成为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他们密切协作，相得益彰，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社骨干离开北京，开始了流亡生活，营造学社暂时解散。1938年初，梁思成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几位学社骨干成员得到消息，也从不同的地方陆续赶到这里。虽然战火连天，生活拮据，但梁思成深感有必要把已经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恢复起来，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古建筑研究，尤其是对以往涉足极少的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开展调查。于是，梁思成致函学社的主要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学社成员现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中基会能否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便复函，表示只要梁思成和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继续资助。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一度解散的中国营造学社又得以在昆明延续自己的古建筑研究历程。

社长朱启钤则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四处筹款，亲自出面与各地方官员协调学社成员外出调查事宜，而这一切对于学社的发展，尤其是大量古建筑调查成果的取得是必不可少的。抗战之前，中国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定期拨付的经费，二是中英庚款董事会不定期拨付的经费，三是学社同仁自筹的款项，四是社会各界人士赞助的经费。随着学社事业的蒸蒸日上，规模不断扩大，在最鼎盛的1937年，职员和社员总人数达到了86人，学社的开支也随之成倍增加。来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经费终归有限，社会各界的赞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朱启钤则充分利用自己从政时积累下来的深厚的人脉资源，广泛寻求各界的支持，筹集款项，用于学社建设。同时，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社会动荡不安，城乡差距悬殊，治安状况更是一塌糊涂，学社成员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各地行政当局的同意和关照。为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学社成员的人身安全，往往不等学

社成员出发，朱启钤便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办理好了必要的手续，甚至连食宿、交通问题都妥善解决，从而确保了学社成员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学社创建初期，为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扩大社会影响，“以见李（明仲）书之流播欧美，中国营造发皇之影响，而社事影响亦附之”。（《社事纪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12月第一卷第2期）朱启钤力主创办学社自己的学术刊物，1930年7月正式出版不定期学术研究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是朱启钤非凡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行政事务经验，再加上严谨、务实的学术研究思想，使他能够和两个优秀的年轻学者——梁思成、刘敦桢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中国营造学社的坚强基石。他们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学社的事业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著名建筑史学家傅熹年院士曾这样评价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人的合作和对营造学社的贡献，他说：“在我看来，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到中国营造学社的最终解体，朱启钤先生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体现在组织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具体的研究工作的实施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则主要是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所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263页）

中国营造学社从1930年成立，到1946年结束，前后17年。抗战期间梁思成、刘敦桢等骨干颠沛流离，经费拮据，外出调查及研究工作举步维艰。但即便如此，成就依然十分辉煌，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是后学之人难以逾越的。而梁思成也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和研究中，逐渐理清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在将一座座史诗般的古建筑介绍给世人的同时，也铸就了自己在古建筑保护和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要早于中国营造学社，但连他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其学术成果是无法与中国营造学社相提并论的。

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刊行了7卷23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发表各类文章141篇，包括考证与调查类46篇，文献、典籍整理类30篇，杂著类26篇，学术思想与理论探讨类15篇，图样与料例及工程做法类13篇，译文类7篇，文物建筑与保护类4篇，《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刊行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价值也给予高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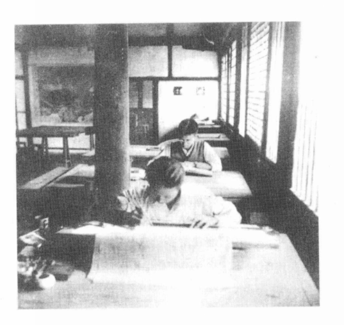
价，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盛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一种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料的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截止到1935年，学社还出版了《营造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等31种建筑历史文献和研究著作，引起了建筑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还编辑整理了10辑古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为当时的人们探索民族建筑如何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就学术风格而言，学社成员运用实证考据的方法来汇集研究成果，不作无稽之谈。如刘敦桢的《大壮笔记》，承续晚清朴学遗风，通过调查研究与分析比较，字字皆有来历，句句都是学问，成为一代学术楷模。正是在这种高效、严谨、务实的风气影响和梁思成、刘敦桢等大师的言传身教下，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培养了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等一批古建筑专家，成为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人才的摇篮。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建筑史学界的研究骨干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师承中国营造学社，这其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受教于梁思成和刘敦桢。

从1932年至1937年，学社成员先后调查过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山东等省的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第94页）即使是在流亡西南的抗战时期，稍有机会，他们便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野外古建筑调查。随着学社创造性的工作，一个个散落四方的古建筑掸去了岁月的风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国人为之欢呼，世界为之震惊。一部生动形象、璀璨无比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这样被他们打开了。



昆明龙头村营造学社工作室



莫宗江（前）、梁思成（后）在四川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

## 三、寻梦佛光寺

前文已经提及梁思成对于中国建筑史和《营造法式》研究的浓厚兴趣。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对此，梁思成曾作过清晰的表述，他说：“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例如罗马式的‘五范’（Five orders），各有规矩，某部必须如此，某部必须如彼；各部之间必须如此联系……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许多配合定例，也同文法一样，其规律格式，并无绝对的理由，却被沿用成为专制的规律的。……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要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梁思成全集》第四卷），295—301页）

而要弄明白中国古建筑的“文法”，谈何容易！建筑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匠学，由匠人师徒相传，传授的方法多为口述和实际操作。由于长期的战乱，完整保存的古建筑并不多，建筑技术著作更是匮乏之极，一些著名的建筑术书，如《大唐六典》、宋代喻皓的《木经》、元代内服的《宫殿制作》、明代的《营造正式》和《梓人遗制》等均已失传，侥幸保存下来的只有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书，均为当年负责宫廷建筑的官员编撰。但这两部书也久已无人研习，加上其本身内容

偏专，语言晦涩，很多技术早已失传，令人如观天书，根本无法解读。尽管内容一时难以弄清楚，但梁思成对其中蕴涵的巨大价值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似乎已经看到这两部书背后呈现出的绚烂多彩的中国古代建筑历程。他下定决心，要在科学、系统的古建筑研究中征服“天书”。因为，中国古建筑的“文法”，应该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两部书中，它们就是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

在破解古建筑“文法”的过程中，梁思成没有走纯粹理论研究的老路子，而是采用了理论研究结合实例印证的研究方法，从近代建筑开始，逐步向唐宋建筑推进，为进一步追溯上去研究《营造法式》打好基础。为此，他首先选择了相对难度较小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作为突破口。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修订颁行的一部建筑术书，共分70章，涉及到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并对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提供了丈量方法。由于该书成书时间较晚，距当时只有200年左右，而且国内保存的建筑实例较多，尤其是故宫，那庞大的建筑群无疑是研究明清建筑最好的教材和标本，而那些世代以修缮这些皇家建筑为生的老工匠们则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事实上，梁思成很快便拜杨文起老师傅和彩画匠祖鹤洲老师傅为师，虚心请教关于工程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谦虚、平易的作风，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不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获得了那些朴实的工匠们的信任和热情帮助，古籍中晦涩的术语一一得以化解。诸如“蚂蚱头”“三福云”之类的名词，都是通过老匠师们在故宫内逐一指认和详细解释后才弄明白的。梁思成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弄懂了。他将自己研究这部著作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书，名曰《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出版。多年以后，梁思成最早的助手之一莫宗江还清晰地记得老师全力以赴开展研究时的情景，他说：“梁先生的工作特点是计划性极强，一个题目来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计划，而且完全按计划执行。写《清式营造则例》，他一边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一边向老工匠学，学的过程就把图画出来，只二十几天就画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业，一大摞让我太吃惊了，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严格按计划执行，工

作效率非常高。”

在研究《工程做法则例》的过程中，梁思成对朱启钤多年来收集的数十本工程则例抄本，以及师徒相传的口诀，进行系统学习和整理。这些形式不一的则例抄本和口诀看似杂乱无章，不成文法，实际上却包含了多少代工匠的建造心得和体会，是各代师徒薪火相传的课本，其中既有正文、口诀，也有简算法，有些则是从样房算房流传出来的做法秘本或是工部书吏从档房中私下抄录、夹带出来的《内工则例》。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则有大木作、小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油作、画作、裱作、内里装修作、漆作、佛作、陈设作、木料价格、杂项价格、材料重量、人工估算等，类似于近代的“工程定额”“预算表”“材料做法表”等。民国之后，这些抄本逐渐流散。朱启钤很早就认识到这些小册子的价值，他指出：“此种手抄小册，乃真有工程做法之价值。彼工部官书，注重则例，于做法二字似有名不符实之嫌。……盖学者但知形下与形上分涂，一切钱物，鄙为不屑。迁流所极，乃至营建结构之原则，算经致用之法程，竟亦熟视无睹。……自此种抄本小册之发见，始憬然工部官书标题之中做法二字，近于衍文。”（《营造算例印行缘起》）经过长期收集，朱启钤共积累了几十本，并将其统一定名为《营造算例》。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相比，《营造算例》虽然内容驳杂，但更接近工程实践，易于理解，对它的研究实际上为进一步研究《工程做法则例》打下了必要的基础。经梁思成研究和整理，1931 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一、二、三期陆续发表了《营造算例》。1932 年，梁思成重新校读《营造算例》，以单行本出版。1934 年，在对内容进一步修订之后，《营造算例》作为《清式营造则例》的姊妹篇得以再版。

《清式营造则例》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学术著作，在近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这部被梁思成称作“纯粹限于清代营造的则例”的著作的价值，林徽因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论”里作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阐述，她说：“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

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一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评价则更为坦率，他们认为：“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学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清式营造则例》的出版为梁思成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他并未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相反，首战告捷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他时刻在告诉自己：真正的目标是攻克李诫的《营造法式》，撰写出一部出色的《中国建筑史》。为此，他必须加快研究的步伐。单纯的理论研究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他认为实地考察现存的古建筑，发现其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对于建筑史研究是必要和必须的过程。“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梁思成全集》第一卷，161 页）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调查。

今天我们翻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照片，很难觅到花前月下、品茗观景的悠闲场面，相反有很多他们在专心测量古建筑时的工作照，以及他们或步行、或坐在破旧的牛车上行进在颠簸曲折的乡间土路上时不经意拍下的照片。现代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在当时的中国开展野外建筑调查的艰辛。坦率地讲，这种艰辛不仅包括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闭塞等造成的种种困难，更有因社会处于混乱状态而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梁思成夫妇的好朋友费慰梅曾和他们有过一次在山西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她的一段描述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困难状况：“当时的知识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传统鸿沟依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到城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从乡下把农产品送到集市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且满布带有传

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供应可口的饭食，至于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这就很难说了。20年代和30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有时还会碰到土匪抢劫。”（《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76页）对于当时社会治安的混乱，还有一件事极具代表性。1932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当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蓟县县城后，他立即打电话给还在北京家里焦急地等待消息的徽因，告诉她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资料的严重匮乏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甚至找不到一份古建筑的简单介绍，哪怕是只言片语，中国大地上尚存的古建筑瑰宝只是存在于他们的充满热情的想象中。至于这些古建筑在哪里？现状如何？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量的历经战乱而幸存的古建筑此时正散落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广袤土地上，就象一朵朵在驿外断桥边悄悄开放的寂寞的寒梅，如此的美丽，却又如此的寂寞。梁思成决定开展古建筑调查的最初线索来源便有力地说明这一问题，说起来，还带有一点幽默的成分。梁思成是受一首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儿歌的启发——“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随即决定前往这些地方开展调查。

梁思成正准备前往河北正定之际，一个不经意间得到的信息改变了他的行程。一天，他的好朋友杨廷宝突然兴冲冲地来找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自己的一个最新发现——一幅与众不同的古建筑照片，这恰恰是梁思成朝思暮想的。杨廷宝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一次我刚好去北京鼓楼，现在是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古怪的寺庙的照片。图片下面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76页）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照片里的建筑果然如杨廷宝所描述的样子，其独特的造型浸透着历史的深邃。梁思成敏感地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就在看到独乐寺照片的一瞬间，梁思成几乎不假思索地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决定首先前往蓟县。

蓟县是北方重镇，位于北京东面约90公里的盘山之麓，汉属渔阳郡，

唐开元间，始置蓟州，自古以来为军事重镇。当时的蓟县是一座极度闭塞的山区小城，独乐寺保存有两座古建筑，一是前面的山门，二是观音阁。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两层实际三层的木结构建筑，"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上下两层之间还有一个暗层，从外面看不见。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独乐寺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因此虽然屡经战乱，但始终得以完全保存。1932年4月的一天，梁思成带着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和两位学社同事一起前往蓟县。对于自己的首次野外考察，梁思成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那辆在美国大概早就被当成废铁卖掉了的老破车，可它还在北京和那座小城之间定期地——或不如说是无定时地——行驶。出了北京城东门几英里，我们来到箭竿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但是两岸之间的细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在借助渡船渡过河水后，这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中寸步难移。我们这些乘客得帮忙把这老古董一直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在别的难走的地方，我们还得多次下车。为了这50英里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独乐寺观音阁高耸于城墙之上，老远就可以看到。从远处，人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座如此古老的、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殿宇。"（《困惑的大匠·梁思成》，36—37页）梁思达的回忆则印证了旅途的艰辛，他说："从北京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还得大家下车推车。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节了。就这样一批'土地爷'下车了，还得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一家地处独乐寺对门的小店，就成了我们的'驻地'。"（《困惑的大匠·梁思成》，36页）

作为一名建筑史家，梁思成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幸运在于他从事古建筑调查竟然借助一个偶然得到的线索而拥有辉煌的开端；他的

不幸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贫瘠、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无法给他提供迅捷有效的条件去尽情探索那些他一生挚爱的古建筑。

蓟县之行的收获之大令梁思成欣喜若狂。经考证，观音阁和山门都是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所建，距1932年已有948年之久。“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梁思成全集》（第一卷），162页）调查的结果为梁思成打开了了解宋代建筑的大门。他仔细地比较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和《营造法式》中所列的尺寸，这种直观的比较澄清了《营造法式》中一些曾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内容晦涩的段落。

回到北京后，梁思成将蓟县之行的收获写成长达数万言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该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调查报告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震惊。不仅因为独乐寺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而且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分析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内容严谨，文笔生动，梁思成的治学风格初见端倪。傅熹年的一段评述颇具代表性，他指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反映了他通过精密测绘并与《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此后，日本人就不再提由他们代劳测绘研究中国古建筑实例的事了。”（傅熹年《一代宗师，垂范后学》，《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12页）

成功的开端给了梁思成以无穷的信心和激励，再也没人能够阻挡住他对古建筑的追寻之旅，至于工作环境的极度艰辛，在他的眼里已变得微不足道。在之后的数年里，他和妻子林徽因，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们，足迹几乎涉及整个华北地区，还包括西北、中南、华东的部分地区。随着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一个个散落四方的古建筑终于得到了重视和新的认识。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1932年调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1933年3月调查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及正定古建筑；1933年9月调查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等；1933年9月调查应县木塔、浑源县悬空寺；1933年11月，调查河北赵县赵州桥；1934年8月调查山西晋中地区十三县古建筑；1934年10月，调查浙江六县古建筑；1935年2月，考察曲阜孔庙建筑，并制定修葺计划；1936年春，调查龙门石窟及山东中部19个县古建筑；1936年冬，调查山西、陕西部分县市的古建筑；1937年6月，调查陕西、山西十余县市的古建筑。在野外调查的同时，梁思成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如《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和《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等。

每次外出考察，梁思成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精神令同行之人佩服不已。他的敬业精神和平易作风深深影响了周围的同事，他们在共同的志向激励下，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工作群体。莫宗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梁先生爬梁上柱的本事特大。他教会我们，一进殿堂三下二下就爬上去了，上去后就一边量一边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困惑的大匠·梁思成》，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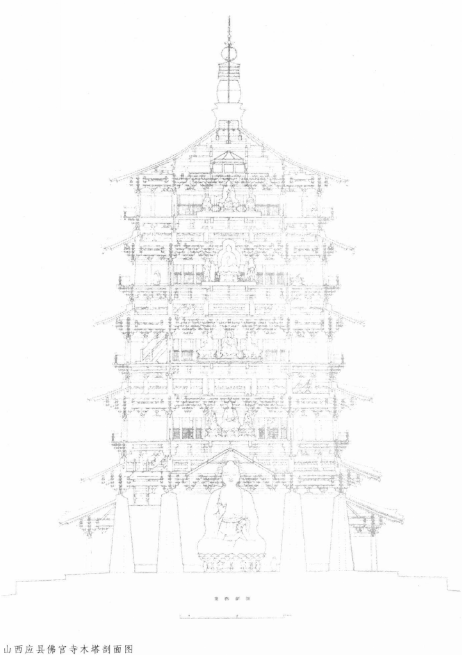
至于说调查中的各种困难险阻，早已成为梁思成和同事们的家常便饭。在山西大同考察，特别是在云冈石窟期间的遭遇颇有代表性。1933年9月，梁思成夫妇和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前往山西大同。原本以为大同是雁北重镇，生活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到了之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大同比他们想象中的落后得太多了，长途奔波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他们竟然找不到一个下榻之处，为数不多的几家鸡毛小店简直是脏乱至极。多亏了时任大同火车站站长的李景熙——梁思成留学美国时的同学，关键时刻慷慨相助，不仅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住宿，还出面请求大同地方当局帮助解决这些来自北京的建筑学家们的饮食问题。在大同市区，有老同学帮忙，食宿

问题总算得以解决。出了市区，境况可就不容乐观了。几天之后，梁思成等人来到大同郊区的云冈石窟，对石窟中表现出的建筑作系统的研究。空旷的山崖上，人迹罕至，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处只剩下几堵残垣断壁的废弃农舍。白天酷热难耐，夜晚则冰冷刺骨，几个人冻得夜不能寐。吃的更惨了，他们费尽周折，也只能买到一些土豆和玉米面，连咸菜都是难得的佳肴。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能吓倒他们，相反，他们完全沉浸在云冈石窟那伟大的艺术成就中，流连忘返，三天之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去。当地农民对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有悖常理、几近癫狂的行为大惑不解，以至于一度将他们视为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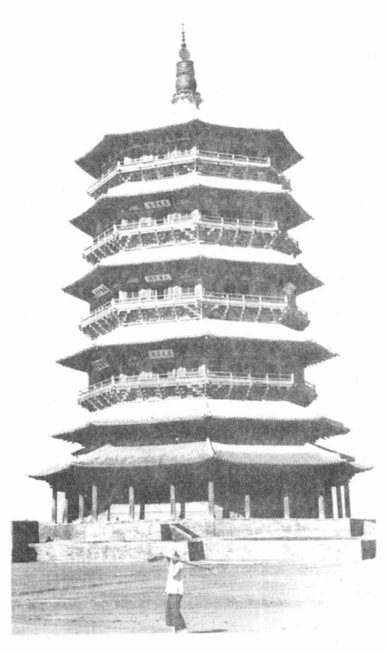
测绘应县佛宫寺木塔时的经历则是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应县佛宫寺木塔建于公元 1038 年，由地面到塔尖高 67 米。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层层叠上而建成的。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塔，也是最大的一座木塔。早在进行古建筑考察实践之初，梁思成就对应县木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 1933 年，初步确定秋天去山西大同考察的计划之后，应县木塔便成了梁思成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林徽因对此感受颇深，她说："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梁思成全集》第一卷，316 页）大同附近的古建筑调查任务结束后，梁思成未作丝毫休整，便带领学社成员奔赴应县，早晨七点出发，一直颠簸到晚上八点，才迤逦来到应县县城，远远地望见暮色中那高大巍峨的木塔。可以说，他几乎是以一种朝圣者的虔诚态度瞻仰着渐渐和夜幕融为一体的塔身以及塔顶那盏永不熄灭的万年灯。在给林徽因的信中，梁思成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动，他告诉徽因："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

倒！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瞠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士能忘情时那句‘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我时常还听得见。”“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梁思成全集》第一卷，317页）

兴奋之余，梁思成立即带领莫宗江等学社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测绘工作。拍照片，量平面、斗拱和断面，再到测量各檐高度和塔刹，梁思成他们几乎完全沉浸在这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之中。莫宗江回忆说：“我们把塔身全部构件都测量完了后，余下的就是塔刹的尺寸了。但是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九百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的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下来。”（《困惑的大匠·梁思成》，49—50页）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使他们甚至暂时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以至于命悬一线的情况突然发生时，还丝毫没有感觉恐惧，或是害怕。危险发生在测绘的最后环节，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莫宗江当时正在塔顶上拍照，想把高大的铸铁塔刹收入取景框，但角度总是感觉不太合适，于是他趴在塔脊上慢慢后退，不知不觉间两只脚居然退到了塔顶的檐口，猛然间回头看时，竟然没了退路。梁思成呢，经历更可怕，看看他的回忆，“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专心致志地在塔尖测量和拍摄，未曾注意头顶的云层迅速地合拢了。随即一声惊雷突然在身边爆响。我大吃一惊，险些在高出地面二百英尺的上空松开手中冰冷的铁链”。（《梁思成全集》第三卷，352页）当他们匆忙间从高空下来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急着爬下，则见实测记录册子已被吹开，有一页已飞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剖面图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

到栏杆上了。若再迟半秒钟，则十天的功作有全部损失的危险。我们追回那一页后，急步下楼——约五分钟——到了楼下，却已有一线骄阳、由蓝天云隙里射出，风雨雷电已全签了停战协定了。我抬头看塔仍然存在，庆祝它又避过了一次雷打的危险，在急流成渠的街道上回到住处去。”（《梁思成全集》第一卷，318页）

1932年6月的宝坻之行虽然无险难经历，但雨打风吹，艰辛之处，确也别有一番滋味。宝坻之行的想法源自在蓟县时得到的一个信息。在蓟县乡村师范学校，对古建筑颇感兴趣的王慕如老师告诉梁思成，在他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有一座西大寺，又名广济寺，结构与梁所说的独乐寺诸点约略相符，大概也是辽金遗物。蓟县虽然地处偏僻，但净美可人，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毗邻的宝坻县城，想必景致也不会太差吧。带着这种想法，梁思成来到宝坻县城，考察位于县城西门内西大街上的广济寺。等进了宝坻县城，梁思成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宝坻县城只有几条尘土飞扬的街道，光溜溜没有半点树影。住宿的客栈满是苍蝇，窗外即是喂牲口的地方。满大街、甚至整个县城都弥漫着咸鱼的臭味，因为南大街是重要的咸鱼交易市场。环境虽然恶劣，但对广济寺的考察还是收获颇丰的，多少抵消了些许恶劣环境造成的烦躁心情。在广济寺三大士殿，梁思成不仅考证出大殿建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是处地道的辽代建筑，而且在无意间，梁思成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古建筑建造实例，那就是《营造法式》里所称的“彻上露明造”。原来三大士殿的顶部没有天花板，在殿内抬头看上面的梁架，就像看一张X光线照片，内部的骨干，一目了然，其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见到过。紧张工作了4天，梁思成等人顺利地完成了测绘任务。可没想到100余公里的返程却是一波三折，在风雨中他们足足折腾了16个小时，才得以到达北京城。在此次考察所撰写的《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一文中，梁思成详细记载了这段曲折的返京之旅。

十七日清晨三点，我们在黑暗中由宝坻出南门，向河西坞出发。一只老骡，拉着笨重的轿车，和车里充满了希望的我们，向

"光明"的路上走。出城不久，天渐放明，到香河县时太阳已经很高了。十点到河西坞；听说北上车已经过去。于是等南下车，满拟到天津或杨村换北宁车北返，但是来了两辆，都已挤得人满为患，我们当天到平的计划，好像是已被那老骡破坏无遗了。

当时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河西坞过夜，等候第二天的汽车，一个是到最近的北宁路站等火车，打听到最近的车站是落垡，相距四十八里，我们下了决心，换一辆轿车，加一匹驴向落垡前进。

下午一点半，到武清县城，沿城外墙根过去。一阵大风，一片乌云，过了武清不远，我们便走进蒙蒙的小雨里。越走雨越大，终了是倾盆而下。在一片大平原里，隔几里才见一个村落，我们既是赶车，走过也不能暂避。三时半，居然赶到落垡车站。那时骑驴的仆人已经湿透，雨却也停了。在车站上我们冷得发抖，等到四时二十分，时刻表定作三时四十分的慢车才到。上车之后，竟像已经回到家里一样的舒服。七点过车到北平前门，那更是超过希望的幸运。（《梁思成全集》第一卷，258页）

在对古建筑和《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梁思成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他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极有特色，且距离现代不算太久，应该有少许的木框架建筑存在，于是，寻找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他从事野外考察的最大梦想。"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在中国，古建筑的敌人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形之下，古建筑之得幸免者，能有几何"？（《梁思成全集》第一卷，161页）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几乎考察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古老

的建筑仍然是蓟县独乐寺，难道中国境内就没有一座唐代的木框架建筑吗？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框架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梁思成却从未放弃自己追寻唐代木框架建筑的信念，直觉清晰地告诉他：中国一定还存在唐代木框架建筑。

前文曾经谈到过，30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时局的动荡使得梁思成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展开了同时间的赛跑，连续外出调查，试图尽快把华北、中原地区的古建筑全部调查完毕。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中的很大一部分会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这种民族的使命感激荡在他们的心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又何尝不是保卫家园的英勇战士呢？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收录的61号洞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的一座地处台外的寺庙——佛光寺引起了梁思成的浓厚兴趣，这座地处偏僻的古老寺庙会不会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呢？尽管之前，屡屡满怀希望去考察某个古建筑，又总是失望而归，但梁思成始终没有灰心，对地处偏僻的佛光寺仍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937年6月，梁思成夫妇和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奔向山西，目标就是五台山区的佛光寺。此时的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次外出竟然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北部中国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一个月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旋即沦陷，他们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他们更未意识到，几年来学社成员们孜孜不倦地开展的古建筑调查工作最终登上了辉煌的顶峰，他们终于找到了心中的古建筑圣殿——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寺庙。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这无疑是辛苦付出后最慷慨、最高级别的回报，任何褒奖在这一伟大发现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正如书上记载的，位于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的山中的佛光真容禅寺非常偏僻，梁思成等人费尽周折，才到达那里。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每座山峰的顶部都有一块较平坦的台地，于是有了东、西、南、北、中台之称。五峰中间的盆地，有一个名为台怀的古镇，五峰以内叫“台内”，五峰以外称“台外”。台怀是五台山区的中心，是一处极为重要的

“文殊菩萨道场”，自古名刹林立，香火旺盛。但由于庙宇修缮频繁，古寺原有结构保存无几，民国初年已很少能看到明清之前的建筑。台外则大为不同，由于分散偏僻，交通不便，香客、游人罕至，以至于香火冷落，僧人普遍比较清贫，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余钱去整修寺院，一些古老的寺院建筑就这样被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事情有时就是这么耐人寻味，古建筑的保护离不开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可在很多时候却又是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成反比，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古建筑本身越能保持自身风貌，而免去外界无知的改造或是开发。这种情况在台外地区表现得尤为充分。

从看到佛光寺大殿的一刹那起，梁思成就惊呆了。寺庙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有20余株古松，大殿高大雄伟，那巨大、坚固、造型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的久远，其建筑的一招一式，处处体现着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大殿内的雕塑更是典型的晚唐时期作品。梁思成感觉自己的心激动得几乎无法控制了，长期的古建筑研究实践形成的直觉正在清醒地告诉他，面前的这座寺庙肯定建于唐代。直觉毕竟不是确凿的证据，接下来，梁思成等人开始对寺庙的建筑作全面的调查，试图找到直接的证据能证明建造年代。毫无疑问，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的，他们不仅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作品，而且发现了建筑时间的原始记录——佛光寺约建成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比在此之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还要早127年，是一座典型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堪称独一无二的民族瑰宝。佛光寺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的建筑学界，成为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领域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虽然发现佛光寺这座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令他们兴奋不已，但整个调查测绘工作却是困难重重。在大殿的天花板上的“阁楼”里，他们便遭遇到了数以百万计的臭虫和无数只的蝙蝠。梁思成这样记载当时的经历，“上千蝙蝠丛生于脊桁四周，如同厚敷其上的一层鱼子酱，竟至于无法看见上面可能标明的年代。蝙蝠身上寄生的臭虫数以百万计，于木料上大量孳生着。我们立足的平暗（即天花板）上面厚积微尘，也许历几个世纪方积淀至此，其上到处点缀着小小的蝙蝠尸体。我们的口鼻上蒙着厚面罩，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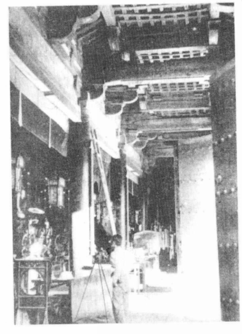
透不过气，在一片漆黑与恶臭之间，借手电光进行着测绘和拍摄。几个小时以后，当我们钻出檐下呼吸新鲜空气时，发现无数臭虫钻进了留置平暗上的睡袋及睡袋内的笔记本里。我们也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刻最感快慰。不出所料，队中同人均对身体的苦楚一笑了之。”（《梁思成全集》第三卷，357 页）佛光寺年代的确认也颇有些戏剧性。在寺里连续三四天的清理、测量之后，梁思成等人始终未找到关于建寺年代的最直接的文字记载，尽管斗拱、梁架、藻井以及屋顶架构使用的双“主椽”的构件均已明白无误地显示着晚唐建筑的特征。或许真的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一直在大殿内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不经意间的一瞥，竟然感觉离地两丈多高的一根大梁的底部隐约有墨迹显露。梁思成等人闻讯连忙过来，瞪大眼睛往上看，可灰尘太厚，字迹又太模糊，看了半天，也无法确认是否为字迹。关键时刻，又是林徽因，冥冥之中似有天助，“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为验证自己的发现，林徽因详细查看了此前在阶前石幢上发现的文字。幢上竟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此名为“佛殿主”，位列诸尼之前。石幢上刻写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 年。经过紧张的搭架施工，梁思成等人得以近距离地查阅梁底的文字，前后又花了三天时间，他们终于读完并记录了题字的原文，并最终确认佛光寺的建造时间就是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在那一刻，梁思成突然意识到，此前在大殿的平台左端见到的一尊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唐代女子坐像，应该就是这位名叫宁公遇的女子，这座大殿真正的施主，而看寺的老僧人关于这座雕像是大唐篡位的武则天像的说法显然是误传。这座令他们苦苦追寻数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居然是一位女子捐建的，而且，远离尘嚣一千多年之后，居然又被一名女建筑学家最先发现并破读，是巧合？是天分？还是缘分？连对妻子才华一向极为钦佩的梁思成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后来发表的《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还一再说：“她，一位女性，第一个发现这座最珍贵的中国古刹是由一位女性捐建的，这似乎太不可能是个巧合。”（《梁思成全集》第三卷，359 页）

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梁思成夫妇和他的同事们沉浸在无比愉悦之中。在他们的心目中，直到确定佛光寺是唐代建筑的那一时刻，博大精

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大殿

MAIN HALL OF FO-KUANG SSU · WU-TAI SHAN · SHANSI

佛光寺大殿绘测图



梁思成在佛光寺大殿



林徽因与佛殿主宁公遇

深、辉煌璀璨的中国古建筑圣殿的大门才完全向他们展开，令人陶醉，令人痴迷。无论梁思成，抑或今天的我们，都不是宿命论者，发现佛光寺，虽然不乏偶然和幸运的成分，但这又何尝不是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多年来风餐露宿、孜孜以求的成果呢？

佛光寺的发现将梁思成夫妇的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工作激情。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国半壁山河顷刻间落入日寇之手。和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梁思成夫妇几乎未假思索便舍弃家产，扶老携幼，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他们多年来苦苦经营的华北地区古建筑调查与保护事业在最辉煌的刹那间突然结束了，留给人们的则是无限的慨叹和遗憾。而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开展的文物建筑普查中，居然意外地发现，在五台山区，离佛光寺不算太远的东冶镇李家庄，还有一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虽然规模小于佛光寺，但建寺时间却早于佛光寺 75 年，建于大唐建中三年，即公元 782 年。其实，1937 年 6 月梁思成一行前往佛光寺调查的时候，就曾经到过东冶镇，他们正是在这里下了汽车，然后换乘驮骡，赶赴豆村的。但日本人的侵略，使他们失去了亲自去发现这一古建筑瑰宝的机会。多年以后，梁思成的一位学生张锦秋记载了自己在南禅寺的感受，她这样写道：“南禅寺大殿果然名不虚传，它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建于公元 782 年（唐建中三年）。虽然只是个三开间的殿宇，但造型端丽，结构简洁，是典型的唐式建筑。平缓的屋顶、深远的挑檐、舒展微翘的翼角、简明受力的斗拱，侧角的木柱、升起的梁枋、高昂的鸱尾、两端升起的叠瓦屋脊、叉手、直棂窗……我们这一伙就像小学生认字一样，逐一识别。以前从书本上学得的抽象概念一一得到印证，我简直心花怒放。唐代建筑如此洒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建筑史的研究上，更突出表现在他对于中国古建筑保护的真知灼见以及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古建筑保护实践上。每一次外出调查之后，梁思成都要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的古建筑保护意见和长远保护计划，大力宣传古建筑保护的意义和紧迫性，同时积极参与重要古建筑的维修工作。从 1931 年到 1937 年，

梁思成先后主持和参与的古建筑维修工作有：1932年拟定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内城东南角楼修葺计划、故宫南董殿维修计划；1934年拟定景山万春、缉芳、周赏、观秋、富览五亭修葺计划，并为蓟县独乐寺和应县佛宫寺木塔拟定修葺计划，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1935年2月，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1936年拟定赵县大石桥修葺计划；1937年5月，应邀到西安作小雁塔的维修计划。抗战后期，梁思成还专门编撰了一个全国文物古迹的名单，并托人送了一份给周恩来。

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等文章中，梁思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古建筑保护思想。在他眼中，历经沧桑的古建筑不仅仅凝聚着历史的美与厚重，更成为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而保护这些活的历史，则应以"保护现状"为"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梁思成全集》第三卷，1—107页）

在古建筑保护方面，梁思成尤其强调人的因素。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保护为例，他指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而从速制定和实行古建筑保护法，以政府法律作为古建筑保护的后盾，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样是"绝不可少者"。（《梁思成全集》第一卷，1221页）只有解决了观念的问题，再有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古建筑专家来主持修葺和保护工作，古建筑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对于不尊重历史，随意修缮古建筑，甚至是推倒重建的行为，梁思成深恶痛绝，将其视为古建筑的大敌。他批评传统的修葺方法"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敝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梁思成全集》第三卷，1—10页）对于清光绪二十六年重修的六和塔，梁思成尖锐地指出"竟是个里外不符的虚伪品，尤其委屈冤枉的是内部雄伟的形制，为光绪年间无智识的重修所蒙蔽"。（《梁思成全集》第二卷，357页）类似的批评还有很多。

对于古建筑维护，梁思成主张在尊重历史和保持建筑物原状的前提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在制定修葺计划之前，要首先弄清楚建筑物的年代，“须知道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然后再使用“今日我们所有对于力学及新材料的智识”，“尽量的用新方法新材料……以补救旧材料古方法之不足；但是我们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让这些东西改换了各殿宇原来的外形”。（《梁思成全集》第三卷，1—107 页）在《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一文中，他也多次论述了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提出可以在塔顶安装信号灯，夜间导航，恢复宋代“海船夜泊者，以塔灯为指南”的历史旧貌。（《梁思成全集》第二卷，307 页）

30 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理论研究上也取得重要突破，尤其在建筑审美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建筑意”概念的提出。1932 年夏天，他们去京郊的卧佛寺、八大处等地考察古建筑，感触颇深。求学以来，在他们心底不断闪动的建筑学理念逐渐在实际的工作中汇集起来，慢慢的，就像涓涓溪水奔流而出，终于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对建筑学的理解，这就是他们合作提出的“建筑意”思想。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深深地融入到对古建筑的研究中，他们认为古建筑的“美”不只是诗情画意，而且还有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在他们的眼中，那些古老、沧桑的建筑物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他们不仅饱含诗情画意，那“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人们从中可尽享无穷的美感；而且它们所蕴涵的浓浓的历史凝重感给人们打开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子，指引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天地，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国人渐渐忽略的。

考察归来，林徽因和梁思成合作完成了《平郊建筑杂录》，集中阐述了他们的“建筑意”思想。在这引述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

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甚么叫做“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含义或解释来。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梁思成全集》第一卷，293页）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建筑审美观而言，“建筑意”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或巍峨高大，或精巧玲珑，或金碧辉煌，或残缺不全的建筑不仅是一幅幅魅力无穷的历史画卷，更是过去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那随处可见的沧桑与厚重不正是历史的记录吗？

## 四、最后的野外考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地区旋即沦陷。梁思成、刘敦桢等部分学社骨干不得不暂时中止已步入巅峰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舍弃家产，扶老携幼，开始了艰苦的流亡生涯。其间的危险与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梁思成仍然没有放弃对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并团结其他学社同仁，苦苦支撑局面，一有机会，他就会继续自己心爱的工作。

梁思成全家是9月5日清晨离开北京的。他们先是在天津的家里作短暂停留，之后，便从塘沽乘海轮南下，9月28日抵达青岛。未及休整，便又踏上南下的火车，一路辗转，于10月14日到达长沙。林徽因曾经向友人谈及这一个多月的旅程，她说：“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6页）随着大批文化机构陆续迁至长沙，他们的很多老朋友也来到这里。生活水平虽然下降了很多，住房也非常简陋，但多少还是有了一点慰藉。生性乐观的他们甚至一度还经常找旧日的“星期六朋友”串门，聚餐聊天。

但日本人是不会给无辜的中国百姓以片刻的安宁的。随着日本侵华战事的全面展开，日军的飞机开始频繁地光顾长沙，并将炮弹直接投向城里的平民百姓。梁思成全家曾数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林徽因后来写信告诉好友费慰梅，“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

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64—365 页）

既然长沙连最起码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索性继续往西南流亡。12 月 8 日，梁思成夫妇告别众多朋友，带领全家再次踏上旅途，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南边陲的昆明。后来，他们才发现，他们家是从北京南迁到长沙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动身去昆明的一户。梁思成夫妇可能对此次长途跋涉作了很多准备，并做好了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毕竟从北京辗转来到长沙的第一次流亡之旅已让他们饱受折磨，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次奔向昆明的流亡简直就是一次地狱之行，几乎每时每刻，他们都在向生命极限挑战，游走于生死边缘。8 岁的女儿再冰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旅途的艰辛给她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从长沙经贵阳到昆明的旅程是我们这次长途跋涉中最艰苦的一段，因为当时是坐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走山路。湘黔一带都是高山峻岭，汽车盘旋而上，颠簸很厉害，外婆、妈妈、我和弟弟都晕车，特别是外婆，上车就吐，如患重病。晚上车停在小县城路边，下车后旅客纷纷去抢旅馆。这时，爹爹和妈妈就飞奔着去找住宿的地方，让我和弟弟扶着外婆坐在行李卷上看守我们的行

李。到了旅馆里床铺不够，就把我们自带的“行军床”支起来（那时的行军床是用木头和帆布做的，比较笨重），第二天早上再收起来。

……很不幸的是，妈妈在湖南和贵州交界处的晃县（现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得了肺炎。那时还没有抗生素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曾在日本行医的女医生兼通中西医药，她为妈妈听诊后开了中药方，妈妈服用后缓慢退烧，两周后烧才退尽。这两个礼拜我们就住在这个木板搭的小旅馆中。我们住在楼上，楼下常有过路司机和其他旅客喧闹，同年轻的女老板吵架。妈妈在病中仍用她的耳朵细心听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用一种作家的心态感受着这小小县城中沸腾的生活。

旅途中不仅有疾病的折磨，意外事件的频发和环境的极端恶劣更是让这一家人随时处于危险和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好在每当极度困难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总会在最后一刻出现一丝转机，帮助他们暂时摆脱难关。下面这两件事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实经历。

妈妈退烧后的次日我们就上路了。我们半夜就上车等候启程，妈妈抱着弟弟坐在车的前排，一坐就是一天。没想到这车竟在傍晚时在荒山野岭中抛锚了。最后发现汽油已用尽。但附近既无村，又无店，路过的农民都说至少“要再走五里”才能见到村落。到哪里去找住处呢？当夜色渐渐袭来时，乘客们都绝望了。这时已是1937年12月份，山中极冷，妈妈拉着我和小弟的手来回地走，想暖一暖冻僵的身子。后来一些乘客无意识地推着车往前走，走着走着路边竟然突然出现了一个村庄，主人对这一车乘客还颇热情，打来热水给大家洗脚。于是我们又过了一劫。……

在我们抵达晃县的当晚，爹爹和已开始发烧的妈妈急于找到一间旅馆，但发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他们正在着急时，忽然听到有一间旅馆的楼上传出优美的小提琴声。他们被这动人的琴

> 声所吸引，忍不住上楼去看。原来是一批广东小伙子住在这里，拉琴者是其中之一。听到广东话，爹爹就用家乡话同他们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都是空军航校的学生，也是去昆明的。当他们得知我们全家老小无处安身时，立即表示可以挤出一间房间给我们。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当晚就住进了这家旅馆。（《建筑师林徽因》，59—60页）

历尽了千辛万苦的39天，1938年1月中旬，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第二次流亡的目的地——昆明。刚刚把家安顿好，梁思成就病倒了。过度的劳累使他的背脊椎关节炎症复发，一病就近半年。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便为两件事奔波忙碌起来。一是和林徽因一起受聘担任西南联大的校舍顾问，并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二是积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对于两名优秀的建筑学家来说，设计大学校舍可以说是件小儿科的事情，毋须花费太多的精力。但这一次，梁思成夫妇却遇到了空前的考验，以至于平日里一向斯文儒雅的梁思成怒气冲冲地冲着自己敬爱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一通大吼。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建造如此现代化的校舍。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他们把最后一稿设计方案交出时，竟被告之，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的屋顶可以使用铁皮外，其他建筑物一律以茅草覆顶，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校舍最终都要建成茅草屋。不仅如此，土坯墙也得改为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也必须再次削减。校方希望梁思成按照他们的要求再对设计方案做一次修改。闻听此言，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梁思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直接闯进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不顾一切地大声质问自己的恩师："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在激愤的情绪爆发的同时，梁思成突然意识到，站在面前的恩师是那么的无奈和无助，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家，难道

他不希望建设现代化的校舍吗？难道他愿意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建设成茅草屋大学吗？当然不是，国难当头，全民抗战，学校能够维持运行已属万幸，哪里有多余的经费从事基本建设！或许是体会到恩师的苦衷，梁思成继而又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茅草房？一个普通农民都能做，还请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梅贻琦先生虽满怀伤感，但仍坚毅而诚恳地说："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原谅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造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算是对今天的补偿，好吗?"此情此景，令梁思成不禁泪流满面。

后来，新校舍很快按照梁思成夫妇的设计方案建起来了。梅贻琦先生虽肩负校务重任，但仍坚持住在简易的房屋里。他曾在日记中记述了居住的感受："屋中瓦顶未加承尘（设备），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逢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昆明期间，梁思成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成功地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活动。梁思成到了昆明不久，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成员也先后来到这里。在梁思成的积极奔走下，不仅成功地获得中美庚款基金董事会的资助，而且与避难于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丰富的藏书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的文献资料。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很快就成立起来，并随即开始了对西南地区古建筑的全面调查。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的行为似乎令人无法理喻：天上敌机轰炸不断，朝不保夕；收入微薄，几近食不果腹，居然还有心情去四处调查古建筑？这就是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的人格与精神的真实体现。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的行动无可辩驳地告诉世人：发掘和保护中国古建筑瑰宝这一伟大事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生命的价值。

这一时期中国营造学社的野外古建筑调查主要有三次：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对昆明市及其近郊的古建筑调查，梁思成因病重未能参加；1938

年11月赴安宁、楚雄、镇南、下关、大理一线进行古建筑调查；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对川康地区的古建筑调查。其中，第三次野外考察，即川康之行最为重要。

从1939年秋天开始，梁思成率领学社的同事们开始川康之行。他们先考察了成都的古建筑，之后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足迹遍及川康地区。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交通极不便利，他们的行程中，从最新的美式军用卡车，到足可以进老爷车博物馆的旧客车，再到竹筏、滑竿，几乎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都尝试了。实在无车可坐，或是无路可行的时候，只好翻山越岭，徒步前进。从成都到灌县，他们有幸乘车而去，免去了一些行路的辛苦。可下车之后，几个人全身都是焦油味，都几乎要被熏倒了。原来，抗战期间油料极度紧张，很多民用汽车不得不改用木炭作燃料，汽车就像头未吃饱饭的老牛，哼哼唧唧地缓慢行进，车厢都充斥着刺鼻的焦油味，乍一闻，能把人熏一个跟头。后来梁思成、陈明达二人好不容易结束乐山的考察，可以回成都会合了，又搭不上去成都的车，据说是交通问题影响了正常的通车。没办法，为了不让学社其他同仁着急，他们索性雇了两辆人力车，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总算回到了成都。当然，也有很幸运和很“惬意”的时候。说幸运，是有时在路上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于是就向过往的车辆频频挥手，希望能搭上顺风车。还真有少数空载的军车会停下来，热情地招呼他们上车。坐上全新的美式军用卡车，和一帮大兵天南海北地侃一通，不知不觉间就到达目的地了。说“惬意”，则有其表，而无其里。四川山多，道路高低起伏，蜿蜒曲折，滑竿是一种常见的交通工作。坐在上面，随着轿夫的行进而上下颠簸，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但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坐一会儿挺美，坐的时间长了，双脚就不听使唤了。尤其是他们考察的时候，正值秋冬季节，气温低且不说，一路上阴雨连绵，冰冷刺骨。坐在滑竿上，脚都冻麻、甚至冻僵了，“惬意”则成了“怯意”。

自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以来，梁思成等人的野外调查重点一直在华北地区，对这一带的气候、地理、景观，乃至人文状况，他们都相当熟悉，也积累了丰富的野外工作和生存经验。大西南则是他们极少涉足的地区，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北方差别极大，开展野外调查自然面临着诸多新的考验。川康一带山高林密，稍不留神就会迷路，指南针成了出行的必备之物。云南的疟疾非常可怕，防蚊就成了首要的工作，否则不仅工作难以进行，生命都会受到威胁。林洙根据梁思成的回忆讲述了很多他们的经历和见闻："四川的跳蚤多得惊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大盆水来，脱了鞋袜站在水盆中央，然后抖动衣裤，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水面上浮着一层跳蚤。云南、四川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封建势力还很强大，30 年代买卖人口还是常见的，而且有普遍的吸毒现象。在华北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才吸毒，在西南地区却有相当一部分贫苦的劳动者也吸毒。他们在旅途中常常看到种植罂粟花的大片土地。那些脚夫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白天卖了一天苦力，晚上往往就把当天的收入买了鸦片，在街头找个角落一躺，蒙上毡斗篷，躲在里面吸，看了真就叫人心酸。"（《梁思成、林徽因与我》，136 页）

由于战乱、气候等原因，四川之行并未发现更多的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尤其是木框架结构的建筑，但这里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是让学社的成员们大开眼界，他们看到了大量的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四川境内所存的汉阙堪称全国之冠，粗略估算一下，其总数大概能占到全国汉阙总数的四分之三。崖墓的数量也很可观，岷江、嘉陵江两岸随处可见。而摩崖石刻，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因此，川康之行，他们考察的重点是汉阙、崖墓以及摩崖石刻。

在汉阙调查方面，既有大量的有铭文的汉阙，还有无数的无名阙。其中，保存较好且有着较高建筑价值的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和渠县冯焕阙。雅安高颐阙属于子母阙，下部有台基，台基上以条石数层垒砌，阙身表面隐起地栿枋柱。阙身以上施石五层，仿木建筑之出檐。上刻栌斗、角神、枋、蜀柱及栱。第四层上隐起人物禽兽，第五层刻檐下枋头。阙身上有四注顶，上面檐椽瓦陇仍保存一部分。阙上的柱枋斗拱皆有一定比例，斗拱的各部件均随枋的大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连带关系。就建筑结构而言，这可能即是宋代"材"的前身。另外，檐角的角神，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早出现的角神实物。而建于东汉延光年间的渠县冯焕阙，梁思成也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该阙“简洁秀拔，曼约寡俦，为汉阙中惟一逸品；而局部雕饰，以几何纹与斗栱人物参差配列，也属孤例。”（《梁思成全集》第三卷，219页）

在崖墓调查方面，梁思成等人不仅考察的数量多，包括彭山、乐山的白崖山崖墓，绵阳的白云洞崖墓，广元的杨家沟崖墓，彭山的王家陀、寨子山、江口镇后山崖墓等，他们都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对这种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石构建筑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他们的考察成果，特别是对彭山崖墓的研究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其文物价值始为学界所认识。1941年春季，在著名考古和人类学家李济的倡议下，经傅斯年、朱家骅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流落到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联合组成了川康古迹考察团，重点到彭山、乐山一带调查崖墓。当年和梁思成、刘敦桢一起开展川康地区古建筑调查的陈明达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全程参加了此次考古发掘活动。1941年底，川康古迹考察团满载重达20余吨的实物成果，浩浩荡荡返回李庄。这次在抗战期间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以其丰硕的成果赢得了两个“第一”：一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彭山崖墓进行的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调查发掘，二是抗战期间中国人组织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摩崖石刻是川康调查的另一个重点。在梁思成一行调查的诸多摩崖石刻中，有几处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位于乐山凌云寺的乐山大佛。经梁思成考证，这尊高71米、堪称海内第一的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初年，即公元713年，历经数代，到贞元19年，即公元803年方才竣工。“唐时饰以金碧，覆以层楼，号大像阁……明末毁于袁韬之乱。民国十四年，杨森部队炮轰像之面部，嗣虽墁补，神态迥异，亦我国佛教艺术之一重大损失也。”（《梁思成全集》第三卷，154页）二是位于乐山龙泓寺外朝北的山崖上的大小数十处佛龛。“虽规模非巨，而内容丰富，为川中不可多得之精品”，千手观音、孔雀名王、观经变相等更为中原石刻罕见之题材。就建筑雕刻而言，也是内容丰富，古意盎然，在佛像的“背部配列殿宇楼阁，表示西方极乐净土之庄严相……中央为殿堂二层，具平座，上覆四注顶。

左右掖刻经幢各一"，其两侧又有两座楼阁，这左、中、右三处楼阁"联以阁道，覆以廊屋，窈窕相通，而阁道皆弯形，如宋《营造法式》所载的圜桥子"。（《梁思成全集》第三卷，157页）其中的建筑细部如卧棱栏杆施卧棱及勾片栏版，屋顶鸱尾等形制比例逼真。这些建筑造型对于研究《营造法式》的小木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位于夹江千佛崖、大足的北山和宝顶山的摩崖石刻，也多为唐代作品，具有很高的建筑史料价值。

在历时半年的考察中，学社成员共调查了四川和当时的西康省的31个县、市，调查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约730处，从中筛选出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107项。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南方古文化的广阔世界中。川康调查也是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调查。

## 五、李庄往事

李庄，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西南古镇，位于宜宾市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江河口。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余。尽管建镇历史悠久，号称"长江上游第一古镇"，也曾是远近闻名的交通驿站和"米仓"，清康熙、乾隆年间繁荣一时。但近代以来，小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逐渐走向衰落，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1940年，鉴于日军对昆明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为保护所剩不多的文化教育机构和相关的文物、图书资料，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社会科学研究所从当年的10月开始，分期分批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与此同时，早已确定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也在积极进行

搬迁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并很快付诸实施。这是一场足以载入近代中国历史的文化大转移，它不仅使万余名优秀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安全和平静的生活环境，可以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和专业学习，并在极其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和教育成果；而且诸多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到来，也让这个普普通通的西南古镇一举成为大后方一个人才荟萃的文化中心，从此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为世界所知晓，当时的人们甚至可以以“中国李庄”作为对它的称呼。

在诸多迁入李庄的教育、科研单位中，无论同济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均为国字号，是按照国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到李庄的，但唯独中国营造学社例外，它只是一个民间的学术机构。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前文已经介绍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暂时解散，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社骨干相继流亡大西南。在昆明，经梁思成多方奔走努力，学社重新恢复，并先后开展了三次野外考察活动。虽然学社的工作得以恢复，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学社，那就是图书资料的极度匮乏，极大地制约着学社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初，学社在北京决定暂时解散的时候，绝大部分成员扶老携幼踏上流亡之旅，根本没有能力将图书资料带出，而多年积累的重要的图片资料虽打包存入天津租界中的一家英资银行，但 1939 年夏天也不幸毁于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没办法，只能凭借私人关系借书看。当时流亡昆明的教育、科研机构不少，但有图书的却同样寥寥无几。西南联大虽然声名显赫，且和梁思成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图书资料却少得可怜，不足为中国营造学社所用。究其原因，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南开因积极抗日，校园被日军轰炸，图书早已焚毁殆尽，只有清华抢运出部分图书和设备，但绝大部分在后来的日军轰炸中化为灰烬。真正有丰富藏书、并且保存完好的只剩下一家了，那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方便研究工作，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设法将先期运到重庆的 13 万册中外善本书籍寄运至昆明，并租下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作为图书馆。梁思成闻讯即与傅斯年协商，希望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和技术工具，以便开展学术研究。而素来“自负才气、不可一世，常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却对梁思成极为钦佩和尊重，他不仅

慷慨答应了梁思成的请求，给予中国营造学社以诸多方便，使中国营造学社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民一官两个学术机构从此成为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关系，而且在之后的抗战岁月中，想方设法给困境中的梁思成夫妇以帮助和支持，在学界传为佳话。

1940年秋，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计划一经确定，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也随即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选择。实话实说，尽管昆明的空袭越来越严重，但对于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并已着手开展古建筑调查与研究的梁思成夫妇来说，是不愿意再作一次长途迁徙的，更何况要去的地方还是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僻小镇。这种想法在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明显地流露出来，她告诉费正清夫妇：老金“先是说些不相干的事，然后便说到那最让人绝望的问题——即必须立即做出决定，教育部已命令我们迁出云南”。（《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73页）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抱怨说：“这次的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和认识十年的一群老友分离。我们将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而联合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打断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52页）

尽管不情愿，出于学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梁思成最终还是决定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移四川李庄。1940年11月29日，林徽因带领母亲和两个孩子，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乘上一辆带篷的卡车，开始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长途旅行。梁思成在临行之前脚趾受伤，必须马上治疗，不得不暂时留在昆明。虽然这次大转移的艰辛与惊险比不上从长沙来昆明的第二次逃亡，但同样是困难重重，辛苦异常。西南地区的冬季，阴冷潮湿，他们乘坐的卡车满载着30余人，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加上随身携带的行李，车厢里异常拥挤，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腿叉开坐在行李上，在颠簸的山路上苦熬时日。梁再冰的回忆或许可以帮助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旅途的艰辛与无奈。

> 根据我（十一岁）当时所记的一点日记，29日我上车离开昆明后因为晕车，就“倒在妈妈手上睡觉，有很多人都吐了。……后来困极就睡着了，醒来已到曲靖，在‘松花江旅馆’住下”。11月30日，我们从曲靖出发，当晚到达宣威，“住在‘中国旅行社’。小弟（从诫）发烧至39度多”，“半夜在床上听见小弟说胡话”。12月2日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宣威到威宁，“住在‘官商客寓’是个小店，很脏，老板抽鸦片烟”。
>
> 12月3日我们从威宁到达毕节，我至今仍记得沿途风景如画，但人烟稀少。在临近毕节城时竟看到背着狈的狼在离公路不远处奔跑。当时听同车的人说，晚上有狼在离我们的卡车（停在城门附近）不远处嗥叫，使留在车里看守行李的人很害怕。
>
> 在毕节，从诫继续发烧，妈妈带我到街上的中药店为他买了药，回来按当地土法在煮药时放进一个鸡蛋，然后用药浸过的鸡蛋为他揉搓额头，使他逐渐退了烧。……
>
> 12月9日我们准备坐上水船从泸州去宜宾。同一卡车来的各家先把行李捆好，请挑夫挑到江边，再用小划子将行李运到靠近轮船处，结果发现轮船入口太小，大件东西进不去。于是，刘伯伯和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小姐等人就押着行李绕道而行，刘伯母带着刘家兄妹们，妈妈带着我们坐在囤船上等待他们，直到天黑，我们才上船。这一天，大家都没吃晚饭，饿着肚子上了床。（《建筑师林徽因》，66页）

12月13日，苦熬了半个月、心力憔悴的林徽因终于带着家人到达了目的地——李庄。在旅途中照顾年迈的母亲和生病的孩子而激发出的超乎想象的顽强意志居然能够支撑着她没有病倒，可以说是个奇迹。但毫无疑问这种连健康人都无法忍受的艰苦跋涉对于身体极度孱弱的林徽因而言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到达李庄后不久，林徽因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能

恢复健康。正如梁再冰所说的，“舟车劳顿的辛苦和阴冷的天气终于使她早已透支的健康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安全而言，李庄对于梁家显然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平日里少了日军轰炸的威胁，生活、工作有了安全的保障。对此，林徽因感触颇多，她告诉费正清夫妇：“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尽管不时有敌机编队从小镇上空呼啸而过，飞至长江上游的宜宾、重庆等城市。但另一方面，李庄的气候却成了林徽因健康的第一杀手。冬季阴冷潮湿，夏季闷热多雨，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呛人的煤烟味常年弥漫在空气中，再加上秋冬季节频繁光顾的大雾，即便是当地人都会感到难以忍受，以至于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曾访问过李庄的费正清对这里的气候作了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说：“四川的地理环境，使这座小镇雨水多于阳光，常年累月下来就变得潮湿和肮脏，形成一股潮热和尿臭的气味，像云雾一样弥漫在小镇上空，甚而整个四川。”（《林徽因寻真》，253 页）这对于习惯了北方干燥气候，又患有肺结核病的林徽因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不仅是林徽因，同在李庄的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一代名媛沈性仁，以及梁思成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到李庄后不久，均相继病倒，而最主要的疾患便是肺结核。梁思永后来常年卧床，几乎不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英年早逝；沈性仁的病情则不断加重，后虽有机会赴兰州疗养，但还是未能挽救生命，1943 年离开人世。

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并不是主角，准确地讲，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附属而已。在办公和住宿地点的选择上，同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重要机构早已占得先机，所剩余房已寥寥无几。最终，学社来到了离李庄镇约两华里的上坝村的月亮田，并常驻于此。据梁再冰回忆，“上坝村在一座小山脚下，山上长满橘树。月亮田是一所宅院，院门朝西（从门口向西北看可以望见奔流不息的江水）。这个门比里面的院子略高，走下几个石阶才是院子，院中长着不少芭蕉树。门口有一大片水田。出大门走几步就可以登上南边的小山”。由于李庄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单位，住房变得格外紧张，营造学社实际上是和房东合住在月亮田。“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即画图室）和宿舍主要是两排互成直角（L 形）的房子。其中较长的一排

(南北走向）分为前后（西、东）两部分，分别面向有芭蕉树的前院和一个比较安静的后院。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画图室）面向后院。我们一家则住在与学社办公室成直角的‘侧翼’中”。（《建筑师林徽因》，68页）在这里，梁思成一家一住就是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天才离开。

纵观梁思成一家在李庄的生活，苦辣酸甜，五味俱全。在这里，他们的子女渐渐长大，中国营造学社也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孜孜以求地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不小的成就；在这里，梁思成夫妇均不同程度地患病，并和疾病苦苦斗争，生命对于他们而言变成了一种残酷的挑战，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最终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还是在这里，他们和费正清夫妇、老金，以及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的友谊，在患难中得以巩固和延伸，他们更为彼此的人格和品格所钦佩。如果要作一个简要的概述的话，或许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浓缩出李庄的点滴往事。

一是“疾病”。

到达李庄后不久，林徽因的肺结核症就复发了。“她的病势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重庆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医院，连体检的条件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抗生素类药物，更没有肺病特效药。妈妈身边也没有任何医生或护理人员，我（十一岁）和弟弟（八岁）太小，外婆年纪又太大。可怜的妈妈当时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我早上起床时时常看到她床边挂着许多汗湿了的毛巾。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怕会失去妈妈，但又不能给她以任何实际的帮助。”（《建筑师林徽因》，68页）

梁思成也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谈到了林徽因的病情，他说：“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三月十四日（一九四一年），她的小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成仁。我只好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四月十四日才返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53页）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林徽因才慢慢退了烧。但她的身体始

终没能根本好转，病情仍不时反复，稍微劳累就会发烧。可以说，她从此失去了健康，“只能天天卧床，从卧室的窗户中望望外面的小院”。梅贻琦、罗常培等人曾于1941年6月访问李庄时专程探望梁思成夫妇，对于林徽因的病情颇为担心。梅贻琦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徽因尚卧病床未起，在其病室谈约半小时。未敢久留，恐其大伤神也。”

事实上，1937年9月梁思成夫妇南下流亡之前，林徽因曾到医院作过一次体检，医生严重警告她必须安心休养，不宜远行。林徽因后来坦率地告诉自己的朋友：“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5页）之后9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彻底摧垮了她本已十分孱弱的身体。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一句话尤其让人唏嘘不已，他说：“他们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不重合的圈》，405页）1945年11月，梁思成陪林徽因去重庆，特意请著名的胸外科医生、美国人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林徽因体检。检验结果出来之后，埃娄塞尔博士无奈地告诉梁思成，结核菌已经从林徽因的两个肺叶扩展到肾脏，她也许只能再活5年。

无休止的疾病虽然给梁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曾令梁思成夫妇消沉和绝望，但没能压垮他们，更没能使他们彻底地消沉下去。相反，生性乐观、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他们始终在顽强的挣扎中寻找生命的乐趣。孩子们的回忆也许最能体现出这美好而温馨的时刻。梁从诫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病中的母亲这时更勤奋于学习。她在病榻上读了大量的书。我和姐姐至今还能举出不少当时她读过的书名，这是因为当时她常常读书有感却找不到人交谈，只好‘对着两只小牛弹她的琴’。这时期，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我也当成功课去读它（那时我只有12岁），还要我们一句句地去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米开朗琪罗传》，因为是英文的，我们实在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给我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讲的时候很动感情，可能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鸣。她偶尔也还写诗，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在她兴致好的时候，间或喜欢让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轻轻地为我们朗

读她旧日的诗、文，她的诗本来讲求韵律，比较‘上口’，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母亲非常擅长朗诵。我记得，还在昆明时期，我大概只是小学二年级，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读给我和姐姐听。一篇古文，被她读得绘声绘色：唐雎的英雄胆气，秦王前踞后恭的窘态，听来简直似一场电影。五十年过去了，我仍觉得声声在耳，历历在目。在李庄时，她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到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莎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姐姐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了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地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建筑师林徽因》，95—96页）

林徽因也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谈起了自己的读书情况，她说：“我读的书种类繁多，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元代宫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纪德、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爱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83页）

身体状况稍好的时候，林徽因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她告诉费慰梅“我继续扮演着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让全家、几个亲戚和同事多少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忙着为思成和两个孩子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直到实在做不下去时，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加入缝补的行列。这比写一整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变迁或描绘宋朝都城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在思成忙着写作时，我曾经替他的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71页）

梁思成呢？危难时刻出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的他，几乎像一个陀螺，

为了学社的生存，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心爱的古建筑研究，还有许许多多数不完的事情，终日奔波忙碌，早年车祸而造成的脊柱关节硬化症也在不断的加重。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自称“车站”的梁思成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81 页）

前文曾经谈到过，为照顾病重的妻子，梁思成几乎学会了全套的护理知识，甚至包括那个时代男人们不屑一顾的做饭，蒸馒头，做果酱，腌咸菜。当看到梁思成满头大汗地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人们恐怕很难将这眼前的这位“大厨”和一代建筑学宗师联系起来。后来，费正清访问李庄的时候，不慎在旅途中感染了呼吸道病菌，在梁家养了好几天病。多亏了梁思成的悉心护理，使得费正清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是“友谊”。

前文已经专门谈到过梁思成夫妇和费慰梅夫妇，以及老金的真挚友谊。事实上，抗战的艰苦环境不仅没有阻断或削弱他们的交往，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在陪都重庆意外重逢后，费正清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到李庄访问，尤其是到月亮田看望处于极度困难中的梁思成全家。尽管途中不慎感染呼吸道病菌而一度病倒，但费正清还是非常高兴能见到自己的好友及其家人。不等身体康复，他便和梁思成夫妇畅谈起来，那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太太客厅。尽管梁思成夫妇依然是那么乐观，但亲眼目睹到的窘迫境遇还是令费正清感到震惊。费慰梅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费正清“于是向他们保证，今后将尽量给予协助。他劝梁思成花掉那些我们捐的钱，也卖掉我们赠送的自来水笔、手表等东西。”正是他们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梁家的经济压力，也给病中的林徽因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她高兴地告诉了费正清两件事：一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开玩笑和嬉闹了，但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随意的、不太正经的隐喻和议论，非常动人心弦、非常甜蜜”。二是自己“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

奶粉”。（《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65页）

梅贻琦先生一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论辈分，他算得上是梁思成夫妇的老师。在1941年6、7月间访问李庄的时候，曾两度前往月亮田探望梁思成夫妇，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在7月5日的日记中，梅贻琦这样记述当天的感受："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临别伊再提及返昆明之意，但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思成亦送至轮边，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林徽因寻真》，255页）

在梁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的不仅有费正清夫妇、老金这样的多年挚交，还有许多并无太多交往的学界同仁。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便是其中之一，而他为梁家生计秉笔上书一事更是成为学界美谈。

作为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重要成员，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于1940年冬携妻带女迁入李庄。但1932年参加野外考古发掘时不慎患上的急性肋膜炎，严重地损害了梁思永的健康，并留下了无穷的隐患。到达李庄之后不久，梁思永便患上了肺结核，一病不起，甚至数次病危。虽然经过家人的精心护理，病情一度有所缓和，但从1941年秋天开始，又连续出现反复，以致于长期卧床，根本无法工作。

傅斯年曾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出于对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和林徽因的人品和才学的钦佩，也出于对这几位名门之后悲惨境遇的同情和关切，在他们病困交加的时候，傅斯年毅然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他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已经到了坐吃山空、举步维艰的地步。考虑再三，一向性情孤傲、很少开口求人的傅斯年于1942年4月18日给自己的好友、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援信，信中这样写道：

>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即肺结核病），卧床二年

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贫，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

接着，傅斯年提出了三个理由，应当给予梁氏兄弟以援助。

其一，即是出于对于梁启超先生人品、学问及爱国向学家风的敬仰。

其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而(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其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最后，傅斯年再次强调说，“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两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93—395 页）

虽然信函发出后并未得到希望中的回应，但以傅斯年的为人，认定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的。最终，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本已十分紧张的经费中筹措了一万元，用于资助梁思成兄弟治病。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它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梁思成兄弟的经济压力，而且使他们的生活和医疗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的信中，兴奋地告诉老友家里的变化，他说：“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

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四公斤。”（《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66页）

后来知道傅斯年为梁家所做的事情后，林徽因感激之余，专门致函表示感谢。她说：

>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
>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
>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92—393页）

三是“事业”。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困难，从1939年起庚款补助完全断绝，中国营造学社不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尽管费正清、杨廷宝等人曾经为学社赞助过一些经费，但对于学社而言，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的生计问题。到了1943年，中国营造学社几乎断绝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人才队伍的流失。迫于生计，以及健康原因，1943年秋天，学社的重要领导之一刘敦桢接受了重庆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教授聘书，结束了自己在营造学社十余年的工作，举家离开李庄。虽然梁思成很能理解刘敦桢这一无奈的选择，但刘的离去，对于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营造学社来说，仍是致命的打击。林徽因将此事告诉好友费慰梅时，情绪一度极为失落，她说：“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

的人。全部的账目都由他负责，连思成应付不了的琐碎杂事也交给他管。现在这些工作全要落在思成肩上了！这不打紧，如你们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里的同仁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67 页）据说，刘敦桢离开李庄的前一天晚上，梁思成和他，这两位营造学社的顶梁柱，多年以来患难与共、亲密协作，打造出古建筑研究广阔天地的好同事、好朋友，促膝而谈，言谈之中满是伤感和无奈，最后竟然号啕大哭。后来，陈明达也离开学社另谋出路。昔日人才济济、声名显赫的营造学社最后只剩下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等三位老成员和一名新招进的学员罗哲文，此外还有一位编外成员林徽因。

为维持学社正常运转，梁思成四处奔走，每年都亲自前往重庆申请资助。尽管如此，自学社在昆明恢复以来，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顿，抗战期间，尤其是在最困难的抗战中后期，梁思成带领全体成员，在古建筑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重点做了四件大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一件大事，编写《中国建筑史》，深入研究《营造法式》。

通过研究《营造法式》，梳理清楚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编写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多年的梦想与追求。1939 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撰委员会主任。1942 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梁思成克服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工作。为了弥补图片的不足，他彻夜工作，以线描图，工作台上昏黄的小油灯常常陪他到天亮。在工作中俯身向画板时，他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这样就支撑了头部的重量，大大缓解了倍受病痛折磨的脊椎的压力。1944 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尽管当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并未出版，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堪称抗战时期梁思成最突出的学术成果。

在竭力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又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编写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全书于 1944 年完稿，以图版和照片为主，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1984 年，在费慰梅等众多生前好友的帮助下，《图像

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该书的出版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被建筑学界赞誉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理解”。著名建筑学家陈植评价说：“这一名著是中国建筑学家第一次以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它以近代的表现方式，分析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体系及其各类部件的名称、功能与特点，叙述了不同时代的演变，阐明了主要建筑的类别，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深入浅出地作出系统性的论述，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页。）

这一时期，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莫宗江等人的协助下，“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基本完成。这些成果为1966年出版《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梁思成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文字中的差错，可以从校勘中得到改正；一经肯定是正确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图样的错误，特别是风格上的变换，是难以校勘的。虽然我们自信，在古今中外绘画雕饰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格的鉴别、认识上，可能比我们的祖先高出很多（这要感谢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建筑史家和完善精美的摄影术和印刷术），但是我们承认‘眼高手低’，难以摹绘；何况在明、清以来辗转传摹，已经大大走了样的基础上进行‘校勘’，事实上变成了模拟创造一些略带宋风格的图样，确实有点近乎狂妄。”

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林徽因也加入到梁思成的研究中来。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的前言中对妻子的帮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梁思成全集》第四卷，5页）李庄时期的林徽因除了间或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外，还对汉代历史和美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想用英文写一部《汉武帝传》。老金告诉费正清：“她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

因夫妇》，161 页）

第二件大事，编辑印发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虽然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当梁思成得到杨廷宝等人赞助的两万余元的资金的时候，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编印。1944 年，中国营造学社以石印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发表了山西佛光寺、雨花宫、成都清真寺的调查报告，还翻译发表了费慰梅的《汉武梁祠原形考》一文。

为印制这两期汇刊，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几乎是在最简陋、最原始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项后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艰巨任务。罗哲文亲自参与了此项工作，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我们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也是发表学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在北平的时候，曾经出版过六卷，每卷四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与论文，从内容和印刷质量来说，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自学社南迁后，流离辗转，由长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迁四川，无暇顾及。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四川，印刷、纸张、装订、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在李庄乡下就更加困难了。然而思成先生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学社的同仁也都积极响应，一起动手，同心协力。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那时李庄根本没有白报纸、新闻纸之类的纸张，也没有铅字，更谈不上铜版、铅版和装订机具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土纸和大石版的石印。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还是问世了。我们是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而且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到石印、折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

成的。值得称道的是在思成先生的倡导和亲自动手之下，学社全体同仁包括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先生及老人、妇女、小孩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今天翻开七卷两期的土纸“汇刊”，可以看到当时在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卢绳、王世襄等人的笔迹。自己的文章自己抄写、印刷、装订，可说是彻底的自力更生了。（罗哲文《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怀念——忆我与思成师十事》）

第三件大事，倾心培养古建筑研究人才。

古建筑保护的专业性很强。梁思成在从事古建筑调查研究之初即强调指出“须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梁思成全集》第一卷，222页）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才严重匮乏，现代建筑教育刚处于起步阶段，能够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不仅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学术团体，而且培养了一批古建筑研究人才。即便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李庄时期，学社还是先后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来此学习和工作，例如燕京大学毕业生王世襄，中央大学毕业生卢绳、叶仲玑，同济大学毕业生洪慰德，以及学社招收的最后一名正式学员，后来成为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的罗哲文。

对待这些年轻的同事、助手和学生，梁思成不仅在生活上对他们关爱有加，而且注重发挥他们的特长，引导他们在专业上有所发展。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努力工作、不断求索的学习成长氛围，带领年轻的学社成员在专业上迅速进步。抗战中后期，学社已无力单独组织野外调查，但全体成员依然在李庄的工作室埋头整理资料，研究工作坚持不辍。除去研究工作外，梁思成每天都领着几个年轻人练习爬竹竿，为的是日后有条件外出测绘时，不丢掉爬梁上柱的基本功。

王世襄和罗哲文的经历颇有代表性。1941年冬天，燕京大学毕业生王世襄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希望能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份工作。在梁思成的引荐下，王前去拜访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不料，对燕京大学成见极深的傅斯年竟然未加思索，便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

不配到我们这里来”为由，将王世襄拒之门外。正当王走投无路之际，梁思成毅然决定将他留在营造学社，担任助理研究员，并发挥其特长，悉心予以培养。后来，王世襄才知道，当时的营造学社已经穷困潦倒，梁思成甚至连给儿子买新鞋的钱都拿不出来。抗战胜利以后，王世襄虽然离开了营造学社，并最终成为文化大师，先后撰写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应影》等十余部著作，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但对危难时刻梁思成的热心相助始终难以忘却。

相比之下，罗哲文则更幸运。1940年冬，罗哲文经招考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当时他还是个16岁的中学生，对建筑学知识一无所知，只是对美术感兴趣而已。罗哲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他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的言传身教和悉心呵护，从此确定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最终成为文物保护大师。罗哲文这样回忆在学社的学习：“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并注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我从他们那里又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与技能。”（罗哲文《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怀念——忆我与思成师十事》）

关于罗哲文的成长，还有一件与梁思成密切相关的趣事。罗哲文原名罗自福，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文发音极为接近，到李庄后，经常有人开玩笑地叫他“罗总统”，时间长了，几乎成了罗自福的代名词，弄得他哭笑不得。梁思成觉得这样下去对于罗自福的影响会很不好，于是便建议他改名，并帮他取了一个很儒雅的名字——罗哲文。

第四件大事，关注现代建筑教育，合作举办建筑设计竞赛。

虽然离开东北大学之后，梁思成一直以主要精力从事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但他对于现代建筑人才的培养依然非常关注，尤其是传统建筑设计能力的训练。抗战期间，梁思成与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有较多接触，杨廷宝等众多好友也在建筑系任教。为激励青年学子潜心学问，将现代建筑理论、技术与传统中国建筑特色有机融合，推出更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现代中国建筑，为战后中国之重建发挥才智，梁思成决定在中央大学举办建筑设计竞赛，并为竞赛获奖的学生设立专门的奖学金，以资奖励。

经与中央大学协商，最终确定参赛学生为该校建筑系三年级学生。关于奖学金的名称，梁思成明确提出：希望以中国营造学社创建人朱启钤老先生的名字命名，以彰显这位可敬的老人对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事业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朱启钤字桂辛，于是这项在现代建筑教育史上极其珍贵且极其特殊的奖学金遂定名为“桂辛奖学金”。

1942 年第一届建筑设计竞赛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举办，题目是“国民大会堂设计”，要求做传统的建筑形式。郑孝燮获得了第一名。多年以后，郑孝燮还记得当年评奖时的情景：“梁思成身着中式长袍，温文尔雅，在学生作业前反复地看过以后和杨廷宝先生交谈了一会，便走到郑的图前，在上面画了一个红星，注明桂辛奖学金第一名。”（《梁思成、林徽因与我》，153 页）1944 年举行的第二届竞赛以“后方某农场”为题，评委包括梁思成及中央大学的两位资深教授——童寯和李惠伯。经过评委认真审阅，朱畅中的作品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

就规模而言，这两次竞赛都不大，虽有奖金，但数量很少，只是象征性的。如果放在现在，可能只能算是大学建筑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建筑设计作业评比。但在抗战中后期的中国，能够有此责任感促成此事者，恐怕为数不会很多。作为一名知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可贵也在此充分得以体现。他所关注的不仅是自己学术领域的问题，更以其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战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融汇古今的现代建筑设计人才培养等工作。事实上，两届建筑设计竞赛的获奖学生后来均成为优秀的建筑学家和古建筑保护专家。

对于抗战时期梁思成夫妇在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锲而不舍地开展学术研究的精神，费正清在晚年的回忆中不禁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 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写成了最近刚出版的这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他用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他们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8页）

# 第五章

## 1948 年的首选院士

## 一、再进清华园

1945年抗战胜利，梁思成夫妇盼望已久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分别在重庆和李庄得知抗战胜利的喜讯。1945年，梁思成受聘担任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主持编写沦陷区内的文物古建筑目录。8月10日晚，梁思成和两位中国作家，还有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好友费慰梅，一起在美国大使馆的餐厅共进晚餐。餐后，几位老朋友坐在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边乘凉，边聊着战前的往事。八点二十分左右，梁思成他们突然停止了交谈，长时间的警报声响过之后，山城重庆一下子沸腾起来了。费慰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延烧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自动排列成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驶过大街。汽车在大街上擦身而过，车上的乘客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研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也高兴地勾肩搭背，笑啊，跳啊，饮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77页）

为弥补没能和妻子在第一时间共同分享抗战胜利喜悦的遗憾，在费慰梅的帮助和陪同下，梁思成很快便乘坐美军的C—47运输机到达宜宾，之后又乘船回到李庄。此时的李庄早已沉浸在胜利的欢庆之中。这个人才云

集的沉寂古镇，从获知胜利消息的那一刻起，便沸腾起来了。太久的压抑，注定要以超乎常规的狂放爆发。这些因战争而流落异乡、历尽坎坷的知识分子，喜极而泣，奔走相告，古镇的小街上，充斥着欢庆游行的人群。虽身体虚弱而卧床不起，林徽因依然被小镇的喜庆氛围深深地感动，尤其是女儿再冰不时带回来的“最新消息”，更是让她心动不已，多年的病痛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丈夫的归来和好友费慰梅的到来，更令她欣喜万分，她一刻也不愿躺在病床上了。于是，大家做了一个简易的滑竿，由罗哲文等几名小伙子担当“轿夫”，梁思成、费慰梅等人陪伴左右，浩浩荡荡加入游行队伍大军。这一天，他们已经苦苦等待了8年。

流亡大西南的艰苦岁月即将成为过去，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梁思成和他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要抉择。抗战中后期，中国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几乎完全断绝，在梁思成等人的奔走努力下，教育部设法将学社的研究人员的薪金分别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制内，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刘敦桢、陈明达等人的相继离职，使学社的力量大大削弱。虽然在梁思成等人的苦苦坚持和努力下，学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再也难以继续昔日的辉煌了。抗战后期，学社已根本无力组织野外古建筑调查。抗战虽然胜利了，但8年的战争，民生凋敝，无论政府，还是朱启钤等一批过去学社经费的资助者，都无力再给学社提供固定的研究经费，继续维持中国营造学社显然已不大可能。

对于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来说，当时的出路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学社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从事古建筑研究；二是另辟新径，从事现代建筑学教育工作，为百废待兴的战后中国培养急需的建筑人才。尽管梁思成从30年代起，就主要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学家，他的眼光始终没有局限在这一领域，而是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发展。以《中国建筑史》的完成为标志，他已基本上理清了各个时期的体系沿革和历史源流，找出了整个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虽然还有很多课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就总体而言，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战后的中国千疮百孔，处处是废墟，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梁思成投身到战后重建家园、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潮中去。显然，

仅沉浸在学术研究的狭小空间就显得与时代的需要不合拍了。战后的重建急需大量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门人才，而在当时的中国，受过专门训练的建筑师却是屈指可数。培养现代建筑学人才，满足中国社会需要，成为梁思成投身战后重建工作的切入点。

1945年3月9日，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提笔给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母校适时设立建筑系。他指出

母校工学院成立以来，已十余载，而建筑学始终未列于教程。国内大学之有建筑系者，现仅中大、重大两校而已。然而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创始与人类文化同古远，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人类不可无居室。居室与民生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数千年来，人类生活程度随文化之进展而逐渐提高，营造技术亦随之演变。最近十年间，欧美生活方式又臻更高度之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今后之居室将成为一种居住用之机械，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 Working mechanism，此将来营建方面不可避免之趋向也。我国虽为落后国家，一般人民生活方式虽尚在中古阶段，然而战后之迅速工业化，殆为必由之径，生活程度随之提高，亦为必然之结果，不可不预为准备，为适应此新时代之需要也。

然而我国社会，虽所谓智识阶级，对于居室之重要性且素乏认识，甚至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之别者。殊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虽均以相类似之物料为其工作 medium，但其所解决问题之本身则相去甚远。建筑所解决者为居住者生活方式所发生之问题，自个人私生活之习惯，家庭之组织，以至团体或机关组织办事之方式，以至一工厂生产之程序，皆需要不同之建筑部署，以适应各个不同之用途。而土木工程所解决者，则较为间接，如公路、铁路、水利等等问题是也。

抑近代生活方式所影响者非仅一个，或数个一组之建筑物而

已，由万千个建筑物合组而成之近代都市已成为一个有机性之大组织。都市设计已非如昔日之为开辟街道问题或清除贫民窟问题（社会主义之苏联认为都市设计之目的在促成最高之生产量，英美学者则以为在使市民得到身心上最高度之愉乐与安适）。其目的乃在求此大组织中每部分每项工作之各得其所，实为一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之全盘合理部署，而都市中一切建置之合理部署，实为使近代生活可能之物体基础。在原则上，一座建筑物之设计与多数建筑物之设计并无区别。故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

抗战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来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举凡住宅，分区，交通，防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筹划，预为百年大计，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巨，而工作亦非短期所能完成者。英苏等国，战争初发，战争破坏方始，即已着手战后复兴计划。反观我国，不惟计划全无，且人才尤为缺少。而我国情形，更因正在工业化之程序中，社会经济环境变动剧烈，乃至在技术及建筑材料方面，亦均具有其所独有之问题。工作艰巨，倍蓰英苏，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古谚虽诫“毋临渴而掘井”，but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日添授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即是之故，受业认为母校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

在课程设置及专业设置上，梁思成密切关注国际建筑学界发展动态，明确提出要抛弃以往陈旧的教学组织模式，瞄准世界最高水平，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他在信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

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 Ecole des Beaux-Arts 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型式，不近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 Prof. Walter Gropius 所创之 Bauhaus 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德国自纳粹专政以还，Gropius 教授即避居美国，任教于哈佛，哈佛建筑学院课程，即按 G.教授 Bauhaus 方法改编者，为现代美国建筑学教育之最前进者，良足供我借鉴。

在组织方面，哈佛，麻工，哥伦比亚等均有独立之建筑学院，内分建筑，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户内装饰，等系。为适应将来广大之需求，建筑学院之设立固有其必要。然在目前情形之下，不如先在工学院添设建筑系之为妥。建筑系设备简单，创立较易，其中若干课门，如基本理化及数学力学等，因无须另行添设课程，即关于土木工程方面者，亦可与土木系共同上课；其须另行添聘者仅建筑设计及绘塑艺术史等课教员；在设备方面，目前仅须购置书籍及少数绘画用石膏模型即可，在工学院中，实最轻而易举。为此建议母校于最近之可能期间，筹设建筑学系，其建筑设计学教授则宜延聘现在执业富于创造力之建筑师充任，以期校中课程与实际建筑情形经常保持接触。一俟战事结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营国筑室，古代尚设专官；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问题计，专门建筑人材之养成实目前亟须注意之一大问题。此项责任，我母校实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2 页）

梅贻琦校长最终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于 1946 年设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聘任梁思成为首任系主任，担当创建之重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随之结束，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也一同转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为支持他们继续开展古建筑勘察研究工作，经梁思成、朱启钤与梅贻琦协

商，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的同时，专门成立了中国建筑研究所，编制也在建筑系，其与建筑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样，中国营造学社虽然在形式上不复存在，但就其实质而言，薪火传承，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光大。

八年抗战使得中国学术界基本同世界隔绝。为扶持战后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选派梁思成去美国，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几乎与此同时，梁思成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前者邀请他于 1946—1947 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后者则希望他参加 1947 年 4 月召开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

匆匆安排好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工作和家里的事情之后，梁思成于 1946 年 10 月乘上了驶往美国的邮轮。从 1928 年学成回国，到这次重返美国，一晃就是 18 年了。望着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和上下翻飞的海鸥，梁思成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分。是啊，这十几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梁家，或是对于他本人，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辉煌，有欢悦，但更多的是磨难，磨难，磨难。十几年前那个新婚燕尔、英姿勃勃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已是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啦。

1946 年 11 月，梁思成到达美国的纽黑文，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和交流活动。他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信息，加强对现代建筑教育最新进展的了解，以便为自己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提供更多的参考；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广泛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提高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

在和美国同行的广泛交往中，梁思成敏锐地意识到，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筑学界在建筑理论方面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形成了很多崭新的理念和思维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即是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单栋的房子扩大到人类整个的“体形环境”，建筑师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立生存与发展的完美“舞台”。基于此种理念，尽管建筑师派系、风格不尽相同，但规划、设计的目标很一致，那就是生活以及工作上的舒适和视觉上的美观，尤其强调对人的关怀。这些最新的建筑观念对于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

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和他的妻子爱琳娜·麦克马洪曾于1935年4月到北京访问，梁思成夫妇接待了他们，并成为好朋友。林徽因还陪斯坦因夫妇游览了颐和园。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毫不掩饰对这两位新朋友的欣赏和喜爱，她告诉费慰梅："我们爱上他们，他们也同时爱上我们。"十余年后在美国的重逢，使梁思成得以在重温同斯坦因夫妇的友谊的同时，也从斯坦因那里了解到最新的城市规划动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一名大学的建筑系主任来讲，这些知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梁思成回国后，立即着手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了城市规划的内容，并酝酿成立城市规划专业。

在美国期间，梁思成不仅有机会回到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学，而且专程前往匡溪艺院拜访了建筑大师萨里宁，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项目。对萨里宁的访问，使梁思成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匡溪艺院的良好学习环境同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思成这样记述拜访萨里宁的收获，"与谈建筑教学原则，他主张问题要实际，不应用假设问题。所以中国学生若来，需自己把中国问题带来，他可助之解决。这里只有毕业研究建筑班，以十人为限，老先生自教。只有 Design 一课，课题偏重 City Planning 方面。学程颇自由。学费连膳宿每学年9个月仅1050元，真便宜。除建筑外，尚有绘、塑、图案、陶瓷、纺织等课。学生以动手为尚，空气充满创作滋味。校舍美极，园中塑像尤多，喷泉满地，幽丽无比。"凭借此行与萨里宁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梁思成得以推荐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年轻人——协助他建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到匡溪艺院拜师萨里宁。吴良镛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梁先生告诉我，他离美前参观了沙里宁所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艺术环境很好，可同时学习建筑与规划，很适合你，并且沙里宁已七八十岁了，跟他学要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后来梁先生为我写好了给沙翁的推荐信，林先生一看，说：'对良镛的介绍信应该这样来写'，于是动手就改。一封推荐信竟然两位大师拟稿，我理解为他们对我寄望之殷，送我出国之情之深。"（《建筑师林徽因》，112—113页）

梁思成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现代建筑学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同时废寝忘食地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古建筑的艺术魅力。工作是如此的紧张，以致于他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有这么一段颇具学者情调的幽默故事。一天，梁的朋友、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去住处找他，不想吃了个闭门羹，于是给他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到：“梁思成成天乱跑。（罗常培）”过了几天，梁思成到罗常培住处回访，碰巧主人也不在家，生性幽默的他便随手写了张字条：“罗常培常不在家。（梁思成）”后来两人相见，兴至之余，又互赠一句，组成一幅对联：“罗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陪女弟子，梁思成妄思伏骥拙匠思成联国楼。”

在美国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梁思成对他在抗战后期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文稿进行校对，并加写了一些章节，他希望能使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梁思成的工作得到了费慰梅的全力帮助。在他们的努力下，书稿的改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就在梁思成紧张工作之际，从北京传来一个令他极度不安的消息：林徽因的病情再次恶化，不得不进行一次大手术，如果手术成功的话，也许，林徽因的生命能得以延长几年。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很大，作为她的丈夫，梁思成必须陪伴在她身旁。对于梁思成来说，虽然他在美国的考察、讲学还未结束，但毫无疑问，这里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好在梁思成美国之行的大部分事务已基本完成或接近尾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紧张地处理完未尽事宜，之后，便匆匆登上了直抵大洋彼岸的邮船。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思成离开美国回国之前，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的好友费慰梅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时局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前途很难预料，而两家人再想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的聚会、聊天，恐怕机会越来越少。想到这一点，费慰梅立即作出了一个决定：以访谈的方式约请梁思成系统地讲述早年的经历，并作详细的记录。作为一名出色的学者，费慰梅的专业素质再次得到体现。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相见，到了1949年初，通信也完全中断了。费慰梅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自相识以来的大批信件，便成为

后人了解梁思成、林徽因，走进他们的真实世界的珍贵资料。再后来，费慰梅以这些资料为素材，撰写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作品，在向世人介绍这对优秀的中国学者的感人经历的同时，也再次重温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1947年9月，梁思成回到了北京。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林徽因的手术一直到1947年的12月份才进行。也许是众人的祈盼感动了上天，手术取得了成功。经过一段时间静养之后，林徽因的精神和体力都有了明显的恢复。手术的成功不仅为林徽因在建国初期再次将事业推向辉煌赢得了弥足珍贵的时间，而且使梁思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半年多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了。

回到清华之后，梁思成惊讶地看到：系里的各项工作都已得到妥善的安排，相关的人员和设备也基本到位，1946年招收的第一届学生的学业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总之，虽然教学改革、专业设置等重大问题亟须在他的领导下来进行，但就建筑系筹建时期的工作任务而言，已经很好地落实了。而这一切，除了需要归功于吴良镛、吴柳生等建筑系的筹建者的巨大贡献之外，尤其要感谢的是林徽因。虽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林徽因始终关注着建筑系的建设，从专业课程的设置，到青年教师的培养，再到教材教具的选择，大事小情，林徽因无不尽其所能，提供指导和帮助。关于这一点，建筑系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感受颇深。吴良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 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见我那是一次不多的例子），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例如，学校最初分配我住工字厅，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合住，别人感到不方便，林先生知道了，说：“那好办，金岳霖先生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房，有配套的家具，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这样，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学生上素描课，要有石膏，林先生让我找美院李宗津先生；请一位讲师给翻制；到东单口永兴洋纸行去采购绘画用品；需要教学辅

助人员，介绍我去颐和园找当时在那里监工的原营造学社纪玉堂先生来系工作。“你如果进城回不来，可以住在中山公园，去找一位老师（一位70多岁的营造学社留守人），在那里过夜……”有些事是她卧床时想到的，有些是我把事情进展告诉她，经琢磨后，建议我怎么做的。（《建筑师林徽因》，111页）

在专业教学方面，林徽因同样是行家里手。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清华建筑系的第一届学生顺利完成了入学后的第一份设计作业，作为助教的吴良镛同样受益匪浅。“一年级的第一个设计是公园大门，我作为大学毕业的助教来教《初步设计》，有些心虚不安。我学着在中大时启蒙老师谭垣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第一次设计在师生昼夜奋战中结束，大家都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欣赏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作业送给林先生去看。看到新学期第一批作业的成果出来，林先生自然特别高兴，她与金岳霖先生共同以极大的兴趣，看着图版，说这张比例处理得很好，那个不太像公园门，这个更具有欢迎人的气氛，等等。”（《建筑师林徽因》，111页）

为帮助缺乏建筑测绘与研究经验的年轻教师提高业务能力，林徽因还利用中国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并亲自作开题报告，“从和珅的为人、与乾隆的关系，到恭王府的奢华。这一组建筑的价值等”，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1947年年底，内战打得热火朝天。此时的梁思成也正忙得热火朝天。除去精心照顾心爱的妻子以外，梁思成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根据最新的现代建筑教育理论和多年的治学心得，对清华大学建筑系进行大胆而又影响深远的改革。在1949年7月10日至12日的《文汇报》上，梁思成发表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思路和目标。

梁思成指出：“近十余年来从事所谓‘建筑’的人，感觉到已往百年间，对于‘建筑’观念之根本错误。由于建筑界若干前进之思想家的努力和倡导，引起来现代建筑之新思潮，这思潮的基本目的就在为人类建立居

住或工作时适宜于身心双方面的体形环境。在这大原则大目标之下‘建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所谓‘建筑’的范围，现在扩大了，它的含意不只是一座房屋，而包括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为贯彻这一建筑思想，他博采众长，并以自己的教育观为核心，提出“清华大学‘建筑’课程就以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才为目标”。（《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6页）

围绕这一目标，梁思成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经过再三努力，将建筑工程学系更名为营建学系，明确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他指出广义的体形环境有三个方面，“第一适用，第二坚固，第三美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育方针应以训练学生能将这三个方面问题综合解决为目标。而国民党教育部所定“建筑工程学系”名称是不恰当的，“建筑工程”所解决的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中坚固的一个方面问题。清华的课程不只是“建筑工程”的课程，而是三方面综合的课程。因此，将建筑工程学系更名为“营建学系”。进而，梁思成对“营建”一词作了阐述：“‘营’是适用与美观两方面的设计，‘建’是用工程去解决坚固的问题使其实现，是与课程内容和训练目标相符的名称。”（《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7页）

二是对建筑系的学制和专业设置进行了改进。从1948年起，将学生分为建筑组与市镇计划组，将城市设计教学首次引入中国。对于建筑组的学生，“着重建筑物本身之设计及建造”，在房屋之设计和构造方面的课程较多；对于市镇计划组的学生，则明确了其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的学习方向，“着重在整个城市乃至多组城市间相互的关系，在文化，政治，经济，交通等等各方面地区之部署，分配，求其便利，适用，美观，是一个与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整个社会关系极密切的工作，所以工程方面着重市镇工程，还有若干社会政治科学”。（《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8页）同时，

从实际教学和培养需要出发，梁思成提出应将现有的四年制改为五年制。

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梁思成希望在时机成熟后，国内各大学应普遍设立营建学系或营建学院，学院下设建筑学系、市乡计划学系、造园学系、工业艺术学系和建筑工程学系。

梁思成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在育人理念方面同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常说："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就是我要培养的建筑师。"（《困惑的大匠·梁思成》，92页）基于这一目标，他将营建学系的课程分为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设计课程、综合研究等五大类。

总结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以下三点特色非常引人注意。一是理工与人文的结合，重视社会科学学科在建筑教育中的作用，在课程中增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问题、土地利用、社会调查等。二是重视历史课，如中外建筑史、中外美术史、雕塑史，都是作为文化及社会背景必修课来要求。深刻地洞察历史，赋予作品厚重的历史感，是梁思成作为建筑史学家对于建筑教育的一个突出贡献。三是重视艺术能力的训练，为此他诚邀各方面的专家讲授建筑画、素描、水彩、雕塑、建筑初步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不仅在于训练和提高学生们的表现技巧，更重要的是与历史课相呼应，以较快地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在教学实践中，梁思成尤其强调民主的学风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并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从而为清华大学营建系良好的教风、学风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学人才。（参考《困惑的大匠·梁思成》，92—96页）

坦率地说，这一时期是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最自由、最活跃的阶段。他对于建筑学科的发展的准确把握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崭新而系统的建筑教育思想最终确立了他作为现代建筑教育家的卓越地位。年仅五旬的他工作是那么的繁忙，以致于好朋友老金对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条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 二、载誉美利坚

前文已经讲到，1946年梁思成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赴美国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梁思成还收到了两所美国名校发出的邀请函，一所是坐落于美国康乃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邀请他1946—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另一所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邀请他参加将于1947年4月召开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梁思成发表在著名的《笔尖》杂志上的论文和战争中出版的最后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使国际学术界得以了解他———位在和疾病、贫瘠苦苦抗争的同时仍潜心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中国建筑学家。

其实，抗战期间梁思成也曾接到过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请他到美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但梁思成夫妇始终没有离开自己苦难中的祖国。如今抗战胜利了，国家百废待兴，对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接到耶鲁和普林斯顿的邀请函后，梁思成一度很矛盾。一方面，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设和国内建筑学科的发展而言，能有机会到美国讲学、交流，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他也迫切希望得到战后美国建筑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另一方面，妻子林徽因的病情仍不稳定，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如果接受邀请，一去就是一年，家里的事情怎能让他放心，再加上清华建筑系的创建还没有理出头绪，大量的工作需要去落实。应该说，关键时刻，林徽因对此次美国之行的坚决支持最终促使梁思成接受了邀请，决定赴美讲学、交流。

从1946年11月到达纽黑文，到1947年9月回到北京，梁思成在美国实际上工作生活了七八个月时间。这次美国之行，不仅使梁思成得以全面了解战后美国建筑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以及建筑教育理念的转变，为他回国后领导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设提供了一手的素材和信息，而且通过自己深厚的学术底蕴、出色的工作和谦和的为人，使他有机会参与到一些重要的工作中，并获得了美国建筑学界，乃至国际建筑学界的一致认可，真正成为世界知名的建筑学家。有两件事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一是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殖民地时期成立的第四所大学，1746年在新泽西州的Elizabeth创立，当时名为“新泽西学院”。1756年搬迁到普林斯顿时名称仍未改动，一直到1896年学校才正式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具有浓厚的欧式教育学风，强调训练学生具有人文及科学的综合素养。2008年最新统计全美综合排名为第一。为庆祝建校200周年，1946年至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便是1947年4月初举办的“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

出于对梁思成学术成就的认可和尊重，普林斯顿大学不仅邀请梁前来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而且特别邀请梁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的大会主席。事实上，应邀出席这次高规格学术盛会的远东文化研究专家可谓“高手云集”，不仅包括这一领域内成就斐然的美国同行，还有很多来自欧洲、亚洲地区的知名人士，如荷兰莱顿大学的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博物馆馆长塞伦，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等六十余位。除梁思成外，还有几位出色的中国学者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等人。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虽然与会的中国文化专家很多，但在会议的主办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研究专家劳利教授看来，真正的领军人物非梁思成莫属。费慰梅对此曾感触颇深，她指出：“劳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广泛的中国艺术兴趣，留下深刻的印象。劳利的亲

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索佩尔（Alexander Soper）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刊行的最后两期，一直密切注意思成的成果。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以及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乐意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5 页）

作为研讨会的主席，梁思成不仅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在会议上作了“唐宋建筑”及“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是所有与会专家学者中唯一作两场学术报告的人。此外，他还在会议期间，举办了一次他多年来调查研究古建筑时绘制或拍摄的图片和照片展览，并以刚刚发现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作了一次演讲。梁思成的研究成果以及通过他的研究展示给世界的中国古建筑成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

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著名的那绍厅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授予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名誉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突出成就。整个仪式隆重热烈。费慰梅参加了名誉学位授予仪式，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仪式开始，由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领着大学生列队入场，接着走出的是两名受奖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大黑色长袍、帽子的梁思成，一高一矮，形成鲜明的对照。”普林斯顿大学这样评价梁思成——“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暨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6 页）

对于梁思成来说，被授予名誉学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认可。在普林斯顿大学保存着梁思成就接受名誉学位写给校长多兹的一封信，短短数语既准确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情和足够的礼貌，又充分展现出梁的人格与风格。他这样写道：“对一个只不过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寻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者而言，这样的奖赏实

在是过高了。”（《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7 页）

二是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参与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在美国讲学和考察期间，梁思成还意外地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出任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

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共同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表达了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在这之后，苏、美、英、中又分别举行过几次国际会议，草拟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章程，并就安理会表决程序达成协议，决定于 1945 年 4 月 25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关于国际组织的会议”，以便正式制订《联合国宪章》。1945 年 6 月 25 日，参加旧金山会议的 50 个国家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同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从此正式成立了。联合国总部大楼也被称为“联合国大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大厦建于 1947 年至 1952 年，坐落在美国纽约市东曼哈顿区，可以俯瞰东河。主要建筑物由大会场大楼、秘书处大楼和哈马舍图书馆三部分组成，秘书处大楼为大厦的主体建筑物，楼高 153.9 米，共 39 层，立面为大片玻璃墙，被俗称为“玻璃宫”。如今，联合国大厦已成为纽约市区颇为著名的一处景点，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游览。游客们在赏景之余，恐怕很少去关注大厦的设计者。事实上，这座高大雄伟、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建筑的设计方案，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建筑师的智慧，中国的梁思成便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就大厦设计的主体工作而言，需要梁思成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参与更多的是在方案论证阶段。但毫无疑问，能够有机会进入到设计委员会，本身就是对于梁思成学术成就的褒奖。毕竟他是作为中国建筑师的代表，来为联合国大厦的设计提供咨询。设计委员会人数不多，但汇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现代建筑的权威专家，如法国的勒·柯布西埃，法国的尼迈耶等人。这对于急于了解和掌握战后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建筑设计动

态和发展趋势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后来的实践证明，梁思成的表现受到了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充分肯定，尤其是他谦和而文雅的处事风格，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建筑师乔治·杜德利当年也有幸作为助手参加大厦的设计工作，和梁思成有过一些接触，他的回忆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梁思成在联合国大厦设计中所做的工作和所发挥的作用。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加入对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人知道他或他的成就。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远远超越勒·柯布西耶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坚持远离布杂艺术风，对文化变迁倒没什么反应。思成则建议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一如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长长的前厅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大厦选址在东河之滨，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这样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若按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194页）当然，梁思成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对设计要求和备选方面进行反复研究和权衡之后，他对尼迈耶提出的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个方案最终得到设计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就在梁思成载誉美利坚，为中国建筑界赢得广泛赞誉之际，他的研究成就也赢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便开始酝酿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对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言，院士头衔更是至高的褒奖和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尽管国内和平尚未实现，民众生计都无法保证，对于仓促着手评选院士意见不一，众说纷纭，但院士评选一事还是在内战的隆隆炮声中启动。著名物理学家、第一届院士吴大猷说："35 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 400 人。36 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 150 人。"按原定计划，院士选举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牵头，总干事萨本栋负责数理、生物两组，胡适、傅斯年、

李济、陶孟和等社会科学界大腕负责人文组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作为主要决策者，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的意见尤为重要。在第一轮正式推选开始之前，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拟订了一份20人左右的人文组建议人选名单。其中，在考古及美术史学科，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梁思成，可见梁思成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与会人员投票选举，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和好友金岳霖、钱端升等81人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其中人文学科领域获此殊荣者一共28人。7年之后，在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推选中，梁思成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虽然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极度腐朽，但客观地说，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的第一届院士选举工作还算是公道、规范。尤其在人文学科领域，大家林立，高手云集，稍失公允便会招致无数骂名。就这一点而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确是出于公心审慎而为之，也获得了学界及后人的认可。连一向狂放不羁、无所顾忌的傅斯年都曾经为此殚思竭虑、小心翼翼。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这样说："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然（?）。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人文组，还是数理组、生物组的当选院士，大多是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教授。梁思成虽然当时已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但与那些常年工作于此的教授不同的是，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在中国营造学社——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学术团体工作期间取得的。这个结果既是对梁思成学术成就的肯定，也应该是对他当年毅然选择营造学社的丰厚回报吧。

## 三、理想守望者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议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隆重举行。虽然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且内外交困，但对于这一学术界最高级别的盛会还是不敢怠慢，蒋介石亲自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会议场面虽然盛大而热烈，院士头衔也颇能让人感到振奋，但时局的发展已不可能给这些旧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们以太多的聚会、畅谈、庆祝的机会了。随着内战炮火的迅速逼近，纪念大会结束之时，已是他们分别之际。

院士大会结束后4个月，即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就在傅作义下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之前，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行动"，由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牵头，拟定了一份包括六十余名学术界名流的"抢救人员"名单。其中主要包括四类人士：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撤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为确保这些学术精英继续为国民政府服务，国民政府要求北平"剿总"、教育部、交通部等全力配合完成此项工作。12月14日，蒋介石甚至亲自给北大、清华两校校长胡适、梅贻琦发电，催促他们立即率在北京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对学术有贡献者飞南京。一时间，平津两地诸多学术大家人心惶惶，面对新旧两个政权，究竟何去何从？

和许许多多对旧政权统治失望之极的正直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没有逃避新生的政权，甚至连出国定居的机会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如果论及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清华大学知名教授的梁思成

当然名列国民政府的“抢救人员”名单之中。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劝说，和自己的家人，以及老金、钱端升等好友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清华园。对于梁思成夫妇的选择，很多同事、朋友都不大理解，尤其是对于他们连出国定居都放弃更感到不可思议。毕竟，新旧政权更迭之际，为了自身安全和事业发展，寻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是人之常情。对于他们的这一决定，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曾经给出一个解释，她认为：“思成和徽因对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心挂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那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的世界。”（《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207—208 页）应该说，费慰梅的解释有一定道理，那就是梁思成夫妇确实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迎接新政权的，但这显然不是全部的理由，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其中。

如果我们已经了解梁思成夫妇在抗战时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了，何况，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确实满怀憧憬，并真诚地希望这是一个崭新而美好的开端，无论对于古老的中国，还是生活于斯的每一个普通百姓，还有，就是那些他视为珍宝的古建筑。成立之初的人民政权所显示出的勃勃生机和崭新气象给了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昔日垃圾成堆、乞丐满街、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的北京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整个城市豁然开朗，整洁的环境，井然的秩序，工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工作，许许多多在过去被认为根本无法清除的社会丑恶现象在人民政权的强大攻势下彻底消亡了，古老的北京城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一切都使梁思成感到万分欣喜，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加倍地为建设人民民主国家而努力。对于梁思成来讲，新生活毫无疑问是一个喜剧的开端，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然而，命运却在不断地和善良的人们开玩笑。恐怕很难想象，喜剧的开端很快就收场了，悲剧的成份则在一分一分的加重，直至完全处于它的笼罩之下，最终，在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幼稚”的梁思

成满怀着无数个想不清的困惑离开了这个他深深挚爱的世界。

事实上，早在北京城解放之前，梁思成就开始与共产党合作了。这次合作对于梁思成而言是神秘、愉快而顺利的，又对梁思成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留在清华迎接新政权的到来。当然，关于这次合作，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需要保密的，梁思成周围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不知晓，大洋彼岸的费慰梅也就不可能获悉详情了。

那是 1948 年冬天，傅作义的部队困守北京城，负隅顽抗，企图作最后的挣扎。郊外的清华园、圆明园等地则成为国共两军短兵相接的战场。整个平郊，一度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为保护北京郊区的高校和重要文物古迹免受战火打击，毛泽东连续两次专门致电林彪、罗荣桓等四野高级将领，明确要求他们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些地方的人员及财产安全。电文如下："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沙河、清河、西山系主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事实上，不仅清华、燕京及诸多文物古迹区要着力保护，遍地是文物古迹的北京城更是人民解放军要想方设法予以保护的重中之重。人民解放军拟订的平津战役作战方案中坚持对北京城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方针，除去政治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旦武力攻城，城内的诸多文物古迹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毁于战火。

眼看着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扛着云梯、杉篙等攻城器械快速奔向市区，梁思成不禁焦急万分，坐卧不安。作为一名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的专家，他不敢去想象武力攻城可能会给古老的北京城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但几天后的两件事一下子使这种顾虑大大地得以缓解。第一件事发生在 1948 年的 12 月 18 日，进驻清华园地区的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在清华大学西门张贴以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将军的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重申对高校的严格保护政策。告示指出："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按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

学，维持学校秩序。”对于梁思成来说，和这份安民告示同样具有震撼力的是家里的保姆刘妈告诉他的经历。刘妈家就住在清华园附近的成府村，12月13日早晨，她打开家门，突然发现村里已经住进了许多解放军战士。原来他们是半夜开进村的。奇怪的是这么多的解放军进村，竟连村子里的狗都没有惊动。在寒冷的冬夜，全部席地坐在胡同里休息了一夜。她说自己活了60多岁，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军队。看到这份告示，以及亲身感受到的解放军官兵朴素的作风、严明的纪律和对老百姓的爱护，再联想起之前国民党特务及残兵游勇对清华园的肆意骚扰和无端破坏，梁思成和清华园的师生不仅感慨万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啊！

第二件事则发生在清华园解放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在梁思成的好友、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陪同下，两名解放军军官突然来到位于清华园中的新林院八号，登门拜访了梁思成。面对深夜造访的两名军官，梁思成倍感诧异和不安。也许是看出了梁思成的心事，稍事寒暄之后，两名军官便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人民解放军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但如果傅作义顽抗到底，将不得不武力解决。因此，他们希望梁思成先生能在军用地图上将北京城内著名的古建筑标出来，以便于在可能发动的攻城战斗中，解放军的炮火不会轰炸这些地区，从而避免这些古建筑毁于战火。这简直令梁思成惊喜万分，保护古建筑不正是他多年来到处奔走呼吁、竭尽全力而为、但始终很难有所作为的事情吗？而且最近他更是为北京古建筑会不会在战火中被毁而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在国民政府的新闻媒介中被骂为洪水猛兽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却宁可付出更大的伤亡也要保护这些古建筑，这使他在感情上一下子和共产党接近了。他二话没说，马上和病中的妻子一起通宵达旦的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尚属机密的重要任务。虽然北京城最终和平解放，但这件事对梁思成的触动之大、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和平解放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主力的挥师南下，全国解放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应党中央的要求，梁思成夫妇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夜以继日地编写出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制，发给人民解放军的各个部队，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当年参与此项工作的罗哲文在纪念梁思成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回忆起这件事。他说：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立即要挥师南下和西进。党中央深知梁思成先生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梁先生提意见、想办法。这里还要补叙一下，我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日寇占领区抢救了山西赵城广胜寺的金代刻本“赵城藏”和其他文物古迹。周总理早有指示要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和里面保存的藏书。但由于对全国的古建筑文物分布情况还不熟悉，所以特地来清华请先生的。这一来正符合了先生要想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文物，为党为人民作贡献的心愿，他慨然应允了。于是他便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厚厚的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摺纸页、装订、包裱封面，都是如像出学社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的。一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蜡纸的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当时助教）的手笔。这里还得补记一笔的是，这一简目编者的名义为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以后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因创办清华大学营建系都在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全部来到了营建系，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特设立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以保证此一工作不致中断。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的条件日益困难，经费缺乏，教学任务的加重，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营造学社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这本《中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也就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份珍贵纪念和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份献礼。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对在广大地区解放时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怀念——忆我与思成师十事》（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古建园林技术》1986年第三期]

其实，这只是梁思成编写的第三份重要文物建筑目录。抗战时期，梁思成便受命编写过两份文物建筑目录，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份文物建筑目录大约完成于1944年的夏天。1942年6月4日开始的中途岛海战，最终以美军的胜利而告终。美国海军在此战役中成功地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环礁的攻击，之后，美军开始掌握对日作战的主动权，日军在亚太地区的全面进攻遭受严重挫折，太平洋战争胜利的砝码开始明显地倒向盟军一边。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战区，在经历了7年艰苦卓绝的殊死抗争之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到1944年夏天，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号角吹响，抗战胜利就要到来了。为适应即将开始的全面反攻的需要，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对沦陷区的重要文物建筑实施必要的保护。正在李庄潜心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被紧急征召至重庆，在受聘担任这个委员会副主席的同时，接受了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尽快编写出一份沦陷区重要文物建筑目录，并在盟军使用的军事地图上详细标注，以便在发动军事进攻时，尽量让炮口避开这些建筑古迹。目录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编好之后下发至各战区和盟军飞行员。由于涉及军事秘密，梁思成后来很少提及此事，至于这份珍贵的文物建筑目录究竟在后来的战略反攻中发挥多大作用，保护了多少座古建筑，我们无法作一精确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梁思成的学识和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国民政府和盟军的一致认可。此外，还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充分肯定。据费慰梅回忆，梁思成编写的文物建筑目录曾传到了正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手上一份，并

引起了他的注意。或许，正是通过这份目录，周恩来知道了梁思成，并在北京解放前后，点名约请梁思成主持标注北京城内的文物建筑古迹并编写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目录。

编写完沦陷区古建筑目录之后不久，梁思成又接受了一项更为机密的任务：编写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目录，同样在盟军的军事地图上予以详细标注。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盟军已经占据了太平洋战场的绝对主导权，其轰炸机开始频繁光顾日本本土。虽然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日本政府罪不可恕，但为数众多的日本古建筑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毁于战火，实在太可惜了。接到任务后，梁思成二话没说，立刻带着助手罗哲文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将标注好的地图和古建筑目录交给盟军的时候，梁思成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的毁灭性打击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均可炸，但京都、奈良两座城市需保护，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由于日本的负隅顽抗，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不断升级，东京、大阪等城市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但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盟军始终没有对古老的京都和奈良进行毁灭性轰炸，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两座古城最终得以完好保存。

正如自己一贯的为人处事风格，梁思成从来也没有将京都、奈良两座古城免受盟军轰炸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更没有去宣讲、张扬，加上当时所做的工作属于军事机密，知情者甚少，所以，战后多年，日本人都一直在猜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大和民族的文化之根得以完好保存。应该说，对于一位痴心于古建筑保护、并将其视为自己终生理想与梦想的学者而言，有什么褒奖能比得上经过自己的努力而使一座座古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更有成就感呢！

如果不是41年后罗哲文的一番考证，也许，梁思成当年为保护京都、奈良所做的努力还真的就湮灭在历史的陈迹之中。下面是罗哲文对这段往事的记述。

由于时过四十年，这件事早已沉于脑海之底了。还是去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才把它钩沉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管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的讯问我，说是在日本奈良、京都近年来传说着这样一件事，当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的时候，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唯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得免于难，不知何故。有人说是美军中的学者建议的，而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管谷先生知我早期从学于梁思成先生，那一时期在中国营造学社和梁先生一起，希望我能证实这一事实。于是我这才想起了重庆描图这一事情来。

那是1944年的一个夏天，思成老师告诉我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乡巴佬进城我当然很高兴，干什么工作他没有具体讲，但是我想他既然要我去，他是知道我的能力的，一定能做的。就是有困难，有他在也不要紧的。于是我和他二人便高高兴兴顺流八百里而下了。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却住在另外一座小楼里。他每天拿了一捆晒兰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我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祯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察到是不宜多知道的。

一经提起，我很快的回忆起来了，因为此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入城市，有两个事从未领略过的，一是电话我初次打交道，开始真把听和说的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激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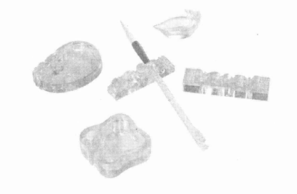
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郑孝燮同志还又提供了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他对日本古都古建筑感情如此之深，当遇到要对日本进行轰炸的时候，提出建议保护古都和古建筑，是很合情理的。

当我和郑孝燮同志以直接参加和从旁作证，证实了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失败被炸时，奈良、京都得免于难，大量国宝文物得以保存，日方朝野均以“古都的恩人”的敬语来称赞梁思成先生。

回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讯问了宿白同志，他说他确是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中听说过，他曾经建议过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怀念——忆我与思成师十事》（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古建园林技术》1986年第三期］

# 第六章

## 新时代，大贡献



## 一、国徽、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1月底，北京解放了。随着傅作义同意接受中共和平改编军队的消息的传出以及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北京城，一直在京郊清华园为城内外众多古建筑命运深深忧虑的梁思成如释重负，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他当然希望自己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同时，能为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是诸多拒绝逃离大陆，选择留下来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林徽因就专门谈到过她个人的体会，她说："中国'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现在我们的病基本上已被我们最伟大的'医师'治好了。新生的中国正在向康复的大道上走。"（《〈城市计划大纲〉序》，《林徽因文存·建筑》，173页）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建筑师自然不能落伍，林徽因指出："祖国的解放为我们全国的建筑师带来了空前的大转变。我们不但忽然得到了设计成千上万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办公楼的机会，我们不但在一两年中所设计的房屋面积就可能超过过去半生所设计的房屋面积的总和乃至若干倍，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劳动人民。我们是为祖国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建设，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建设的一部分而努力。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将是这新时代的和平民主精神的表现。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重要意义，在今天，任何建筑师，无论在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中，都是最活跃的一员。我们为这光荣的任务感到兴奋和骄傲。但是我们也因此而感到还应当以更严肃的态度担负起这沉重的责任。"（《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林徽因文存·建筑》，183页）

解放之后北京的名称由北平被重新恢复为北京，并被确定为即将诞生

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新政权建设过程中，向来远离政治、专心致志从事古建筑研究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推向了时代的风头浪尖，从此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来，旧中国不仅国力衰弱，一穷二白，基础建设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建设任务迫切而艰巨。新政权成立后，立即掀起了国家恢复与建设的高潮。作为一名在古建筑保护、艺术设计、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知名学者，加上一贯的爱国言行和在关键时刻拒绝跟国民党逃走的表现，使得身为清华大学营建系系主任的梁思成很快便被纳入到中共高层的视野范围，尤其是在北京尚未解放之际，他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人民解放军交给的标注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任务，更加深了新政权对梁思成的信任。我们不用再去更多地探求梁思成晚年为什么违背青年时确立、并坚持多年的不从政原则，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和政权的权力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何况，近代以来倍受欺凌与压迫的中华民族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这对于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强烈震撼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一直重病卧床的林徽因都为新生的社会激动不已，“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建筑师林徽因》，100页）年轻人更是为这个新生的社会而欢欣鼓舞。1949 年 3 月，正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三年级读书的女儿梁再冰毅然决定暂时中断学业，报名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很快便随同解放大军南下，成为一名年轻的革命战士。

北京解放之后，梁思成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中共委以重任。先是受聘

担任顾问，参与筹建中央直属修建处，之后的头衔则更多了，包括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南海怀仁堂建筑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50 年 1 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解放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梁思成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清华园和北京市区之间。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讲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不难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梁思成可谓“官运亨通”，但基本上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参政、议政，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从政。而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任职，又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使他有机会为他所挚爱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去奔走呐喊，尽管他的努力所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且很快便让他吃尽苦头，几乎成了一名政治的“弃儿”。但也有例外，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以其特殊的学术和政治身份，先后参与了新中国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评选工作。鲜红的五星红旗，庄严的国徽，高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如今已经成为人民中国的标志，可今天的人们还知道吗？它们之中处处浸透着梁思成的汗水和智慧。可以说，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师生，成功地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在 1949 年之后最辉煌的成就。为了实现这一切，他和林徽因几乎以生命为代价。

1949 年 7 月 1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海内外同胞公开征集新中国国旗和国徽的图案以及国歌词谱。8 月，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梁思成、徐悲鸿、艾青等受聘为顾问。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国旗、国徽无疑都是最重要的标志，无论艺术水准，还是政治含义，要求都非常严格。梁思成除担任“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外，还和林徽因一起，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成立了设计小组，积极参与国旗和国徽的设计工作。相对来说，国旗设计方案的产生过程比较顺利。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决议：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紧接着，政协决定由梁思成负责领导

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汇总修改意见，确定正式的国旗图案。经过通宵达旦的工作，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师生不仅确定了正式的国旗图案，而且为即将公布的国旗图案绘制了第一张施工图，并采用坐标法规定国旗的比例和五星大小与位置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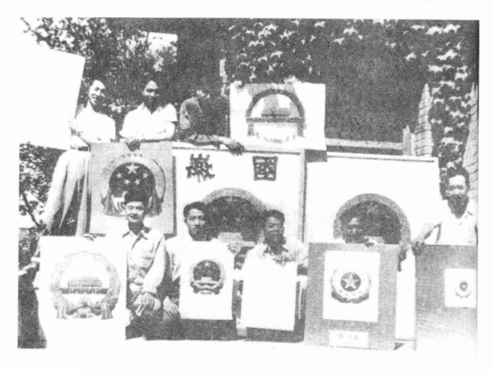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梁思成还参与了国歌词谱的选定工作。虽然没有专门从事音乐研究和创作，但年轻时期的梁思成可是一名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的“小音乐家”，再加上自身深厚的历史修养，他在国歌的选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思成曾颇为自豪地写信告诉女儿：“关于国歌之选定，张（奚若）伯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时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制成，而在抗日期间极有功劳的一首歌。……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说法国马赛曲就是一首军歌，也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词，是历史性的歌词。……我们虽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是‘做奴隶的人’，但那是历史性的。……于是我的主张得以胜利的通过。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建筑师林徽因》，79—80页）对于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太熟悉了，当年流亡长沙期间，梁思成就经常指挥避难于此的教授们高唱此曲。多年以后，儿女们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激动不已。

国徽图案的征集设计工作则颇费一番周折。一是由于初期公开征集的方案设计水平都不太高，没有一份符合评选委员会的要求；二是在于是否将天安门作为主题设计进国徽图案存在较大分歧。对于前者，全国政协决定不再漫无目标地向全社会征集方案，而是特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建系分别组织人力，集思广益，取长补短，重新拿出高水平的设计方案。对于后者，则进一步组织讨论，以统一思想。对于在国徽中使用天安门图案的意见，梁思成一开始并不赞成。甚至当中央领导已经明确表态，全国政协一届五次常委会已经通过了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图案之后，梁思成依然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的形象



1950年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部分成员（左起前排罗哲文、朱畅中、张昌龄、胡允敬、李宗津，后排汪国瑜、莫宗江、高庄）



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基于此种理念，他指出：“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梁思成全集》第九卷）应该说，梁思成更多的是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考虑天安门在国徽图案中的取舍，而支持采取天安门图形的意见则更多的是从政治含义上考虑，在他们看来，天安门已不再象征着封建皇权，而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代表，并且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形象标志。后者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不仅中央的高层领导明确表示认可，张奚若、茅盾等一些知名学者也予以赞成。

在就国徽图案内容进行争论的同时，设计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工作。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梁思成不仅将党中央和全国政协的意见及时地传达给设计小组的成员，更在设计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大量的心血。超负荷的工作使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和林徽因两人几乎轮流生病，有时甚至虚弱得连话都不能多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依旧是他们生活的主题。工作室不能去了，干脆就在病房和同事们讨论设计方案。在很多纪念梁思成的著作中都收录了这么一张照片，病中的梁思成躺在床上，枕边到处都是国徽的设计图案，他正聚精会神地和站在床边的林徽因讨论着对设计方案的意见，他们是在以生命作代价为新生的人民中国设计国徽啊！

1949 年 10 月 23 日，林徽因率先拿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由林徽因、莫宗江设计，提供技术意见的有梁思成、邓以蛰、王逊、高庄等。在他们提交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详细地阐述了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案，“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

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这个方案虽然未被采用，但却为后来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创意。林徽因等人“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人国徽图案，用五星体现新中国‘政权特征’，并把国徽和国旗联系在一起的创意，被后来正式确定和颁布的国徽所采用；‘嘉禾缀以红绶，红绶穿瑗为结’（而‘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建筑师林徽因》，117—118页）

以此为开端，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展开了一场设计竞赛。他们互相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设计小组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的设计思路和改进方案不断涌现，国徽的设计也日趋完善和成熟。这期间，中央美院的设计小组做出了一个以彩色的斜透视的天安门为主题的新方案。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在对送审的国徽图案审查之后，政协常委会正式决定国徽采取天安门图形。6月1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图案。转天上午，梁思成便将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全部请到新林院8号的家中，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尽快拿出新的设计方案。朱畅中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清华参加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的每一位教师，都分配有不同的任务。各人分别搜集自己所需的参考资料、设计细部、位置和整体的关系，大家又都参加整体构图布局的讨论研究。每一轮中大家提出一些方案设想后，就在梁、林两先生的主持下，集中成几个整体图案，加以推敲、调整、修饰，筛选出一个或几个方案。然后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立即进行绘制彩色工整的图案送审。”（《建筑师林徽因》，119页）

6月下旬北京的天气已十分炎热，挥汗如雨的设计组成员似乎早已忘却了一切，争分夺秒完善方案，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望，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就在紧张而充实的忙碌中度过了。6月15日、17日，中央美院和清华大

学分别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国徽设计修改方案和设计说明。尽管两份修改方案都按照上级的要求作了大的改动，均“采取图案为天安门图案”，且增加了稻穗等内容，但清华的方案却在以往的基础上再次作了更大胆的突破，“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天安门不再是惟一的内容，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到的篇幅，更多的空间则让给了“国旗上的金色五星”，把一个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天安门置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国徽采用金红双色浮雕造型，极富中国特色。红的底色配上五颗金星，正是一面满天空的五星红旗。这一大胆的突破，不仅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征，而且整体画面显得更加庄重和协调。对于这个方案，参加全国政协国徽评选小组会议的李四光曾经作过一个中肯而精辟的评论，他告诉周恩来总理和在场的评委：“我看这个图案气魄大，天安门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真伟大；下边，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宏。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建筑师林徽因》，121—122 页）可以说，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处理“领导意图”和遵循设计规律等矛盾问题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给后辈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紧张的期待中，最终的结果就要宣布了。1950 年 6 月 20 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的全国政协国徽评选小组会议上，由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完成、融合了清华和中央美院设计思想精华的国徽设计方案最终中选。三天后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通过了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师生奔走相告，举校欢庆，整个校园都要沸腾了。我们可以想象梁思成当时的激动心情，但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人们恐怕没有注意到，过度的劳累使得病中的梁思成几乎无法站立起来，他是在病榻上和自己的妻子及同事们一起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及方案审查是梁思成夫妇献给新中国的又一份厚礼。今天，高大巍峨、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更成为永远耸立在中国亿万人民心中、记载着革

命先烈不朽功勋的丰碑。即使丝毫不懂建筑设计的人在瞻仰这座英雄丰碑的时候，也会对它磅礴的气势、独特的造型以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历史感和震撼力激动不已。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建国之初的那段岁月，再来重温我们的建筑大师们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光辉历程吧。

1949年9月30日下午，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会后，毛泽东和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工作也随即紧张地展开。根据中央的要求，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公开征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这一提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征求设计方案的公告发布不久，都市计划委员会便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方案180余份。这些方案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体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二是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这个意见主要出自一些雕塑家；三是用高耸矗立的碑形或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就其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则是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可谓种类繁多。

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方面、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经过激烈的争论，前两种方案被否定，基本确定了“碑型”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明确了，但具体的设计方案却难以让人满意。

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初选择的三种设计方案，虽然形式各异，但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即纪念碑碑身下的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类似天安门的台座。梁思成一直参与此项工作，并对碑的设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充分汲取各方意见精华的基础之上，梁思成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设计思想。在写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一封信中，梁思成简要而准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

>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
>
> 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

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结合自己所熟悉的古建筑设计实例，梁思成特意以北京的鼓楼和钟楼为例，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成功做法。“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鼓楼是一个横放的形体，上部是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圆券门洞。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的高度的‘额头’压住，以保持安全感。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们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

明确了设计图样的主要问题，梁思成又进一步指出：

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

就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而言，如果“塞入长宽约四十余公尺，高约六七公尺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此外，已有方案中“台的高度和体积使碑显得瘦小了”，比例上极不协调。

还有，就是在天安门台座下面“无端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

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太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基于上述理由，梁思成再次明确表示：“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

在阐述自己理由的同时，梁思成还绘制了各种方案的草图以更直观地说明问题。针对已有设计方案的不足，他初步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思想，并将绘制的草图同已有方案草图进行对比论证。他认为，就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天安门的关系而言，已有方案的“英雄碑显得十分渺小，纤弱，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弱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他提出的方案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起，挺拔而不纤弱，可以很好地与庞大，龙盘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针对已有方案碑身和台体的比例不协调的问题，新方案提出“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为瞻仰敬礼而来的人们设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来，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

此外，梁思成在信中还否定了“碑的四面各用一块整石，四块合成”的观点，也不赞成像传统的石碑一样没有碑顶。他指出，纪念碑“是一种类似塔型的纪念性建筑物，若做成碑形，它将成为一块拼凑而成的‘百纳碑’，很不壮严，给人的印象很不舒服”。因此，“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因此，顶部很重要。”后来，他提出做成“建筑顶”的建议。（《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27—130页）

梁思成的建议在领导和专家们中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建议多被采纳。纪念碑的底座改为坚实的平台，放弃了原来设计成三个门洞的方案。1952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彭真担任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被任命为副主任，同时，梁思成还兼任建筑设计组组长和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召集人。1952年夏，由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最后采用梁思成建议的设计方案，除碑顶暂作保留外，碑身以下全部

定下来，并立即开始基础设计和施工。碑高约为40.05米，从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正阳门城楼（高约42米），结构方面还考虑到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1954年11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碑顶采用梁思成建议的“建筑顶”，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浮雕的主题。1956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完工。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设计到完工，历时7年。我们暂且不谈论它所包含的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单就建筑设计本身而言，就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伟大的建筑。作为建筑设计负责人，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现代建筑学结构、审美原理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通过建筑本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成功背后，我们一方面为梁思成夫妇废寝忘食、甘愿舍弃性命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折服；另一方面，我们又从这些伟大的作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了梁思成对新生的人民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和一颗赤子之心。正如梁思成一贯倡导的，建筑创作要有激情，有想法，有立意，创作在其中，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浓厚的爱国主义不正是梁思成夫妇设计这些作品时的激情和不懈动力吗？

## 二、出色的教育大师

“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一代宗师的光和热》，《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6页）这是梁思成在给学生讲课过程中

经常所讲的一段话。这段精辟的表述引起了一位名叫李道增的学生的强烈共鸣，多年以后，这位已经取得显赫学术成就、成为海内外知名建筑学家的学生在一篇缅怀恩师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了这段话。其实，打开十卷本的《梁思成全集》，我们不难看到，从青年时代开始，梁思成的身上就有一种浓厚的教育情结，一种对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建筑师的情结。从白手起家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到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后言传身教培养年轻人，再到抗战期间靠微薄赞助携手中央大学举办建筑设计竞赛，直至抗战结束上书梅贻琦领衔创办清华建筑系，可以说，梁思成一生都没有离开建筑教育。应该说，这种自觉的培育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他那位可敬的父亲——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和专业背景下有所突破和创新。纵观梁思成的教育实践，不仅体现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更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和宽广的视野，使他在现代建筑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代教育大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思成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获得了很高的“职务”。乍一听梁思成拥有的众多头衔，人们总会觉得有些高不可及，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营建系系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要想一下子记住并全部说准确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熟悉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梁思成为人谦和，胸襟坦荡，对于他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事实上，从1946年重回清华创建建筑系开始，一直到1972年1月9日病逝，无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起伏跌宕，变幻莫测，但教师的身份和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和学生们在一起，梁思成永远是那么年轻而富有朝气。可以说，教育学生和进行古建筑调查与保护，是梁思成一生挚爱之所在。

回顾梁思成执教清华的点滴往事，以下三个方面，或许更能让我们领略一代教育大师的风格和品格。

其一，礼贤下士，广揽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和创办东北大学

建筑系时的做法一样，重回清华创办建筑系伊始，无论是已成名的大家，还是默默无闻、但极富才华的年轻人，只要是建筑系需要，梁思成都能不辞辛苦，诚挚聘请。这其中，既有刘致平、莫宗江等几位来自中国营造学社的经验丰富的古建筑研究人员，也有吴良镛、胡允敬、汪国瑜、朱畅中等一批富有才华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还有高庄等一些在自己专业领域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也正是靠着这股礼贤下士的精神，仅仅几年的时间，建筑系的师资队伍便迅速发展壮大，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对此，建筑系的学生感触颇深："无论是指导我们设计，或教别的课的老师，个个都有一'招'，都是很有学问的。师资阵容十分之强。梁先生很'爱才'，恨不得把天下之建筑英才都请到清华建筑系来。"（《一代宗师的光和热》，《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4—165页）

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是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元老之一。抗战胜利时，年仅24岁的他刚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一年。抗战最后阶段，吴良镛曾有机会协助梁思成整理沦陷区古建筑资料，对于其出众的才华，梁思成非常欣赏。当获悉梅贻琦先生同意自己提出的关于设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建议后，梁思成首先想到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吴良镛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大概是1945年的10月份，接到梁先生的信，"告诉我清华要办建筑系，让我去看他。他家刚从李庄搬到重庆，我见到林徽因先生躺在床上很清瘦，面色苍白疲倦。当时，房间里还有一位客人，他们正谈着，梁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傅孟真（傅斯年）先生'，看到我有些怯生，林先生说：'你们何不到隔壁房间去谈？'于是我和梁先生便顺着走到一个四壁空空、连坐凳也没有的空房间，梁先生站着告诉我，为了战后的复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当前，建筑教育太保守，他将去欧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办的系里任助教，共同创业等等。由于此前与梁有过一段愉快的共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退出，以免打扰他们和客人的谈话。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我做出一个抉择，从此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建筑师林徽因》，110页）1947年，梁思成

从美国讲学归来，又和林徽因一起起草了推荐函，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师从加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

雕塑家高庄先生的引进也很有代表性。高庄先生的艺术造型造诣很高，是一位真正的工艺美术大师，但个性强，脾气大，不易相处。对于引进高庄先生，建筑系内的同事多少有些顾虑，担心日后不好使用。梁思成明确表态：只要高先生有真本事，我带头让他三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庄先生不仅得到了梁思成及全系师生的尊重，和大家相处融洽，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徽设计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 年 6 月 23 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提出的国徽设计方案之后，需要尽快把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的浮雕模型。梁思成推荐高庄先生担此重任，并请徐沛贞协助工作。接到任务后，高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一向爱美爱得入迷，鉴赏力极高，而且眼到手到。再加上生性认真，从来不肯马虎，所以在塑造过程中，对方案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不管不顾地‘擅自’修改起来。幸亏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全力支持，一方面写报告向中央说明情况，一方面充分信任，决不干扰高先生的工作……多少日子之后，他带着满眼的血丝，右眼被台灯烤得近乎失明，完成了修改和塑造。一看成品，全系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不赞叹。”更值得钦佩的是，完成这么大的一项工作，高庄先生除了给学生们在讲课时作了一次专门讲述之外，此外再也没向外人提及此事。

还在重庆时，梁思成曾邀请老同学童寯和他一起来清华创办建筑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童寯一直在中央大学任教，未能北上清华。对此，梁思成一直念念不忘。1949 年 6 月，南京解放之后不久，梁思成便立即致信童寯，再次发出诚挚邀请。他说：“现在北京已安定下来，并且已开展了建设工作。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的建筑师，并且需要训练大量的新建筑师。我企盼着你早早的北来，华盖可在平设一分事务所，先立下基础。从清华及我个人的立场说，我恳求你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回来提携母校的后进。我已对学生说了多少次你早已答应过来清华，他们都在切盼。清华建筑系的师资太缺乏了，你若肯来，可以给我们无量的鼓励。因此双重原因，我恳切的求你毅然离开南京，来为母校养育后辈。我

知中大也需要你，但在宁沪的建筑师多，总可找个替身；而清华之需要老兄，却是迫切之至。”（《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2页）信虽不长，但态度之诚恳，溢于言表。虽然童寯最终未能来清华大学，但梁思成的招揽贤才的诚心由此可见一斑。

对莫宗江的关心和爱护也很具有代表性。1916年出生的莫宗江从小家境贫寒，小学没毕业便失学。莫宗江非常聪明，具有很高的美术天分。1931年进入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梁思成的助手。可以说，是梁思成的言传身教，带领他进入古建筑研究的博大殿堂。莫宗江曾回忆在学社期间的学习感受，他说：“常有人问我，梁思成是怎样培养我的，回想起来，梁先生是不爱讲大道理的，一切都是自己示范。如我画图时他常常来看，看着看着就说‘宗江你起来’，于是他就坐下来画给我看，而我也就是这样每天到梁的绘图桌前去读图，看他每天完成了哪些图，怎样完成的……在周末梁先生常常带我到他家去，于是他就和林先生把他们收集的最好的速写、素描、渲染，都是些精品，拿来给我看。这些都是我的教材，我喜欢哪张，他就让我带走拿回去细看。”在梁思成的指导下，加上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莫宗江进步非常快，不仅成为梁思成的得力助手，而且于1944年被提升为副研究员。抗战胜利后，随同梁思成到清华创办建筑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大家如云的清华园，未接受过正规教育，而能任教于此直至教授者，莫宗江不能不算是个特例。

梁思成不仅了解莫宗江的才华，更是十分爱护和欣赏。林洙曾经讲过一个“罐子的哲学”的故事。一次，梁思成指着教室中摆放的用于学生写生的一个陶罐和一个瓷盘，给在座的学生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他说：“一个盘子，你滴上几滴水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水面，你可以一眼就看见它有多少水。但是一个小口的罐子，你却看不见它有多少水，即使装满了，你看见的水面也只是一点点，你把它碰翻了，它洒出来的水也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留在里面。所以要知道盘子里的水绝对不如罐子里的水多，你要想喝到这些水并不容易。你们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但那只是一个盘子，是你自己看得最清楚的，一点一滴你都看见了。但是你们的老师则是一个罐，首先你要认识到他们的容量是很大的，要知道他



梁思成给学生讲“罐子哲学”

们的学问都装在肚子里，你是看不见的。老师所具有的本事和美好的东西不是你在课堂上就能看到的。不要只重视名人专家，要学会尊重你周围的人，而且要看到你周围人的本事，不要把自己的分量看得太重了。现在大家都很重视文凭，但是莫宗江先生没有那张可爱的文凭。他有时说说俏皮话，但从不宣讲什么，可是莫先生肚子里装着的几乎是仅只他才有的本事。《营造法式》一书彩画的颜色是错误的，谁又知道对的是什么样，但是莫先生知道。这些在他那小口的罐子外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周围的人，你们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与我》，183—184 页）

除了着力建设好、使用好建筑系的师资队伍外，梁思成还广泛约请校外名家来讲学，开拓学生视野，其中有常书鸿先生讲授的敦煌石窟，吴庆华先生讲授的彩色照明艺术，侯仁之先生讲授的历史地理，陈占祥先生讲授的城市规划，等等。

其二，关爱学生，悉心呵护。

前面已提过，1932 年梁思成写给他的第一批学生——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信中所流露出的那份真挚感情，对于那些与自己年龄相差不太多的学生，正如他自己所言：“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如果说青年时代、初为人师的梁思成将自己的学生当作弟弟妹妹一样看待的话，那么 1946 年重回清华的梁思成则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儿女，在精心培养之际，倍加呵护。

建筑系创办初期，图书资料十分匮乏，一些绝版的善本书更是稀缺。梁思成便把自己家中丰富的藏书毫无保留地面向全系师生开放。不论哪一名师生，都可以到梁家借书看，包括已经绝版的 Vigal 水彩集、Flinr 的英国水彩人物集等。梁家图书整天都在学生们手中传阅。久而久之，建筑系的师生几乎把梁家当作了公共图书馆。

其实，对于建筑系的师生而言，不仅梁家的藏书可供他们无偿使用，连梁思成、林徽因珍藏多年的绘画、雕塑作品都经常被拿到课堂上，甚至梁思成早年留学期间所作的学习笔记都送给了系资料室，以方便学生借阅。建筑系的很多学生都记得小陶猪的故事。梁思成家的客厅茶几上摆放着一

只明代的小陶猪，很是惹人注目。每有学生来家中读书或谈话，梁思成常常以此来考学生，问他们能否欣赏。如果对方摇头，他就会哈哈大笑说：等你们学会欣赏时就能毕业了。他不但要学生看，还要他们亲自去摸，去感悟陶猪断面细部设计上的精妙之处。

自创办清华建筑系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无论教学和社会活动任务多么繁忙，一年级新生的建筑概论课梁思成必定亲自讲授。据很多他的学生回忆，自己真正了解并喜欢上建筑学这个专业，就是从梁先生的建筑概论课开始的。很多外系的学生也是直接聆听了梁思成的教诲之后，才下定决心转入建筑系学习。

关肇邺一直清晰地记得当年梁思成的教诲以及自己的转系经历。

1948年春我在燕京大学理学院读一年级。一天，校长邀请刚由美国参加联合国总部设计回国的梁先生来校做学术讲演。我因仰慕先生的名气，也去听了。那次讲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特征"。这个题目，对于一个学理科的学生本不易引起太大的兴趣，但我却深深地被先生那渊博的学识和学者风度所折服。特别是先生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建筑是一面镜子，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会后许多进步学生均赞扬他的观点与他们偷偷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吻合，这更加深了我对先生的钦敬，并暗暗决心转到清华去学建筑。在那年清华校庆时，我到旧水利馆楼上那狭窄的建筑系馆去参观，看到建筑系所学的内容和涉及的各种学科领域后，更加坚定了学建筑的决心。虽然清华不承认我一年的学历，要重新报考一年级，我还是转了学。

开学之际，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他第一句对我说，"祝贺你是今年考进的唯一新生，希望你能学好。"原来那一年我们同年级十多人，全部是清华其他系的学生因对建筑有兴趣而放弃原来专业转来的或是由清华"先修班"来的，正式考入的只我一人。接着先生便把这十来个一年级学生都找来，简要地说明了建筑学的内容，最后说，"你们要仔细考虑好，愿不愿学这样的学

科，若不合意，现在转走还来得及。”并着重对我说，“特别是新来到清华的你”。我连忙说，“我认真想过了，我愿意”。先生是深感不少人因对建筑学的误解而投错了门，白白浪费了时间，因而在开学之初要提出警告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55—156 页）

后来，关肇邺学业有成，留校任教，不仅和老师一样桃李满园，而且作品获得多项国内外重大奖励，其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当选为北京 80 年代十大建筑之一，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获国际建协授予的特别奖。1995 年关肇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于恩师的无私帮助，敦煌研究专家萧默终生难忘，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梁思成的奔走努力，不仅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而且得以进入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领域。事情发生在 1962 年，有一天，梁思成突然接到一名建筑系毕业生从遥远的新疆伊犁寄来的求援信，这个学生就是萧默。原来，萧默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新疆伊犁州设计室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工作后不久，伊犁州设计室被撤销了，原有人员重新分配工作，萧默被调到一所中学任教。虽然教育工作也很重要，可与自己的专业离得太远了。万般无奈下，萧默想起了自己的大学老师。于是，他给梁思成写了那封求援信，希望老师能协助他回到专业岗位上工作。虽然和萧默并不熟悉，也没有太多的交往，但在梁思成的心目中，这些可爱的学生都是自己的宝贝，更是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他着急地对林洙说：“我们培养一个建筑人才要花六年时间（1966 年以前清华大学建筑系学制六年），培养一个建筑师国家要花好几万元，怎么能随随便便地使这些宝贵的专业人才学非所用呢？”这时，梁思成想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两年前，著名的敦煌研究专家常书鸿先生曾希望梁思成推荐一名清华建筑系的毕业生到敦煌研究所从事古建筑研究工作，虽然当地的条件也比较艰苦，但却是能发挥专业特长的理想去处。考虑到萧默的实际情况，梁思成决定推荐他去敦煌工作。之后

不久，梁思成在一次会议上恰好遇到常书鸿，很快便谈妥此事，并专程到文化部请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出面，妥善办理了调动事宜。萧默没有辜负老师的关怀，在敦煌工作期间，不仅很好完成了莫高窟窟前区总体规划等建筑和规划设计任务，而且在敦煌建筑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一名优秀的敦煌建筑研究专家，其著作《敦煌建筑研究》于 1989 年获文化部首届优秀文化艺术研究成果二等奖，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梁友松是梁思成的第一个研究生，进入清华后和梁思成的第一次见面就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象。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系主任，他身材瘦小，眼镜后面双目炯炯有神，还带着一丝孩子气的笑意，这是个和蔼可亲、乐天淳厚的长者。他说话时表情丰富，一手挟着香烟打手势，极富幽默感。我也夹在老同学中出神地听着，一下子我就觉得和这位高不可攀的系主任的距离拉近了，以后我在先生面前就一直是自自在在的，我相信所有的同学都会有同感。"

在著名建筑设计专家张德沛的心目中，梁思成既是他们的良师，又是他们的家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应邀参加一次盛大的国宴，赴宴归来，同学们围坐在老师周围，好奇地询问国宴的盛况。张德沛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梁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国宴的盛况，并勉励同学们好好学习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当他把目光投向我时，笑着说：'张德沛，你要是参加这次宴会的话，你一定会大饱口福啦！'因为在那次宴会上有一道特别的菜，那就是一盘鲜尖红辣椒，梁、林两位先生都知道我爱吃辣椒。接着梁先生又绘声绘色地描述：毛泽东主席走到他餐桌边，在祝酒的同时，劝说大家都来吃辣椒，并且说这道'辣椒'菜是'革命菜'。红军长征过雪山就是靠吃辣椒和烧酒来抵抗风雪严寒的。林先生在旁边风趣地说：'你不要再说张德沛啦！你当时为什么不带点回来！'又惹得在座的师生哄堂大笑！就是这样，我们的梁、林两位先生和建筑系其他老师，既是我们学生的老师，又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系里的头四班同学不到 30 人，老师们不仅知道我们的学业情况，秉性优缺点，而且连我们这些同学的爱称或绰号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其三，学识渊博，诲人不倦。

梁思成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讲课过程中大师风范得以充分展现。

关肇邺教授回忆道："常说好的教师若倒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但我感到对先生来说，至少应说是一大缸。他在讲课中时时涉及有关联的外围领域和中外历史、语言、艺术、书法、音乐、佛教哲学、工程技术、城市规划等。我们学生不多，大家围坐一桌，先生娓娓而谈，如谈家常，如数家珍，大家无不被他极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所感染。先生所讲到的内容，这些人类创造的文化结晶，大部分不只是来源于书本，而是经过先生的亲自观察，细心揣摩，有的是亲手测绘摹写甚至是他第一个发现论证的，是真正兼有丰富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由于学贯古今，兼通中西，所以旁征博引，一件事物可以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相应事物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印象深刻。"梁思成讲课时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同样令学生们终生难忘。"先生有极深厚的功底，这对我们更是最有影响力的样板。记得在建筑史课里，当先生讲到罗蔓建筑如何发展成为哥特式的，他边讲边画，从如何减薄了墙壁，出现了大窗，到如何加强壁柱，出现了扶壁、飞扶壁，如何加上小尖塔、吐水兽以及如何拉长了柱子，调整了比例，出现了筋肋和各种装饰，短短十多分钟功夫，把哥特建筑形象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同时黑板上也一步步地出现了一个极完整、极准确、极精美的哥特教堂剖面图和天花板仰视图。从大的间架比例到细部装饰，无不维妙维肖。"（《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56—157 页）

前面已经提到过，为帮助一年级新生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梁思成一直坚持给他们讲授建筑概论课。一门很普通的的专业介绍性课程，在梁思成的讲授中，妙趣横生，内容充实，令人回味无穷。几十年过去了，提起当年梁先生讲授的建筑概论课，沈三陵仍是记忆犹新且无限感慨。她说："先生的第一句话说，不满十八岁的同学请站起来，呼啦一下站起了约三分之一的同学。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果然你们是年龄最小的一班。于是他转身在黑板上只一笔就勾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与狗同等大小的小屋，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窝。他点了点头，又在狗的旁边画了一个大的房子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房子。先生笑了，在黑板上写上'尺度'两个字，然后说，

'这就是尺度'。"过了多年，沈三陵本人也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了，她说："现在我也是教师了，感到给初学的同学讲清'尺度'的概念颇费口舌，但先生当年那么简单生动地帮我们了解什么是'尺度'，这一课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梁思成关于"比例"概念的讲解仍是三言两语加上两幅图画，但同样传神生动。"一次先生画了一个小婴儿和一个成年人，然后又在成年人旁画了一个和成年人同等大小的婴儿，问我们这两个谁是大人谁是小孩，我们回答了，他说这就叫'比例'。建筑也和人一样，各种建筑有自己的特点和比例，如果尺度弄不好，让人看起来像个拔高了的小孩或缩小的大人，会很不舒服。"

对于梁思成的语言表达能力，李道增同样是感触颇深，他说："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梁先生一说话，大家都自然屏息聆听他的即兴讲话，从来都十分生动、风趣，从不干巴巴。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譬喻典故还来得多，间而引得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发人深省。他的确是位艺术家，讲话的'形象感'特强，情理交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的'理'闪耀着知识与智慧的光辉。他的'情'又像一团火一般的热。"不仅讲话水平高，讲课水平更让人钦佩不已。"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文化修养，他亲自给我们讲过四门课：设计原理，西方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绘塑史。'玄武'们（指建筑系的学生）都爱听他的课。没人打瞌睡。他给我们看他学生时代学建筑史的英文与德文笔记，以及建筑史钢笔画插图，简直一笔不苟，功夫真是到家了，令我们赞叹不已，顿感需要发奋像他那样下苦功夫。他不但外文那么流利，中文与古文功底深厚，文章写得漂亮，思维的逻辑性与用语言创造形象的能力，恐怕是建筑界同时代与后来者鲜有能赶得上的。"（《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7 页）

课堂上的一分表现，课下都要付出十分的辛苦。梁思成曾对他的助教胡允敬说："别看我在黑板上画得这样熟练，在讲课前，不知默画了多少次呢。"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做人与做学问并求是梁思成的又一风格。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他是以他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全

系。梁友松至今仍记得上学时的民主气氛，“那时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固然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或者在做渲染透视图时助一臂之力。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因为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听蔡方荫和侯仁之的讲座，一道跳土风舞，一道和老师们过节联欢，一道进城去游行，所以虽然在年龄和学识上有差异，但这四个年级的同学感情竟如同班一样，我后来觉得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让大家互相影响，互相取他人之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混成一种朴质的学风。这就是不苟同也不固执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汇集。”

梁思成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尽一切努力把学生的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趣味才能上得去。如果只顾练‘技巧’，艺术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一贯重视理论，理论丰富人的思想。有思想理论的人洞察力敏锐，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却能捕捉到。他说：‘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建筑师所见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比一般人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65 页）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关肇邺对此感受很深，他说：当年，梁先生常常对学生说：“希望你们喜欢自己的职业，建筑创作要有激情，就像画家一样，一张好的作品，得有那么一种激情，否则这张画在技巧上不论多高明也是只有匠气，而无灵气。同样建筑师不是把一些东西堆砌起来，画出

来。建筑师得有想法，有立意，创作在其中，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不要挑挑拣拣的，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你才能体会到，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建筑师，这个职业是个很好的职业。一定要把感情放进去，比如巴黎的公共厕所就设计得非常好嘛。”

梁思成的学生费麟回忆道：“梁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正确的，改正自己错误的，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梁先生不仅学问渊博，更可贵的是做人的品格，从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他受到批判，但有些观点他仍然坚持。”梁友松对此也体会很深，他说：“我认为，梁先生对我的教诲中最使我受益的乃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在同样的原始基础材料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所谓见仁见智之不一，但最不可取的乃是罗列獭祭，鹦鹉学舌，拾人唾余的做法。”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梁友松的一句话大概可以代表学生们的心声，“梁先生给我的教导，最主要的还不只是在业务上，而是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和信赖，以及在逆境中，带点幽默感的泰然自若”。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乐地成长，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梁思成似乎又忘却了一切烦恼，回到了清华园，回到自己的学生们中间。

## 三、生死不渝“黄昏恋”

1948年的一个秋日，梁思成像平日一样，神采奕奕地走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的楼道里。他身材瘦小，略显驼背，穿一身讲究的西服，戴着一副

宽边眼镜，显示出儒雅的学者风范，同时，还有一点滑稽幽默的神态于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他刚从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归来不久，系里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去处理。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文静的女孩子，20岁上下，长得十分秀气，看她的神态，似乎对建筑系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景仰。看到面前的这位女孩子，梁思成立即想起了妻子曾告诉过他的一个新认识的小同乡，应该就是她吧？迟疑一闪而去，梁思成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言语亲切而不乏幽默。他猜对了，面前的女孩子正是林洙，一位年仅20岁的高中毕业生，刚刚从上海北上清华求学。来清华后不久，她就拜访了自己仰慕已久的福建同乡林徽因，并得到林的热情帮助。对于梁思成的轻松提问，年轻的林洙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几乎是在这同时，她也马上断定，面前这位幽默而热情的中年学者肯定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

梁思成和林洙的相识似乎颇为平常，但又是那么默契，或许正是这种默契预示着今后会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不管当时的情景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初次相见的梁思成和林洙恐怕谁都没有想到14年后，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有缘千里来相会，也许今天的我们能这么说：他们的缘分就是从此开始的。

抗战期间的流亡生活彻底夺去了林徽因的健康。抗战后期，上海曾一度传闻林徽因患肺病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去世，境况很坏。传闻虽然不属实，但林徽因的健康状况确实非常令人担忧。1945年11月，著名的胸外科医生、美国人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林徽因体检后，曾无奈地告诉梁思成，林徽因也许只能再活"五年"。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在北京的白塔寺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加上大大改善的医疗条件和梁思成的精心护理，林徽因的身体状况竟然得到了很好的恢复，甚至一度可以从事教学和文艺创作。新中国成立前后，满怀激情的林徽因再次焕发出了无限的艺术创造力，除去精心指导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她还抱病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之后她又带领助手莫宗江、常沙娜等人，开始抢救几近失传的景泰蓝工艺。很多时候，林徽因甚至根本不去顾忌自己已

经非常衰弱的身体，深入民间工场作坊考察景泰蓝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并以惊人的毅力和助手们一起研究设计出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和配色。随着他们设计并试制成功的一批具有浓厚民族特点和时代气息的景泰蓝工艺品的问世，终于使得濒临消亡的景泰蓝工艺起死回生。但很遗憾，病魔再次扼杀了林徽因的艺术创作激情。1954 年秋，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很快便失去工作能力，年底，住进同仁医院。

就在林徽因病危之际，一直深爱她的丈夫梁思成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与磨难。

一是病痛的折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同样极大地摧残着梁思成的健康，重回清华之后，虽然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长期繁忙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国徽期间，他和林徽因几乎是轮流生病，在病床上完成了国徽的设计任务。1955 年 1 月，梁思成再次病倒了，经检查是肺结核，不得不住进了同仁医院，就住在林徽因病房的隔壁。

二是政治上的打击。1955 年 2 月，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梁思成在政治上被冠以“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反动帽子而受到无端的指责和批判。坦率地讲，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批判以及莫须有的罪名对梁思成的打击要远远超出身体上的疾病。从此，梁思成再也没能走出政治斗争的泥沼与漩涡。

1955 年的初春，对于梁思成来说无疑是极度压抑和痛苦的。抛却自己的磨难不说，与亲爱的妻子近在咫尺，但却眼看着她倍受病痛的折磨而无能为力，梁思成不禁泪流满面。3 月 31 日深夜，看望过林徽因之后，梁思成回到自己的病房休息。未久，林徽因忽然意识清醒了，弥留之际，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护士，她要见一见丈夫。护士却毫不理会她的要求，告诉她：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再也没有力气等待了，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一代才女林徽因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对于梁思成来说，共同生活了 27 年、一生挚爱的妻子的去世是一个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了亲爱的徽因，他怎么

活下去呢？事实上，很多好心的朋友也都为他捏一把汗。

好在后来紧张的政治气氛稍稍缓和一些，梁思成也从悲痛中暂时解脱出来，继续着繁重的工作，努力探索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繁忙的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的空虚，但心灵的孤寂却愈发暴露出来。毕竟，他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的人，他从不畏惧任何困难，哪怕面对死亡，但他害怕孤独，他需要精神的慰藉，需要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谈心、交流的亲人，但他却没有，甚至连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同时，整日忙碌、而又年岁不小、病痛缠身的他也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此外，林徽因的母亲已年逾七旬，一直由他一个人照顾，既不太方便，更显得力不从心。

林徽因去世后，也有不少同事、朋友和领导关心梁思成的生活，提出要给他找个老伴，还有一些女士仰慕梁思成的大名，毛遂自荐要与他结为伴侣，但他都没有答应。生性幽默的梁思成曾经戏述自己的择偶标准为"三要"和"三不要"，即老的不要，丑的不要，身体不好的不要，反之，则可以考虑。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出于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等种种世俗的顾虑，梁思成尽管十分渴望重建一个温馨的家，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是将这一愿望悄悄地藏在心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 ……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的清静。……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
>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0页）

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令人欣慰的巧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林洙又一次走进了梁思成晚年的生活。梁思成的感情"真空"再也不能坚持，那

看似平静的生活在理解、信任和爱的力量感召下，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开始了。

林洙于192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8年刚刚中学毕业的她从上海来北京，希望能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继续求学。在清华，她结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很快成为一个受梁家欢迎的年轻朋友。事实上，从相识之时，林徽因就给予了年轻的林洙以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林洙在有关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中多次提及他们给予自己的帮助和指导，她说：当林徽因得知自己初到清华，生活、学习等方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安排妥当，便"问起我的食宿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工字厅食堂入伙。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访了吴柳生夫人，并和她谈好让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吴家去了"。由于时局的动荡，清华校方为迁校的问题斗争得非常激烈，因此没有办先修班，林洙原先的计划就落空了。得知这个消息，林徽因又主动提出来亲自辅导她的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

北京解放后不久，林洙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程应铨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她先在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1953年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梁思成领导的《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绘图，后在系资料室从事资料管理。事业上积极上进的林洙在家庭生活上却很不幸福，她和程应铨的婚姻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在努力摆脱失败婚姻给生活造成的阴影的同时，林洙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由于在建筑学界的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从政毫无兴趣的梁思成除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职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繁忙的工作令他应接不暇，他每天都要接到大量资料和信函，而他本人哪有那么多空余时间来归类整理。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用梁思成自己的话说，他本人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字纸篓"也

就越来越大，简直要把他埋起来了。吴良镛看到梁思成面临的窘境，决定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帮助梁思成整理资料。这个人就是林洙，当时她正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工作。

梁思成对林洙的到来深表欢迎。林洙主要帮助他整理各种信函和资料，同时，由梁思成口授，代写一部分简单的回信。很快，杂乱无章的梁家变得井井有条。工作之余，他们也谈论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从文学作品的欣赏到彼此的生活经历。渐渐地，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梁思成还是他的一贯风格，常常是一个思考敏锐、言语不多的忠实听众；而腼腆的林洙则成为聊天的主角。她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因为在梁思成的面前她可以如此无拘无束地将她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一一倾诉，而这恰恰是她以往的情感生活所缺乏的。梁家的客厅因为有了他们这么热烈、真诚的谈话，而少了几分冷清，多了些许温馨。许多年以后，已经年迈的林洙回忆起这一段日子，仍旧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她这样写道："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39 页）

爱情的力量是林洙"说不清楚"的。正是在相互之间逐渐加深的信任与理解中，林洙和梁思成相爱了。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以往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恐怕在此之前，彼此都从未把对方作为自己在情感方面的选择对象，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吧；一切又是那么的自然真挚，是信任和理解使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再到倾心相爱，这其中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卿卿我我，更没有海誓山盟，但在真诚的信任和理解中构筑的爱是如此的纯洁和牢固，恰似一股涓涓清流，悄悄地滋润着梁思成和林洙的情感空间，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两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再也无法将他们分离开。

既有激情、又不失冷静思考的梁思成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升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将自己对林洙的爱恋之意勇敢地表达出来，而所用的方式

则既传统又充满浪漫情调——他写了一封自己称为“申请书”的求爱信。浓浓的暖意和诚挚的情感洋溢在质朴的话语中，尽管其中也流露出一丝的世俗的胆怯和顾虑。这里我们摘录了信中的几个片段：

“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

“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0—241 页）

如果用“情深意重，严谨而不乏幽默”来概括这封信的内容恐怕再贴切不过了。面对自己所爱的人，梁思成敢于主动冲出世俗的羁绊，去坦诚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我们真应该为梁思成迈出这一步而感到高兴。此时，最幸福的人莫过于林洙了。应该说，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梁思成，尽管她的顾虑和压力可能比梁思成还要大，以至于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一旦这“幸福”突然降临的时候，她就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而幸福地陶醉其中了。在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沧桑之后，梁思成和林洙真诚相爱并最终成为伴侣。这种情感就象是一泓秋水，平静、自然的表面下蕴涵着无限的激情，一种对爱情、对生活、对事业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

当年，梁启超戏称梁思成和林徽因要经过地狱的磨练才能走到一起来。历史竟会有着惊人的雷同，晚年的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竟然又要经受种种磨难才能如愿以偿。只是，当年的磨难主要出自内因，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性格和思维习惯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差异，需要慢慢磨合；而现今的磨难则完全出于外部，传统思维下的社会舆论和梁思成的亲属们的坚决反对。梁思成的弟妹们甚至联名给他们尊敬的二哥写了一封措辞颇为严峻的“抗议信”。一时间，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关于“林洙想做建筑界第一夫人”的传言也不胫而走，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坦率地讲，即使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也同样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毕竟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长达两千余年的古老国度，落后、保守的封建意识并不会因为封建皇帝的垮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还会继续在社会生活和人的头脑中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更何况，梁思成的弟妹们对哥哥晚年婚姻的干涉还不仅仅由于封建意识在作怪，其中更多的是浓厚的手足之情，他们惟恐年纪比哥哥小近30岁的林洙是贪图金钱和地位才嫁给哥哥，到头来，使得老实、善良的哥哥吃亏上当。我们丝毫不怀疑梁思成的亲人们因为关心、爱护他才竭力干涉他和林洙的结合，但在干涉梁思成的同时，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晚年的梁思成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

面对扑面而来的反对声，林洙几乎要顶不住了，她说：“在那些可怕

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3 页）在爱情经受考验的时刻，梁思成勇敢地将各种压力都给承担下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着心爱的林洙，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关心着她。只要在一起，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由于梁思成的特殊地位，他的婚姻风波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这其中就有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北京市政府召开一次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梁先生应邀参加。会后，副市长吴晗拉着梁思成说：‘思成，坐我的车，到我家来坐坐。’到了吴晗家里，吴晗说：‘前些时候，彭真同志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梁思成结婚，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嘛！’梁先生向吴晗介绍了林洙的情况，详谈了他们的结婚经过并说他与林洙相识已有 14 年之久了。吴晗同志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临告别时，吴晗又说，彭真同志让我转告你，他说：‘你告诉梁思成，我支持他们的婚姻！’梁先生回家后，非常高兴地对林洙说：‘现在，我们的婚姻得到了市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风雨之后，彩虹满天。梁思成和林洙终于顶住了种种阻力，于 1962 年正式结为夫妻，从此开始了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不渝的人生旅程。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梁家又时时回荡着欢快的笑声。梁思成的博学、幽默和林洙的聪明、贤惠相得益彰，可谓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林洙在她的回忆中讲了一件难忘的趣事。有一天，梁思成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林洙：“眉（林洙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林洙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知道。”梁思成依旧笑呵呵地说：“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担任瘦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这一下就把林洙问住了，她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两个协会，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妻子苦思冥想的样子，梁思成像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道：“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 44 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 45 公斤，一个 47 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

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讲到这里，梁思成又忍不住笑起来，边笑边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的林洙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并笑称梁思成是个专门骗人的“大坏蛋”。（《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8 页）

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流逝着，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和牢固。对此林洙曾颇有感触地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夫妻之间不能仅凭一时间热烈的爱情，还应有诚挚的友谊，如果没有诚挚的友谊，那么热烈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它早晚会淡漠。夫妇间要保持持久的友谊与爱情并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双方都付出执著不懈的努力。”（《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9 页）

尽管梁思成和林洙已经成为合法夫妻，但有一些人还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暂且都将他们的初衷视为对梁思成善意的关心（其实，有些人的用心恐怕并非善意），梁思成婚后的生活则给了他们最好的答复。谁都无法否认这么一个事实：梁思成和林洙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夫妻，他们的生活不仅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且，经受住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严峻考验。

1963 年开展的“双反”（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林洙被组织上错误地认为有贪污嫌疑，并对其展开了调查。有关部门负责人更是三番五次地找林洙谈话，要求她坦白交代错误。由于梁思成的特殊身份，整个建筑学界都在议论这件事，林洙所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其实，此时的梁思成所受的压力同样大，一面是国家法律、组织纪律，一面是新婚不久的妻子，他既绝对相信组织，又很了解和信任妻子，到底谁对谁错呢？梁思成陷入了苦苦的思索。理智又一次使他找到了正确的处理办法，在林洙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梁思成的一段话“解放”了她。梁思成很严肃地告诉林洙他的明确态度：“……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

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4页）正是这段冷静而不乏温情的话，给了林洙以很大鼓励，撇开个人委屈，积极协助组织调查，最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林洙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欢畅，不仅是为了自己终于摆脱了“莫须有”的罪名，更重要的是，林洙亲眼看到，在全系，全校，甚至整个建筑界都在嘲笑她是个贪污分子的时候，梁思成却能够泰然处之，丝毫没有冷落她，而且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帮她度过难关。对于一个家而言，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的呢？正如林洙自己所言：“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只明白了一点，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47页）

命运似乎总是在作弄善良的人们。正当梁思成和林洙沉浸在生活的和谐与幸福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许许多多学术大师一样，梁思成从一个受人尊重的著名建筑学家一下子被打成了罪不可赦的“反动学术权威”，无休止地批斗与迫害也随即而来。梁思成成了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对象，梁家也成了造反派们屡屡抄家的重点户。造反派们甚至勒令林洙必须和梁思成划清界线，限期离婚。他们这样训斥林洙：“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在邪恶面前林洙毫不畏惧，她以自身的行动给了造反派们最响亮的回答：决不离婚，要永远和梁思成在一起。这里，我们引用林洙的一段个人独白，其内心世界，清晰可见：

>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
>
> 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

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惟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77 页）

真挚的付出必然会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让林洙感到莫大欣慰的是，当初坚决反对梁思成再婚、并因此关系僵化的女儿终于理解了父亲的选择。

1965 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51 页）

残酷的迫害使梁思成原本已十分羸弱的身体彻底垮下了。此时的他工资被停发，存款被没收，各种待遇也被一并取消，造反派们唯一“赐予”他的就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吓倒林洙。对于年老病重的丈夫，林洙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去呵护他，照顾他，安慰他。她既是一位忠诚的妻子和助手，又是一位细心的保姆和护士。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压力，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林洙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洙依旧在交流思想。一次，梁思成很坦率地谈及自己对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认识，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显然大大违背了当权者的观点。耿直的梁思成甚至表示不愿意口是心非地写假检查，而希望像以往那样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他的这一想法把林洙吓坏了，如果梁思成真要把这些观点和盘托出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要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于是，林洙万般叮嘱梁思成，

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绝不可说给外人。看到妻子紧张的样子，梁思成似乎忽然明白了其中原由，他温和地笑着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这句带着几分酸楚的玩笑之语是那么的朴实真挚，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恐怕只有林洙才能完全体味出来。（参见《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梁思成病危住进医院后，尽管昼夜需要有人护理，但执掌清华大权的工宣队却丝毫不予理睬，甚至要求林洙每天参加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的学习，一分钟都不许请假。无奈之中，林洙每天既要参加学习班，从早上一直熬到深夜，然后再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照顾梁思成。而病得几乎连说话都困难的梁思成每天晚上都会像个孩子似的，等见到林洙，才肯入睡。每天早晨林洙一起床，他马上就会惊醒，一直目送林洙离开病房。

1972 年 1 月 9 日，梁思成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尽管他带着很多遗憾而去，但有一点，他是十分欣慰的，那就是，实践证明：他和林洙的结合是正确的，他们之间用信任和生命构筑的爱是牢不可摧的。

# 第七章　大匠的困惑



## 一、从梁陈方案到北京城墙

198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去世多年，国家科委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了他们，以奖励他们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从一方面看，这份姗姗来迟的国家级学术奖励确实彰显了梁思成夫妇在学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他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又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毕竟，梁思成夫妇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尤其是梁思成，从1955年遭受举国批判到1972年去世，其间又有多少机会和精力再去继续自己心爱的古建筑调查和研究呢？与革命群众拆除古建筑、建设新城市的强大声势和行动相比，他关于保护古建筑的呼吁声似乎显得太微弱、太渺小了，不仅很快淹没在革命者呐喊的声浪中，甚至连他本人也被淹没了，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革命群众任意批斗。或许，正是带着这种激愤和无奈，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在代替父母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表彰大会时不禁说出了一段心里话，他说：“梁、林二人都是1929年留学回国的。如果他们1949年回国，能得这个奖吗？”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将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推向了又一个顶峰。但无论梁思成，还是他周围的人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这一辉煌竟成为梁思成在学术上最后的巅峰。之后的十几年，除去兢兢业业地培养学生外，梁思成在学术上所遭受的批判要远远多于褒奖，除去“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卷）之外，甚至很少有像样的学术作品问世。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正常的工作生活中，梁思成都遭遇到了和许许多多著名学者

一样的命运。这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抑或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可以说，包括梁思成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直到弥留之际仍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梁思成在建国之后遭遇的学术悲剧及人生悲剧，开始于50年代初的北京市区规划和保护北京古城墙，而50年代中期在全国批判“大屋顶”运动中突然进入高潮。无可奈何的“失败”和席卷全国的政治批判使梁思成真正成为知名人物，不是作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而是作为一位满脑子封建复古观念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反面教员。这种颠倒黑白的批判造成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稀能见，有些人一提起梁思成，就会脱口而出：梁思成不就是“大屋顶”吗！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一件看似幽默、实则令人心痛不已的小事：1955年全国展开对梁思成的批判，有一天，梁思成来到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馆，瘦小的身上穿着西服，戴着宽边礼帽，学生们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思成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虽然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梁思成主要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但对于城市规划，他不仅不陌生，相反，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早在1930年，天津市政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市区规划建设方案，梁思成就和东北大学的旧同事，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市政传习所训练主任的张锐合作完成了《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最终拔得头筹。抗战中后期，考虑到战后国家将在废墟中重建，科学合理的规划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梁思成多次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重视城市规划，同时，积极开展规划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吴良镛曾专门谈起过这段往事，他说：“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先生不顾牙齿全部拔掉的苦痛，孜孜不倦地阅读沙里宁新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发，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发表于《大公报》上，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室梁先生的赠书中，有亨利·邱吉尔的《都市即人民》等书，页边都写满了梁先生注的中文提要，足见其用功之勤。”（《梁思成文集》，《前言》，第2页）受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他更是将城市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专业方向着力建设。在将学生分为建筑与市镇计划两组进行培养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

条件成熟时应将营建学系扩建为营建学院，下面专门设立市乡计划学系，“以城市或城市与乡村乃至一个地理区域或经济文化区域内多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为对象。目标在将农工商业，居住，行政，交通等等所需的地区作适当，合理，愉悦的分配，以增加人民身心健康，提高工作效率”。（《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9 页）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他多年来生活、工作的城市，更是一座历史悠久、古迹名胜荟萃的文化名城。作为一名古建筑研究专家，梁思成将对祖国的热爱突出地倾注在对北京城的热爱上。还在北京解放之前的 1948 年，梁思成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北平文物必需整理与保存》的文章，文中着重阐述了北京城的历史价值，指出“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是现存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因此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对这个“历史艺术陈列馆”的保护。

北京解放之后不久，中央领导便委托梁思成组织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和胡允敬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师，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1949 年 5 月，梁思成受聘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能够有机会参与主持新北京的规划工作对于梁思成而言是一个进行规划实践的绝好机会，他希望能提出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案，既按照现代城市规划解决好北京市区的长远建设、发展问题，又能解决北京这一历史名城的保护问题。9 月 19 日，梁思成上书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就开展北京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都市计划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联贯起来，其余一切工作，都是这两个大前提下的部分细节而已。”基于城市规划的特殊性，梁思成尤其强调新北京的建设要“慎始”，他认为：“我们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必须‘慎始’”，在“都市计划法规”未颁布之前，必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事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虽然部分是消极的），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

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梁思成全集》第五卷，43页）

做好新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好。其一，是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问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首先而且应该建设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一点是不会出现任何分歧的，但要不要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甚至在市区建设大批的工业企业，这在当时就成为摆在政府和学者面前的一个必须解答的突出的问题。其二，是政府行政中心区的选址问题。北京是一座古城，文物建筑众多，且原市区格局已基本确定。而大批党政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进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商业、交通、生活服务等相关机构和设施的出现，势必会给旧城区的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对于前一个问题，梁思成认为新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充分借鉴近代欧美大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口过密、交通拥塞和环境恶化等种种弊病。“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还兼像罗马、雅典那样的‘古迹城’……使北京成为招揽世界游客的‘旅客城市’。”一句话，北京作为一座历史古都，又是新中国的首都，不应该着力发展大工业，而应该将城市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

但显然，梁思成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难得到官方的认可的。鉴于旧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百年屈辱史，中共领导者在进入北京之前就确定了要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指导思想。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必须把北京“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旧有落后的城市变成现代化的城市。”而1949年9月16日来华的以阿布拉莫夫为团长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提出的北京市区规划意见也认为：北京作为首都，不仅应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北京市的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的25%，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北京的大工业。

梁思成的建议并未引起中共领导足够的重视。新中国的领导们对北京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是不容许丝毫动摇的。彭真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他告诉梁思成：毛主席希望北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并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既然中央和苏联专家组在北京市的工业化问题上决心已定，再作坚持也不会有结果，梁思成便集中精力研究政府行政中心区的选址问题。因为这一选择，无论对于新北京的建设，还是对于古老的北京城的保护和发展都有着太重要的意义。

在梁思成看来，“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是它的许多不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艺术的表现；如北京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中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美果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里，我们对它们宝贵万分是理之当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今后我们的建设，必须强调同环境相配合，发展新的来保护旧的，这样才能保存优良伟大的基础，使北京城永远保持着美丽、健康和年青。”（《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01—113 页）出于这种认识，梁思成于 1950 年 2 月与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合作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梁陈方案）及有关图纸十余张，并将建议书复印了一百余份送给了中央及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和领导。

梁陈方案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主张“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位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方案在详细阐述

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后，又从四个大的方面论述了"需要发展西面城郊，建立行政中心区的理由"，即"建设首都行政机关，有什么客观条件"，"旧城区内建筑政府行政机关的困难和缺点"，"逃避解决区域面积的分配，片面的设法建造办公楼（在其他工作区域内设法应付求得地址），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加增全市性的严重问题"，"在西郊近城空址建立行政中心区域是全面解决问题，是切合实际的计划"。同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状况的紧张，方案还专门论述了"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对于旧城区建筑政府中心的困难，梁陈方案明确指出："第一、北京原来布局的系统和它的完整，正是今天不可能位置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第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至少要大过旧日的皇城，还要保留若干发展余地。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足够的面积。"至于在具体工作、生活中的缺点，则更加突出地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导致人口膨胀，密度不断增加；二是建设行政单位，必然带来大量的旧房拆迁和居民安置；三是旧城建设大量现代化建筑，势必会改变整个北京景观，不符合文物保护原则；四是由于单位、人员集中带来的交通压力增大，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交通安全隐患；五是政府机关分散于旧城各处，办公与宿舍区的分离，造成联系的不便和时间上的浪费。而将行政中心放在西郊，且合理规划办公、生活区域，则可有效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梁思成全集》第五卷，60—81页）

和梁思成关于北京不宜大力发展工业的意见遭遇的命运一样，梁陈方案同样遭遇苏联专家和官方的猛烈反驳。苏联专家拟订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他们根据苏联城市建设的经验指出：政府中心区放在城外是不经济的，要把新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内，才能又好又快地解决配置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在聂荣臻主持的一次报告会上，梁思成与苏联专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针对他们的观点，梁思成强调：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内既不能适应行政中心本身的功能要求，也不利于古城保护，行政中心位置的选择是首都规划的关键，应予慎重考虑。在城市规划问题上，专家的意见固然是重要的参考，可他们没有也不

可能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双方争执不下之际，中央领导的意见使这场本应深入下去的讨论和研究草草划上了句号。苏联专家最后对梁思成说："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

尽管自己的想法受到苏联专家的批驳，但梁思成还是不愿放弃。梁陈方案出台之后的两个月，也就是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专门致信周恩来总理，重申早日确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总理汇报梁陈方案中对于北京行政中心位置选择的意见和建议。

但很遗憾，事实很快证明，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梁思成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中央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不仅如此，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专家的意见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梁陈方案被公开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是违背了中央的"一边倒"政策的。对于梁思成反对将行政中心设在市区的做法，一些中央领导颇为不悦。据说，过了十余年一位领导还在提及此事，言辞很是犀利，他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

所幸，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氛围还相对比较宽松，对梁思成、陈占祥的不同意见还只是内部的同志般的批判，并未无限度的上纲上线。但显然，政治斗争的阵阵寒意已经悄悄地袭来了。

1953年夏，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在动物园内的畅观楼办公，由市委领导主持，并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1955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梁思成虽然一直在都市规划委员会挂个名，实际上他已不再具体过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遗憾。尽管在后人看来，梁陈方案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对旧城区的改造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重视不够，可行性论证还不够充分，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一定困难，等等。但是，从梁陈方案和梁思成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论述中，我们能清晰

地感受到，他是在充分借鉴吸取了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整体环境保护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继而去定位城市的性质，确定行政中心位置。20世纪 80 年代，吴良镛和刘小石曾评价说："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梁先生做了不少工作，提出过方案和许多建议。他曾提出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建议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保存北京故都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限制旧城内新建筑的高度不得超过三层，以及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等许多意见，并为之写文章、作报告、奔走呼号，尽了一个建筑工作者应尽的职守。他在 50 年代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多是为此而作的。在建国初期，全国都在贯彻执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号召。梁先生当时能结合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一特点，提出重视环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保护文化名城的面貌等意见，现在看来，实在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梁思成文集》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和郑光中则进一步指出："1950 年，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曾提出在西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以保护旧城格局和面貌不受破坏，这一建议在当时经济条件下虽不现实，但还有不少合理成分，如'建议'认为旧城人口和建筑密度已比较高，不宜再挤进大量机关；'建议'强调了旧城格局的完整性及其在历史文化上的重要价值，要尽力保护好这一精华；'建议'还主张有计划建设新区，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减少交通压力等等。此外梁先生还主张不在旧区内建工厂。30 年来，实践证明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并有现实意义。"（《北京旧城传统格局与古迹保护探讨》，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室）

在过去几十年保护古建筑的实践中，遇到挫折已经是家常便饭，和世俗的权力相比，学者们显得太"渺小"和无力了。但如今却令梁思成想不通，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向北京市乃至党中央领导慷慨陈词，希望能采取措施保护古建筑。他告诉有关领导："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他甚至明确断言，"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如今事过境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深究当时党中央否定梁陈方案的是是非非。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不到50年，人们就已经后悔了。随着北京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到1981年工业用地占城市总用地的16%，工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43%，交通拥挤，人口稠密，供水不足，住房紧张，环境恶劣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大城市弊病几乎无一幸免，新建筑布局混乱，大量的古建筑被毁掉，被占用，或被任意改建。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北京的发展，影响着北京的形象。走了这么长时间的弯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人们才开始学会冷静地反思北京城区的科学规划。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作出四项指示，其中对城市定位具体阐述为："首都第一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神经中枢，是维系党心民心的中心，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更是强调指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工业中心说、经济中心说从此彻底退出了北京市的城市定位范畴。北京市陆续公布了对旧城区新建建筑高度实行限制的办法等一系列保护古城的规定和措施。走了30年的弯路，我们终于清醒了，尽管这种清醒还不很彻底，也不算全面，但毕竟我们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

关于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政府行政中心区选址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之后，旧城区的开发建设随即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随着大批新建筑的出现，和无数文物建筑被中央及地方有关单位占用，且内部任意加以改造，如何对待和处理历史名城和古迹的问题愈加突出和紧迫。这其中，最让梁思成揪心、并为之寝食难安的莫过于北京古城墙的存废和东西四牌楼的拆除等问题。为了它们的命运，梁思成奔走呼吁。

50年代初，为了促进北京城的改造，加快建设步伐，有关拆除城墙的言论就逐渐多了起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声音来自官方。至于理由，很简单：其一，"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其二，"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其三，"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其四，"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

皮，利用为公路”。一言以蔽之：“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全集》第五卷，85页）

虽然50年代初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拆除古城墙的现象，但危机已经显露无余，尤其值得忧虑的是北京市的文物和建设部门从未把城墙列入文物古迹保护的对象。北京市区的开发建设力度越大，关于拆除古城墙的声音就越响亮。这对于为保护古建筑忙碌了半辈子的梁思成来讲不啻于是一个晴空霹雳。作为一名古建筑专家，他清楚地知道北京城墙的价值：美丽的北京古城是一个由宽10多米全长近40公里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大城市，北京内城的很多门都是由箭楼、瓮城和城门楼构成的巍峨建筑，门楼是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在他的眼中，气势恢弘的北京城墙和整个旧北京城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和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孔庙、国子监、颐和园等同样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建筑，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而且堪称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一个历史现象辩证的发展的卓越标本。……至于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苏联人民称斯摩棱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项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10页）战争年代的连天炮火都未能毁灭它，如今，进入了和平年代，我们怎么能亲手毁坏它呢？而一旦毁坏，它就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风采了。梁思成开始为挽救古城墙而四处呼吁。

应该说，在保护古城墙问题上，梁思成的头脑始终是很清醒的。一方面，他怀着一腔真情大力宣传古城墙的文物价值，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共鸣和认可。正如他自己所言：“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

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另一方面，则在批驳主张拆城墙者提出的理由的同时，努力结合北京城市发展需要，就阻碍交通等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制定全面而极具前瞻性的古城墙开发利用方案。在他看来，随着北京城工业、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单纯的“维持原状”已很难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要想使古老的城墙焕发出青春的魅力，赢得劳动者的喜爱，必须下工夫做好开发和利用工作。为此，梁思成提出：“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首先，按照现代通行的都市建设规划，通常会采取将城市分为若干较小区域的作法，而古城墙正好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内担负起这个任务，利用它为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其次，对于阻碍交通的问题，则“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第三，关于古城墙是否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其势力的遗迹的质疑，则不必惊慌失措，因为“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有，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第四，对于拆下城砖用于市区建设的意见，梁思成干脆替他们算了一笔细账，看看究竟划算不划算。将近40公里长的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公尺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这些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的废料，“用二十节十八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运完”。更何况，这么大的工程，所浪费的人力、物力一定是非常惊人的。基于上述理由，梁思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城墙的确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予利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

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

在对拆除派的主张逐项批驳之后，梁思成为城墙的开发使用开出了一副独特的“药方”。他提出：

> 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甚至兴奋地预言：“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梁思成全集》第五卷，85—89页）

然而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有关部门和领导不仅断然拒绝了梁思成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把他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说，一位北京市的领导在会议上曾公开宣称：“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

从50年代初开始，北京古城墙在浩浩荡荡的群众大军“进攻”下，一点一点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复存在。1958年6月北京市委拟定的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除"，"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文革爆发之后，疯狂的革命群众更是掀起了最后一波的拆除城墙大潮。梁思成的心在为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消亡而流血，他曾对别人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新会梁氏》，353—354页）

拆除古城墙的余波尚未平息，革命者又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区的牌楼。1953年，围绕着牌楼拆迁的交锋又开始了。

牌楼、牌坊是老北京的重要街景。东四、西四各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东西长安街、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繁华地段也都有典雅、精美的牌楼，它们给古老的北京城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气质，成为老北京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但它们也未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士气高昂的建设者们在拆除城墙的同时，又将矛头对准了这些历史久远的美丽建筑。

罗哲文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 自从城墙城楼决定要拆之后，牌楼就成为"进攻"的主要对象了。一场论战围绕着牌楼而展开。主张拆的一方是认为牌楼妨碍交通，必须拆除才能解决。另一方不主张拆的认为，一要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二是可以用街心广场转盘方式来解决。我当时是"敬陪末座"的一名实际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此事。一是保，一是拆，各陈理由，各抒己见。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前辈或是领导，有郑振铎、张奚若、梁思成、翦伯赞、吴晗、薛子正等人。吴晗当时是副市长，主持讨论，他的主张是拆。此论遭到了这些专家们的坚决反对。思成先生据理反驳，并提出了从交通规划上解决矛盾的办法。
>
> 张奚若、翦伯赞、郑振铎等都力主保护。郑振铎是吴晗同志的老师，也未能把他说服。一连开了好几次会都未得结果，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怀念——忆我与思成师十事》（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

年而作），《古建园林技术》1986年第三期》〕

从1950年拆除东长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开始，到1954年1月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关于牌楼保护的争论整整持续了3年。这期间，开了无数次会，也争论了无数次。在一次会议上，梁思成和吴晗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据说吴晗一时情绪极为激动，站起来对梁思成说："你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里到处建起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但林徽因也参加了几次重要的古建筑文物保护座谈会，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作用等问题作了长篇精辟的发言。对于政府在北京文物古建筑保护方面的一些错误做法，性情率直的林徽因更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邀到郑振铎家聚餐，来宾还有刘敦桢、陈从周、吴晗等人。席间，对于吴晗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不作为，林徽因忍不住高声指责。据陈从周回忆，"那晚主要是谈文物保护工作。当然无可否认的，因为建国之初，急于基本建设，损坏了一些文物与古建，正如席间郑振铎同志呼吁的那样，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先生的感情更是冲动了，她指着吴晗同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桑，然而在她的神情与言辞中，真是饱含了句句深情"。（《林徽因集》序）

其实，学者们可能是把辩论对象搞错了。历史学家出身的吴晗或许没有对古建筑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恐怕还不至于连牌楼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不懂，可以说，他的"坚决反对"更多的来自他身后的组织和上级领导。学者们能够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观点，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即使理屈词穷，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贯彻领导的意图。实事求是地讲，不是吴晗缺乏足够的骨气和勇气，和政权的权威相比，个人能有多大作为呢？最终，吴晗还是以副市长的身份上报了一份对牌楼、牌坊的处理意见的信函："1. 为防止倒塌，保障人民安全，立即拆除羊市大街女三中前景德坊。拆除后它应迁地或就地保存；2. 东、西交民巷两个牌坊可立即拆除；3. 地

安门保存或拆除问题，以后再研究。”

在这场漫长的牌楼保卫战中，梁思成的焦急程度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他多次向各级领导面陈意见，甚至不惜与持不同意见的好友面红耳赤地激烈争论。吴晗在最后报北京市委的信函中也不得不承认“意见仍分歧，不能取得一致的，是旧都市风格，如东、西四牌楼和首都建设的矛盾问题。梁（梁思成）俞（俞同奎）主张保存，并认为是可以和新都市规划结合。”考虑到梁思成的身份和影响，最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和周总理恳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西斜、渐落西山时的美妙景致。周总理没有发表意见，显然，组织的决定是他也无法改变的。最后，周总理借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回答梁思成，其中的万般无奈，又怎能用语言表达得清楚？

## 二、飞来横祸大屋顶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格外重视民族性问题，体现在建筑设计领域，尤其强调新建筑的民族风格。大批援华的苏联专家，更是将民族形式问题提到了政治立场和阶级斗争的高度，他们要求中国的新建筑，内容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在外形上则要充分展示中国的民族形式，对欧美各国盛行的“世界主义”风格建筑，则视为抹杀民族特色的垃圾之作，坚决予以排斥。在苏联专家看来，“艺术本身的发展和美学的观点与见解的发展是由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还正在由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着。在艺术中的各种学派的斗争中，不能看不见党派的斗争，先进的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梁思成全集》第五卷，

186 页）1949 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专家组组长第一次与梁思成见面就提出要搞"民族形式"，并画了一个大屋顶以说明他的意思。穆欣、巴拉金等专家也无一例外地坚持搞大屋顶。

对于苏联专家强调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并不算陌生。所谓的"大屋顶"，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高高耸起的宫殿式的屋顶。早在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南京等地就曾兴起过一股建造"大屋顶"建筑的热潮，四五层高的楼房，下面是西式结构和外形，顶部却设计成凹型弯曲的宫殿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此来区别西式建筑。北京、成都、济南等地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其中还包括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等高等学府。坦率地讲，对于这种设计风格，梁思成是颇有微词的。1935 年 11 月，梁思成在其撰写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前二十年左右，中国文化曾在西方出健旺的风头，于是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也随了那时髦的潮流，将中国建筑固有的许多样式，加到他们新盖的房子上去。其中尤以教会建筑多取此式，如北平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四川华西大学等。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玻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北平协和医院，就是其中之尤著者。"（《梁思成全集》第六卷，234—235 页）对于这种所谓的"中国式"建筑，梁思成在之后的多篇文章中也曾提出严厉批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虽然梁思成一直专注于古建筑研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现代建筑设计风格的认可。他表示："这个时代的艺术，如果故意的避免机械和新科学材料的应用，便是作伪，不真实，失却反映时代的艺术的真正价值。所谓'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在这种观念上努力尝试诚朴合理的科学结构，其结果便产生了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衣。"

当然，这一时期，对于建筑师们为中国创造带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的努力，梁思成还是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说："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摹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架构，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但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创造新的既须要对于旧的有认识，他们需要参考资料，犹如航海人需要地图一样"。中国营造学社搜集整理的古建筑照片恰恰是最好的参考，可以帮助这些建筑师对于中国古建筑有一个较真切较亲密的认识。因此，梁思成组织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将这些古建筑照片"分门别类——如台基，栏杆，斗拱……——辑为图集，每集冠以简略的说明，并加以必要的插图，专供国式建筑图案设计参考之助"。（《梁思成全集》第六卷，235—236 页）

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氛围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巨大热情促使梁思成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在 1950 年 1 月营建学研究会的讲话中，梁思成明确提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寻找一条创造新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途径，设计建造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两年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新观察》上合作发表了《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一文，全面谈及建筑的民族特性问题，他们认为："建筑本身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筑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这已是今天中国大多数建筑师们所承认的原则。凡是参加城市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们都负有三重艰巨任务：他们必须肃清许多城市中过去半殖民地的可耻的丑恶面貌，必须恢复我们建筑上的民族特性，发扬光大祖国高度艺术性的建筑体系，同时又必须吸收外国的，尤其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满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众多而繁复的需求，真正地表现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精神。"（《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36—142 页）

尽管大家都在高喊建筑的民族性，尽管这一时期梁思成在建筑设计思想上更多地强调新建筑要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强调向苏联学习，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和理念培养新一代的建筑师，并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欧美的现代建筑提出批评，但实事求是地讲，在短时期内要弄清楚什么

才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新建筑，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还是古朴自然的木结构建筑？抑或是别的形式？恐怕没人能说清楚。连梁思成本人都承认：创造我们的新建筑“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老实说，我们全国的营建工作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去做。”（《梁思成全集》第五卷，55 页）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更多的是在号召建筑界同仁开展相关的民族形式的研究，同时，尽量搜集及整理值得参考的资料。

不过，在建筑的民族特性研究和探讨过程中，有一点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不能完全仿古。既要有传统特色，又要符合现代建筑要求，这成为建筑师们努力尝试的方向。梁思成认为古建筑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遒劲的斗拱和它们所承托的庄严的屋顶，从总体看，建筑的特征也恰恰在于天际线和屋顶轮廓。“我们古代的建筑匠师们积累了世代使用木材的特别经验，创造了在柱头之上用层叠的挑梁，以承托上面横梁，使得屋顶部分出檐深远，瓦坡的轮廓优美。”（《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37 页）

建国之后日渐浓厚的政治氛围，苏联专家的一再要求，加上全国建筑界在设计具有民族风格新建筑方面的困惑，使得梁思成逐渐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批判自己一贯认可的“国际式”建筑及其所体现的现代建筑设计风格，将其视作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在 1951 年 8 月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梁思成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了表述，他说：“我自己就该做自我检讨：过去虽然研究且熟识中国建筑历史和传统手法，而在实际设计建筑物时，却受了世界主义影响，曾做过不顾环境，违反传统的‘现代式’建筑，误以为那是国际主义的趋向。到解放后我才认识到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的结合，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23 页）

梁思成下决心从自己最熟悉的古建筑形式入手，结合现代建筑的元素，设计具有民族风格建筑。斗拱作为木结构建筑的重要部分，显然已不适合现代建筑，中国传统特征浓厚的屋顶是否可以与现代建筑结合呢？带着这个问题，梁思成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对于“大屋顶”的批评，“我们过去曾

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梁思成全集》第五卷，193页）如果说以往自己对“大屋顶”的批判是因为其设计上未抓住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只是单纯的形式上的捏合，就像是穿西装戴顶戴花翎一样，那么，如果能把握好传统屋顶与现代建筑结合的“度”，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探索、实践民族形式的新路子。基于这种想法，1951年，梁思成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新宿舍，开始尝试用传统风味十足的大屋顶来表现中国风格。由于新建宿舍造型优美，既方便实用，又与所处的中南海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

中南海宿舍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梁思成的信心。他指出：“今后中国的建筑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而‘民族的’则必须发扬我们数千年传统的优点。回顾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中国的建筑已充分地表现了其半殖民地性格。……今后应是民族的，我们只采取西方技术的优点，而不盲从其形式。……”“这次我所试拟的中南海几座宿舍形式，虽不算成熟，但自信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在文化方面有自觉的反半殖民地时代的西式翻本样式，努力恢复民族原有的优美成分（小的如瓦顶，屋檐，廊子，花台，大门，挂灯等，大的如整体的比例，墙面的处理，门窗的安排等)，就都表现革命的精神和在旧基础上创造新生命的力量。”（《梁思成全集》第五卷，82—83页）在中央科学讲座上，梁思成特意设计了两张想像中的建筑图，作为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一种方式的建议。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35层的高楼。他希望用这两张图说明两个问题，两个他一直在思考和积极探索的关于建筑的民族风格的问题。“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梁思成全集》第五卷，233—234页）

梁思成主张用传统的形式和“文法”来体现建筑的民族性问题，并非

想为全国树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在中南海这样特定的环境中新建筑可以带有浓厚的仿古风格，一般的建筑物，如宿舍、办公楼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至于满足人们艺术和美观的要求只能是比较次要的。毕竟仿古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在费用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平顶，而这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的新中国来讲无疑是难堪重负的。梁思成希望作为对建筑民族性问题的大胆尝试，“大屋顶”建筑能在建筑界引起广泛的争鸣，继而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更多、也更成熟的建筑设计方案。但出乎他的意料，正苦于缺少成功范例可遵循的建筑学界很快就将其无节制地推行开来，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关、学校、工厂如法炮制，以至于带有浓厚仿古色彩的新建筑不断涌现。梁思成不是革命领袖，他不可能具有一呼百应的权威，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盲目地学习苏联的风气才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何况，全国上下都搞大屋顶也绝非他的初衷。对于一哄而上的大量仿古建筑，梁思成尽管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对于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探索精神，但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对于其设计水平更是不满意。为此，他一再提醒全国的建筑界同仁：“设计民族形式的建筑时，不是找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摹仿一下，加一些民族形式的花纹就可以成功的。在设计工作中应用民族形式，需要经过深入和刻苦的钻研。”“新中国的新建筑必须从实际创作中产生出来，而且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摸索时期。这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我们对于建筑艺术——一种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其次，这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我们对于民族建筑传统和规律的掌握的迟速。不掌握规律，不精通，不熟悉，只是得到皮相，或生吞活剥地临时抄袭和硬搬，就难有成就。所以努力向祖国建筑遗产学习是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梁思成全集》第五卷，230—232 页）

仿古建筑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造成很大的浪费，显然与当时中国的国力是不相符合的。随着大量关于浪费问题的新闻报道的发表，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与此同时，苏联建筑界也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迭而转变了风向。1954 年 11 月召开的全苏第二次建筑工作者会议上，赫鲁

晓夫严厉批评了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问题。苏联老大哥的态度转变更加刺激了中国高层领导，很快发起了一场对建筑界一味仿古的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并将其拔高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批判就要有靶子，尤其是这种政治批判。作为建筑学界的权威，国际知名的古建筑研究专家，又是建国初期探索、研究建筑的民族风格的积极倡导者，梁思成无疑是首选。于是，批判的矛头很快集中到梁思成身上，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急剧升级。

1955年4月的《文艺报》发表的《反对浪费国家资金的建筑设计》一文指出"资产阶级的建筑设计思想却打起所谓'民族形式'的假招牌，说'建筑首先是艺术'，'我是以创造美去为人民服务的！'引导人们走向盲目抄袭的复古主义。他们从'清式''辽式'毫无批判地抄来一套所谓'法式'，不管建筑物的性质用途如何，将宿舍、办公室、学校、礼堂造成大大小小的宫殿和庙宇，用大屋顶、飞檐、石栏杆、毫无意义地在钢筋水泥的墙柱上涂漆描花，还装上斗拱、假梁假柱。"（松明《反对浪费国家资金的建筑设计》，载《文艺报》，1955年第6号）

对建筑理论的肤浅理解甚至一无所知和对于"错误"性质的无限拔高，成为这一时期批判文章的一致特点。一篇文章提出："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只是对反动阶级的关怀。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他的立场是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成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的论调。"（《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错误》，载《文艺报》，1955年第21号）

还有一篇文章更是不惜歪曲事实，认为梁思成"歪曲了'法式'的本意，阉割了'法式'的精髓。……他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以及一些苏联专家的著作中寻找证据，以他们的词句来装点自己。就这样他以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堂皇的形式，终于形成了一股片面强调'民族主义'的逆风。实质上这正如某些同志说过的，他已经把'适用、经济和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党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改造成为'美观和可能条件下的适用和经济'。这是梁思成先生隐藏在写着'民族形式'和'法式'

这几个大字的幕布后面的实质。”（《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新建设》，1955 年 12 月）

正如当年全国上下一窝蜂盲目模仿建造古建筑一样，对梁思成的批判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央甚至指定彭真负责，在颐和园畅观楼组织了专门批梁的写作班子，很快就写出 30 多批判文章，准备随时向“反动权威”梁思成发动进攻。同样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梁思成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甚至是学生，或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或出于明哲保身的无奈想法，或出于投机专营的卑劣心态，竟然也公开加入到批梁的队伍中来。至于批判的水平，曾参与领导此次批判活动的周扬的一段话或许最有说服力，他在参加北京市委组织的批梁讨论会上坦言：“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老专家呢？”

在巨大的压力下，梁思成无奈地屈服了，决心“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的屈服并非在建筑理论上的悔过，而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对于仿古建筑造成的惊人的浪费现实面前的反省。1956 年 2 月 3 日，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梁思成作了公开检讨，转天的《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检讨的全文。透过检讨的片段，我们或许不难感受到梁思成当时的心境：

“过去 20 余年中我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建筑的调查报告、整理古籍、中国建筑历史、都市规划和创作理论的文章和专书。这些文章和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

“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

“我对自己的错误是长期没有认识的。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感

情中存留着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假古董'，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接受这种'趣味'，让他们住在一个'保持着北京原有的城市风格'的城市里。"

"我之所以走上错误的道路是因为我的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为人民带来了损失，造成了祖国建筑的障碍。这才使我体会到技术是绝对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脱离了党就必然要犯错误。"

"我要像一个初进学校大门的学生一样，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水平，重新认识建筑，重新认识遗产；重新开始我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梁思成全集》第五卷，268—269 页）

尚未从失去爱妻的巨大悲痛中解脱，梁思成又不得不面对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双重压力，成为全国批判的"靶子"。尽管后来由于梁思成"承认错误"并放弃了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的意见，使批判逐渐平息下来，但梁思成心中的苦痛又有谁能去体味呢？更可悲的是，从此以后，作为一名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再也无法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戛然而止。还有一点，就是如梁思成所言，"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这看似颇有当年梁任公风格的话语却预示着一段更大的人生悲剧的开始。当年，梁任公是要努力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超越自我，如今，梁思成则是在一步步失去自我的过程中迷失了寻求真理的方向。

## 三、爱恨清华

经过50年代的政治风雨，昔日在学术研究和古建筑保护领域非常活跃的梁思成基本上沉寂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探索氛围一旦笼罩上阶级斗争的阴影，就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风采。从此以后，梁思成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领导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工作上，当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他还经常作为中国文化界的代表参加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可悲的是，梁思成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才是他理想的"天堂"。有一点值得欣慰，那就是梁思成于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这无疑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梁思成一生先后被两个政权的最高学术机构授予院士或相当于此的学术头衔，足以表明他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他尊敬的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8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他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掉。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的联系更加密切。当年经常到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梁家聚会的朋友也多半来自清华或出身清华。1933年到1934年，梁思成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终其一生，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从创业时的艰辛磨砺，到国徽设计竞赛的欢

欣愉悦；从守护京城古建筑的悲愤无奈，到文革期间革命小将的非人折磨，26 年的清华执教生涯，梁思成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的同时，也在自己挚爱的校园中饱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1956 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思成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当数《营造法式注释（上)》的完稿和完成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设计方案。

抗战中后期，梁思成曾集中精力对《营造法式》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在莫宗江等人的协助下，"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基本完成。抗战胜利后，由于忙于复原工作，之后又受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工作暂时被搁置起来。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天灾人祸的中国社会，社会局面稍稍稳定下来。1962 年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陈毅代表党中央提出应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科研工作予以支持，保证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还高度评价了梁思成过去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自 50 年代中期因"大屋顶"而遭受批判以来，梁思成还没有机会专心致志地开展古建筑研究。有了中央领导的鼓励，那埋藏已久的学术激情再次被点燃起来。晚年的梁思成曾经和林洙谈及这段感受，他说："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还提到了我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77 页）在清华大学的安排下，建筑系选派了三位优秀的年轻教师——徐伯安、郭黛姮和楼庆西担任梁思成的科研助手，组成科研小组，全力以赴开展《营造法式》的研究。李庄时期研究《营造法式》的骨干成员莫宗江也经常来参加他们的探讨。

多年以后人们才蓦然意识到，梁思成的古建筑研究之路始于《营造法式》，竟也终于《营造法式》。或许是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政治气氛，梁思成又一次展开了和时间的赛跑，他要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完成对《营造法式》的全部注释研究工作。有了李庄时期的经验和成

果作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便步入正轨，到1966年，除小木作和彩画作有待实例的补充外，其他诸卷已全部完成。对于这段研究工作，梁思成后来评价说："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真正收到了各尽所能、教学相长的效益，解决了一些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更令人高兴的是，他们独立地解决了一些几十年来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很遗憾，就在梁思成准备一鼓作气，向《营造法式》发动"最后进攻"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了。不仅研究工作彻底终结，梁思成本人也很快陷入到这场可怕的政治动乱之中，再也没有机会从事自己挚爱一生的古建筑研究了。《营造法式》的研究最终未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时隔17年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将梁思成等人的研究成果出版，定名《营造法式注释（上）》。

设计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也是始于196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中日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在中国政府和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外交取得很大进展。1963年适逢唐朝时期东渡扶桑弘扬佛法的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两国各地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和法会，中国政府决定在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建立纪念堂。在选择设计师时，负责此项工作的赵朴初先生一下子就想到了老友梁思成。他知道，梁思成不仅非常熟悉中国古代的佛教建筑，而且有着精深的研究，请他来主持这一关系重大的纪念性建筑的设计工作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梁思成在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设计任务的同时，还不禁回想起了童年时旅居日本的往事。为做好设计方案，他很快便和陈从周一起奔赴扬州，实地考察建筑地点。在对国内现存的佛光寺、南禅寺等唐代建筑和鉴真和尚当年在日本奈良建造的著名的唐招提寺金堂进行反复比较、研究之后，结合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选址的地形环境特点，梁思成最后确定了纪念堂的设计思路：保留唐招提寺金堂的基本风格的同时，增设一碑亭，既和纪念堂自然地融为一体，构成一庭院，又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唐代佛寺氛围。

由于种种原因，十年之后的1972年，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才开始正式动工兴建，一年后落成。又过了11年，1984年，鉴真和尚纪念堂的设计



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

被国家建筑工业部评为全国优秀设计一等奖。而此时，它的设计者梁思成已离开人世 12 年了。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研究彻底中断，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最终在一片茫然和无奈中告别了自己深爱的亲人和事业。

没有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灵魂被扭曲到何种程度。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刻意歪曲事实，因此，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

7 月底，随着工作组的撤销，清华园里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疯狂的革命群众开始大规模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很快，早已上了黑名单的梁思成便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熟悉他的人应该知道自从 1923 年的车祸之后，他的腰就再也没有恢复健康，甚至不得不长期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觉得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

对于梁思成和他的亲人们来讲，批斗只是文革噩梦的开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在曾经熟悉、但眼前却陌生一片的清华园中蹒跚而行。梁思成是头号反动权威，不管是哪一派革命群众都要揪斗他，往往“坐飞机”就是三四个小时，或是

大半夜。无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的身心遭受到巨大摧残，他的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了。林洙在回忆中讲述了一件痛苦的往事："那是一次批斗系总支书记刘小石的会。主攻对象是刘小石，梁思成只是陪斗。在批斗会进行到一半时，很受思成器重与爱护的一个学生走上了讲台，他自称早在'文革'前夕就收集整理了梁思成的反党言论上报党委。他揭发批判刘小石，说在他们整理的梁思成的材料中，刘小石把一些关键的'反动'言论给删去，包庇了'反动权威'。那天晚上我扶思成上床时，发现他极度的虚弱，还有些颤抖。他喃喃地说：'没有想到啊！真没有想到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80 页）后来批斗虽然停止了，但人格上的侮辱却在不断升级。革命小将们时不时地冲到梁思成家里，像耍猴一样勒令梁思成站在自家门前交代罪行，甚至强迫他披着毛毯站在那里任人围观。师长的尊严、学者的人格，在这些疯狂的革命小将们无知的哄笑声中毁灭殆尽。

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只有 24 平方米、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当时梁思成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尤其怕感冒。就在他们搬进这间小房子的当天晚上，灾难就发生了。林洙回忆说："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 10 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内还是处于摄氏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糊上了报纸，但怎么也贴不上，浆糊一抹上很快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零下 2 摄氏度、零下 3 摄氏度、零下 5 摄氏度。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并为思成不断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仍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82 页）即便这样还远未达到革命群众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甚至是无耻勒索的"反动堡垒"。从 8 月红卫兵"破四旧"查抄梁家开始，任何造反派组织都可以在任何时间闯进梁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稍有不满，便对梁思成和他的家人拳打脚踢，

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几乎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多年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稿子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由她保存，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再往后来，实在没什么可抄拿的了，便开始了公开的经济勒索，“无产阶级造反派”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关于梁思成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其中有两张最令人触目惊心。一张是漫画版的大字报。在一次对建筑系领导的集中批判中，除去普通的大字报外，还为每一名系党总支成员和系领导配上了一张大幅的漫画像。漫画中的梁思成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在50年代初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的一句话。大字报批判他“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北京城墙，留恋封建社会，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毒害青年。解放前夕去美国讲学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卖出中国的古建筑，贩回资产阶级的腐朽建筑观和教学制度”。

另一张带有归纳性的大字报将梁思成的重大“罪行”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标题是“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这篇大字报“揭批”了梁思成的“四大罪状”：第一，梁思成在1966年接见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法国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第二，梁思成在1947年代表国民政府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第三，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第四，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对于这些帽子大得惊人、处处暴露出愚昧无知、肆意颠倒是非黑白的“反动罪名”，梁思成除了默默地承受，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呢？或许正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反而促使梁思成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建国之后，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一度有所扭曲的思想反而得以解脱和纠正。例如关于大屋顶问题的重新认识，他告诉林洙：

我承认，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





> 的思想影响很深。但是在30至40年代我是反对普遍建造“大屋顶”的，为什么到了50年代，我反而积极地提倡搞“大屋顶”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在客观上受当时“学苏”、“一边倒”国策的影响。解放初期，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无一不批判“资产阶级建筑观”。我这个资产阶级学者，自然是“众矢之的”。在带有政治压力的学术批判下，使我多少盲目地把过去形成的“建筑观”否定了。认为那些全是资本主义的“建筑观”，而把苏联搞的“复古主义”、“折衷主义”这一套作为“新事物”、“先进经验”照搬、照学了过来。主观原因则是由于我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她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但是50年代初所盖的“大屋顶”建筑，却很少能达到我所想像的“美”的标准，使我对“大屋顶”越来越灰心——就是说，对“大屋顶”这一古代的建筑造型，是否适用于现代新建筑发生了疑问。（《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71页）

即使是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日子里，梁思成仍天真而又坚定地希望早日弄清问题，继续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下面这段话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

> 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77页）

文革开始后的一天，梁思成和林洙整理残存的图书，突然看到一对汉代铜虎的照片。艺术的美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梁思成，沉浸其中，并脱口而

出“你看看，眉（指林洙），你看看多……”在“美”字就要出口之际，梁思成突然条件反射似地回到了现实中来，“美”是当时犯忌讳的一个字，于是又下意识地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话音未落，梁思成和林洙也不禁被这不伦不类的话逗得大笑起来。这笑声中满含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被扭曲的时代和生活，不正是梁思成心灵创伤的真实体现吗？（参见《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81页）

无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迅速恶化，清华大学医院又拒绝为他治病。几经辗转，在一位好心的大夫的帮助下，才在北医三院得到了治疗。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梁思成的情况后，得以转到北京医院继续治疗。

随着文革的发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加上北京市的六个工厂，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六厂二校”成为全国的样板。1969年1月26日下午，执掌清华大学大权的工宣队、军宣队突然召开全校大会，传达由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文件谈到对待五种人的不同政策，一是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政策；二是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三是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四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五是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毫无疑问，梁思成属于第四类。

文件中指出：“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共有十四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的批判，要给以出路。”

文件进而指出：“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曾任副校长……）尤其如此。”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

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使师生员工受到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

“同时，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是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个别部分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 年）

在这份荒唐的文件中，梁思成很“荣幸”地成为了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并得到“给出路”的宽大处理，“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虽然不久以后，梁思成被恢复了党籍，但他却彻底沉默了。会后，工宣队队员们竟然特意跑到医院，向正在住院治疗的梁思成传达了对他的宽大处理决定，并要求家属谈体会，表忠心。这些无知的人啊，他们以为自己的恩赐会令梁思成感激涕零。他们错了，他们丝毫不懂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格。对梁思成来说，这份“恩赐”无疑是对他精神上的彻底打击。身体上的折磨他丝毫不畏惧，“建筑”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满心希望通过批判找出自身的不足，然后再全身心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并因此而保持着精神上的动力。但从此以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完全崩溃了。梁思成用行动表达了无比的苦闷和抗议：1 月 26 日到 2 月 27 日，他没有在笔记本上写一个字。林洙的一句感慨或许最能说明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88 页）梁思成迫切希望找到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但他始终未能如愿。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病情不断恶化。

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的建筑大师，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们能来和他一同探讨革命的学术问题，以澄清认识，改造自我。但就像林洙记忆中的那样，“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很少有人光顾。（《梁思成、林徽因与我》，2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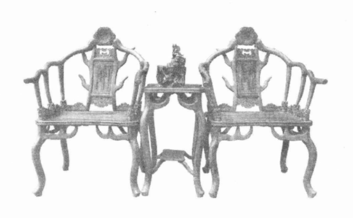
1972 年 1 月 9 日，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30 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清华园纪念这位学术大师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说，梁思成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在苦苦探索的问题，答案已经找到了。



# 第八章

## 尾声——于平凡中传承家风



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家的众多儿女，他们大多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大家庭。尽管其后代鲜有人逾越梁启超的大师地位，渐为平常百姓家，但不可否认，薪尽火传，百年梁家的风格与传统依然在其后代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得以延续和发扬。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有两个孩子，女儿梁再冰和儿子梁从诫。如今他们也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梁再冰1929年8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这是梁家的长孙女。她那位对子女关爱有加、尤其偏爱女孩的爷爷——“饮冰室老人”刚刚于半年前去世。为纪念最敬爱的父亲，年轻的梁思成夫妇为自己的女儿取名“再冰”。梁从诫1932年8月出生，从诫，从诫，跟从李诫也，为儿子取此名，不仅表达了梁思成夫妇对他们心中的英雄——《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无限敬意，也表达了他们探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巨大热情和满腔希望。

在梁再冰和梁从诫的成长之路上，父母及整个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他们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们在无忧无虑中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父母对我们关心而不溺爱。我（指梁再冰）识字后，父亲买了许多书给我看，但从不对我进行‘注入式’或‘填鸭式’教育。在我们家里，儿童可以提问和发表意见，但不许哭闹撒娇。他们出差时，我总是若有所失，非常想念他们。他们有时写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把我俨然当成一个大人看待。”（《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34页）梁从诫则这样回忆自己的妈妈：“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30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

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樱花。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建筑师林徽因》，91页）20世纪30年代是梁思成夫妇从事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最繁忙的一段时期，然而无论工作多么繁重，他们对子女的关爱丝毫没有削减，全家团聚的时候，总是笑语盈室，温馨的氛围令我们不禁想起昔日的“双涛园”和“饮冰室”。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震动了全中国，也彻底打破了梁家的宁静。誓死不当汉奸的梁思成夫妇义无返顾地扶老携幼踏上了南下的流亡之旅。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梁再冰、梁从诫姐弟俩渐渐长大了。父母的爱国情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豁达乐观人生态度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们。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那时虽然只有五岁，但确实已经亲身体验过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死亡的威胁。大人们悲壮的爱国激情和民族危机感，随着歌声溶进了我的血液。我是用一个‘抗战孩子’的全部心灵在唱。”（《不重合的圈》，408页）

流亡到昆明之后，梁再冰、梁从诫姐弟进入当地的一所小学学习。有一天，梁思成很严肃地将两个孩子叫到身旁，郑重地嘱咐他们：在学校里，任何时候也不准告诉别人自己的祖父是谁。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借祖父的名声来炫耀。这件事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并成为他们做人的一项原则。

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这样自豪地描述她的孩子：“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的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的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长成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他能操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和粗野的本地同学打交道。但在家里他倒像个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有时专心制作各种小玩意儿。”（《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71页）

有一幅摄于1941年的照片将梁家的真挚情感充分表现出来：重病中的

林徽因无力地躺在床上，满怀慈爱之情的双眼凝视着端坐在床边的小从诫，懂事的再冰亲昵地靠在妈妈身边，微笑地看着妈妈和小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动人场面啊！

乐观豁达的心态不仅帮助梁家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而且留下了一串串的欢声笑语。在李庄时，梁再冰常患感冒，于是写了一张条子贴在院中的大树上，号称“出卖伤风感冒”。40年代初，梁思成把儿子带到重庆，并为他选择了南开中学。吴荔明讲了这么一则趣事：南开中学有一个极严格的校规，男生一律剃光头。梁从诫自己舍不得剃光，于是留了个小平头，梁思成发现后让他再去剃，从诫无可奈何地剃了个光头回来。生性诙谐的父亲悄悄地对吴荔明说：“他就是怕当和尚。”顿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62页）

抗战胜利后，梁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生活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1946年9月，梁再冰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说起梁再冰的考学，还有一段故事。梁再冰先报考清华大学，但却未被录取。林徽因得知消息后曾一度怀疑清华判分有问题，于是调取了梁再冰的试卷，经审核，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而没有说情通融。

之后的中国由于政权更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家也毫无例外地卷入这场时代激流中。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目标激励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热血青年。1949年春天，年轻的梁再冰和众多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踏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当时北京各大学的文科学生几乎有一半都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梁再冰和父母拥抱告别之后，满怀憧憬地离开了熟悉的北京城，崭新的生活由此开始了。

1950年6月，梁再冰从汉口新华社四野总分社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工作。60年代，曾在国外工作了一些年。尽管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起伏跌宕，她与父亲也天各一方，并一度产生了一些误会，但父女深情依旧。70年代初梁思成病危期间，梁再冰和其他家人一起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历程。

梁从诫于1950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研究生毕业



病中的林徽因和儿女

后分配到西南边陲的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1962年调到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梁家受到巨大冲击，身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之子，梁从诫也被卷入其中。1969年，被迫辞别年迈的父亲，下放到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这一去就是10年。其间的种种磨难我们无须去刻意描述，但无论在多么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都始终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文革结束了，梁家重获新生。1978年，梁从诫从江西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并曾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1988年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1989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除了自己繁忙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外，梁从诫在整理、出版父母生前作品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在费慰梅及许多建筑界前辈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他克服种种困难，将父亲于抗战后期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译为中文，1992年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之后，梁从诫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文集·建筑卷》和《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将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建筑学成就和文学天赋完整地展现给当代的读者。

梁思成先生一生都在为保护和发掘中国古建筑而奔波忙碌，甚至不惜抛却身家性命。在他眼中，那些散落四方的古建筑才是自己终生的最爱，他说：“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26页）梁从诫并未继承父业，而是学习了历史。然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在从事了多年教育、学术和编辑出版工作后，竟在花甲之年改行，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开始了一项全新的事业。也正是这一执著的转变，将他的事业真正推向了巅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他所选择的领域和他父亲毕生从事的古建筑保护有着众多一致之处，只是，前者范围更广，责任更大——那就是，中国的环保事业。

据梁从诫讲，是不经意中看到的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世纪80年代，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辑，一篇关于环境问题的来稿深深地打动了他。文章作者尖锐地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规模小、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势必成为无法估量的污染源，对周围环境和生态造成

难以弥补的破坏。从这篇文章中，梁从诫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但又是极为可怕的信息，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正在遭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他说，正是那篇文章唤起了他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在许多国家中，环境的恶化由来已久。但对今日中国来说，它却尤为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其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以至人均占有的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少；其经济活动规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而她借助科学和技术知识以改变自然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加之，对于千百万普通中国人来说，那种追求物质享受和舒适，甚至渴望成为‘速成富翁’的冲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们很难想像，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怎么能够永续地、健康地维持下去。”（《不重合的圈》，318—319 页）

1993 年 3 月，梁从诫与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等人探讨在中国建立民间绿色组织问题，正式开始了投身民间环保事业的历程。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对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和我家庭的未来极端重要，而目前仍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忽视的事情。”（《不重合的圈》，318 页）当年的 6 月 5 日，他们在北京西郊“玲珑园”公园组织了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恳谈会，六十余人参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组织的民间绿色讨论会，人们后来称之为“玲珑园会议”。几经周折后，经文化部办公厅同意，民政部社团司注册，1994 年 3 月，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获准成立，梁从诫任院长。根据“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宗旨，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以玲珑园会议参加者为主，“自然之友”有了第一批会员。

一个民间团体从事环境保护，难度之大，丝毫不亚于当年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建筑。我们仅举两个小例子：1993 年 11 月，梁从诫等四人应邀到某著名高校作关于环境问题的讲座，听众不足 30 人；一年之后，梁从诫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听众只有 5 个人。坦率而言，这还只是公众参与环保意识薄弱一个方面的困难，至于说经费短缺、政策法规薄弱、地方保护等方面的困难，更是不胜枚举。对此，梁从诫的态度异常平静，他深知：环境保护不仅需要无畏的勇气与激情，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坚定不

移的信念，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以环保教育为主，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就像“自然之友”在群众性环保实践活动中确立的基本原则：一不唱绿色高调，二不做绿色“救世主”。他们深知：“‘还我青山，还我绿水，还我蓝天’，不论喊得多么激昂、浪漫，没有包括自己在内的踏踏实实的行动，什么都不会改变，或只会变得更糟；而没有公众的自觉参与，少数‘环保精英’不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也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不重合的圈》，282—283 页）当年，面对台下听讲座的 5 名观众，他坚定而自信地说：如果我能够在你们 5 个人心中种下 5 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如果环保这个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来做了。正因为它不被关心，被遗忘，所以我们才要来做，并把它坚持下去。2001 年应邀到香港凤凰卫视第 33 期世纪大讲堂做讲座时，梁从诫和主持人谈及一件环保小事：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去全国政协开会，却被警卫拦在门外，理由很简单，来开会的人都乘车，哪有自己骑自行车来的？

就是梁从诫，这位当初对环保知之甚少的学者，在花甲之年，以全部热情和精力投身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宣传与保护工作，成为一名三句话不离环保、受人敬重的环保宣传家和身体力行者。从 1993 年起，梁从诫先后到各大、中小学作过近百次环保讲座。1998 年 7 月 2 日到 12 月 31 日，应邀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生热线”周四专栏“自然之友”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在自己参加的历次政协会议上，梁从诫均提交经过精心准备的环保问题提案。1996 年 3 月，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梁从诫作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大会发言，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另外，自组建自然之友以来，先后接受了上百次国内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十几篇有关环境问题的文章，积极宣传、普及环保知识。

1998 年 6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梁从诫应邀代表自然之友参加 7 月 2 日在广西桂林举行的克林顿总统与中国民间人士关于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会。（详见梁从诫《金丝猴，“那是我的表亲！”——与克林顿总统会见记》，《不重合的圈》，251—256 页）1998 年 10 月上旬，梁从诫在一次

与英国驻华大使见面时谈起了藏羚羊的保护和藏羚羊绒在英国的非法市场问题。深表同情的英国大使当即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英国首相布莱尔即将访华的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交易，以支持中国开展的反盗猎藏羚羊斗争。很快，梁从诫便写出了公开信，并附上一组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英国驻华大使转交布莱尔首相。10月7日，梁从诫应邀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又当面和他交谈了藏羚羊保护问题。为了杜绝盗猎，保护正在遭受灭绝性捕杀的藏羚羊，吁请布莱尔更有效地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羊绒的非法贸易。布莱尔于次日复信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信中布莱尔首相明确表示："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1999年2月，梁从诫应邀赴布鲁塞尔参加欧洲议会绿党党团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民间环保运动发展情况。1999年9月，全球《财富》论坛年会在中国上海举办，梁从诫应邀参加，并在以"能源和环境"为主题的大会上发言。在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时，他质问与会的国外工商业巨子："你们纷纷来到中国，无非是想在中国这块大蛋糕上切更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方式，中国的资源能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然而，从寥寥的掌声和冷淡的反应中，梁从诫再次感受到了环境保护的艰难。

梁从诫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从野生动植物保护，到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从中国北方的沙漠化到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等等。2000年，梁从诫应中央电视台《人与自然》栏目主持人赵忠祥邀请就野生动物保护话题进行探讨。这次电视访谈曾被有关媒体称为"梁从诫与赵忠祥的世纪对话"。梁从诫系统阐述他对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危机根源与解决途径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面对日益严重的野生动物生存危机，梁从诫大声疾呼：人与动物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野生动物的

绝灭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

中央决定开发西部后，西部热一浪高过一浪。梁从诫敏锐地意识到西部热背后严峻的环保问题，他指出："开发西部，必须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把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2000年3月11日，中新社）

2001年3月，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梁从诫接受记者采访时深刻阐述了当时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特别谈到环境教育的全民化问题，他指出："现在很多高等学校开设环保、技术性环保工程方面的课，跟我们所讲的环保意识教育是两码事，这完全是一种工程、技术课，学会这种技术课，他未必有很高的环保意识，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我认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环境意识的教育，每个公民都认识到自己在改善环境、不污染环境，而且保护环境，自己有什么责任，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范围内尽量少制造环境压力，尽量少污染环境，而且特别是在治理环境需要负担费用时心甘情愿，如果政府要求公众来分摊处理环境问题的费用，老百姓可能不干，这里面就有一个环境意识问题。我们要保护环境，就要承受某种程度的不方便。资源上、环境容量、人的消耗量这三者能不能达到平衡，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环境意识教育，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少扔塑料袋，而是你究竟怎么活。"（《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5日）

1995年7月9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的文章，透过这不长的报道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梁从诫的真实性格和品格。记者这样写道：

> 西北地区许多基层文化站十分简陋，然而在接待全国政协群众文化调查组时，却车辆浩荡，饭菜丰盛。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疾呼——
>
> "西北地区那么穷，为什么还要这么铺张？能不能省下搞接待的钱干点正事？"
>
> "我看了一路，至今还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许多乡文化站和基层文化单位确实太寒伧、太可怜了。但我们能不能从各方面

挤出一些钱来给他们一些支持呢？我们去时，有那么多陪同的人，动用了十几辆小车，浩浩荡荡。”

“我们走过几个省，接待规格都很高。其实，我们是来工作的，并不需要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需要顿顿大鱼大肉上酒上饮料。对于西北地区的困难，我们都能理解。如果宣布我们只吃小米粥或最简单的饭菜，把钱省下来支援没钱的文化站，我们都会鼓掌支持的！”

打开梁从诫领导的自然之友大事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成立仅十余年的民间环保组织，虽然发展途中遍布荆棘与坎坷，但它却从未退缩，而是迎难而进，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成长之路。从最初的四位发起人，到现在已有了遍布全国的上千名个人会员和三千余个团体会员。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环保活动均由他们发起并推动展开。在中国首次开展民间群众性环境教育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办普及环保知识的“绿色讲座”，听众达到数千人次。出版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儿童环保读物——《绿色家园》。在中国首次进行“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连续三年对全国主要报纸的环境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对其环境意识予以科学评估。通过全国政协等多种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大量涉及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江河源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建议。在中国首次组织志愿者自费到内蒙古沙漠和陕北的植树活动，并多年坚持。首次举办民间性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交流培训活动，两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德国、荷兰就青少年环境教育问题进行参观学习。为宣传保护野生鸟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组织了第一个群众性业余观鸟小组。为保护生态资源，制止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的恶潮，1999 年组织北京多家环保团体共同发出“不买、不做、不吃野味”的倡议书。与国外环保组织和传媒频繁交流，宣传中国的环保政策和民间的环保活动。此外，广为社会关注的滇金丝猴保护、长江源生态保护及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的保护等环保焦点问题，也正是由于自然之友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和人士的积极参与，并向中央领导同志和新闻媒体及时反映有关情况，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不是他

们的出色工作，也许滇金丝猴——这种灵长类中除人以外唯一的红唇动物，将在失去最后一块栖息地之后而永远灭绝；如果不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甘愿倾家荡产的英雄之举，也许身姿矫健、生态价值极高的藏羚羊很快就会在偷猎者的枪声中彻底消失，可可西里也将成为一块野生动物的伤心地……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在环境污染与破坏日益加剧的今天，如果没有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加入到锲而不舍的环境保护实践中，也许会有更多的环境悲剧发生。

由于梁从诫及其领导的自然之友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中的开拓性工作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们的行动逐渐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并赢得一系列赞誉。1995 年 10 月，梁从诫在日本东京获得由日本《每日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联合颁发的第一届“亚洲环境奖”；由于多年来积极参与中国文物的保护活动，1998 年，梁从诫被文物界推选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1999 年 7 月，梁从诫获得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发的 1999 年度“地球奖”；1999 年 12 月，为表彰梁从诫在环境教育和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突出贡献，国家林业局授予其“大熊猫奖”；2000 年 8 月，梁从诫荣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此奖以菲律宾前总统命名，旨在表彰亚洲地区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曾被国外传媒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2000 年 12 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在 2001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因为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梁从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2 年，受聘担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3 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同年的 12 月，当选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2004 年 9 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2005 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在荣誉面前，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梁从诫依旧那么平静。在他看来，还有太多的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他去做，荣誉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如果说这些荣誉还算有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们似乎可以从一个方面证明：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普通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意识正在逐渐增强。也正是基于此种思考，在 1999 年“地球奖”颁奖仪式上，梁从诫的一句朴实无华的答

谢辞道出了这位中国环保先行者的心声："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和他的父母一样，梁从诫从未躺在名人之后的金字招牌下，而是对自己的出身很淡漠。正如他所言：如果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一个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学者和民间环保活动家，梁从诫在自己的领域忘我地工作，不懈地追求心中的绿色梦想。"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在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实践中继承并体现着百年梁家的人格与风格。